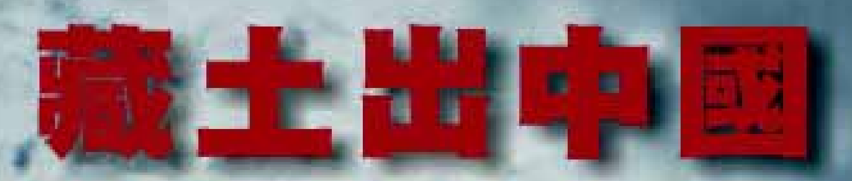


達蘭薩拉啟示・流亡西藏訪談

北明著



北　明　生於北京，下放山西，後舉家遷往農村地裏刨食為生。當過軍隊文工團員、工廠磨工、機關機要員、聲樂系學生，戲劇評論員、報紙記者、刊物編輯和文學美學助理研究員。著有藝術人類學專著《史前意識的回聲》、紀實文學《告別陽光》。東歐崩潰之後出離淪陷之地，漂流自由之邦。為養家糊口稻粱謀，中輟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研讀，主持美國東方語種媒體《華盛頓手記》專題，以「現代漢語描述英文世界，西方觀念解讀東方故事」十數年至今。為索還歷史本相，求證生存意義，研讀寫字，涉獵中國近代諸般重大歷史事件及熱戰、冷戰、非戰時代中美相關事物。有關庚子國難系列、韓戰系列、柏林牆系列、抗戰中的美國系列、解讀美國系列、美國對華行為外交系列百萬文字著述均屬被禁之列，或束之高閣淪為石經，或網上漂浮不知去向。不意被稱為旅美作家，忝為獨立學人。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達蘭薩拉啟示〉是散文隨筆，記述作者對流亡西藏社會與人物的觀察、感受與思考。在這一部分文字中，作者試圖尋找流亡藏人在異國他鄉重建西藏文明的動力和源泉。

下篇是〈流亡西藏訪談〉，針對大陸流行的關於西藏的官方宣傳，瞄準西藏問題種種，讓海外的漢、藏兩族專家、學者、作家發言。由於言論封鎖，他們的觀點和看法始終沒有機會與大陸公眾見面。通過這部分內容，讀者可以粗略了解西藏六十年來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真實情況。有助於辨認和解讀黨國宣傳部關於西藏的一貫說法。

封面圖片：達蘭薩拉轉經山上
封底圖片：萬尺高空俯瞰印度
(北明攝影)

閱讀這本書，使我的心靈震顫：那些歷經千難萬險逃出死地的藏人，心靈沒有被仇恨淤塞。從領袖到普通民眾，精神遼遠豐厚；性格仁慈寬厚；意志堅韌頑強；信仰矢志不渝……。對這個偉大的民族，我唯有仰視。我希望與所有我的漢族同胞分享這本書的全部內容。

—— 子仲(讀者)

這是一部訪問日誌，貫穿記者的敏銳和詩人的激情。有關西藏，它讓我們躲過喧囂，傾聽到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內心之聲，她的良知與道義，悲憫與傷痛，歉意與理想。這是漢族姊妹向藏族兄弟的致敬。

—— 一平(詩人)

這部神奇的史詩 —— 一個堅強民族的流亡與重建 —— 第一次得到富於精神深度的揭示。這本書客觀而公正，沉靜而富於靈性，閃動著哲思與詩意的激情。道義的正大、精神的高貴和文字的雅緻獲得美學上的高度整一。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和《熱情奏鳴曲》似乎從始至終迴旋在字裡行間。

—— 孫乃修(學者)

此書所描述的藏人逃離中國的大遷徙，是當代最偉大的群體性精神事件，是三千多年前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當代翻版。通過北明敏感溫柔的文字，你可以觸摸到構成這一當代史詩的各色人物，從達賴喇嘛、僧俗菁英直到那些翻越喜馬拉雅山的少年，並走入他們的精神世界。

—— 鄭義(作家)


ISBN 978-962-339-089-7
9 789623 390897

HK$ 85.00

藏土出中國

達蘭薩拉啟示・流亡西藏訪談

北明著

田園書屋出版

藏土出中國

達蘭薩拉啟示・流亡西藏訪談

目　錄

上篇　達蘭薩拉啟示

下篇 流亡西藏訪談

序

孫乃修

一

羅曼羅蘭凝望著夕陽暮色，頓覺心中靈光一閃，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面影忽然從心靈中一躍而出，恍若一輪紅日跳出大海，他驚喜地立刻訴之筆端，像貝多芬忽來靈感立刻將一串旋律傾瀉筆下。

當北明面臨西藏苦難獨自沉思時，她心中一定有過這樣的靈光激射，一定產生過荊棘般燃燒的道義激情，催放出一串燦爛的思想花朵。這本新著《藏土出中國》，帶著思想的芬芳，在我們面前敞開，不正是那顆美好心靈開放的一叢鮮花麼？

像乘著阿拉伯故事中那條神毯，我們伴著北明一夜間橫跨太平洋飛臨印度，又跟著他們一行，喬叟筆下快活香客似地談談笑笑，朝達蘭薩拉聖城一路悠悠而去。

從擁擠雜亂、乞丐成群、充滿世俗色彩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喜馬拉雅山上心思純淨、人人上進、充滿靈的光環的達蘭薩拉，我們跟著北明靈動而含蓄的筆鋒，不無感慨地進入比較文化學和比較人類學的思考。這是她

此行的一個重要文化發現和強烈感觸。她告訴我們，藏人非常善良，藏人非常虔誠，藏人沒有乞丐。她止住筆鋒，只給我們講一個個故事和見聞。她羈勒得好。藝術需要含蓄，沒有羈勒就沒有藝術。

她那些故事和人物深含的文化意蘊是明顯的：西藏民族的人生是真誠、純淨的，沒有仇恨、沒有世俗氣、沒有虛偽、沒有欺世盜名，從領袖到平民，從老人到孩子，都有兒童一樣的真純心靈；他們有高度的自尊和人格意識，不肯伸手索求，沒有乞求他人哀憐的習性，他們沒有貪鄙、自私、金錢欲望，他們是人間最富靈的氣息的民族，這對高度物質化或被物質異化了的民族是一個強烈針砭。這一人類文化學思考，在書中時而閃動，像奏鳴曲中的一個濃縮而有待擴展的母題(Motif）。

居住在喜馬拉雅山上、與冰山雪蓮、蒼天雄鷹一同生活的西藏人民，是離上天和自然最近的民族。他們和下界那些沒有思想信念、沒有神聖之物、沒有靈魂家園、沒有道義觀念、只知權欲物欲、整日行屍走肉、胡吃海塞的俗輩們異趣異調。來到達蘭薩拉的人們，越向山上走，離物就越遠，離靈就越近。

二

讓我們跟著北明的活潑筆鋒，聽著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睜開一雙大眼，懷著虔敬心情，一路觀賞奇異文化景象，與那個生活在靈界的民族做心靈對話，從崇高的人類精神層面去領悟和熱愛這個民族。

古人唱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我們本來純潔的心靈後來蒙塵太多，我們本來明澈的眼睛後來變得渾濁，在登山去達蘭薩拉前，我們需要先蕩滌心靈的灰塵，淨化我們的眼睛，洗潔我們的塵纓。山上的兄弟姐妹們有著比我們純潔得多的心靈，我們不可把塵俗帶上去。這是進山的第一個心靈律條。

在作者走上靈山、一路沉思的敘述織體裏，漢族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和藏族平民單巴次仁一家的苦難命運，像奏鳴曲的第一主題和

第二主題，相互映發，時時復現，構成情思的迴旋和文化的變奏。楊志軍的詩，有如行吟詩人的歌，一個漢族文化流浪者在尋找精神家園，詩思蒼涼，素樸真情，隱喻漢族人對藏族文化價值的認同；單巴一家雪中逃難、家破人亡，隱喻西藏民族自由生活和心靈家園的毀滅。漢族詩人風塵僕僕走向西藏，尋找人間的真和愛，而西藏平民全家卻不得不揮淚翻越雪山逃離家園，尋找安身立命的一塊心靈樂土。這種反向追尋，顯示雙重悲劇，產生強烈的文化反諷和深刻的思想寓意。

北明的文化觀照和反思，在三個層面呈立體式展開：一、漢藏知識分子的心靈層面；二、東西方文化層面；三、西藏文化和印度文化層面。

從藝術美學角度看，這本書有如一首交響音詩。音樂織體和詩的吟唱交織一體，幾個有意味的主題和動機時隱時露，在手指下飛快掠過，有如燕尾剪波，輪流復現而跌蕩起伏；悲愴的流亡曲、寧靜的山中沉思、熱情的鳳凰涅槃之歌(本文涅槃一詞即英文之Nirvana，源自梵文)，交融成意味深長的文化反思和別具一格的心靈歷程。

三

達蘭薩拉是流亡西藏人的新家園，像在災難和毀滅中保存生命物種的諾亞方舟，它成為西藏民族新生命的搖籃。它的出現，顯示流亡西藏民族拒絕黑暗、超越苦難；它的成長，標誌這個民族的堅強和新生。

流亡是一種不幸，沒有信念尤為不幸。沒有信念的流亡民族，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例如漂泊歐洲的吉普賽人。然而，對於一個有信念的民族，流亡不過是抗爭命運、維護尊嚴、重建民族、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

這是一個獲得心靈自由、獲得新生的民族，一個走向文化重建、社會進步的民族。達蘭薩拉是西藏民族文化生命的象徵，它充滿蓬勃的生命力，洋溢著自由的氣息，它的社會生活內容在悄悄變化，它的政教合

一式社會管理模式也在走向民主和現代化。五十年來流亡西藏民族在達蘭薩拉的奮鬥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民主和文化自由的樣板，為未來洪水滔滔之際救世於危難、整合西藏民族而提供一個嶄新的社會範式。

一個山外的達蘭薩拉，一個對岸的台灣諸島，脫枝而去者皆獲新生。

北明對達蘭薩拉社會——從宗教領袖、議會首長、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和學校兒童——做的細致觀察和採訪，第一次向讀者展示這個處於文明發展中的新型社會風貌。她的富於沉思性質的第一樂章〈達蘭薩拉啟示〉，柔板似地把我們輕靈引入新鮮的歷史情懷。

四

一個民族不可沒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和偉大人物，不可沒有胸襟開闊、氣質恢宏的知識分子。古代之孔子、佛陀、耶穌皆是，二十世紀之孫中山、愛因斯坦、羅素、甘地、薩哈羅夫亦是。偉人的存在，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核心和心靈支柱。他們以道義和人格凝聚民族心靈、指引民族前進，絕不靠權杖和暴力。

西藏民族不幸中的大幸在於有人格崇高、心靈偉大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做民族的核心，為這個民族遙指未來。就此而言，西藏民族比漢族幸運。有精神界領袖，他們流亡而心靈不散；漢族卻有太多唯權唯利唯物唯騙的饕餮勢利之徒混充領袖，握重權者無心肝，居高位者無德行，抗爭者形同散沙，戰鬥者缺乏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是世界級偉人。他的人格、道義、悲憫情懷超越宗教而成為中國和世界共同擁有的精神和文化財富。

北明在達蘭薩拉對達賴喇嘛的訪問，真實記錄他對解決西藏問題持的明確立場和理性觀點，慨然回顧一系列重大歷史往事，生動勾勒出這位大智大勇者的智慧風貌，一掃俗界庸人對他的誣蔑和歪曲。在

甘地陵園倘佯沉思中，北明靈思風發，若有神助，激情從心底噴薄而出，以汪洋恣肆之筆，縱橫於二十世紀政治文明歷程，高揚理性和平抗爭這一現代文明價值，對達賴喇嘛的智慧和人格作出高度評價。

五

十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學下帷讀書，西藏蒙古史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我生命中陽光燦爛、靈光四射時期，靈感風發泉湧、不擇地而出。〈轉世靈童制度斷想〉一文就是那時繽紛思緒中的一朵心花。達賴喇嘛回憶童年時在布達拉宮每日黃昏聽著外面哨音、望著牧羊人夕陽暮歸時那種憂鬱眼神、孤獨心情和心靈渴望，至今繚繞在我心間。次年，達賴喇嘛六十華誕，飛來哈佛。我有幸與他相見，親密握手，共進午餐。那日天朗氣清、陽光明媚。

這是天降大任的命世之才，歷經千年不遇之苦難、半個世紀罡風苦雨之磨礪，歷史似乎註定要鍛造這位英雄偉人，在佛滅民傷、地陷天傾之際呼喚他挺身救世，毅然引領民族沖破羅網、拋棄黑暗、出走家園、重建民族、走向未來的輝煌。

與班禪喇嘛備受凌辱的黯淡命運形成鮮明對照，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決然出走，乃英雄之決斷。這是信念的尊嚴、人格的尊嚴、民族的尊嚴之必然。他帶領人民跨越風雪迷茫的雪山峻嶺，走上民族流亡與重建之路。這是西藏歷史上最悲愴、最偉大的英雄史詩。

現在，他微笑著站在我面前，伸出熱情的雙手，眼鏡後面是一雙含笑而富於睿智的眼睛，鮮紅的袈裟從堅實的臂膀輕靈地飄垂。

他的微笑來自心底的佛性，他的平易來自心靈的美德，他的率性自然，來自天生的性靈，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顯示一種大才無礙的精神氣象。那種襟懷坦蕩的人格風度、高雅純真的精神態度、談笑風生的高朗氣象，待人接物的大家氣度，構成不可抵禦的性格魅力和強大的文化征服力，使竊據世俗權位之庸夫俗子自慚形穢而心懷畏懼，他們仰面唾天

而自污其面。

這個來自青海農家的三歲靈童在藏傳佛教文化鐘靈毓秀之氣的奇妙哺育下，成長為民族危難之際的英雄偉人，令世界人民愛戴的精神領袖，這不是一個文化奇跡麼？他無須俗界威權，無須博士本子，無須吹捧頌揚，然而他的精神和人格代表著民族的勇氣、人類的智慧和人的尊嚴。

高山雪原上的西藏民族有福了，因為他們有百折不摧的信念，他們有氣質非凡、得大自在的英雄偉人。悵然迴首山下塵凡俗世，除了貧瘠和矯情，陰謀和謊言，野蠻和殘忍，物欲和自私，腐敗和不德，貪鄙和無恥，獄卒和軍警，皮鞭和子彈，誣蔑和誹謗，宣傳和鼓噪，爾虞我詐互相坑害，虛假口號和鱷魚眼淚，在這文化貧困年代，在這精神不毛之地，我們自己究竟有什麼？

六

一個知識分子應當心靈寥廓、思維徹底。擺脫狹隘民族觀念或種族觀念，不僅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絕對必要，而且對於所有文明人都是必要的。這是「人生而平等」人權絕對律令的基本要求。可惜，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索爾仁尼琴等，皆未能免除俄羅斯民族、斯拉夫種族的狹隘觀念或民族自傲心而上升到人類情懷、人權思想、人的解放這一心靈境界，未能從民族主義走向民主主義。

1831年，俄國軍隊攻陷華沙，殘酷鎮壓波蘭人民反抗俄國專制、要求民族獨立的運動。西歐媒體、特別是法國報刊立即憤慨譴責沙皇政權對波蘭起義的野蠻鎮壓。對此，普希金寫了兩首政治詩，反擊那些批評者。在〈致那些誹謗俄國的人們〉一詩中，他寫道：「這是斯拉夫人之間的戰爭，這是家庭內部的爭吵，這是命運的決定，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無須置喙。」他對波蘭人民的民族獨立要求，沒有顯示出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他對波蘭人民的苦難遭遇，亦缺乏基本的人

道感情，他的狹隘民族情緒被沙皇俄國的軍事勝利所鼓舞並且為沙俄帝國暴行辯護，而他自己在沙皇專制下不僅沒有自由，而且受盡屈辱。

普希金的國內自由派密友(包括維亞津姆斯基)、波蘭著名詩人密茨凱維奇以及歐洲學者皆嚴厲批評普希金這種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觀念及其對俄國欺凌其他民族的野蠻行為做的辯護，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則一針見血地痛斥普希金這種所謂「愛國主義」實乃「獸性的愛國主義」。

托爾斯泰早年參加過塞瓦斯托波爾戰爭，晚年為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將中國的旅順港交給日本而感到「愛國者」式的憤怒，亦相當滑稽，顯示其思維的分裂和心靈的狹隘。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西藏人民作為一個被異族暴政威壓的民族，遭受血跡斑斑的暴力虐待和迫害，七千餘座寺院被推倒，民族領袖遭到長期囚禁，無數僧人橫遭飛機轟炸和炮擊，西藏民族的生命、人格和尊嚴從未受過如此摧殘和凌辱。一個民族受辱，是全體國民的恥辱。這部痛苦的心靈史是漢族人無法想象的，盡管漢族人同樣遭受凌辱和皮鞭。二零零七年西藏人在逃亡途中被中國邊防軍殘忍槍殺的鏡頭，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人民的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事件，皆使文明世界為之震驚。凡此種種，令人想到西班牙教士拉斯卡薩斯(Las Casas)在《印地毀滅簡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中揭露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時期那部血腥史，諸如綁架、欺騙、酷刑、屠殺、文化剿滅和種族滅絕。

《一個藏人的童年》記述諸多事實：「解放軍」進入他的家鄉，寺廟裏的僧人排著長隊，捧著哈達歡迎他們，沒幾天，軍隊就開始強行拆毀寺廟，作者跟父親逃難，一路看到很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作者的父親也被打死(見《藏土出中國》第191-192頁，以上事實係李江琳女士據《童年》一書提供)，令我立刻想到拉斯卡薩斯《簡述》多處談到美洲原住民托著禮物和食品盛情迎接西班牙殖民軍，絲毫沒有冒犯他們，三千餘人竟被這些軍人統統殺死，幾天後二十一位當地首領開

歡迎會迎接西班牙殖民軍，也當即被逮捕，第二天把他們活活燒死(見英國企鵝圖書 1992 年英文本第 29 頁)，這類記載頗多(參見第 48 、 57 、 68 、 97 頁)。暴力征服者的罪惡是相似的。欺凌其他民族的人，自己決不會有自由；少數民族的自由和全體國民的自由是同一項事業；民族的自由，歸根到底，就是個人的自由。

西藏民族不需要眼淚和憐憫，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支持。尊重和理解，是精神高貴的表徵；民族沙文主義式驕傲心態不過是心性卑賤和奴氣之變態而已。

北明才性中的靈氣，使她的心智具有穿透力；她個性中的正直，使她的作品具有征服力；她心靈中的激情，使她的文字富於感染力。她的筆下滲透著對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種精神上的理解，滲透著對它的重建和新生的無比欣喜和對它的靈的文化的虔敬之心。她的達蘭薩拉之行，是以人類道義立場和歷史公正態度執行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道義責任。她用筆和心靈把事實和真相、歷史和現實告訴世界人民。

這是一支以西藏涅槃和民族新生為主題的《引子與迴旋隨想曲》，一首西藏新生奏鳴曲。它的新生將為中國大地提供一個樣板。流亡使它走向新生，新生使它走向超越。跟隨這支引子和前奏曲，宏大的歷史樂章噴薄欲出。

七

這本書把一夜夢思銜到那片靈氣氤氳的神山，我要升起在太陽之前。

晨色熹微、霞光萬道之際，是心靈與古典精魂獨往來之天地。晨曦中，像有一注灌頂的醍醐，天地物我之間神秘的靈知之泉，自蒼穹翩然而降，我翻開這本當代之作，恰恰讀到〈達蘭薩拉啟示〉的壓卷之文——〈遺失的桂冠〉。

我被它震撼。寧靜的理性，深邃的哲思，清純的心靈，聖潔的感悟，對天地人生理趣的思考，對人類精神價值的高揚，透過簡潔的語言，閃射出玲瓏剔透的思想光輝和理性激情。作者精敏地一筆揭示甘地的精神價值及其對人類社會諸多罪惡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無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無良知的享樂，無品行的知識，無道德的商業，無人性的科學，無獻祭的敬拜」。甘地之為聖雄，誠哉宜矣。為棒喝一個墮落民族，須將這七句真言鐫刻於國門、鐫刻在每個人心扉。

正是堅定站在這一道義原則上，二十歲的達賴喇嘛來到甘地墓前。他繼承聖雄的精神遺產，斷然拒絕與黑暗合作，堅守人格立場和民族尊嚴，堅守人類精神價值，高揚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開始對惡的抗爭。我相信，這是精神上的偉大日出，當心靈獲得這樣的啟悟。

這是一篇散文傑作。讀畢此文，投之於案，頓生「何物老嫗生此寧馨」之嘆。窗外一樹金色秋光在晨風中颯颯搖曳，我要立刻傾聽貝多芬——《C小調悲愴奏鳴曲》、《升C小調月光奏鳴曲》、《F小調熱情奏鳴曲》。我要讓心靈的沉痛、理性的寧靜和靈魂的激情同時轟鳴。只有貝多芬才能夠使這顆被重重叩響的心靈鋼琴得到痛快的傾吐。

八

對話是一種文學體裁，是思想展開的一種方式。柏拉圖以對話方式，把哲學家對萬物的思考和見解循循善誘、層層剝筍似地表達出來。《藏土出中國》的第二樂章〈流亡西藏訪談〉亦是對話體作品。無論在選題的見識上，還是在提問的設計上，或是在話題的把握上，都顯示作者才智的犀利、俊爽和敏銳。

就流傳最廣、惑人最深的所謂「西藏問題」、「『大西藏』問題」、「西藏獨立」、「種族隔離」、「西藏受益中央政府高額補貼」和西藏經濟現狀以及西藏歷史歸屬等等問題，作者提請漢藏學者、專家、作家們對這些問題做了實事求是的解答和澄清。主持者思路清晰，緊扣話題，

要求受訪者提供統計學數字和具體事例，使訪談建立在客觀、公正、準確的基礎上。客觀、公正、準確是學者和記者的職業要求。北明在訪談中把這一點表現得冷峻犀利、近乎無情，使訪談乾淨、利落、堅實、雄辯，顯示清晰的思維邏輯和出色的專業素養。

在我看來，世間許多問題本來簡單，只是自私欲望和黑暗心靈把問題製造得似乎很複雜。比如中國問題，不過「民主」二字就解決了；西藏問題，「自治」二字也解決了。不讓中國民主、不讓西藏自治，偏偏製造出許多自尋煩惱、自欺欺人的謊言和麻煩，整天刀光劍影、如坐火山口，自己無異身陷囹圄的囚徒。

人之立身於世，堅持人格獨立、學會正確思維乃第一要事；用歐坎的剃刀(Ockham's Razor)將一切假問題統統砍去，思維馬上利落，精神豁然開朗。西藏和中國問題之解決需要偉人，正如東歐和蘇聯問題之解決需要戈爾巴喬夫。我們是站在山巔、眼界開朗的歷史樂觀主義者。我們的豪氣和信念是任何人也奪不去的。

五十年來，這是第一本由漢族知識分子親歷達蘭薩拉、直面流亡西藏政府精神領袖和最高級官員、與之親切傾談而留下的真實記錄和心影，也是第一次對流亡西藏民族的新生態做的真實而富於精神深度的揭示。這是一次真誠的心靈對話和文化溝通，是對一個堅強民族的悲劇歷程做的客觀、冷靜的探索，是對一部偉大史詩做的才華橫溢的描述。深沉的理性、靈動的文筆、完整的知識結構、精細的敏察力和獨特的感悟力，使這部著作生出多重交響。道義的正大、精神的高貴、哲思和詩情的交織、不同主題線索多聲部地迴旋，構成美學上的高度整一和強烈的心靈撞擊。

當第一縷春風吹到高原新城達蘭薩拉，那溫馨裏含著北明和她的朋友們這樣的無數知識分子對它的美好祝願和祈禱。

2010 年 11 月 12 日於秋光斑斕的多倫多

自序

北明

早先，「西藏」之於我，就像於漢語世界大多數人一樣，是一個無關痛癢的詞語，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讀到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對中國人的最初印象。他說：「我看到的是三個身穿灰色制服，頭戴鴨舌帽的人，夾在我的那些身穿紅色和金色袍子的官員們中間，他們顯得灰沉暗淡，無足輕重。」這讓我睜大了眼睛：原來藏人對我們的感覺跟我們對他們的看法如出一轍！

丹增嘉措描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兩年時他的感受，那時的漢人世界中，我還沒出生，距離後來山西省話劇院的一次演員詩歌朗誦比賽，也還差三十年時間。在那次朗誦比賽上，大學剛畢業的我作為後進，朗誦了一首自己寫的詩，獲了頭獎。詩的題目是：〈我驕傲，我是中國人〉。

丹增嘉措很快就在紅色中國製造的西藏滅頂之災中，發現他的感受「無疑只是一個幻覺」；而在讀到他的那個幻覺之前很久，我對這個紅色國族的感受就變成了「我悲哀，我是中國人」。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在「灰色制服」裏，一邊以最理想的主義自我餵養

而膨脹，一邊開始以最卑劣的手段自我閹割而墮落。即便如此，達賴喇嘛的感受——無論如何修正——仍然使我感到驚訝。

在寫下這些字時，我把自己的驚訝放在案頭，仔細審視，想找出原因。而後發現：對中國專制罪惡的認知，並不能夠等於對西藏命運的了解，對中國民間災難的感受，也無法覆蓋藏人的苦難。面對紅色袈裟和彩色藏服，我始終保持一種類似面對出土彩繪的感受，而我對考古並無興趣。想不到出土的彩繪竟用「灰沉暗淡，無足輕重」描述它面臨的世界！這個世界正是我們，可是這些出土文物竟是誰？既然他們如此評價他人世界，那麼他們自己如何自我解讀？為什麼他們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感受，從最初就如此準確？他們所處的世界邊緣真的微不足道嗎？

我仍然不能說清楚丹增嘉措對漢人那八個字的描述帶給我的微妙感受和啟迪，但毫無疑問的是，從此我知道，漢人如果不走進西藏，就缺少對西藏的發言權。我說的是，把對中國宣傳機器免疫力裝進背包，親自走進西藏。

丹增嘉措尋求與中國民間接觸的努力，使我獲得了一個機會走進西藏——流亡西藏，而不是中國中央政府控制下的漢化嚴重的西藏。我了解到的不僅是西藏六十年的苦難遭遇，還有他們在滅頂之災中鳳凰涅槃的史詩般的故事。前者作為內陸西藏的厄運，在中國苦難歷史中加上了同樣血腥而殘暴的一筆；後者是流亡西藏的自我救贖與變法，讓我對這個 600 萬人口的民族陡生敬意和尊重。

關於揭露苦難之於重建良知二者的關係，我尊敬的一位兄長曾經說：沒有真相，走不出黑暗；只有真相，找不到光明。正如無辜者未必人格高尚，反抗奴役未必能贏得自由，此言是六十年大陸在苦難中掙扎的真實寫照。流亡西藏在暴政的血淵骨嶽中，守住了人的尊嚴與高貴，拒絕與奴役者在行為上和精神上一同沉淪為獸，拒絕在方法和手段上與之同流合污，這使我深受觸動。在遠離了奴役卻鮮見光亮的、海外中國的黑森林中，我確切看見了流亡藏人點燃的光明。所

以，這本書的產生，不是出於對他們的同情，不是要向被蒙蔽者訴告他們的苦難——儘管這很重要，而是出於對他們的敬意，希望表述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在苦難中的堅韌和悲憫、在反抗奴役中避免讓仇恨毒害心靈和避免以牙還牙的高貴精神，以及在繼絕存亡時沒有讓民族主義佔領自己的家園，沒有對人類的理性精神關上自己的大門——我相信這更重要。有這樣的流亡西藏的存在，「馬沙達永遠不會再淪陷！」廢墟上的重建屬於他們。

這本書分兩篇，下篇是〈流亡西藏訪談〉，以「自由亞洲電台」我主持的《華盛頓手記》專題〈走進西藏〉系列專訪為基礎整理而成。這一部分，針對大陸流行的關於西藏的官方宣傳，瞄準西藏問題種種，讓海外的漢、藏兩族專家、學者、作家發言。由於言論封鎖，他們過去一直無法出聲，他們的觀點和看法始終沒有機會與大陸公眾見面。通過這些訪談，讀者可以粗略了解西藏六十年來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真實情況。我相信，這一部分內容，有助於辨認和解讀黨國宣傳部統理下的大陸「媒體」關於西藏的一貫說法。這本書的上篇〈達蘭薩拉啟示〉是散文隨筆，記述我對流亡西藏社會與人物的觀察、感受與思考。這部分比較個人化，根據2009年夏季我的達蘭薩拉之行的筆記充實、整理而成。在這一部分文字中，我試圖尋找流亡藏人在異國他鄉重建西藏文明的動力和源泉，我相信我找到了它。

如果不是藏人朋友提議在達蘭薩拉出版那些訪談錄，這本小書不會誕生。

本書誕生的一個原因是一種歉疚心情：面對流亡藏人臉上深凹的皺紋、悲苦的眼神、善意的沉默，我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湧動著深深的歉意，歉意的背後，是為自己同胞六十年殘暴對待藏人而生的羞恥與愧疚。我是一個漢人，面對苦難西藏，我只有這一個身份。一百萬捍衛自己生存權、信仰權的藏人死於漢人槍砲虐殺之下，對我而言，這種愧疚無法用「普通漢人不能對當權者的殘暴負責」這種說法消弭。這種愧疚

之情和對藏人自我救贖的敬意，交替徘徊在我整理〈流亡西藏訪談〉和書寫〈達蘭薩拉啟示〉之間，是這本書敝帚自珍的道德基礎和寫作動力。

我在本書中使用和貫穿「流亡西藏」這個概念。流亡西藏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已經存在了五十年，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同情，應該進入漢語世界了。書欲問世，陣痛先行。然而我深信，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之前，流亡西藏是西藏全民及其文化的諾亞方舟，是他們的精神載體和心靈家園。我也相信流亡西藏的存在及其堅守的價值，對中國當今和未來，具有啟示意義。

最後我要感謝達蘭薩拉的桑傑嘉先生、紐約的貢噶扎西先生和其他藏人朋友，感謝我的漢族同胞丁一夫先生、子仲先生和其他海外華人朋友：在我疲於奔命的日程中，是因為他們的具體幫助、鼓勵和支持，這本書避免了半途而廢的命運。

北明謹識

2010年8月22日

於美國維吉尼亞州

獻給

全體藏民的精神載體和心靈家園：

流亡西藏



上篇

達蘭薩拉啟示

·出行走神

我是一個尋找靈魂的漢人，
我循著古道蹄音，來到神山之王的崗仁布欽，
遇到了一個一輩子鑿刻嘛尼石的藏民。

我是一個尋找家園的漢人，
我喊著阿裏阿裏，來到冰雪照耀的白石嶺，
遇到了一個一輩子轉繞冰山的藏民。

我是一個尋找幸福的漢人，
我走過可可西裏，來到古格廢墟的孔雀庭，
遇到了一個一輩子守護酥油燈的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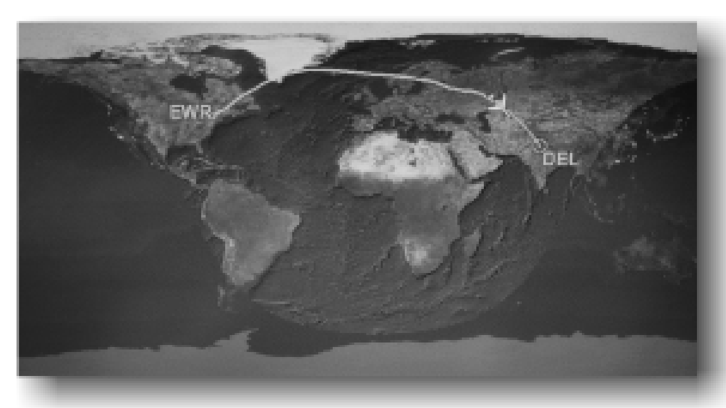
我是一個尋找源頭的漢人，
我冒著十二月冷風，沿著格拉丹冬一路西行，
遇到了一個一輩子給牛羊擠奶的藏民。

我是一個尋找愛情的漢人，
我假裝為了修行，來到太陽的故鄉拉薩城，
遇到了一個一輩子就愛跑馬漢的藏民。

——〈去西藏的漢人〉，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起程奔印度新德里，目標達蘭薩拉。友人提示扛上攝像機，太沉了；說那就帶上小的，最後一刻，家用小攝像機也捨棄了。過去、現在和將來，我都不準備做西藏問題專家，此行無需拖泥帶水。

帶上一本不相干的書，埃利·維索(Elie Wiesel)的《神的使者》，準備旅途中走神。不過後來一查資料，嚇了一跳：自由世界太小了，隨便拿起一本他們出版的當代書籍，可能就會撞到西藏台階上——《神的使者》一書作者維索，不僅是達賴喇嘛的朋友，還是西藏自由的堅定支持者。2008年3月20號那個26位諾貝爾獎得主簽發的聲援西藏的聲明，維索不僅是其簽署人之一，更是這份聯合聲明的協調主導人。這26位諾獎得主囊括了諾貝爾和平、文學、醫學、化學、物理學、經濟學全部獎項。聲明針對當時的西藏局勢，呼籲中國當局停止鎮壓西藏遊行示威的民眾，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埃利·維索是納粹猶太人集中營的倖存者，他的集中營生活回憶錄《夜》，暢銷世界，但是鮮有人知的是，出於同樣的歷史感悟和被奴役者代言人的身份，他與達賴喇嘛私交甚篤。他們二人，一個在戰後十多年的集體失語中，把六百萬「上帝的選民」在集中營裏的非人遭遇公之於世，把盟軍最初走進集中營的驚懼，變成了世界對納粹罪惡的永遠記憶；一個在解放軍槍砲聲中，把六百萬佛教眾信的地獄之苦，變成了西藏重生的煉獄和希望。東西方兩個篤信神祇的民族、兩個不相干的世界，兩種彼此遙遠的呻吟，由於二人的特別關係，頓時連為一體。



從美國東海岸到印度新德里航線，需要越過大西洋和歐亞大陸，繞行半個地球。

走神都不容易。——讓人分神的是印度：行前事先得知的消息是，印度骯髒不堪，聖河恆河乃是人們遺矢之處，隨地大小便不分長幼；欺詐成性，乞丐窮追不捨，遊人對追逐討要者必須視而不見方能自保安全；炎熱無比，高溫攝氏43-45度。令人咋舌的信息已經導致友人齊越「迎接挑戰」的出行心情，另一位友人，易崴，則隔三岔五將各處搜索來的印度資訊從信箱發來，並不斷叮囑必帶物品，那清單看上去好像我們要去一個原始部落探險：遮陽帽、遮陽傘、筷子、勺子、水杯、手電、防蚊劑、止瀉藥、抗生素、清涼油、墨鏡、牙膏、香皂、雨傘、涼鞋、晾衣繩、消毒紙巾……。「多帶美元，零錢尤宜……」。

接獲這樣的信號，你還期待怎樣的逍遙？臨到出門前兩天，我發現我抓著一本叫做《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的書惡補。這書是一個娶了印度妻子的英國學者兼報人寫的，描寫印度諸種深刻矛盾中的現狀，怪趣橫生。邊讀邊想，讀讀可也，可是心情已經被不顧諸神的印度人提前弄壞了：去年我簽證未准，據分析原因是我填寫自己的職業是記者作家。雖然屬實，竟被拖延到團隊啟程而未果。印度人不歡迎讀書識字的華人去觀光？海外華人作家學者身份敏感？中印關係因為西藏而微妙複雜？……

無論如何，此一經歷令人喪失興致，這次再度簽證，被迫填寫另

一個身份，「家庭主婦」，相當於無業遊民。經西藏辦事處往復交涉，準簽了。不過再度折騰期間，印度使館的奇怪作風再度令人沮喪。並非我矯情，一平與我同此經歷，同樣心情，不過他再次填上的是「家庭婦男」，比我還沒脾氣。對印度的這第一次接觸令人相當失望，加上手中活計一大堆，都急中燃眉，我們實無意趣到那遙遠異地，玩味這個古老國度遭遇現代文明時產生的咖喱怪味。麻煩的是，這次計劃已經變成了一張不能退款的機票，我和一平商量：不去，辜負藏人一番盛情和組織者李江琳的熱切期待。我還有另外的顧慮：前述齊越和易歲，是我受李江琳之託邀請的大陸文化界知識界學人，也是我多年不見的友人，我突然中途撤退，沮喪必定轉嫁他們。還有一位也是我代為邀請的大陸知識人，行前最後一刻眼巴巴地說：「那神奧印度定會讓我等驚奇不已，可是我陷入自設困境……」，他正被一個巨大的藝術品分解，無法脫身，要求我把他「放包裹帶上，每天給口水就行，又不走路又不說話，就賴在你身上借你眼睛，晚上給你當枕頭。」此次出行，我不僅要關照兩位友人，還得帶另外一雙去不成的眼睛，只能三頭六臂地走一回了。

行前兩小時才得空收拾行裝。計劃是傍晚前從華盛頓里根國際機場起飛，到紐瓦克機場，與美國同行的學者李江琳、史學家朱學淵和詩人兼編輯一平會合；傍晚後一行四人起飛赴新德里，在德里與太平洋那端啟程抵達的兩位大陸學人匯合。一行六人組成一個中美華人學者作家小組，奔赴達蘭薩拉。說是去印度，其實是去西藏，被禁的西藏，流亡的西藏，是去一個「不顧諸神」的國度，訪問一個背負信仰流亡的民族。

晌晴勃日，林被深植。奔機場而行的華盛頓郊區地鐵偶然彈出地面，撞入陽光下耀眼的綠色。端坐於地鐵車廂座位上，聽憑行進中的車輪「哐當哐當」敲響現刻時鐘。我努力撒手滿把的日常紛繁雜亂，極力收心面對已經進入日程的旅行。

・三千五百年的黎明

好吧！我將這塊大地
放在這裏或放在那裏。
是否我飲多了蘇摩酒漿[1]？

我的一隻翅膀在天上，
在大地上我曳過另一隻翅膀。
是否我多飲了蘇摩酒漿？

——摘自《梨俱吠陀頌詩・致因陀羅[2]》

---

[1] 蘇摩酒，梵文「Soma」，一種取自「蘇摩」蔓草之莖製成的飲料。古印度常以此酒祭神，故為「聖飲」。

[2] 因陀羅，梵文「Indra」，古印度神話中備受憧憬的神，嗜飲蘇摩酒，也是雅利安時代受人喜愛的國神。

時差混亂。抵達印度新德里機場時是美國東部時間的上午11點半左右。

閒逛的野狗隨處可見，像城市治安警察。白色的牛仔在公路邊吃草，如同印度的天使。目力所及，幾個牆壁上的電插座，都是活動的。

出機場，40度熱浪撲面而至。塵土飛揚中，蚊子出現了，還有蒼蠅。無產者們，成排睡在露天平板車上。

有西藏新德里難民接待中心的負責人接機。舉著牌子，鄭重其事。握手寒暄後上車，是小麵包車，次日即出訪歸來的達賴喇嘛，也將在此處乘此車，不過他返回達蘭薩拉他的駐地之前，會去拜訪印度政府。

我們驅車一小時抵達西藏難民村一客棧，薩克亞(Sakya)。設施簡陋，又看見了裸露的燈泡，不過是節能的那種。

印度時間凌晨2點，再去機場接大陸抵達的易歲、齊越。二人已在大廳乖乖等候半小時了，齊越仍然無可救藥地年輕著，易歲則無可挑剔地謙虛著。一一問候，出站上車。凌晨的機場依然擁擠。車輛再度擠出機場，駛上新德里市區公路。塵土把燈光弄得昏暗不堪，正如書中所言，這印度首府公路上，機動車輛和牛車、三輪車、拖拉機以及行人甚至牲畜並行而安然無恙。

空氣濕熱，旅館房間裏，窗戶上的破舊空調機時而從沉寂中轟然起動，時而從轟鳴中歸於沉寂，睡覺成了一種努力不懈的戰鬥。終究打不過濕熱也打不過空調，不多久，發現時已凌晨了。

索性拉開窗簾，推開窗戶。

——這是印度宗教哲學發酵的地方嗎？

眼前的景色太強烈了：恒河破舊，從東方破曉處蜿蜒而來。土地蒼老，沿岸裸陳著自己濕疹的皮膚：遠近貧民居住的屋架內外，橫七豎八堆著裝滿垃圾的塑料袋。晨霧瀰漫四野，在黎明的霞光中給這蒼老的土地和破舊的河流穿上了一道絢爛的麗莎。兩隻烏鴉在近處電線桿子上爭啄喧嚷，幾隻野狗躺在垃圾堆上愜意地享受德里的早晨。

美麗與醜陋相互攜手關照。這綠色曠野上，橫陳的是東方亙古時空裏的矜持和安詳。

最奪目的是太陽！完全無視君臨之所在，依然升起它永恆的壯麗和輝煌。



清晨德里景色：恒河與它的民貧窟日夜相守，太陽依舊升起永恆的輝煌。（北明2009年6月9日攝於新德里Sakya賓館）

「這光來了，在所有的光中最美麗。她光芒四射，顯露出了門口。她攪動了這個世界，向我們展示豐饒，……黎明喚醒了每個生命。……所有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所有生命都被黎明喚醒。」

《梨俱吠陀》頌詩中的這首叫做〈黎明〉：「……從亙古永恆時候起，黎明女神已經照耀，到今天還在拋灑光芒，滿載富麗。她將會照耀未來的日子，她永遠照著自己的力量行走，亙古不變。」[1]

這首詩寫於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就誕生在這樣的土地上。除了那些塑料垃圾袋、貧民窟的鐵架子以及一根旅館樓下的電線桿，這片土地上只有人、牲畜和綠色禾苗，與三千多年前沒什麼兩樣。這裏不合適居住，卻是讀那些印度古老頌歌、領悟他們靈魂追問的最合適的地方。

西藏流亡社會和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之行，在這遠古的黎明中拉開帷幕。

---

[1] 楊彩霞譯本。

・隔代孿生兄弟的故事

都是靈性的石頭神在的冰大阪，都是寂寞的遠古染著霞丹，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都是滿坡的俄博獵獵著金幡，都是高高的階梯可以登天，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都是天葬的高臺神鷹等待著桑煙，都是求婚的福地情人掉進了溫泉，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都是奔湧的姿勢浪尖上漂著寺院，都是直立的化身頭頂高潔的雪蓮，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都是高峻孕育了一萬年的探險，都是微笑靜默成地球的荊冠，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都是冰雪都是冷曠都是常青峰巒，都是因果都是輪迴都是脫離苦難，
……，我的故鄉西藏的山。

——〈西藏的山〉，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在德里短暫逗留期間，我們把西藏難民社區的醫院、寺廟看了一遍。這裡的難民曾經與我們比鄰而住或高居雪原之上，因為不甘漢人的強暴來到了山的這一邊。可是即便印度是他們信仰的宗源之地，他們也不準備融入這個國家。每一個抵達的藏人都會循跡循聲去住當地的收容站，接受同胞的幫助，再加入更大的同胞群體。新德里的難民社區是出逃印度的第一站。

難民村由街道和居舍、店舖和寺廟構成，遠不如恒河的黎明那麼驚心動魄。這日走出下榻旅店，大腦卻仍在恒河的黎明中逍遙。當一位女藏醫笑瞇瞇地為我們分別測量血壓時，我的心血管開始把思緒從恒河召回。印象深刻的是藏人的醫療所，確切地說是牙醫所，更確切地說是一位藏人牙醫。

此人精瘦，　黑，矮小，名叫諾布(Norbu)， 34 歲。他的診所不大，十平米見方駿一張破舊的行醫電動躺椅居中，幾乎佔滿診所整個空間。我們進去，診所就嚴重超員，人無法轉動。瘦小　黑的諾布本可以大大開拓他的空間，把診所開在印度富貴社區，他的一個印度同行朋友就是這樣：診所寬敞明亮，設備助手俱全，月薪70萬盧比，日子悠然快哉。但是那樣一來，前往問診的就不是諾布的同胞而是印度人了。就因此，他留在了難民村，現在的月薪只有 4,500 盧比，低於他的同行朋友15倍之多。藏人的牙齒和印度人的牙齒在價值上如此懸殊！不過諾布對此另有解讀：這差異的程度與藏人牙齒的重要程度成正比。所以，藏人越沒錢看牙，說明他們越需要牙醫，他就越必須留在這裏給他們看牙。

他選擇的原則不是自己的收入水平，是自己的勞務支出對象。他決意要為藏人的牙齒服務。

告訴我們這一選擇的時候，諾布特別自豪。他又指著診所架子上器皿和藥物說：

「臺灣醫生捐了不少。除了這些藥物和手術工具，他們也捐獻人力」。

空間擁擠，我們只能站在那張手術躺椅的四周，就像圍著他供奉的一個臥式大圖騰。他用他堅硬的手掌拍拍那破舊的「圖騰」告訴我們：別看這東西！若要買新的，需要很多很多的錢，但是被他修復一新，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錢。

說的都是盧比。



新德里西藏難民區的牙醫諾布(Norbu)在他的診所裏為我們介紹診所情況。 (易處攝於2009年6月9日新德里)

他的腦袋看上去質地堅硬，說話時，像不屈不撓的鑽頭那樣隨節奏轉動，不說話時，他也轉動鑽頭，接納我們從「圖騰」四周提出的問題。

「當然有藏民來這裏看牙。」他回答說。

「也有印度人到這裏看牙。」他又回答說。

「看牙的有時候還有外國來的。」他補充說。

他眼睛發光，精神抖擻，漢語講得相當好，說話速度像賽跑。

在他診所牆上，有一幅招貼畫是英文的。第一

句是「高興起來。」第二句是：「定期看你的牙醫。」前一句字體大，懸於招貼畫的上方，後一句字體小，落於招貼畫的下方。不過他自己比他的招貼畫更有說服效果。看見他你就會知道，充實和幸福這人類世代追求的東西究竟來自人的大腦還是心臟，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比如診所還是……錢包。

走出諾布的診所，我發現自己隱隱生出一種錯覺，覺得他就是單巴次仁。

單巴次仁曾經想學醫，努力三年未獲資助，放棄了。

單巴次仁當年是逃出西藏的一個男孩。

中國人民解放軍拯救西藏「農奴」那年，農奴們的起義反抗被鎮壓，單巴的父親確白噸多以及全村健壯男人被解放軍反覆囚禁。再度獲釋，回到村子，他痛睹妻子在鬥爭會上忍受折磨，隨後接到通知：十歲的獨子單巴次仁必須前往中國內地接受漢人教育。

單巴父母無法信任那些侵佔他們家園、槍殺他們同胞、囚禁反抗者，拆毀寺院、強迫他們信奉共產主義的「解放者」。那時「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已經大面積開始，西藏傳統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正在瓦解，單巴一家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決定翻越雪山逃離故鄉。

1959 年 10 月，單巴的父親帶領全家五口悄然上路。單巴十歲，除了父母、還有兩個妹妹。一家人須避開大路，翻越兩萬五千英尺的高山，夜行晝宿。寒風凜冽、雪厚齊腰，雪窩陷人，空氣稀薄，那是真正的死亡之旅。

首日破曉，在一萬八千英尺高度的雪地上棲息時，他們發現那條忠實的家犬已不知去向。

次日破曉，小妹妹開始嘔吐。

第三日，他們仍然在雪線上掙扎。夜晚翻山，小妹妹趴在母親背上，白天休息，她睡在母親身邊，始終默契配合，不吃不喝，不醒不鬧。

第四日，全家因擺脫了雪線上可能的追捕而酣睡一覺，下午醒來再翻過一道坡，把留有他們足跡的雪山甩在身後，來到了不丹的丘陵前，勝利在望了。這時候，單巴的母親聽見了背上小女兒艱難的呼吸聲。這是逃亡至今她發出的最大的聲音，孩子仍然沉睡不醒。接下來，這孩子在母親劇烈搖晃中停止了呼吸。她度過了翻山最艱難的時刻，卻沒能挺到勝利。

全家守著屍體慟哭失聲。聲音即刻被蒼茫雪野無情吞噬。他們就地掘坑，用白雪掩埋了她小小的屍體。繼續前行，一步一回頭。

勝利只是逃亡者的希望，死亡之旅在雪線以下延續。四個小時後，他們進入完全陌生的地理環境，茫然失去了目標。他們選擇看到的第一條道路走下去，來到一個村莊，然後仍然不知該去向何方。最後獲悉不丹政府已經不再允許藏人停留，他們必須繼續前往印度。

一望無際的高原雪域變成了蔽日密林，致命的猛獸梟禽毒蛇出沒，粘附人體吸血的水蛭防不勝防，陌生而漫長的旅程似乎剛拉開序幕，攜帶的乾糧卻吃完了，他們卻必須拖著完全累贅的冬季藏袍。餐風露宿，乞討為生的旅程中，單巴承擔為全家乞討的任務，因為他總是能夠幸運地討到食物。但是每當獨自去乞討，那條走失在雪野的狗的命運，比密林的陰影更加濃重地壓在他頭上，他隨時擔心自己丟失得無影無蹤，無聲無臭。後來，他們漸漸與逃亡藏民匯合，終於抵達印度南部的米薩瑪藏族難民營。

這是一個臨時棲息之地。世代習慣的青稞、酥油和肉食變成了咖哩土豆和大米，高原變成平原，寒冷乾燥的氣候變成了炎熱潮濕的熱帶雨林。另一方面，兩千五百年來生活在封閉中的藏人，沒有任何免疫力抵抗外來人種的病毒。各種流行病迅速傳播，翻越雪山又穿過森林的藏人必須面對這第三輪的命運篩選。

不斷有老人和孩子死亡。

五百米之遙就是他們自己的火葬場。為了防止病毒傳染，死者統統火葬。煙霧終日不斷，難民營如同死亡營，哭聲不絕，連綴著日月陰

晴。終於有一天，單巴的另一個妹妹染上了阿米巴痢疾。她先是不玩不動，最後不吃不喝，病情急劇惡化，不幾日，一家人眼睜睜看著她離開了人世。

那一天，難民營上空飄繞的煙霧中，加入了單巴一家第二個死者化成的煙灰。

翻過雪山是逃亡第一步，丟下了一個小妹妹在冰天荒雪；棲居難民營是逃亡的第二步，死去了第二個妹妹，卻連屍骨都不能存留。世上對父母的打擊最大莫過於失去孩子。悲痛中再遭重創的單巴的母親喃喃自語，翻來覆去只有一句話：

「我們從中國人手裏跑出來，結果只是將屍體掩埋在異國他鄉！」

這喃喃自語，是藏人出藏的泣血路標。

兩天之後，單巴一家必須再度離開，他們被安排到印度北方築路。這是他們流亡的第三步。他們必須跟上隊伍，越走越遠。這一安置方式本身使他們意識到：不久後回到故鄉的希望渺茫。這個打擊如雷暴中的霹靂，準準穿透單巴父母的心魂。

火車行駛三天，月台上再被丟棄三天，五缺二的三口之家，和一百六十名難民一起在藏曆新年中，抵達流亡目的地。

達賴喇嘛曾在《流亡中的自在》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中回憶他當時獲悉的消息說：1960年2月1日，當第一批抵達的定居者「看到這塊土地的時候，很多難民情不自禁痛哭失聲。他們前面是一條艱難的路。印度政府為他們提供了帳篷等簡單工具，可是除此之外，他們唯一能依靠的是他們自己的決心。」單巴一家三口正是第一批抵達者，他們無法逃脫致命的遷徙帶來的厄運。美國作家約翰·F·艾夫唐在《雪域境外流亡記》中寫道：「流亡者來到印度之後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就清楚地看到，這一過渡性階段不僅比逃跑威脅更大，而且給人們帶來了傷害，幾乎沒有一家能夠倖免」。首先是藏人的肌體對印度病毒毫無防疫能力，這導致病毒長驅直入。印度所有築路營情況大同小異：藏人不可能不與當地人打交道，哪怕一周一次收工後買食物，也必須接觸當地人。「無論當地居民患什麼樣的

傳染病——尤其是肺結核，總是可以傳染給西藏人。由於他們缺乏適當的抗體，大多數人常常因此喪命」。可能因為沒有醫療，或者因為不診，許多情況下，藏人看上去無疾而終。高海拔地域的住民遷徙到低海拔平原，意味著物種的氣候、飲食、生態、生物包括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對於一個封閉在高原雪山上兩千五百年的民族尤其如此。印度工頭很會使用藏人做廉價勞動力，他們每人每天必須拼命勞動十小時，只掙十個美分(一個盧比)。如果把營養不良和無分男女老幼的體力勞作算上，則情況更加淒慘。嚴重的死亡率使人們開始懷疑，藏人是否合適群居。

自從離開第二個女兒死去的難民營，單巴的母親就沒有恢復正常生活。1950年開始的災難導致1959年的逃亡，1959年的逃亡導致兩個女兒死亡，他們的歸程看上去遙遙無期，連達賴喇嘛都逃出來了。她心神恍惚，啜泣不止，在三天三夜的火車旅程和三天三夜的站台露營中，她總是拉住單巴的手不許他離開。此後接連兩個星期出賣苦力，她終於病倒了。單巴和父親為糊口而去工地掙那十美分的十個小時時間裏，她獨自躺在破舊不堪的帳篷中、草鋪上，蓋著全家唯一的毯子。她知道這次輪到她了，她放棄了生存的意志。附近印度村莊診所的醫務人員無法確診她的病症。

她為即將到來的死亡感到幸福。她有理由感到幸福：兩天前，單巴的父親背著她來到達蘭薩拉的草坪上，她見到了剛剛定居下來的達賴喇嘛，接受了尊者摸頂祝福。單巴的母親是這個家庭最後一位女性，她留下了遺言：見到尊者死而無憾。此外，她要單巴好好照顧他的爸爸，並說，總有一天，單巴會回到西藏的。第二天單巴幹活歸來，他的母親已棄世而去。

單巴只有父親了。單巴不到十一歲。

母親去世兩週後，單巴的父親確白嘰多開始嘔吐。這個少言寡語的漢子曾經與中國入侵的軍隊對抗而被囚，看不下妻子被批而挨打、忍不得兒子被送走而漢化，他帶領全家出走，翻雪山穿密林，親眼看著兩個女兒死去並為之送葬，他一直撐到現在，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的病情

急劇惡化，接著被送往一小時車程之外的一家醫院。

那一天，單巴剛好年滿十一歲。酷暑白晝，他在工地上勞動，陰冷夜晚，只有父母曾經同在的帳篷與他相伴，這是媽媽去世的地方，是父親生病抬走的地方。漫漫長夜，空中緩緩沉落著白天工地引爆的灰渣塵埃。一連數日，恐懼和孤獨同時攫住了這個十一歲的孩子。他獨自蜷縮在媽媽離去前躺過的草墊子上挨到天明，再到工地，挨到天黑……。

單巴後來在西藏難民幼托園裏長大。幼托園之後，他成為達賴喇嘛授意創辦的第一所藏人現代化學校的第一批受益者，然後再到一所教會學校繼業，最後在頗富盛名的基督教學院接受高等教育。他始終學習成績優異。苦難和挫折把單巴變成了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西藏人，他明確了未來的生活目標：由己及人，為西藏人謀福利。目睹親人一個一個不治而亡，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醫生，治病救人。當時流亡藏人日益增加，醫生卻寥寥無幾。但是他向援助組織申請了三年，一無所獲。他被迫放棄了這個理想……。

單巴次仁及其一家的經歷，在美國作家約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中有全面記述。單巴的故事和書中的其他描述，使西藏境內100萬被鎮壓者、10萬逃亡者及其悲慘的逃亡經歷——因生存環境驟變，在瘟疫般的流行病中密集死亡，有些難民定居點幾週之內死亡五分之一的事實，從冰冷而抽象的數字，變成血肉溫熱的具體生命。

看到牙醫諾布第一眼的時候，我被他鑽頭一樣的硬度所撞擊，被他某道不謀食、苦樂自為的古典精神所感動。走出他那診所的瞬間，我突然意識到，諾布正在實踐單巴當年的理想。單巴當年若有幸獲得資助去醫學院讀醫學，如今一定會像諾布一樣在藏人集中的地方開一所醫院或診所，欣然服務於他逃亡的同胞。

諾布也許不知道誰是單巴，不過他們的孿生精神，如同高原青稞和雪山聖水釀製的傳統青稞酒，讓我第一次嘗到了甘甜清苦而綿潤深厚的西藏味道。

．終生的哈達

在我的老家，到處都是喇嘛，
他們終生都是為了敬獻哈達。

不用說你就是仙女的飄帶，飛揚出人間的吉祥；
不用說你就是珠峰的聖雪，飄落成夢的衣裳。
——拉薩，拉薩，你就是世界的哈達。

不用說你就是母羊的鮮奶，是飄上天的雅魯藏布江；
不用說你就是情人的相思，是那無語的歌唱。
——袈裟，袈裟，你就是天堂的哈達。

不用說你就是夏天的清風，送來冰塔女神的涼爽；
不用說你就是冬天的溫暖，漫過凍土的高岡。
——莊稼，莊稼，你就是望果節的哈達。

不用說你就是捧起的誠信，把月亮的芳香掛在脖子上；
不用說你就是陽光的熔造，柔軟成祝福的金幛。
——駿馬，駿馬，你就是奔馳的哈達。

在我的老家，生活著我的阿爸阿媽，
他們終生都是為了敬獻哈達。

——〈哈達頌〉，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德里西藏難民社區的管理人員、福利協會副主席叫洛辛格桑(Lobsing Gyaltsen)。他五十多歲，頭髮烏黑，臉上卻佈滿了皺紋，如飽受水土流失之患的黃土高原，溝壑縱橫。這些溝壑糾葛著他的眼睛，眼神蒼涼而憂鬱，連笑容都悲苦淒涼。

在社區簡陋的辦公室裏，他回答了我們的問題，簡要如下：

1·他是59年抗議中共壓迫，逃離西藏到印度的；

2·他讚成達賴喇嘛爭取自治的中間道路；

3·雖然達賴喇嘛與中國官方的談判屢屢受挫，他認為，如果中國知識界都如我等一樣，關心西藏的現狀，西藏問題可以解決；

4·對正在談判中的中國政府缺乏誠意這一點，他說：我們只要堅持下去，中國政府就會理解達賴喇嘛的追求。

「您回答這些問題，代表您自己還是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我問。

「我代表自己。」他說。

「如果作為一名流亡政府的官員，您將怎麼回答呢?」

「我的回答會跟剛才的回答沒有區別。」

「您是否可以區別中國民眾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同？」

「我可以區別」，他脫口而出，沒有猶豫。

洛辛格桑最後為我們一一獻上了哈達。獻哈達的時候，他持續地、

謙卑地微笑著。我們輪番大叫「別動」，用自己的相機分別拍下好幾張合影。屋子裏氣氛歡悅起來，那時候，他嚴肅的神情退去，顯得特別輕鬆。可是我發現，當笑容出現在他的面龐時，他的神情仍舊被苦澀滯重糾纏著。

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藏人的傳統建築和服飾一概色彩鮮豔而風格熱烈，為什麼他們對異族表達敬意的哈達卻選擇不著一彩的白色。我們此行還將接受很多哈達，包括達賴喇嘛回贈的哈達和十七世噶瑪巴回贈的哈達，全是白色的。洛辛格桑的悲苦神情，使這條白色的哈達格外沉重。1959年他在西藏的槍砲聲中逃離了老家，丟下了世界的哈達拉薩，丟下了天堂的哈達袈裟，丟下了望果節的哈達莊稼，丟下了奔馳的哈達駿馬，丟下光明的哈達強巴……可是他還和在老家時一樣，「終生都是為了敬獻哈達」。



洛辛格桑臉上溝壑縱橫，眼神蒼涼憂鬱。(北明攝於新德里西藏難民社區管理辦公室)

當時我們都沒有料到，藏人在屈辱中堅持的談判，再有幾個月，就會在短暫的迴光返照之後破裂而中止。達賴喇嘛由此再度被妖魔化為分裂主義分子。

躬身接受洛辛格桑戴在我頸上的哈達時，我把他的隱忍一同納入了心中。那是一段我不知道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和單巴的故事一樣佈滿冰雪嚴寒，接著演成一生的沉鬱。

・哪一把尺子丈量西藏？

是自然的宣言，當我看到遍地荒蕪，
我就說那不是西藏的山。

是崛起的好漢，當我聽到弱者呼救，
我就回望西藏的山。

是永遠的晴好，當我遇到風雨煎熬，
我就躲進西藏的山。

是世俗的地貌，是精神的花崗岩，
我的西藏的山，雪域高原的信仰之山。

——〈西藏的山〉，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達蘭薩拉(Dharmsâla)位於印度北方喜瑪偕爾邦(Himachal Pardesh)的西北山區，背靠冰雪終年覆蓋的喜瑪拉雅山脈，海拔 1,250 米至 1,982 米，地貌是山谷與河川，點綴以田園、屋舍。此地距印度首府新德里約十二小時的車程。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作為英國殖民地，達蘭薩拉曾是英軍將領的避暑勝地和印度某行政管理中心，後被棄為不毛之地。1960 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將此地交予達賴喇嘛，允諾他在此建立流亡政府。此後，達蘭薩拉成為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小拉薩」聞名於世，並以其濃厚的西藏風貌，漸成印度重要的佛教朝聖地和旅遊勝地。

晚 10 點從德里乘火車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

車站人山人海，秩序混亂，設施和客車型號陳舊，恍若身置30年前的中國。最令人蹙眉的仍然是觸目可及的第三世界景觀：乞丐成群，蚊蠅昌盛，有些地方一巴掌劈過去可以碰到數隻。地面陰溝像人體暴露的血管，四處垃圾散發著腐敗的氣息。貧窮不要緊，但骯髒是那件掛在乞丐身上的破衣爛衫，它無所不在，先聲奪人，總是使我忘記一個亙古以來的事實：印度是一個關注靈魂勝於關注身體的國度，在他們不堪一擊的現實表象背後，有《奧義書》的天問、《薄伽梵歌》的博愛、瑜伽的神秘。世界上除了猶太人，沒有哪個民族如此鍾情於上帝和靈魂。我對印度社會的現狀難以認同，畢竟當代印度憲法規定他們是一個世俗國家。甘地描述過社會的七種罪惡，其中之一是「沒有奉獻的崇拜」。弗蘭克在描述俄國東正教弊端時指出：教徒們狂熱

追求天堂的幸福，以至於把地面放棄給魔鬼去統治。

凌晨，從蘇式陳舊列車硬臥車廂裏醒來，我們坐在僅有的兩個下舖床位上親密無間，卻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爭論。爭論者是朱學淵先生和李江琳女士，二人的分歧在於如何看待流亡藏民以及藏族現狀。朱先生是史學者，對中國民族源流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他抵達後即席訪談十數藏族難民、官員和「盲流」，非常失望。他的失望

是真誠的。還在美國登機之前，獲悉我從信箱裏傳去的關於印度髒亂差的消息，他不以為然，回應說：不論怎樣，民主體制下的社會和人



新德里火車站候車乘客一景。 (北明攝於2009年6月11日)

民，比極權體制下的老百姓有禮貌。他指的是紐瓦克機場的印度人不怎麼高聲喧嘩，旅途中井井有序，完全與文明社會融為一體，跟大陸外出旅行者大相徑庭。但是，新德里一天的見聞，也許主要是井市視覺的衝擊，已經使他非常失望。

江琳具有宗教知識結構和東方宗教情懷，她是這次達蘭薩拉之行的組織者和領隊，近年她對西藏流亡社會的實地考察和深入調查，使她在海外藏學研究中嶄露頭角。在我等一行中，唯有她是西藏問題的真正專家。她對朱先生的失望感到沮喪，對朱先生說：「你要上山，才能下結論！」

達蘭薩拉是一座海拔近兩千米的山，在藏人中和其他民族朝聖者中，去達蘭薩拉俗稱「上山」。

二人爭執不休。從旁觀聽，我感到茫然。他們衡量同一個社會，用的是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範疇。朱先生在思想上是五四精神繼承者，民主和科學是他丈量一切人類文明實體的標尺。江琳強調的是藏傳佛教的宗教性與精神取向。

你縱然可以用世俗化標準衡量一個宗教民族和佛國，但肯定難得其門而入，或者入門不見山水。同時我確信一定程度的科技、物質文明是人類精神自由的前提。很難想像刀耕火種的人類能夠理性地洞悉宇宙的奧秘和自身的局限。但是「五四」的無神論哲學基礎和科學迷信同樣難以適應現代文明人類的需求。人類歷史證明那個叫做「共產」的主義，作為一種理論雖然產生於工業化社會，做為一種實踐，則不僅滋生於貧困，而且易於在無神論國度大行其道。

此外，對於藏民族而言，是否應該用漢人習慣的尺度去衡量？人類是否能夠、而且必須在同一種文明中齊步前進？

西方人至今也沒能把以色列和希臘兩大文明源頭和流脈折騰得很平衡。達賴喇嘛曾經注意到：西方大城市的生活非常舒適，但是很多人只會跟自己的貓和狗表露真情。在設施齊全的西方豪宅中，他注意到洗手間裏擺放著鎮靜藥和安眠藥。我知道另一個更加荒唐而嚴肅的

故事：一位精明強幹的獨身女人，任某公司部門主管，周一到周五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回家睡覺。周六到周日仍舊孤獨一人，專門住進五星級賓館，並不出門，也不人與，不過看看電視，吃吃飯，睡睡覺。名曰放鬆休息。

如果生命的意義在於追尋快樂，「僅僅物質繁榮不能帶來持久的快樂」(達賴喇嘛語)。可是，坐上奔馳的火車以為山在跑，認為印度就是地球的末端，而且對遍及人類的病毒沒有免疫能力，這樣的民族在現代化社會連平安都不能保證！1950年，年輕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痛苦地發現「中國大軍壓境，而我們被拋棄了」，他檢討說，「1912 年，當我們獲得完全獨立的時候，我們心滿意足地退回到孤立中。……我們的獨立雖然對我們自己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對於外部世界來說，確是需要合法證明的。」[1]一個民族的封閉和鄰里間的隔膜，雖然原因不盡相同，但在本質上相差多少？

另一方面的問題也並不新鮮：人類的古老文明如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都擁有強烈的宗教追求，但是他們社會物質文明的落後，令現代文明無法接受。人類是否能夠在物質與精神中尋求一條中間道路而不偏廢？藏族文化是否有能力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

不過，在情感上，我同情江琳的立場。大陸漢民族精神荒蕪、道德匱乏，病入膏肓，歷史卻證明，藏人是為了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而流亡的。他們與我們之間的不同，是天淵之別。

在巴坦高特(Padhankot)站下火車，上小麵包車，順印度公路接近達蘭薩拉。登車前，戴著接車藏人獻的哈達，被印度乞丐追攆了一次，再跟一位臉掛長髯、身著黃袍的「泰戈爾子孫」合影一張。中途下車，吃了一頓印度餐，進了一次印度廁所，買了很多印度礦泉水，

---

[1] 達賴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電子版第五章，丁一夫譯。

拍了一些印度閒圖，看見路過的敞篷卡車上，一群一群無憂無慮的印度青年不知忙著到什麼地方去……這是印度，不是西藏。

一路無話。

・穿藏裝的女部長

「師傅，你如何將覺悟表現於行動之中？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
「當我吃飯的時候，我就吃飯；當我睡覺的時候，我就睡覺。」

——一則禪宗公案，引自《西藏生死書》

真正的達蘭薩拉行始於這日下午。下午依次會見的是西藏流亡政府信息與國際關係部兩位總管——信息部的Thubten Samphel 和國際關係部的 Sonam N. Dagpo 、外交部部長格桑·塔可拉(Kesang Y. Takla)、首席部長總理桑東仁波切 (Samdhong Rinpoche)。

我等一行六人就西藏流亡政府現狀及歷史聽取了兩位秘書的介紹。

朱學淵在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善良願望之後，針對2008年3·14暴力事件的起因和境內藏人對奧運會的抗議，發表建議和意見。他說，藏人的抗議客觀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不是一個很智慧的做法。他得到的答覆是：流亡政府注意到了境內藏民抗議行為的負面作用，並為此感到不安。但是他們鞭長莫及。因為流亡政府作為一個奉行言論自由原則的民主政體，不能夠限制任何人自由表達的權力，另一方面，流亡政府的聲音也沒有正式的渠道，傳抵國內藏人。

兩位秘書人到中年，言語溫和，言及中國政府暴力鎮壓藏人抗議活動時說：「不知道什麼原因，中國政府挑動兩族人民的敵對情緒」。——他們沒有做任何價值判斷。在德里的藏人社區與福利協會主席洛辛格桑面談之後，這是我第二次從藏人的表達方式裏領略藏人的樸實。而這種感受，與我多年來在美國流亡藏人中所獲得的印象是一致的。

外交部長格桑·塔可拉居然是一位女性。看上去60多歲，個子不高，穿著藏服，眼睛流露著溫和的光。她笑瞇瞇地迎著我們這些不速之

客。我們人高馬大一行人，不算西藏翻譯，與她六比一，不大的客廳即刻被我們擁滿。我無端地擔心，我們形成的空間局促，也會擠壓住她的從容。

結果並非如此。

我插空表達了一個意思：達賴喇嘛在四十年前所寫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書中，使用「中國人」這個籠統概念描述實施侵略行徑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確是目前中國的政府，政府官宦確是中國人，但是這個政府、這些官員，並不具備代表人民意志的資格，中國人從來沒有投票選舉這個政府。所以，在外交辭令、外交政策方面，如果西藏流亡政府不注意區分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將會使中國一般民眾情感上受到傷害。我說，高興地看到現在達賴喇嘛已經開始嚴格區分這一對不同的概念了。女部長格桑・塔可拉解釋說：過去，當西藏遭受入侵的時候，我們看見的就是中國人。而且當時也有歷史局限。現在，尤其是最近，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尊者對中國政府越來越失望，但是他對中國人不會失望。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流亡政府已經開始與民間華人接觸，每到一地，無論多忙，他都會安排時間會見各地的華人。

朱先生再度對外交部長提出建議：流亡政府應當說服自己的人民，不要做不明智的事情，比如不要在奧運會期間抗議中國舉辦奧運等。女部長的回答跟兩位秘書的回答基本相似：他們信奉言論自由，故政府不得干涉民間抗議活動。另外，中國政府封鎖嚴密，流亡政府目前也沒有任何渠道，對內陸藏人施加影響。不過，她說，他們會努力對印度及世界各地藏民發揮積極的影響。

女部長很有些不卑不亢。回答不同意見和價值觀產生的問題，毫不猶豫。這是一方面。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方面——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直觀反應和回答使我意識到，我們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運作原則尚不甚了解。雖然生活在美國的民主社會，但是我們習慣性地以中國極權政治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模式，解讀以民主原則建立起來的西藏流亡政府。

為什麼會這樣？首先也是直接原因，是對流亡的西藏群體及社會缺乏感知和了解；其次也是基本的原因，是衝出極權牢籠的軀體並不能夠直接帶來思維方式的徹底解放。耶和華讓走出埃及的以色列奴隸在荒野流浪了四十年，直到他們全部死光，他們的後代才能進入應許之地。八九之後，為尋求自由和民主而走出漢地的中國知識人在海外生活二十年了。還要過多少年，流亡者才能不僅接受民主、倡導自由，而且習慣於以民主自由價值為基礎的思維方式以及行為方式？一九八九年的死難者們用自由夢想和追求製造的中國掛曆，還有另一個二十年的空白頁等著翻過去嗎？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長格桑·塔可拉在她的辦公室與我們交談。(朱學淵攝於2010年6月11日)

一朝為奴，終生不赦，耶和華太神了！

易崴發言說，大陸知識分子對西藏問題信息不足。多年前他從海外電臺了解到達賴喇嘛的自治政策時，他非常吃驚。他自認資訊豐富尚且如此，一般民眾可想而知。互聯網時代有益於信息傳播，流亡政府應當設法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這非常重要。他也表達了對達賴喇嘛及其自治政策遭中國政府拒絕並被妖魔化等一系列問題的震驚。言談之間，傳達著另一消息：只要有可能，大陸知識人對西藏問題非常關注。外交部長回答說，中國信息控制嚴密，漢人之間的溝通都不自由，流亡政府突破封鎖更難。但是她又說：「我們主要以正常方式與海外華人交流。」

・袈裟中的慈威

我站在日月山眺望你，
望見了一道不逝的彩虹；
我站在青海湖眺望你，
望見了一盞不滅的金燈；
我長長地走去慢慢地靠近，
盼望度過所有的寂寞，
所有的春夏秋冬。

——〈布達拉宮〉，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流亡政府總理會客室。

看來所有流亡政府的辦公室設施和擺設都既非藏傳風格亦非中國特色，而是一應西式風格：辦公桌、座椅、書櫃、會客沙發、茶几等。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的辦公室亦然，只是空間大些。

當這樣的空間裡進來幾位穿西裝的西藏普通官員時，我沉睡感覺開始甦醒，我得提醒自己，這是西藏政府所在地的西藏官員；當這樣的空間裡出現穿西藏民族服裝的外交部長，而她是這個空間的主人時，我必須睜大眼睛，慢慢適應眼前的景觀：她講藏文，舉止文雅，親切誠懇，率直而謙卑。

當這樣的空間裡走進來一位穿絳紅色袈裟的的主人，我被帶進一種陌生的境地，來不及思考，只能被動地條件反射。

桑東仁波切，藏傳佛教高僧兼西藏流亡政府總理。袈裟相當臃腫，裹住他瘦小的軀體，但是無礙於他肢體語言的敏捷。他快步走進門來，含笑與我們一一握手，然後落座，說這裡條件不好，請大家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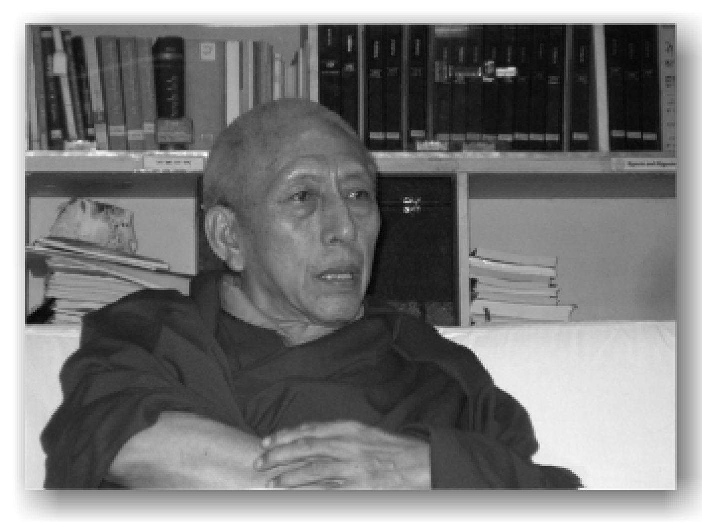
幾句寒暄之後，他的神態，尤其是眼睛已先聲奪人——他目光敏銳，有如利器，似乎可任意切割所攝取的景致。年歲導致他下眼瞼突出，這卻絲毫不能頓挫他目光的力度。他鼻樑筆直，鼻子堅挺，但絲毫不能奪走那目光的葳蕤。這樣一雙壓倒一切的眼睛，使他顯得精神矍鑠，神態自若，篤定平靜中露出威嚴的貴族氣。

憑直覺：這是一位重量級人物。

江琳強調這位總理是一位梵文學家。會客室書架上的書，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少部分是中文書籍，其中包括中國官方出版的西藏問題書籍，顯示這位梵文學家可能在某一領域學貫中西。

而我們有能力直接領略的，只有他的政治智慧。

在此前一次回答有關西藏主權和自治問題時，他曾經言及世界一體化趨勢，明確指出目前歐洲世界已經進入追求各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時代。我記得，這番談吐讓我當時深感驚訝。民族主義，國家主權，是上個世紀殖民主義時期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今，殖民主義土崩瓦解，國家獨立已經實現，民族自決讓位於國家聯盟，個體人權問題已經超越國家主權，成為人類關心的頭等大事。而西藏，面對中國中央政府的極權主義和漢族殖民主義，仍然必須首先爭取民族生存權，挽救文化與宗教於滅頂之災。西藏問題在全球化時代確實是一個滯後的問題，在人類行進的列車中，成了一節脫節的車廂。幸而有達賴喇嘛，以其遍及全球的影響力和信服力，拖著這節車廂不斷前行。



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一位高僧、學者和政治家，西藏真正實力派人物。(北明 2009 年 6 月 11 日攝於流亡政府總理府會客廳)

西藏問題的存在及其尷尬性，是世界上最後一個極權政府製造的，雖然如此，我從未設想西藏領導人對此會有如此明確的意

識和認同。桑東仁波切對此直言不諱，談來從容不迫，這顯示他不僅對西藏問題和流亡政府的訴求在世界政治版圖和全球化時代的歷史位置及特殊性有充分的知覺，而且他絕不會盲目從眾，放棄西藏的獨特性。事實上，沒有單個民族的獨立存在，就不可能有世界人類文化的豐富光譜和多元存在。

1959年第一批逃抵印度的普通藏人絕大多數首次看見森林、火車，1960年在印度的藏人流亡學校上課的學生們，也是首次看見地球儀，首次獲悉世界上除了西藏、中國和印度還有其他國家。不過50年過去，達蘭薩拉流亡政府官員的大腦已經完成了西方人類從工業革命到信息化時代 300 年之久的現代化轉型。藏人藏在自己的袈裟裡篤信佛陀，安於中世紀生活，對現代世界既不感興趣也一無所知，這樣的觀點在桑東仁波切的會客室卻遇到嚴重阻力而無法伸延。我看到的這位總理，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胸懷的民主政治家，他的袈裟裡擁有一個當代人類政治地球儀。他隨時轉動這個地球儀，用來觀照西藏民族始於上個世紀下半葉的厄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把握西藏前途命運。他對人類世界歷史進程的了解、他的人文知識結構、他的現代政治理念和精神道德修養，中國當代高層官員只能望其項背，中國流亡的民主人士同樣望塵莫及。

桑東仁波切 20 歲逃亡。單巴次仁逃亡時 10 歲。他們是在同一年翻過雪山逃離中國的。他們是同一代人。我坐在他側對面的沙發上，靜靜地揣測：如果面前的桑東仁波切脫掉袈裟，他看上去會像單巴次仁嗎？

單巴次仁那染上沈　的父親確白嘣多被抬到醫院，卻沒有死去，一周之後，他奇蹟般地回到了形單影隻、傷心欲絕的單巴身邊。沒多久，傳來孩子要被送往別處去寄托養的消息。幾個月前在雪山那一邊，這五口之家是因為聽到類似的消息而最終踏上逃亡路的，幾個月之後身在印度，再次聽到這樣的消息，五口之家只剩下父親和單巴了。

這次，拒絕前往的是單巴，不是單巴的父親。單巴已經不能再經受任何分離了，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東西一直在不斷地遺失，家園、妹妹、另

一個妹妹，然後是媽媽，就像自己的肢體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但是，殘缺不全的單巴不得不服從父親的決定，父親告訴單巴：這次是去達蘭薩拉，那是他背著單巴母親去過的地方，達賴喇嘛定居的地方，那裡建立了一個托養所，任務就是照顧在築路勞役中失去雙親的孤兒。

這一次的被迫別離是單巴生命中最後一次離別，也是他生命的轉折。單巴沒有辜負父親的期待。他此後中學、高中、大學一路保持優異成績。

學醫不成的單巴後來回到流亡社區，參與政府工作，同時直接參與爭取西藏獨立自由的運動：他加入了民間組織「西藏青年大會」(簡稱「青年會」)，這個組織以主張「西藏獨立」著稱，在當時的藏人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它的四位創辦者都是西藏流亡青年，都出身上層，而且大都畢業於英國在印度創辦管理的一流學校。在他們周圍聚集著一批西藏青年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帶有全世界被壓迫的青年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者的特徵：貧窮、熱情、浪漫而富於犧牲精神。「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正如十八、十九世紀彼得堡、莫斯科大學校園裡的「斯坦克維奇小組」、「孫古羅夫小組」、「拉舍夫斯基小組」培養了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俄國思想家、文學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北大、四川西南師範學院、湖南師大的讀書小組或文學社產生了胡平、王康、梁恆等一批中國民間思想家一樣，在達蘭薩拉七十年代簡陋的房子裡造就了西藏流亡知識精英。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西藏貴族青年聚集在一起，喝最廉價的青稞酒，在煤油爐子上煮茶，幾個人用一個杯子，拿牙刷當勺子，他們徹夜長談，激烈爭論，討論西藏的出路。

這些西藏知識青年驚醒了西藏，西藏開始思考了。兩千五百年歷史俱往矣，擁有現代自由意識的西藏，是七十年代初從達蘭薩拉誕生的。

達蘭薩拉西藏青年會的誕生，也是達賴喇嘛民主自由意識的體現，他理解青年們的激烈情緒，不限制不壓制他們的討論，並且支持他們的自由活動。如果沒有達賴喇嘛的寬容與理解，這個組織(以及其他許多流

亡西藏的民族間組織)不可能存在下去。「中國人怎麼那麼容易就進入了我們的國家？軍隊為什麼沒有浴血苦戰？昌都失陷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西藏青年首次開會，當著達賴喇嘛的面，就對西藏噶廈政府成員發出這樣的質問。

單巴在那個自由的氛圍裡結識了一批西藏理想青年。與他們的交往和接觸，拓展了他的視野和胸襟，關注和思考西藏命運前途成為他生活的重要內容。他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在青年們的政治參與活動引發流亡政府政治危機的數年之後，青年會再度改選，單巴在改選中成為31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候選人之一。基於在青年會分會的廣泛影響和良好聲譽，1978年，他被選為青年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那時起，他成為流亡社會中最具政治權威的人物之一。

由於必須依靠年紀輕、文化高、英語能力強的藏民，西藏流亡政府中青年會成員的比例，從七十年代的接近半數上升到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七十五。桑東仁波切早年也是流亡藏民的民間組織青年會的成員，主張恢復西藏獨立的歷史地位。單巴不僅與當時的桑東仁波切同持西藏獨立的主張，而且在內地武裝革命無功而敗的情況下，甚至主張更激進的恐怖主義的手段。但是三年後，他出任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外事處首席秘書，跟隨自己的精神領袖出訪亞歐兩洲，蘇美兩國等地，眼界大開，西藏復興的觀念也隨之改變了。

達賴喇嘛奔走世界，進行和平努力的成果，不在於擊退西藏本土的中國軍隊，奪回西藏的獨立地位，卻在於使西藏死而後生、鳳凰涅槃，在於西藏社會、文化、宗教、傳統的異地重建，在於使封閉的西藏走向世界，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在眾多流亡藏人試圖演繹西藏變天帳的時候，達賴喇嘛以和平手段，為自己的民族開闢出一片新的天地。這一事實，使達賴喇嘛的首席外事秘書，32歲的單巴次仁終於認識到：「他的倖存以及西藏整個民族的倖存，都是達賴喇嘛為復興建設而和平努力的結果」，「西藏不尋常的希望並不在於失敗的游擊隊，而在於傳統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社會已經重新建立並正在走向世界」。

單巴不是宗教領袖，不是梵文學家，但是在西藏現實問題上，他與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同一條心路上的旅人。現如今，桑東仁波切是達賴喇嘛關於西藏「自治主張」、「中間道路」目的、意義、細則、來由的權威闡釋者。比桑東仁波切小十歲的單巴次仁呢？我猜想桑東仁波切應當是單巴次仁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或老朋友。我想像，在不事佛、不讀經、不工作的時候，他們相遇在達蘭薩拉的老樹下或丹增嘉措的宅院裡，也許會相視一笑，雙手合十，彼此熟悉得知道今天對方喝了幾碗奶茶。



本書作者北明在桑東仁波切總理府聽仁波切回答問題。
(李江琳攝於2009年6月11日)

此刻在總理會客廳看見桑東仁波切，等於部分地看見了單巴次仁。

江琳的問題是，桑東仁波切政務、佛事一身二任，是否相互衝突？回答是，連任第二屆了，至今沒有遇到有衝突的事務。未來兩年，如果遇到衝突，他會考慮在僧侶和總理之間做出選擇。

我突發奇想，如果中國有這樣一位有學識、有信仰、有現代政治意識的總理，該是何等幸事！輪到我發言，我簡報自己對他的直覺，然後問：如果您是一位中國總理，對目前中國現狀您會有什麼樣的不同於中國當局的治理方案？他沉吟片刻，回答說：「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我還是試著回答你。我信奉自由、平等與和

平，如果我是中國總理，我至少要給中國人民自由。」中國問題千頭萬緒，積重難返，從周恩來到朱鎔基、溫家寶，歷屆總理為治理中國滿腦門子官司，下場灰暗。我實在沒想到他這麼簡單扼要就把一個複雜的問題擺平了。綱舉目張，如果我是中國，我會考慮向西藏流亡政府借官、借經驗，第一官是桑東仁波切，第一條經驗是憲政與自由。

易崴發問：西藏自治可能導致西藏嚴重漢化，漢化必然導致對西藏的一些負面影響，如嚴重的貪污腐敗等。您如何看這個問題？桑東仁波切對此問題深思熟慮，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漢化不僅必然引進漢人的毛病，也將引進漢人的優勢，相信二者之間會有一個平衡。他舉例說：我們有些第三代人留學歐洲，不會說藏語，不懂藏文，但是他們與我們之間的溝通沒有問題。比較麻煩的是漢化之後產生的那種不藏不漢、非中非西、不倫不類的人。接著他說，「藏人漢化之後，不會說藏語，不懂西藏文化，變成了一個漢人，這無妨」。

為何無妨？

他答覆的最後一言博得我等由衷讚歎，他說：

「只要他是一個好漢人」。

我相信他的意思並非同意藏人完全徹底漢化為漢人，我相信此話建立在對藏傳文化將源遠流長擁有絕對自信的基礎上，我相信此話表達的是對從孔子到孫中山一脈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最大敬意和對中國民族的最大善意，我相信此話再度顯示他作為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信仰者的容忍氣度。我為西藏有這樣的政治家感到寬慰。我想，如果不是語言障礙，我會成為這位耄耋老者的忘年交，我能從他身上學到謙卑和寬容，智慧和慈威。

職業編輯一平氣質上是一位文化思想型的詩人。中國傳統文化在六十年間毀滅性的厄運及其在中國社會導致的精神災難，在他土厚水深的仁愛心靈田野上留下了深長的、無法癒合的疤痕。他對流亡西藏文化現狀的思考和感懷，就像一片沙漠對另一片沙漠綠洲的守望，

特別深切誠摯。

他告訴桑東仁波切說：西藏問題本來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不是遭遇中共政權而是國民黨的政權，不會發生一九五九年平叛西藏那樣的事情，達賴喇嘛也不會流亡。但是中國當局一直宣傳說，他們一九五九年實行的是民主改革，說西藏過去是奴隸制，說五九年的改革是對西藏農奴的一次解放。這種宣傳對許多中國老百姓來說是有效的。因此，流亡政府應該把這整個事件的真相告訴更多的中國人。一平說：非常肯定，無論西藏過去是一個什麼樣的制度，這樣的做法都是對一種文明的毀滅性破壞，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反文明的。了解這個真相，可以幫助漢人改變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此外，一平說：在漢藏兩族的關係上，我們面臨一個危險，「這個危險也是中國政府刻意在做的，就是通過鼓動漢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使西藏這個政治問題變成漢藏兩族之間的民族問題，使他們之間形成仇恨，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一平說：我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保持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避免這個政治問題變成民族問題，努力化解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我應該告訴總理，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都是同情藏族的。

一平語調徐緩平實，一如他的人，安詳儒雅而寬厚。他沒有提任何問題，但是我確信，這是自西藏1950年遭到來自漢族政權的精神奴役與壓迫以來，藏人從漢人所聽到的最深切的同情的話語和最誠摯的聲援，這也是西藏流亡半個世紀以來，漢藏兩族所實現的一次重要的、溫馨如兄弟般的心靈溝通。一平告訴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他非常欽佩達賴喇嘛。他帶著如此少數的藏人，走出中共對于西藏文明的破壞，在流亡生活中保存了西藏的文明，並且使之發揚光大，傳播到世界各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蹟。達賴喇嘛為人類保護文明做出了一個榜樣。一平說：做為一個漢人知識分子，我對藏人深感欽佩並為之驕傲。縱然漢族有十三億的人口，我們說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在保存自己文明這一點上，做為一個漢人，面對西藏我感到非常羞愧。我們甚至不能比那些翻

山越嶺尋找文明的西藏的孩子。這些孩子冒著生死的危險，許多人在路途上甚至殘廢了，來到達蘭薩拉，追求西藏的文明。這對于整個人類都是一種非常寶貴的品質。一平說，在現代世界物質主義的衝擊下，許多文明已經毀滅，能夠保存下來的文明已經很少，保護西藏完整的、古老的文明，不僅是西藏人的責任，也是漢人的責任，也是整個人類的責任。

我與一平的交往不多也不少，但在中國當代的精神末法時期，我對他的了解和信賴不覺間成為我對人的道德高度保持信心的平台。一平告白說，他說這些話，不是出於一種思想、一個理念，而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知識分子，痛心於中國自身文明的毀滅性的破壞，對于文明的敬重已經成為他內心裡的一種感受。他告訴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不管中國政府怎麼樣說，怎麼樣污蔑達賴喇嘛，希望總理能夠知道，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非常尊重西藏文明，尊重你們所做的一切。

作為同樣的流亡他鄉的漢人，作為在坐的各位流亡者中的一員，他最後說：

「真正的祖國不僅在于你生活的這片土地，更在于你的宗教，你的語言、你的信仰，你的文化。我真心地祝願西藏人即使在流亡期間，也能夠像猶太人一樣，在一千年的流亡當中，在兩千年的流亡當中，仍然頑強地堅持下來。」

經過這次會談，我們對西藏的現狀和未來有了幾點明確的認知：

一，提及未來的財政收入時，桑東仁波切順便提到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一事實大陸漢人無從知曉，引起我等驚異，一向關注經濟形勢的齊越尤其感到吃驚。根據中國官方資料，中國政府對西藏礦藏資源的開發所得，遠遠大于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投資和援助。此外，礦藏的開發，僅金礦，在西藏境內，在衛藏、康區、青海等地就有一百多個。桑東仁波切介紹說：「有關資料顯示，其中的一個金礦，每天開採量就達

20公斤。」他回答說，消息來源是中國官方資料，時間在1999年到2000年中間。

二，內地藏區實現高度自治之後，這種自治不會涉入軍事、外交管理，流亡政府也不會回去與當地政府爭奪資源和利益。這個流亡政府將徹底解散。「內地的西藏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他們應當自己管理自己」。

三，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西藏流亡政府對發源於封閉地理環境中的西藏傳統文化的傳承、變革具有信心。事實上，流亡政府自建立之初就已從教育著手，開始積極迎接現代化的挑戰了。而且流亡西藏五十年的存在已經證明，西藏文化不僅可以在開放社會保存完好，而且可以傳播到世界各地，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不過，桑東仁波切表示：現代文明中的軍事現代化是藏文化唯一不能兼容的東西。

濃濃的奶茶上過兩道了，告別的時候到了。我相信，主要是因為一平溫和平靜而誠摯的表述，使桑東仁波切在結束這次訪問時說了下列的話，我相信這些話出自他的肺腑。他說：「你們每一位講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鼓舞我，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你們所發表的觀點和你們的思維方式，事實上真正代表了中國人的思維，是中國文明的體現。」他又說，「藏漢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和睦相處，做為鄰居，將來不可能由于一些政治問題而分離，成為仇敵，我們還是要一起存在下去。達賴喇嘛提出的漢藏民間的交流這種觀點是非常、非常偉大。各位能夠親自到達蘭薩拉，我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的感謝」。最後他說：這樣的交流，說幾天幾夜
都沒有關係。我現在因為其他工作日程馬上要離開，當然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話，你們離開達蘭薩拉之前，再次與大家進行交流。

合影，致謝，告辭。

總理府和外交部是一座普通的小樓。二樓平台遠離鬧區，近瞰轉經塔，遠眺青峰白雲，意接喜瑪拉雅山脈。出總理會府門樓，接近傍晚時分，山脈層疊，青嵐蒼莽，夕照無限。同仁們不約而同舉起了相機。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府二樓平台遠眺。 (北明攝於2009年6月11日)

心有微瀾，隨藍色山脈韻律起伏有致、漸至無極。回望桑東仁波切的「好漢人」之諾等言說，感覺有一首西藏奏鳴曲從腳下緩緩響起。在傳世至今的作曲家名單上，找不到這首西藏字符的曲目和作曲家的名字。這曲目和名字不在任何音樂史中，它來自雪域高原，是喜馬拉雅山
無言的造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偕心靈永世長存，自古如是。[1]

[1]補記： 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全名桑東仁波切•羅桑丹增。「仁波切」，藏語音譯，是藏傳佛教的尊稱之一，藏文是「珍寶」、「如寶貴人」之意。修行者滿足下列三種情形之一者被尊為仁波切：被認證的轉世高僧、學問高深的世人楷模、成就很高的修行者。桑東仁波切滿足了上述全部三項條件。他5歲被認定為是四世桑東仁波切轉世之身，7歲受戒，20歲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七十年代初完成宗教學業並以其深厚藏學功底，先後任印度瓦拉納斯西藏文化學院院長和高級顧問近三十年。在轉世高僧的特殊身份之外，他的梵文學養和藏傳文化與宗教學識在相關學界首屈一指，堪為國際藏學巨擘；此外，在現實社會層面，在西藏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實踐過程中，他具有西藏民主先驅者的地位：他是第一部《西藏流亡憲章》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在以民主規則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中，他2001年當選首任民選部長、總理並連任至今，此前，他是西藏議會立法議員和議會議長。他確是一身兼高僧、學者和政治家的西藏真正實力派人物。

・藏經樓、佛祖居

我聽說西藏選擇了黃色
因為黃色是太陽的顏色
我知道西藏選擇了太陽
也就是選擇了不落

——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今日參觀此地的西藏圖書館的檔案館、藏經館、藏醫和占星術學會。

圖書館小樓大廳的內裏正在加固。很原始的辦法：木頭樁子下端插在沙袋裏，借沙袋之固，戳在地板上，木樁上端則頂住天花板上一些鐵管子或大樑。工人們正在樑上做加固工作，吭哧吭哧很費力。

推門而入，繞行木樁，步入色彩鮮艷的西藏風格的樓廳，我尚未意識到已然走進了一個物化的精神世界，直到走過黝黑的甬道，穿過狹窄的屋門，進入櫃架壓頂的空間，人被架上層層摞疊的經卷所包圍，嗅覺被亙古書香所浸潤，我看見了那個難以置信的地方。

藏經館佔地面積約 1,500 平方英尺。四壁和中間一排排的書架從地面直頂天花板，架上全部是梵文、藏文佛經。大都線裝，包以金黃色、絳紅色、紫紅色的柔軟厚實的棉布，並貼著編碼標簽。這些經卷質地沉厚，有些極為古老，紙張黑黱弱，磨損嚴重，幾乎無法翻掀。管理員翻身上架，將一部岩石狀的經卷費力地搬挪下來，陳列在案台，小心翼翼地打開外層金黃色的布面包裝，告訴我們：這東西有上千年久遠了。那



達蘭薩拉藏經樓裏，管理員為我們小心打開古老的梵文經書。(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

是一部梵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黑色質地脆弱，邊角嚴重磨損，狀如廢墟裏的出土文物，散發著神秘古老的氣息。

一行人唏噓不已。

這些經書全部是逃亡的藏人翻過這個星球上最高的雪山隨身攜帶到此的。對這個事實的領悟，需要一些想象力：人要奪路逃跑，要翻越雪山，冒著被擊斃的危險，但是不肯放棄這些經書。他們背著這些古老的文字逃難，就像背著自己的祖宗家產。他們背過來的不只一卷、兩卷或一百卷、兩百卷，是成千上萬卷！

這些寫滿陌生文字的經卷，在我的解讀中可以濃縮為兩個漢字：信仰。

這是中國人丟失乾淨的兩個字。

這個被人類不斷窮盡的世俗世界，已經沒有可以創造奇蹟的依憑，除了信仰。

再去另一個陳列室，再一次嘆為觀止。櫥窗裏陳列的全部是佛陀和菩薩雕像，大部分由金屬澆鑄而成。還有唐卡，各色各形、大小不等、新舊不一。這些沉重的鐵像銅像和製作精美的唐卡，也是逃亡到此的藏人以生命做抵押背出來的。

經卷樓和佛祖居是流亡藏人拒絕精神荒漠化的見證。站在這陳列之地，能感到這個遭受凌辱和奴役的弱小民族精神生命的強勁堅韌。

同樣為人奴，同樣為了追尋自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公然逃亡，號稱60萬之眾，而且他們有摩西引領，有耶和華一路看護；出中國的西



達蘭薩拉藏經樓內一側。（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

藏人只能秘密出走，以家庭為單位各自為營，勢單力薄，而且無人引領，無神力看護。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遭埃及追兵趕殺，過紅海、滅追兵，得神助而暢行無阻，毫髮無傷；出中國的西藏人翻越世界最高的山脈、陷落於前所未聞的黑色森林，所有險阻困苦只能用自己的雙腳一步一步丈量，一路走，一路家破人亡。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在前方召喚，鼓舞鬥志；出中國的西藏人走出雪域，前程渺茫，輾轉他國，身不由己，一再失去目標。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只為了一時缺水，吃不到肉，不斷背叛上帝，並不斷要求回到埃及繼續為奴；出中國的西藏人歷經嚴寒、酷暑、高地、平原、缺氧、射殺、凍死、飢餓、屈辱、乞討，一路流亡到印度，再經苦役、疾病、瘟疫而家破人亡，縱使深痛巨創，悲哀淒涼，他們從未背叛自己的信仰。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為行程艱苦，一路走，一路怨聲載道，以至於竟要用石頭砸死他們的領路人摩西；出中國的那條逃亡路，藏人年年月月不絕如縷，聽得見他們散佈在雪野、密林、公路、荒山、帳篷裏與火葬場的啜泣哭號，聽不見他們的仇怨和悔恨。

以色列人一次性出埃及，走了三個半月；藏人年年出中國，流亡歷史綿延半個世紀，至今仍在繼續。

最後，在不毛之地上重建家園、保存傳統文化遺產的是西藏人。而他們這個異地家園，是人類歷史上眾多流亡者家園中第一個沒有武力衛護、唯以信仰凝聚的家園。

考古學和無數學者的研究證明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真實性。西藏人公元後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開始的出中國，作為藏人的自我救贖之舉，是正在發生、不需考證的現代史詩。

步出藏經樓和佛祖居，我知道，從這一天開始，在我心中的藍天裏，將有一面旗幟永遠為西藏而飄揚。

·消解的坐標

把肉體洗成清香的松柏，
把信仰洗成無暇的美玉，
把靈魂洗成天上的花朵，
把語言洗成動人的歌曲。
……
當人與自然再也沒有分界，
我看到了藏土與別處的區別。

——〈洗浴〉，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陀思托耶夫斯基描寫過西伯利亞邊遠地區小城鎮的風貌：人們生活儉樸，秩序井然，沒有自由主義思想，傳統泥古不變並被奉為神聖。每個村莊必有教堂，教堂必有兩座，一座落於活人居住的城裏，另一座立在死人居住的墓地。如果有哪個漢語作家願意描寫上個世紀前半葉的西藏，他/她能為人類貢獻一部奇書：風格類似西伯利亞偏僻城鎮，人們的生活方式比西伯利亞的更封閉也更深邃，更接近太陽也更安詳。中國在那個歲月是被巨蟒纏困的拉奧孔，驚恐萬狀、奮力掙扎而自顧不暇，再說，哪屆政府和軍閥也沒法子像沙皇政府那樣，能把偏遠西藏作為流放地，讓自己的如椽巨筆曹雪芹、龔自珍、紀曉嵐或哪怕胡適、魯迅們去接受懲罰——西藏那時是獨立的異國鄰邦，你要麼如當年唐太宗李世民那樣出嫁室女，攀親求好，等待藏國「漸慕華風」，要麼如後來中共所為，槍炮相見，武力入侵，佔領兼併吞沒，而後快何如哉並臭名昭著於國際社會。

這樣的西藏現已經不存在了。經過 60 年的漢化，嚴格地說，現如今的西藏只剩下海拔、高原以及殘存的自然風景可為遊客樂道和嚮往。

我心儀是另一個西藏，出中國50年之久的流亡西藏。這個西藏保留了遠古的宗教生活方式，同時接納了西方現代文明。無數大陸和西方人前往達蘭薩拉，首為朝聖，也為觀光，但是關於這個西藏在鳳凰涅槃之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它接納西方現代思想與制度文明的特徵和成就，

至今尚未引起人們的興趣。——歐美人習以為常，中國人沒有接收這類信息的器官。

我是少數例外之一。多次撞到現代西藏的大門口，只有這一次，遲鈍的我推開了這扇門。

是日下午的計劃是到西藏流亡議會所在地，議長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將為我們介紹西藏議會建立過程—— 一個聽上去頗為枯燥的話題。

一行人抵達流亡議會的客廳不久，來了議長的司機或清潔工：

四十多歲，五大三粗。黑臉、寸頭、小眼睛。上身被一件綠色短衫緊繃繃裹住，腳丫子卻在寬大的人造革涼鞋裏自在逍遙。此君進得門來，並不報告我們說議長先生即刻駕到，也不倒水端茶清理衛生，卻快步上前與我等一一握手表示歡迎。儼然一應主人做派。

此刻寫下這些文字，回憶斯人舉止，才意識到，我對流亡西藏民主制度的真實感受，始于與此君握手並聽他開口的那一刻：

他就是西藏流亡議會的議長平巴次仁先生。

自我介紹中，我們獲悉他是第一代印度出生的藏人政治家。家境貧寒，兄妹9個，舉家種地。他本人受過高等教育，專業是經濟。身在異鄉流亡為客，自然關心政治。他為我們介紹流亡議會的創立和歷史，神態自若，簡繁有序，條理清晰，藏語中間雜流利的英語，略顯沙啞的嗓音相當性感，微笑卻沒能遮擋他從容自信的作風。幾分鐘之內，他把一個清潔工在表述方式、思維能力、見識學養方面丟的分悉數扳回，令我等刮目相看。

為了記述準確，我把手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編印的《西藏流亡政府簡介》中的〈流亡政府概況〉一節抄錄如下。在到訪達蘭薩拉前，在見到平巴次仁前，在走進流亡西藏的議會廳前，我曾經讀過這段文字，但是忽略了它。現在我意識到，對一個認同自由平等價值卻對



議長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先生坐在議會廳為我們解答問題。左起依次：李江琳、朱學淵、平巴次仁、桑傑嘉(翻譯)。 (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

真實西藏全然無知的人而言，這段文字有十足的顛覆性，即便對於數量微弱的流亡漢人群體，這段文字也意味深長：

「位於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所建立的噶丹頗章政權，也即『噶廈』政府的延續。

「1949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十萬大軍入侵西藏東區省份安多和康區，次年佔領了西藏東部重鎮昌都。隨後，在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政府被迫接受簽訂了所謂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從此整個西藏陷入中國政府極權高壓的統治之下。並於 1959 年 3 月，鎮壓了拉薩抗暴運動，同年，達賴喇嘛和約八萬多名西藏人被迫流亡到尼泊爾、印度和不丹等國家尋求避難……時至今日，仍陸續不斷地有西藏難民為尋求庇護而逃離西藏。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數已超過十四萬，其中包括在印度

就有近十萬人。

「1959 年 4 月 29 日，達賴喇嘛在印度北部的避暑地穆蘇瑞(Mussoorie)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1960年5月，西藏流亡政府遷居達蘭薩拉。如今達蘭薩拉仍然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位於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歷史上西藏噶丹頗章政權的延續，是代表六百萬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非暴力、正義、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西藏流亡政府神聖的原則與承諾，這也使越來越多的各國議會和人民將西藏流亡政府確認為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從一開始，西藏流亡政府的雙重任務就是建立西藏難民定居點以維護西藏民族的特性，以及恢復西藏的自由與幸福。需要重建的工作包括：一，提高流亡藏人的教育素質；二，建立牢固的民主體制；三，為西藏難民在異鄉他國的自力更生而鋪路，並使他們不必依賴外部援助而能夠有尊嚴、自信地生存下去。

「西藏流亡政府對現代民主制度的實踐，主要是為西藏重獲自由後的未來進行準備。其實踐的一部分包括設立議會，這個最初被稱為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的西藏人民議會於 1960 年9月2日正式成立，並逐漸成長而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立法機構。

「1991 年，達賴喇嘛進一步擴大民主化，西藏議會議員的人數增加到46人，議會不僅被賦予選舉噶廈(政府內閣)成員的權利，而且內閣要接受議會的質詢。同樣，1992年依據印度有關法律代表公義的最高法院也宣告成立。

「新授權的議會制定和頒佈了《流亡藏人憲章》。

「2001 年，在達賴喇嘛指導下，議會修改了憲章，從而使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最高行政首長)，然後再由首席噶倫向議會提出其他內閣成員的候選人名單，經議會通過後正式任命之。第一個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原文「且」)·羅桑丹增教授，於 2001 年9月5日正式宣誓任職。在 2006 年8月，他第二次被選為首席噶倫。

「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政府，它已具備了自由、民主政府的所有屬性和功能，盡管流亡政府並不是被設計來取代西藏政權的……達賴喇嘛在未來政治指導中指出，當西藏重獲自由之時，西藏主要責任將會由西藏境內的藏人來承擔，而不是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員。達賴喇嘛還指出，在過渡政府時期，將會通過選舉或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的方式產生過渡政府總統，屆時達賴喇嘛將其所有的政治權力移交給過渡政府總統，過渡政府要在兩年內舉行普選，並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所取代。」

從木匠的兒子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開始，人類幾乎所有暴行和罪惡都堂然皇哉地打出公義的旗幟，這真是令人驚詫駭然。不過，鑑於法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法國知識分子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雷弗爾(Jean Francois Revel)總結過美國創立自由國家的經驗；鑑於俄國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俄羅斯知識分子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別爾嘉耶夫、伊萬諾夫們總結過蘇聯的教訓。相形之下，在極權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奴役下的西藏，引進了人類最文明的管理機制，創造了辛亥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民主實體，用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書寫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獲得人類聯合政府聯合國的表彰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讚歎，遙遙領先於官宦中國、民間中國或流亡中國。奴役者繼續奴役，同情者開始同情，詆毀者輪番詆毀，居傲者繼續指點。達蘭薩拉，藏人的迦南之地，謙恭迎送五洲賓客，泰然自處國際風雲，居高而俯首，從未想炫耀自己的成功。

聽完平巴次仁議長關于議會歷史的介紹，出客室、穿天井，來到議會會議室。一如所有藏人居家、公所、機構，甚至餐館、書店一樣，達賴喇嘛的畫像掛在議會廳正面正中，只是這裏這幅圖片中的丹增嘉措非常年輕，應當是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流亡之初的留影。

議長平巴次仁先生介紹說：達賴喇嘛雖然已經不再擔任政治領袖，

但是這位尊者認為，一個政治家擁有信仰非常重要。有了信仰，當他思考政治問題、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就會有約束，就不能欺騙民眾，而必須首先考慮到誠信。這將有利於好的政治、民主政治。

平巴次仁介紹的下列信息，一則一景，使人印象深刻：

這位議會議長的薪水每月300美金，這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薪水的幾乎最高標準。此外沒有任何其他補貼或獎金。這一點不同於大陸任何機構官員，卻於民主國家政府官員相同。

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的薪水標準比議長低，比他少200盧布，相當于4美金。

議長的工資並非最高，最高的是司法機構的大法官。大法官比議長薪水多100盧比，相當于2美金。——這是一個象徵。這個象徵意味深長：執法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流亡政府幾乎沒有貪污現象。平巴次仁回答說：每年政府的開支只有400萬美金，貪污條件不夠。——他沒有強調人的道德修養，卻告訴我們「貪污的條件不夠」。他舉例證實說：幾年前，有個公務員貪污，款額是2,000盧比，相當於40美金。這個公務員被開除了。這是流亡政府中唯一一例貪污事件。

從歐洲舊大陸到美國新大陸，數百近千年來，所有立法者在限制腐敗問題上都強調現實層面的、有效的制約手段，並不寄望於人的自我道德約束。平巴次仁的言論，顯示一種現實主義思維方式，隱約銜接英國1215年《大憲章》的理性精神，凝聚了1787年美國費城獨立大廳裏制憲會議的熱量。

他順著貪污例子的陳述，接了一句話，順理成章，卻不是橫幅上口號，而是日常現實的寫照。他說：「我們主要靠理念工作。大家都知道工資很低。」

法制與現實環境很重要，理想和價值觀念同等重要。制止腐敗要靠對權力的制約機制。開創民主制度則需要理想主義精神支撐。唯此，在異國他鄉一無所有的艱難困苦中，他們讓自己一步到位，立於不敗之

地。前天總理桑東仁波切・羅桑丹增教授與我等一行會面時回答說：在西藏獲得真正自治之後，流亡政府將自行解散而不會返回內陸西藏繼續執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積累政治經驗，管理流亡西藏。我不懷疑政客們和機會主義者們或者權力野心家們會認為這只是一種宣稱和謊言，我更不懷疑這是流亡政府準備付諸實踐的計劃。誠信和公眾利益是一切文明政治的前提，民主從來只誕生在國家民族利益優先的政治家手上。更何況，流亡政府的成員是擁有道德操守的信仰者，而不是個人權力第一的凡夫俗子。

這個領導14萬流亡藏人的政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具備了一個民主政府的所有屬性和功能。半個世紀以來，他們最大的功績是在達賴喇嘛領導下，保存了境內幾乎被滅絕的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延續了西藏的歷史和語言、習俗；打開了西藏接納現代民主政治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大門，並將佛教這博大精深的東方信仰，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這個仰望神聖，莊嚴宇宙的民族，並沒有為了追求天堂，把地面放棄給魔鬼。

60 年來中國不斷薄古厚今，破壞文化傳統，毀滅宗教信仰。現如今，到過臺灣的人知道，正宗的中國傳統文化、語言、文字、甚至風俗人情在臺灣；而到過達蘭薩拉的人知道，正宗的佛教、佛學，甚至弘法傳教，在流亡西藏。

議會通過的決議必須遵守。1987年流亡政府提出放棄獨立目標，以中間道路尋求自治的主張獲議會決議通過，成為藏人的意志，即便激進的「西藏青年大會」(青年會)成員，也必須服從這項決議。平巴次仁說，他的前任議長曾是青年會主席，也就是流亡藏人激進群體的首腦。議會的議長由議會選舉產生。平巴次仁說，這位當年的青年會主席雖然對自己辭去此職後，竟當選為議長頗感驚訝，不過，這既不說明他放棄了西藏獨立的立場，也不意味著他可以帶領議會堅持此一獨立主張。作為議長，他必須服從議會作出的以中間道路尋求自治的決定。

流亡的西藏人仍然保有一個民主黨，「很小，不大管用」。關于政黨政治及其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關係，平巴次仁深思熟慮，他說：在流亡環境裏，政黨多了，不利于團結。而且，他說，在目前情況下，流亡藏人實行政黨政治的條件不成熟，或者說環境不存在、不現實。

確實如此。七十年代，西藏流亡運動處於蓬勃發展時期，除成立了青年會，還成立了「西藏人民自由運動」及其「協調委員會」。這些政治組織曾經脫離西藏傳統的噶廈政府領導，借助拉薩起義十八周年紀念日和流亡藏民反抗壓迫、要求獨立的渴望，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前，掀起了一次轟動世界的絕食抗議行動。這次行動在國際社會備受關注，報道的規模和程度僅次於達賴喇嘛十八年前的出走。這卻是一次捲入印度政治、並最終受制於印度對華外交政策的抗議運動。時逢印度大選，這次抗議運動先得到印度反對黨「人民黨」的支持，後來卻證明為其所用。它短暫的成功和最終的失敗，完全取決於人民黨在印度大選中對選票的需要，也是中國強權外交的間接結果。它的失敗，在流亡西藏引發了民主黨派和噶廈政府之間的劇烈衝突，終於導致西藏人民自由運動協調委員會的解散，並引發了連鎖反應：青年會四位創始人辭職。西藏流亡運動為此遭到嚴重挫折。

西藏的流亡社會結構相當完整，人口也相對集中，十多萬選民和選舉並非一個虛幻的存在。即便如此，西藏政治家們不得不汲取教訓：只有民主理念，而缺乏選民參與的黨派政治是無法成立的。非要實行，爭鬥與分裂是難以避免的。

道德與精神修養，是精英政治的必要前提。選民意志、民主程序和法律制約，則是黨派政治成功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在社會文明進程的不同階段，起不同作用。前者主導制憲、立法、建國，後者主導管理、維護、發展。

美國「人民主權原則」(托克維爾語)的實現，所採用的並非「大民主」(Mob Rule)方式，而是貫徹精英民主理念和制定憲法、實施規章制度的方式。與此相似，多年後，流亡藏人民主管理機制的建立以及民主制

度的最終成型，也並非黨派政治——在野黨派競爭的功勞，更不是大民主的結果。不過西藏是個宗教民族，它在美國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同樣避免了無政府主義的混亂。

這條獨特的道路就是，依靠達賴喇嘛本人的凝聚力、持守他堅定不移的民主理念，實踐他所親手推動的民主改革。這其實與美國建國初期，一代國父們關起門來，避開媒體，絞盡腦汁制憲以立國的過程，有異曲同工之妙或大同小異之處。期間最關鍵的共同點在於，制憲者或領銜人是準備自我犧牲的民主自由信仰者，而不是準備上台執政的權利野心家。自由理念人人都願意表達，民主實踐則不是表達者人人都能奉行的。這扇門一打開，所有人必須面對撒旦的試探。這試探是毀滅性的，不是聖賢輩出的時代如美利堅建國時期，不是理想莊嚴的人群如流亡藏人，不是信仰維繫的社會如美國清教徒社會、達蘭薩拉佛教徒社會、東歐波蘭捷克東德等國家的天主教基督教社會以及俄國東正教社會，這試探只能讓人成批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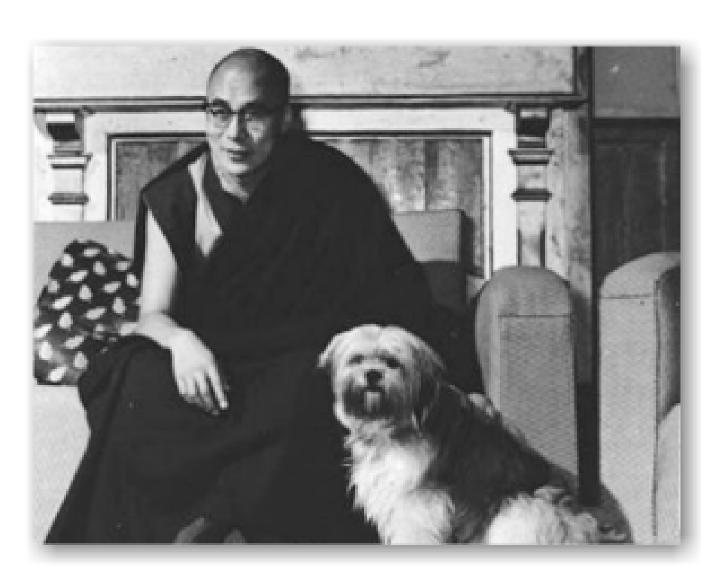
達賴喇嘛的凝聚力持久不衰，是一種精神現象，源自他的特殊身份，也源自他的偉大人格。達賴喇嘛的民主理念堅定不移，是一種思維方式，也依賴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他的民主政治知識。達賴喇嘛的民主改革持續不斷，成功地完成了對西藏歷史上第五世達賴喇嘛所建立的噶廈政府的改造，最終實現了西藏從封閉等級社會向開放民主社會的轉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藏雪域在槍砲聲中出現漢語，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是「民主」。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實行的「民主改革」，徹底瓦解了西藏年代久遠的社會結構及傳統文化，從而把封閉中獨立的西藏強制在漢人的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

恰是從那時起，確切地說是從1960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半年左右的時候，這位藏傳佛教領袖就著手推進西藏的民主。他同時做了三件事：第一，促成了難民的第一次選舉，此後這類選舉就沒有中斷過；第

二，通過印度律師的幫助，借鑒英國文明社會的管理經驗，著手起草西藏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這部憲法除了強調政府行政機構的民主程序，還從普渡眾生的宗教使命出發，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公平理想；第三，為適應流亡生活而改組傳統的噶廈政府。

眾生平等，普世之愛的宗教信仰是達賴喇嘛民主意識的根基，正如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漢明頓等大部分美國立國先賢的基督教信仰和堅定的民主信念，使他們成為權利野心的抗衡對手。西藏的第一部民主憲法制定了限制極權主義萌芽的機制：其中一些條款，為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通過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限制執行機構的權利，打開了綠燈。



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和他的狗。

最後，達賴喇嘛將限制自己權力的機制，寫進了憲法。這部憲法草案第 36 條第 5 款規定，「根據國家最高利益」，國民議會經與最高法院協商後，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彈劾達賴喇嘛，把他從最高權力位置上趕下去。這位心在佛堂、身在異鄉的聖者、政治家說：「這是我的主意。如果我們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須要有能夠改變達賴喇嘛權力的

條款。」但是反對的呼聲高漲，一百五十多名代表聚首達蘭薩拉，以不批准憲法為要挾，要求刪除這一條款。

這卻是西藏的幸運，如同擁有一批真正信奉民主的開國精英是美國的幸運一樣。藏人生死與之的領袖，是一位篤信民主、蔑視集權、崇奉人類福祉的信仰者，而不是崇拜權力、扮演上帝的唯物主義者。達賴喇嘛說：「由於這是新的東西，難以理解。我不得不使他們相信，這一點不僅對全體藏人的今天，而且對他們的將來都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問題是六十年代初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藏人的命運高於自己的存在。這是達賴喇嘛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理念。

憲法大綱在1961年秋季頒佈，憲法則於1963年3月10日那個特殊的日子頒佈。仍然是「草案」，因為它有待600萬藏人舉手通過。

流亡藏人的自由因憲法的制定而得到保護。平巴次仁介紹說，在藏人流亡社會，關于治國方針、外交政策等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氣氛相當民主，這些問題包括中間道路問題、藏人在抗議中焚燒中國國旗行為等。

言及「自治」，平巴次仁說：關於近年與中國高層的接觸，國際輿論早就認為中國中央政府是在拖延時間，現在八次接觸都沒有結果，果然證明如此。他說，這導致藏人內部沉寂一時的獨立呼聲和反抗情緒再度升溫。

平巴議長說：中共中央政府的經濟資助不會取悅於藏民，藏民要求的是宗教自由。這一表述，也出現在達賴喇嘛的傳記中、桑東仁波切的會談中、桑傑嘉的闡述中，甚至我們司機的行為方式中……。為了追求信仰，這個民族可以被殺，不會屈服，也不會整體被收買。

有多少藏人對談判抱有希望？議長對中間道路相當失望。他寄望中國制度的改變。他說：中國民主了，西藏才有前途。

他太清醒了。

我們的訪問如組裝程序，環環相扣，沒有間隙。告別平巴次仁先生，步出流亡政府的議會大廳，走進西藏 「人權與民主中心」辦公室。

大腦飽和，我發現我坐在那個中心，心有旁騖，腦子開始調整坐標，企圖確認平巴次仁給我的不協調的印象。 如果他坐在小汽車裏一言不發，如何能夠區別他與自己的司機之間的不同？如果他走進來不跟我們握手，而是端茶倒水，我們如何能夠認出他的真實身份？除非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蹬上皮鞋，徹底西化？那他還是平巴次仁嗎？

達蘭薩拉號稱「小拉薩」，然而在它的經幡裏和藏袍之下，與拉薩還有多少相似之處？

兩個小時之後從中心出來，在斜斜窄窄的達蘭薩拉坡道上等車回旅館，我們又撞見了平巴次仁。

他下班了。

這次真相大白：他既不開車也不坐車，根本沒有一個司機存在。他騎一輛電動摩托，形象比在郊外狂騎自行車的前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高級一點點：布什那日不聽隨行人



消解舊西藏坐標的流亡西藏議會議長平巴次仁，騎著摩托車下班回家。(北明攝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

員勸阻，率性出門騎車，在田間小路溝坎上狂奔猛顛，結果狠狠摔了一跤。沒摔出大毛病，次日公務照常。好事的記者把他鼻青臉腫的照片赫然登在報紙上，令人睹之噴飯。議長平巴次仁優雅一些。見到我們，他放慢速度，然後雙腿叉地，停下來跟我們打招呼，他不說漢語——他個人已經遠離了苦難的歷史。瘦小的綠色襯衣仍舊親熱地裹著上身，腳丫子仍然在涼鞋裏自在逍遙。

那輛黑色的摩托在他腳踏手擰中一陣較勁，順彎道快速遠去。望著他披落日餘輝的背影，我意識到，這個不修邊幅、有點瀟灑的傢伙把我無法調整的坐標給消解了：他是個地道的現代西藏新生代。描述他的存在的語言，有待在現代漢語中生成。

・青春的特權

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
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
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
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愛因斯坦〈我信仰什麼〉
引自愛麗絲・卡拉普賴斯編，仲維光，還學文譯《愛因斯坦語錄》

流亡村地處拜爾(Bir) 和朝恩楚拉(Chauntra)，兩小時車程的山路。

朱學淵先生年紀最長，極為勤奮，除了尋訪真實西藏，他也調查人種，無論餐館、旅館、路邊、商店、街頭巷尾，他隨時拽人提問，記錄如儀，一派學者風範。但是闔上本子放走訪談人，他就是我們當中最頑皮的一個。他無視衛生條件，嚷著要找好吃的並且時而獨自加餐，在街



達蘭薩拉西藏難民村。（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

邊小攤大飽口福；他還公然宣稱他不老，原因是每見年輕漂亮女孩他依然賞心悅目，而且頓生愛憐之意。老朱心直口快，胸無芥蒂，喜歡開懷大笑，與人易爭易辯也易解。他還心腦開放，像所有智者一樣，善于接受不同觀點。

今日不似往日，氣溫已近攝氏40度。車內空間小，一路顛簸不已，長者老朱一路堅持坐在後排座。兩三小時車抵難民村時，他撐不住了，下車寡言木面，搖晃至樹下，把自己放倒在水泥石階直喘氣。這時我才意識到，此行他應是重點保護對象，可他使我們大家都把他錯當年輕人了。

宅心仁厚的一平也堅持後排就坐，一路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忍受暈車之苦。中途小憩，面有土色，到了地方一下車，終于忍無可忍地嘔吐了。

一行人休息片刻，走過一個巨大操場，走進藏人流亡村舍。

流亡社區對幼兒的管理辦法很奇特，可以說是一種獨創。簡單說來就是，以家庭生活取代幼兒園服務。這種家庭式幼兒園，從居住環境到人際關係，完全擯棄托兒所寄居性質，而給孩子們營造了一個溫馨的家



難民兒童之家院落一景。（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

庭：居所是農家真正的獨門獨院，住房裏完全居家格局：門廳、臥室、廚房、廁所、院落。院子裏有水桶，柴火、雞狗……。每家收容十到幾十數量不等孩子。每家有父母，也是流亡的藏人，起居作息完全家長式管理，儼然一對夫婦超量生育，勉力維持的一個大家庭。不同的是，孩子數量多，臥室也就大，類似八十年代大學生宿舍，上下鋪。兄弟姐妹相互照顧，大小孩子分別同床而臥，小有所依，減輕媽媽的負擔。我們走進了一個這樣的流亡之家，孩子們都上學去了，空曠的屋子只有一位中年藏人母親在廚房裏忙活。她微笑著招待我們茶點，略帶羞澀的眼神透著柔和的光。她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在這裏，當然與其他流亡的兒童同出入，同吃住。

流亡學校是農田間一座很大的擁有露天走廊的連體樓房。烈日下顯得非常安詳。走廊過道有學生席地而坐，背靠的牆上是龍樹菩薩在樹下修行的彩繪，對面的牆上則是一張很大的西藏彩繪地圖。老師指著地圖，正用藏語講授那塊土地的歷史。學生們幾乎無人走神扭頭看攝影機的鏡頭。圖書館中，也有十數七八歲的小學生席地而坐，翻閱架上圖書，我們的進入沒能引人注意。

吸引我注意的是校園圍牆和樓廳走廊上的箴言。逐條閱讀，可以看出流亡藏人的教育宗旨是人道主義和奉獻精神，進取精神和開放心態。此外，這些信條的選擇顯示了洞悉人性的智慧，這種智慧顯然不是源自古老樸拙的西藏文化，而是源自中國知人論世的傳統或者基督教原罪說。我相信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思想，也不過如此：

先人後己 (Others Before Self)；

如果你不能幫助他人，不要傷害他們 (Don’t Harm if You Can’t Help Others)；

真正的教育在于發掘內在於你的最好的部分 (Real Education Consists in Drawing The Best in You)；

教育應當教會我們正確地使用空閑時間 (Education Should Teach US

the Right Use of Leisure)；

教育是為適應環境所做的調整 (Education is Adjustment to Environment)；

教育是生活的準備 (Education is to prepare for Life)；

教育是一建築的品格 (Education is a Character Building)；

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 (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Own Fortune)；

每個人都願意贏，但很少人願意為贏而做準備 (Every One Has a Will to Win But Few Have The Will to Prepare to Win)；

所有的成功都取決于事先的準備 (In All Things Success Depends Upon Previous Preparation)；

成功建立在雄心勃勃的想象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上 (Success is Based on Imagination Ambition and the Will to Work)；

改變事物觀念的能力是成功的秘密 (The Ability to Change Ideas to Things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成功有賴于以盡可能好的方式利用我們的時間 (Success Lies in Utilizing our time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成功的學習與良好的條理關係重大 (Successful Studying is a Matter of Good Organization)；

學習是一個珍寶，擁有者攜帶方便 (Learning is Treasure Which Accompanies its Owner Every Where)；

道路是為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哪裏的人準備的 (The World Makes the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我們生于哭怨，死于絕望 (We Are Born Crying Live Complaining and Die Disappointed)；

沒有激情，偉大事業不會成功 (Nothing Great is ever Achieved Without Enthusiasm)；

樂觀主義者視每一個困難都是一次機會 (The Optimist Sees an Op-

portunity in Every Difficulty)；

悲觀主義者看每一次機會都是一個困難 (The Pessimist Sees A Difficulty in Every Opportunity)；

金錢來復去，道德來復生 (Money Comes and Goes But Morality Comes and Grows)；

世上無完人，我們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We Learn Though Mistakes as no Man is Perfect in This World)；

滿足你所擁有的，無人佔盡高枝 (Be Content With Your Lot, One Can Not Be First in Every Thing)；

來學習，去服務 (Come to Learn Go to Serve)；

下面這一條寫在校園的牆上：

說「我不行……」之前說「我試試」！然後全力嘗試 (Before you say “I can’t…” Say I’ll Try! Then Give it Your Best!)

流亡學校的初級教育顯然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控制，面對西方充分開放，孩子享受精神、道德乃至知識上的「有氧」教育。孩子們在這裏有望成為熱愛本族文化並具有開放心靈、懂得和平與寬恕的現代藏人。

每年逃亡的藏人中，19歲以下的學生佔半數，其中大部分3歲到8、9歲之間。達賴喇嘛當年從尼赫魯那裏得到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創建教育機構和教育體制，培養後代從而保證西藏文化、宗教的延續。此後，藏人按照聯合國標準在印度、尼泊爾、不丹建立起了教育思想和體系完備的80所學校，為3萬流亡藏人的後代和遠離父母逃亡的兒童難民提供國際化水平的教育。

他們尊崇自立、寬容、和平、智慧、助人的教育思想。2004年9月西藏流亡議會一致通過採用的基本教育政策是：使孩子們「深刻意識到個人對他人的幸福所具有的責任」。從《西藏流亡政府簡介》〈教育部〉一章可

以見出，流亡藏人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方案，同時著重西藏傳統精神文化價值和現代科技需要，二者並行，不悖不廢。另一個與之相應的事實是，這裏的升學率勝過了印度本土教育的升學率。——背水一戰，先得要津，面對內陸藏區嚴重漢化、世俗化、虛無化情勢，流亡西藏的知識界、教育界知道自己責任重大，他們必須從教育著手，完善藏傳文化，並使之適應現代化需要。



流亡的西藏兒童在達蘭薩拉藏人學校的西藏地圖前，學習歷史。(易崴攝於2009年6月13日)

語言的應用是一個有意義的標誌。上個世紀20年代被逐出俄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在遠離本土的西方異地建立東正教神學院，開辦文化沙龍、出版大量俄語雜誌和書籍，打破蘇聯本土的意識形態禁錮，超越文化沙漠，銜接並繼續創造純正的俄羅斯文學藝術、思想文化、道德精神資源，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大都操持一種到數種歐洲語言，與西方社會可以毫無障礙地接軌，從而使自己的思想與精神生活真正著陸於流亡之地。流亡西藏有同樣特徵。在西藏流亡社區校園的建築中，走廊上、牆壁上的所有箴言均以英文書寫，圖書館裏，來自

西藏的小學生翻閱的是英文讀物，回答我的問題使用英語，另一學校君達拉(Chaundra ，後詳)，大群的中學生與我等交流，使用的也是英語。藏語當然是他們的母語，英語則是他們的第一外語。身穿紅色袈裟的亞利安人在達蘭薩拉的街巷行走，是那裏的一種奇妙景觀。他們走進西藏文化和宗教依靠英語，而不是藏語或漢語。

流亡西藏不僅以人道主義教育思想保留了自己傳統精神的火種，而且演變為一部打開的經典，成長為一個接納世界文明的開放民族。突出的成果和實例是流亡政府的議會議長平巴次仁。他的本民族傳統文化素養我沒有機會了解，但是作為流亡藏人出生在印度的後代，他來自達蘭薩拉的教育思想及其所屬學校，來自那個原生的綠色種植園，在那裏，他沒有接受過洗腦農藥、馴化激素的培植，他不是廉價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畸形碩果，他也不是蠶食、瓦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果蟲，他的開放型思維方式，民主價值觀念和現代政治理念，是在人類優秀文明的陽光雨露中生長起來的，他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



流亡村學校圖書館內，八、九歲的孩子們正在翻看英文讀物。(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達蘭薩拉)

普通的人，也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政治家，當今任何一級中國官宦，無論作為從政者還是作為個人，都難以與之相比，由於客觀上缺少人文環境，中國流亡的政治反對派要望其項背，也非指日可待之事。

下午陽光燦爛。

來到另一所學校，君達拉(Chaundra)，西藏兒童村分校。徑自走進一個大門，門裏是一個大廳，孩子們正在收拾座椅，清理地面。

全是女生。一見陌生人問話，紛紛放下手中活計，圍攏過來。一問之下，大都出生在流亡藏人聚居地的尼泊爾、不丹等地，少部分直接來自西藏。有幾個孩子能說漢語，顯然從內地逃出來不久。一個15歲的女學生告訴我，她將來要當律師，回到西藏為藏人服務。另一個則說，她要做醫生，醫生可以幫助窮人，維護健康……。

歡樂是青春的特權，她們是那種含氧量極高生命，隨處可以笑到集體人仰馬翻，陽光雨露甘泉一樣，輕易改寫周圍的荒蕪。發現前來的不止我一人，她們從厚重的門簾裏旋轉出門，雁子一般唧唧喳喳飛舞迴旋著，聚散在我們周圍回答我們的問題。弄得當午時分，廳樓門前一派春意。

顯然沒有課代表領隊，沒有老師指導，也沒有準備。他們的世界不需裝飾。

齊越扛著攝像機，對準她們，說：如果你們中有誰想跟自己在西藏的父母說話，可以就站在鏡頭前說。我們也許有機會讓你們的父母從鏡頭裏看到你們、聽見你們。

這回可是真的啦！孩子們驚喜十分，繼而靦腆起來，相互推推搡搡，誰都不敢往鏡頭前面站。

終於，有一個孩子笑著走到鏡頭前，兀自站定，收斂了笑容。她吸了口氣，說，「我想我的爸爸媽媽」，話音沒落，已經淚盈眼眶。她極力克制抽動的嘴唇，無法控制哭泣，斷然掉頭轉身，離開鏡頭，擠出了人群。過了一會，她似乎平靜了下來，再度走回來站在鏡頭前，仍然只

說出這一句話，就再度中斷，再度哭著離開鏡頭。如是三次，她仍然無法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完。

扛著攝像機的齊越已經淚流滿面。

沒想到午後燦爛的陽光下，少女們含苞欲放的生命春日裏，那痛楚的傷口竟然如此不堪碰觸。藏人父母為了孩子的正常教育，為了後代生存在自己民族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宗教中，不惜抵押家族與親情，不惜骨肉分離，天各一方！

學習是孩子天經地義的權利，信仰是藏人賴以為繼的生存方式，為什麼他們只能背井離鄉，劫後餘生，才能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那日傍晚打道回府，與眾人談笑風生之餘，有一種悲情悄然沉落。在山路行車的顛簸中，閉目自觀，發現沉落到心的悲情，竟濺起一種負罪感彌漫胸間，彷彿車尾追隨行進的塵埃。



這個孩子三次站在鏡頭前，無法把要對父母說的話說完。
(北明攝於 2009 年 6 月 13 日達蘭薩拉)

・康巴漢子噶瑪丹達

一座座宮殿堆上了天，
那是人孤拔而起的信念；
一尊尊佛像來到人間，
還有唐卡經卷石牆和老磚，
那是心中的高原藏土的天；
我以頭叩磚，
願拋棄所有的財產所有的夙願。

——〈布達拉宮〉，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噶瑪丹達是我們的司機。噶瑪丹達達喜歡穿得一身潔白。噶瑪丹達年輕英俊，體型健美，臉膛彪憨。噶瑪丹達是個標準的「康巴漢子」。

康巴漢子是藏人中的一族，生活在藏東的三區，衛藏、康區和安多地區。他們大都身材魁偉、體魄健壯、相貌英俊。此外他們中有些頭髮自然曲卷，鼻樑挺直，目光深邃，個個都像米開朗基羅手下那些希臘美男子。



流亡印度達蘭薩拉的康巴漢子。他們的父輩曾是藏區最堅決的武力抗暴者。
(北明 2009 年 6 月 13 日攝於達蘭薩拉)

康巴漢子比「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的希臘審美理念更勝一

籌：他們膚色微黑，那是我們這個星球人類屋脊的標誌。他們動作敏捷、意志堅強，而且富於性感，渾身上下透著漢族男人久違的陽剛之氣。1950年中國解放軍進藏後，所謂「民主改革」開始，抵抗最激烈的是康巴漢子；1959年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出走，掩護他一路免於圍追堵截的是康巴漢子，後來在尼泊爾成立游擊隊，堅持抵抗極權統治14年之久的中流砥柱，也是康巴漢子。

自從上了山，李江琳一有閒情就對我們宣佈，她要嫁給一個康巴漢子，並要在此地常駐久留。弄得我們一見到英俊藏民，就使勁盯住琢磨此人是否來自康巴。

我偶爾也注意我們司機噶瑪丹達。幾天來，車行一路，我們從海闊天空吵到海角天涯，這位康巴的漢子一言不發。雖然從不加入討論，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進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長頭。雖然他是司機，我們是乘客，我恍惚覺得，我等一行在車上哇啦哇啦論西藏、說中國，乃是為了襯托這位康巴漢子對現世嗔妄的徹底疏離，或是為了陪他到各個廟宇去朝拜。

他是一支飽舐經文墨筆，悄然改寫著我每天乘車出訪的感受。

這一天，康巴漢子載著我們看完了西藏村，去看鐘剎寺，仍是一身素縞，一言不發。

鐘剎寺大約是達蘭薩拉最大的寺院，坐落於山巒之間的高地之上，地勢平坦，空間開闊，遠處峰巒環抱，雲蒸霞蔚，近處建築宏偉，陽光燦爛。不過，若與拉薩的布達拉宮相比，它不僅尺寸小了很多，氣氛也沒有那麼神秘。鐘剎寺是遠嫁他鄉、揭開蓋頭的新娘，布達拉宮是固守本土、永不露面的祭司。

布達拉宮始建於1300年。中央部分13層高，建築了13年，是根據五世達賴喇嘛的指示擴建的。建到第2層時，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了。這位活佛生前明白，這座未建成的宏偉建築將成為西藏世世代代

的精神聖地。這太重要了！十九世紀初建造的維吉尼亞大學建築，是當時北美土地上最大建築群。主持創建者和建築設計人傑弗遜，剛剛卸任美國總統不久，他整日在建築工地奔走視察，指揮施工。直到身染沈　，不能移步，就坐在家裏，用望遠鏡透過窗戶，繼續觀察建造的進度和每一個細節。——無論東方在世活佛還是西方自由精英冥冥中都意識到，人類的精神或理想一旦物化為一種普遍認可的形式，就能在世俗世界借所依托，成為永恆。圓寂前，五世達賴喇嘛的心情只能比五百年後的傑弗遜更焦慮，為了這巨大工程不致在他死後斷工，他圓寂前要求「司倫」將他的死訊保密。

難壞了他的司倫！

幾經心血籌劃，這位司倫壯著膽子，製造了一個與布達拉宮的偉大級別相等的東西：彌天大謊。他找到了一名相貌酷似圓寂者的喇嘛，在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冒名頂替。

這個替身如此亂真，布達拉宮的擴建工程順利持續，直到布達拉宮中央部分的最高 13 層竣工，沒有人覺察出任何破綻。

竣工之後，五世達賴喇嘛早已圓寂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混亂與恐慌可想而知。寺廟固然是藏人信仰的載體，達賴喇嘛卻是他們信仰的靈魂。沒有寺院，這個民族將沒有立足之地，而沒有達賴喇嘛，這個民族失去的是精神支柱！沒有精神支柱，立足之地何用之有？這並不算人們發現自己受騙竟然長達 12 年！

要緊三關的是趕快填補達賴喇嘛缺失多年的空白。

這就必須確定五世達賴喇嘛圓寂的準確時間。因為這關係到他的轉世靈童的確定。

五世達賴喇嘛大限之前比誰都明白他要做的是什麼。在這場西藏前途的賭博中，他要讓西藏的信仰立於不敗之地。對推遲公佈他圓寂消息的後果，他做了極富想像力的預測，並根據預測做了善後安排。

這安排顯示了令人喟嘆的智慧，這智慧締造了布達拉宮的神秘特徵：

在吩咐司倫將他的死訊保密之後，他做了另外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著人將自己祈求轉世的祈禱文，刻在了一塊石頭上，再將這刻有祈禱文的祈願石建造進了正在施工中的布達拉宮牆壁中，那正是這座偉大宮殿的第二層牆壁。完成這一切之後，他如期圓寂。

這樣，關於他圓寂的時間，沒有任何證據比布達拉宮十一層磚石建築之下那塊祈願石的存在更有信服力。這個證據，後世既無人可以假造，也無人能夠毀滅，除非事先知道祈願石的存在和確切位置，並拆掉十一層布達拉宮。於是，祈願石的存在和五世達賴喇嘛的圓寂一樣，作為一個巨大的秘密，在布達拉宮十一層高度一下，被壓了十一年。十一年之後，「一位藏王修建的打坐靜室」，成為宏偉輝煌、舉世聞名的雪山聖殿，向人類散發著偉大而神秘氣息。

五十年來，年年有藏人為了自由被迫遠離這聖殿，他們背走了古老的經卷、沉重的佛像、多彩多姿的唐卡，與此同時，他們把帶不走的雪山聖殿裝了在心裏。最初逃亡的倖存者們，歷經了曠世劫變之後，一息尚存，在荒蕪之地所建造的第一座建築是寺院。

今日訪問的鐘剎寺，就是兩百多座境外藏傳佛教寺院之一，是布達拉宮在達蘭薩拉的延續。

赤足登階、推門進殿。

殿堂盡頭，數丈高的金色菩薩像居高臨下，赫然臨座於巨型蓮花台上。座下殿堂深處，傳來了穹音隆隆的誦經聲。進入這樣的境地，除非靈魂已有歸宿，不由人不心生敬畏。一平、易崴、齊越先後拜叩。李江琳本是未出家的佛弟子，這會乾脆躲到金菩薩座下那些擎天巨柱後面念經打坐去了。福相不淺的朱學淵先生，叩拜一招一式都模仿我們的西藏翻譯的樣，對著遠處座上那尊金佛像，全身撲地三次，很吃力地叩了三個長頭。朱先生熱愛西藏沒商量，不過他是一個沒封口的意見簍子，到哪兒都要給流亡政府官員提意見、提建議，一片「我是來幫助你們的」熱誠。可是他叩長頭的時候，動作雖然不得要領，每次躬身甫地之前，

仰望菩薩的眼神卻虔誠無比。我猜想，除了心甘情願讓傾慕的姑娘綁架，他一生的虔誠都加起來，也不及這會兒這麼虔誠。

最美麗也最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的司機，年輕英俊的康巴漢子噶瑪丹達的敬拜。他避開所有人，獨自走上台階，退去鞋子，走過殿宇前寬闊的平台，雙手用力推開厚重的大門，讓自己側身而入。他佇立在大殿盡頭，赤足踏地，雙手合十，伸臂過頭頂、然後附面、最後合胸，完成這象徵修身、修口、修心的動作之後，他躬身伏地，行長叩之禮，如是三次。每次彎膝躬身匍地和仰面起身站立之間，雙臂隨身體起伏的角度前後悠擺，保持平衡。

大堂金碧輝煌，噶瑪丹達一身素縞；殿宇沉雄靜穆如深澗高山，噶瑪丹達的長叩是山澗落潭，大佛座下深處誦經聲隆隆不絕，是他的虔敬叩拜濺起的澗籟天音。他始終沒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始終沒敢按下快門打斷那聖善莊嚴的儀式。這是我此生看到的最具象生動，卻又充滿美學意味和哲學意味的畫面。



這座寺院規模比鐘剎寺小很多，是位於達蘭薩拉山上的乃瓊寺。我們的司機噶瑪丹達每到一殿，不論寺院大小，必敬拜佛祖。（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達蘭薩拉）

初進鐘剎寺大院，撞見一位來自歐洲的修行者，接受了齊越、江琳和老朱的輪番採訪。出得鐘剎寺大殿，誦經

聲已然落下，大殿深處飄出來十數年青僧人，其中幾位乾脆坐在大殿前的台階上，與我等聊天。他們都是這裏的修行者。

鐘剎寺對面，青草花池之間，幾組磚瓦青石建築依勢而列，蔚成大觀。有數百名年輕僧人出入其間，研習佛理。

這所經院沒有內陸藏區的黨支部書記假方丈之名實行統治，沒有愛國主義教科書污佛眼目，僧人們不必被迫表態誣蔑十四世達賴喇嘛，或



鐘剎寺對面的經院。（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達蘭薩拉）

為拒絕表態被除名而失去家園。這裏也沒有內陸漢地峨眉山上那些拽遊客算命索錢的和尚，沒有五台山裏穿西裝、開寶馬，朝九晚五，按時上下班的方丈，也沒有成群結隊、利慾薰心的凡夫俗子前來燒香磕頭，求財求名，求犯罪不罰、做惡不懲……這座佛殿很純粹。這被迫遠嫁他鄉的西藏新娘，脈管裏流的是喜馬拉雅山的血，雪山上那神聖古老而神秘隱忍的祭司，是她永生的父親。

布達拉宮煥然新生，是因為那塊神秘的祈願石不期然成為第一層的基石。此後七百多年過去了。在這七百年間，達賴喇嘛們已經來去往生了九次，平均每八十年一次，每次都將有限的肉體與永恆的生命重新連



鐘剎寺裏剛下課的小和尚。（易歲2010年6月13日攝於達蘭薩拉）

接起來。現如今，那塊刻有往生轉世、普渡眾生之宏願的祈願石，歷經七百年的滄桑和半個多世紀血與火的洗禮，仍然嵌置於布達拉宮基座之上和牆壁之中，觀者可見。它默默地扛著這聖殿的十二層高度，歷經數百年風雨滄桑，沉積為藏人的精神胎記。

我們星球上被稱為「西藏」的地方，是一個連接此在與彼岸、來世與往生的神秘之地；被稱為「藏人」的民族，是人類往來於肉體和靈魂、瞬間與永恆之間的使者。噶瑪丹達對不可知世界的虔敬，比人們對世俗權力的膜拜更深刻，而他對大陸漢語世界的沉默，與雪山上那座聖殿一樣金碧輝煌，與聖殿牆壁中那塊祈願石一樣意味深長。我沒去過拉薩，無緣親睹那塊祈願石，不過我覺得，康巴漢子噶瑪丹達的沉默與長叩，無疑是藏人精神生活方式的縮影，代表藏人對意義和永恆的追尋，是世世代代西藏的聖者先知往生轉世、承重持守，絕不放棄救贖眾生的理由。

·最後的史詩

你不是混沌也沒有盤古，你就是一片高山大穀，
山色點染野秀，麥地翻出金黃，
藏土的糧倉——雅礱河谷。
你在山南，你是世界上唯一的起源。

有一天從天上飄下經卷，六十歲的老人青發童面，
澤當飛來孔雀馬王，貢布山有了靈龜大象，
藏土的先民登上了壅布拉岡。
你在山南，你是宮殿和神廟的起源。

再也沒有傳說也沒有古老，
最早的人心都是透明的瑪瑙，最早的英雄都是偉大的強盜，
最早的思想都是清冽的瓊瑤，最早的泥蝦如今都成了雪豹。
來到山南，我看到所有的，所有的正在起源。

——〈起源〉，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在山上跟李江琳一屋。初來第一天，她就把囊中物什遍室陳列，還把女性味道十足的印度麗莎上架起掛，清冷瘦瘠的屋子頓時充實熱烈起來。她此行要留駐很久，所帶行李中，採訪、攝影、錄音、筆記、飲食、起居、衣物、保健、應急等物什俱全。此行她除了帶隊接洽、訪問聯絡、呼前呵後，還要與我等一起走訪參觀、採訪提問、記錄攝影攝像，人累壞了。所幸我這位劍氣簫心的女友睡眠極好，洗塵之後，她總能在自己營造的熱烈氣氛中，倒頭便睡，片刻發出溫柔鼾聲。

這夜有江琳溫柔鼾聲伴奏，欣賞之餘，輾轉反側難以入眠。黑暗中，藉著讀過的書本，心思悄然翻過喜馬拉雅，進了神秘的青藏高原——

1932年，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預言：西藏將淪入滅頂之災。他用藏文描述了他的民族淪陷後的境況：

「宗教與噶廈(西藏政府)可能遭到內外夾擊。……僧侶被摧殘，寺院被毀壞，佛教統治削弱，官員土地財產沒收，官員被迫服侍敵人或乞丐般漂流四方。眾生萬物陷入水深火熱中，戰戰兢兢地過活。苦難日子無休無止，難以為繼。」[1]

[1] 約翰・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電子版，第一章。

1947年，西藏預卜世間事物的保護神代表「曲均」預言：1950年，藏歷「鐵虎年」，西藏將面臨「大困境」。

兩年之後，1949年，中國內戰勝敗初現分曉，天空中出現了一顆馬尾形彗星。這顆彗星明亮，懸掛空中數周，晝夜可見。人們記起30年前的1910年，中國入侵西藏時，天空就出現了這樣的彗星！老藏民們據此認定，這一次的彗星無疑也是戰爭先兆。

接下來是改變四分之一人類命運的第一年，1950年。浩然晴空下，大昭寺的一個金頂向外噴水，不可思議。而在布達拉宮山腳下，人們發現，公元 763 年立的那根象徵西藏征服中國的古老石柱，柱頭掉了！莫名其妙。

最後的徵兆出現在 1950 年 8 月。

拉薩東方以遠的西藏南部，發生了大地震，高山河谷易位，數百村莊被吞噬，不拉馬普貝拉河徹底改道。地震搖撼了拉薩的羅布林卡。異象還在于：地震期間，空中接連不斷傳來炮聲般的巨響，如同戰爭中炮彈的發射。地震之後數小時，藏南上空仍舊閃爍紅光，驚世駭人。

異象覆蓋了整個西藏，無疑，這次地震不僅是地質現象，全體藏人都接受了這個不祥之兆：他們與世隔絕、獨立生存兩千一百年的民族國家災禍在即。

「你們帶走西藏的全部苦難吧！讓苦難全部滾蛋吧！」

這是一句藏人諺語。是 1959 年 11 月 1 日，藏人妻子們送別犯人丈夫時，在中國軍用卡車下說的。

中國大軍壓境，西藏只有八千官兵。藏人四個代表團四處奔走求援。西藏隔世雙千年之久，泥古不化，在20世紀以戰爭為紐帶、相互糾纏的世界裏，終於面臨滅頂之災，初次寄望人類良知，撞上的卻是普遍的叢林法則。而且，由於它在國際上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確，即便有意援助，師出無名。國際社會漠然處之，西藏被拋棄了。

自1912年起，除了6名來自印度的二戰難民，西藏再無任何外國勢力。但是中國中央政府對世界宣稱：「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入侵

西藏，「進行了各種欺騙和挑撥」，「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淵」。

以此為假定前提，中國人民的「解放軍」為了「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在西藏的影響，」，以武力「解放了」西藏。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預言西藏滅頂之災一年後，1933年，圓寂了。他圓寂之後，以神秘的方式指示了自己再生轉世的方位。

兩年之後，1935年，拯救未來西藏淪陷的奮鬥業已開始：藏人分頭尋找十三世達賴喇嘛再生轉世之身，人們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指示的方向，找到了現今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丹增加措改變了修行傳統，把佛教請出了佛堂，融入了現實生活：「我們藏人篤信佛教而且許多人實踐的很好。但是認為我們只需要祈禱，不需做任何人為努力就可以挽救我們的國家，這個信念是知識有限造成的。」[1] 丹增加措說。

苦難沒有被犧牲者帶走，沒有滾蛋，但是在半個世紀時間裏，以喜馬拉雅山脈為界，他們的命運一分為二，一面忍受曠世畸劫下宗教文化的毀滅，一面奮力重建毀滅的宗教和文化。達蘭薩拉的存在證明，這個幾乎棄絕現世經營的民族，在陌生的不毛之地重新播種自己的文明，繼續59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斷的制度改革，接納西方民主政治文明的經驗。他們基本成功了。

制定流亡憲章，建立立法、司法、行政功能完備的民主政治體系；

建造宏偉的經院廟堂，總數超過兩百座，供兩萬名僧尼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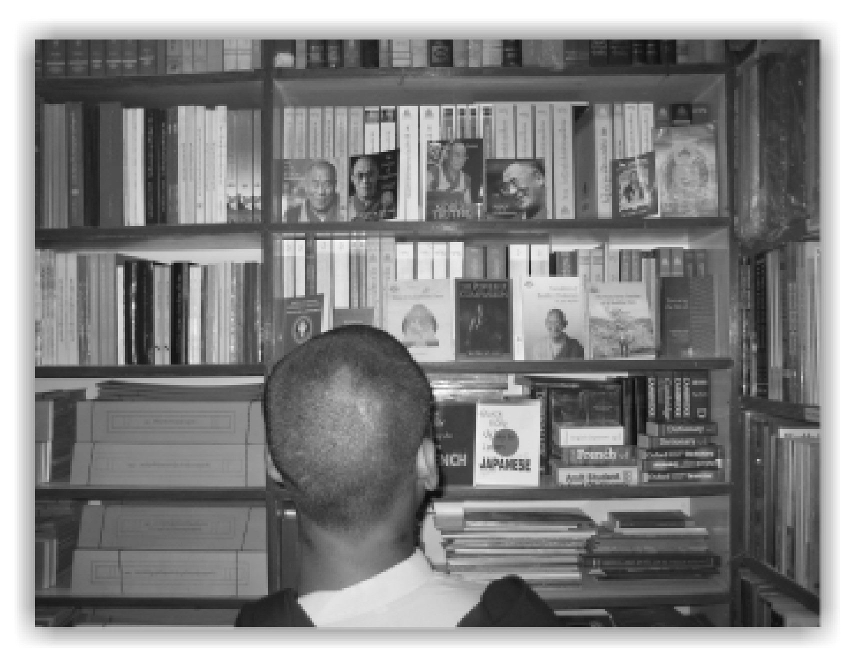
在世界各流亡地建立學校80所，為3萬名流亡青年提供一流教育，並為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

建立起近60個農業區、手工藝區的不同形式的流亡藏人聚居區；

---

[1] 約翰·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記》，電子版，第一章。

擁有自己的多語種出版社、網站和電腦中心，並定期出版藏、中、英文期刊；



位於新德里西藏難民村的街頭書店一角。書籍全部是藏文和英文。（北明攝於2010年6月10日新德里）

建立了醫療保障服務，在印度和尼泊爾流亡社區擁有醫院7個，保健中心4個和40多個醫療診所。同時還有藏傳醫學學院和曆算院，在印度和尼泊爾設有50個門診部為藏人提供西藏傳統的醫療服務。

如今，他們已成印度國中之國，全備的民主自由社會的初步形態和結構，足以使他們在暴政奴役和現代文明衝擊下，保存自己古老的文明，並為世界人類貢獻具有現代意義的精神價值。

出中國，歸西藏！這是共產極權歷史終結之前最後的一部寓言和偉

大史詩。

一宿異鄉思想，我覺得自己快要變成西藏人了。東方發白才沉沉入睡。醒來之後昏頭木面，卻見江琳榮光煥發，在陽臺上、晨曦中俯仰天地，起臥騰挪，把瑜伽練得出神入化。令人羨慕不已，遂早餐時與眾戲言：再有此行，住宿分配標準需要改革：務必廢除性別分野， 單 以鼾否為限。

我等均奔耄耋之年去也，斷無非禮問題。我補充說。

眾聞言哈哈大笑，無人反對。

·心中的金色池塘

請不要擋住我的光線。

——第歐根尼

為了尋找洗手間，我無意間進入了那片遊人絕跡的安謐之地：達蘭薩拉老人院。那是一座普通樓房，背山依勢而立，面臨松濤山谷。樓前空地的座椅石凳上，落座一排老藏民，歸林的倦鳥一樣，漠漠然安之若素。

「樓裏有廁所」，兩位帶著口罩的青年藏人女子指點著回答我，「沒有水」，然後又加了一句。

她們正將一個床墊從樓裏往外搬弄。

憋著氣逃出廁所，衝出樓房，見那床墊已置於樓前空地。墊子上躺臥著一位老藏人，上身赤裸，毯子半遮，古銅色的皮膚縮瑟而鬆弛，不再能拽住下墜的肌肉；墜落的乳房如缺水的瘦池塘蕩漾的兩圈微波。老人沐浴著正午的陽光，全神貫注地閉著眼睛，彷彿已經進入佛教中的生死中介地——「中陰」狀態。她不需要恥辱感了。

流亡政府最大的經濟來源，是國際社會的捐助和藏人的自我捐獻。資金短缺是顯而易見的。這座樓是達賴喇嘛的妹妹幫助建立的達蘭薩拉老人院。

樓前沒有「金色池塘」。

也許有，在老人們心裏。

比起內地藏區森林砍伐的荒地、掏空礦藏的地下和氾濫成災的雅魯藏布江與金沙江，誰能說達蘭薩拉的轉經山不是他們的迦南之地？

可是無論如何，比起宏偉莊嚴、氣勢磅薄、金碧璀璨的佛殿經院，

這坐落在轉經山角落的老人院，充其量不過聊勝于無。但是若真無這所老人院，這些孤苦老藏民可能無法在安然中謝世。

死亡是人生必達之地，藏人在意的是如何抵達。

所以他們寧願如此打發自己的晚年，卻不惜血本供奉佛祖，打造經院！

西藏這道門檻裏面只有六百萬藏人。可是進入這道門並非易事，這是一道「窄門」[1]。

以武力征服地球大部，改變人類歷史的亞歷山大大帝，終生有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他說：「事實上，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寧願做第歐根尼」。那一天，他去到蔑視一切習俗、遠離塵世喧囂的墓穴中去探望第歐根尼。這位大帝站在墓穴洞口，恭敬地問他崇拜的人：「我能為您做些什麼？」

他聽到的回答是：「好，請不要擋住我的光線。」

如英國哲學家布萊恩‧麥基所言：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哲學家對世俗價值最意味深長的蔑視。

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分別是亞里士多德和蘇格拉底的弟子，他們的兩位老師同是西方價值文明的創造者，這兩位弟子雖然生活在不同世界，前者只會羨慕後者的人格和精神。東方的秦始皇和釋迦牟尼則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後人在當今中國和藏土，無法演繹古希臘的和諧與邏輯，即便秦始皇的繼承者們征服了中土全地也不行。這是古老東方專制主義獨角獸的命運：不是在死寂中苟延，就是在災亂中瘋狂。

不要擋住他們的光線。我祈願那些通往藏區的通衢大路和鐵路化為烏有，以便藏土豐富的礦物資源被掠奪的速度慢一些，為西藏留下些地氣和磁場，以便藏民漢化的程度慢一點，為世界留下藏土上那道窄門和

---

[1] 《聖經‧馬太福音》第 7 章 13-14 節，「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窄門裏釋迦牟尼的弟子。

如果窄門被毀，我祈願藏區六百萬藏民在七百萬漢族移民和中國世俗化的社會中，還能找得見自己回家的天路，自己心中的金色池塘。

·山花須插滿頭歸

須彌[1]不動住中央，
日月遊行繞四方。
各駕輕車投熟路，
未須卻腳嘆迷陽。

——倉央嘉措[2]

1 「須彌」(梵語：Sumeru)指須彌山。源自古印度神話，是世界中心之山，位於小千世界中央。此詞後為佛經採納。亦有人認為須彌山即今日之喜馬拉雅山。
2 倉央嘉措是第六世達賴喇嘛，其名意為「梵音海」。以浪漫情懷和愛情詩歌著稱於漢民族。



易崴在轉經山的白塔下瘋狂拍照。（北明攝於2009年6月14日達蘭薩拉）

達蘭薩拉的轉經山是這裏藏民的聖山。山路上下，佛塔四周，藏人絡繹不絕，個個手搖經輪，念念有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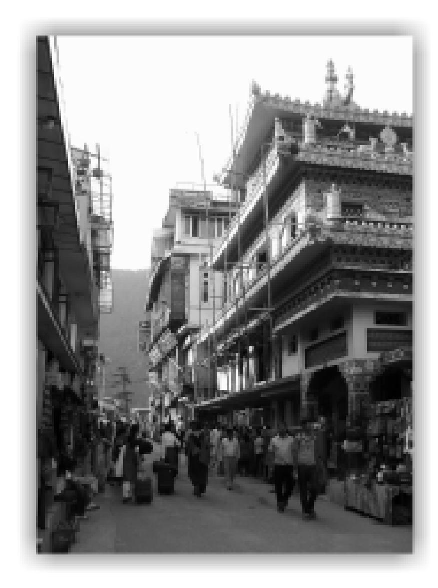
友人易崴平時總是笑瞇瞇，對什麼都沒意見，若要抱怨，準是抱怨自己如何笨拙。可是在他令人驚嘆的才能中，精湛的攝影技術只是其中之一。這位仁兄這次帶了三個照相機，整日隨身裝備，四處瘋狂拍照。

易崴的攝影高徒李江琳也當仁不讓於師，帶的相機鏡頭是一個大變焦，拿出來遠射，像一門小炮。我的裝備僅次于易崴和江琳，一個小型數碼專門抓拍新聞圖片，另一個中長焦鏡頭相機用來攝取風景。齊君是職業電影導演，除了自己的相機，他對李江琳的錄像需要有求必應，這會他降級為攝影師，一如既往地扛著江琳的攝像機，隨時待命開機。

佛塔四周經幡如林，五顏六色滿山搖盪。我們進入藏人境界，轉動頭顱，尋找角度，在轉經山林中，繼續瘋狂拍照。然後亦步亦趨，學藏人樣走山一遭，轉經一圈。

日頭即將落山的時候，我們攜大小七、八個相機，滿載而歸。

藏民的手工藝品小攤沿街兩邊一字排開，蜿蜒而去，琳瑯滿目。女傑林昭有詩云：「相逢難得開口笑，山花須插滿頭歸。舉世皆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這正是此刻我的心情。經不得誘惑，先給未能成此行、



達蘭薩拉街景。（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達蘭薩拉）



達蘭薩拉街頭首飾攤。（易崴攝於2009年6月12日達蘭薩拉）

不吃飯光喝水還義務當枕頭的柯昂昂買了一個紅色木質手鐲和項鏈；再給齊越一路上熱線聯繫不斷的女友買了一個玉石手鏈，又給易崴買下他挑中的一大堆項鏈手鐲和一二銅缽。不過癮，繼給屢撞國門不得而出的廖亦武買了一個可作樂器的銅缽。這鬍子一年前跟我再要口琴，我牢牢記住卻沒得空上網搜索，這次異國銅缽被我撞上，正是時候。以木槌沿銅缽邊緣輕擊旋劃，仔細聆聽，有樂音蕩漾，音質純淨剔透，餘波裊裊嚶嚶，持久不絕。有這銅缽發出聲響，可以平衡他的音樂會上那總是陰氣森森的底層之聲。

「萬惡的舊社會」的老人們正確地說：窮家富路。達蘭薩拉是真實西藏的首府，世界名勝之地、東方佛教聖地。西藏文化從這裏起死回生，傳遍世界。這裏是人類慈悲、堅韌、聖善品格的煉獄。有多少歐洲人厭倦整齊劃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厭倦空虛浮躁的現代生存方式，尋求生命的意義而尋到了這裏？別說那些街上閑逛、眼睛裏透著人情味兒的牛了，路邊揀個石頭帶回去，也是達蘭薩拉的石頭！何況他們架上那些手工藝品！即便粗糙廉價，也是達蘭薩拉的粗糙廉價。除了借這方聖土淘寶，以謝我友人隔洋相連的深情厚誼，我在此地還給自家買了三、五瑪瑙手鐲和一大堆棉毛披肩，借故重溫遺忘多年的花錢不數的感覺。



穿上印度女人的麗沙！左起：李江琳、朱學淵、本書作者北明。(易崴攝於2009年6月14日達蘭薩拉)

我修行無尺度，不近廟堂而戀塵世美意，索性將所有手鐲項鏈一舉披戴，彌補平日持家上班衝鋒陷陣的簡約。戴著它們，在這山坡彎道上一路走來，手腕脖子上叮鐺作響，神意靈韻並秀而出，頓時周身敞亮，飄然自得，很有成就感。



達蘭薩拉的牛讓人印象深刻。它們逍遙在各種人類出沒的場所，學校、醫院、操場、站台、樹林、道路、街巷……，怡然自得如入無人之境。此牛頭上牌子寫著：「禁止停車　罰款 1,000」。
(北明 2009 年 6 月 14 日攝於達蘭薩拉)

不幾時，齊越與我再度出門走街，準備買些青菜煮食，彌補這些日子維生素的匱乏。半路他改了主意，鑽進路邊小攤，要壯膽吃一次印度薄餅。席間見一來自南方的印度青年，以坐在搖籃裹的愜意姿態，在簡易木條餐桌上，將薄餅撕碎，放入土豆菜湯之中，然後徒手撈抓，吃得津津有味。同樣的用餐方式，我在美國第一代印度移民的豪門大宅裏，餐具齊備的西式餐桌上也見過。抓得更麻煩，是米飯，而且也是從稀糊糊的菜湯裏徒手抓。看見這種吃法，就想起那頭沒吃沒喝還挺自尊的牛。

昨天難民村歸來途中，下車休息，一平為大家買得蔬果一大包，順手摘出一支遞給了身邊一頭悠然逛街的牛。

此牛穿明黃毛皮，有帝王之氣，面堂正中那巨大的鼻子，觀之若有千載之威。牠吞食一平的青菜之後，毫不滿足，堅持要一平再度施捨，站在一平面前紋絲不動。還不時用一隻眼睛看住一平腳下那一大包蔬果，另一

隻眼睛乜斜我舉起來的照相機。一平不走，牠也不走。僵持片刻，一平隻好慚愧地笑笑，說聲「對不起」，抱起青菜，轉身離去。

不料這牛不同意如此結局，邁開四蹄，甩著尾巴，不緊不慢隨一平而去。結果是，一平轉了一圈回來了，牛也回來了。

兩人站定，再度成對峙局面。



前排左起：牛、一平、朱學淵。（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達蘭薩拉）

一平有些不知所措，微微抱赧，再抱起那一大包蔬果，小心翼翼邁步離開。冷不防，他側身擠入菜攤內裏，鑽進棚子，從後面消失了。此牛緊隨不捨，不料一平消失，牠自知體積太大，無法尾隨，便守在原地，觀望等候。良久，不見一平復現，終於決定放棄，很大度地甩著尾巴，邁著帝王步伐，到別處巡視去了。

我和齊越薄餅午餐未盡興，歸來後煮食蔬菜，痛飲菜湯。念及那在自己家鄉的街道上巡視的牛，小有歉意：我們闖入牠的地界，一番背後稱斤斷兩的交易之後，就把牠辛勤耕種所獲如此這般都吃掉了。

「酒足飯飽」，各自為營，在旅館床頭整理數碼圖片，整理近日觀感，借網絡「下山」探親訪友，短暫回到山下熟悉的世界。

·另一面之詞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
……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邵穆公

「我們是人。我們沒有人權。我們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們沒有表達的自由。59年開始，漢人入侵西藏，殺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大活佛大？(一個字記錄時未聽清)迦巴還有和尚們。然後，600萬藏人，有100萬非正常死亡。我們的領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班禪喇嘛被關押16年。後輩藏人的記憶無法消滅，無法忘記。」



逃抵達蘭薩拉的2008年那波侖寺抗議藏人在難民接待中心接受採訪，各個神情凝重。(易崴攝於2009年6月15日達蘭薩拉)

步行前往達蘭薩拉難民接待中心，採訪去年(2008年)川藏地區那波侖寺抗議活動情況。受訪的是幾名青年藏人，也是

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問及事件的背景和「幕後策劃」：「你們是否有任何可能與達賴喇嘛聯繫？」

反覆地問，回答都是四個字：「絕對沒有」。

那波輪寺的宗教活動、3 月 10 日中國入侵西藏紀念日以及奧運會，是抗議發生的主要原因。首日 3 月 14 日，抗議遭受警察三次阻攔，但是一萬名左右抗議的藏人衝破封鎖，抗議成功，散去。次日發生衝突：官方使用警棍，催淚瓦斯，「炸子」，民眾的武器是石頭塊。

在當日採訪筆記上，關于他們抗議的理由，有下列的記錄，是他們自己的陳述：

「在寺院，對大量僧侶實行管制。寺院宗教活動也受到限制。藏人的生活習俗受到侵害。所以，我們不滿意，我們要抗議。

「當局不回應和平道路，並誣蔑我們的尊者。我們深受傷害。我們的口號是『自由與平等』，與漢人的一樣。我們與中國民眾沒有矛盾，政府不聽我們的呼籲，沒有回應。所以產生了抗議運動。

「我們是按照憲法法律進行抗議的。後來，他們宣傳為暴力性質。逼迫我們上山，我們像動物一樣地逃生。

「3月14號沒有發生暴力事件。那一天準備了橫幅，有『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要獨立』、『要自治』等。到了之後，才發現已經被中國官方強行要求抗議提前舉行，本來4點開始，要求2點開始。所以已經舉行完了。總共有1萬多人，到政府門前被阻擋了3次，沒有擋住。抗議之後就離開了。3月15號(抗議行動)不是我們組織的，有2萬多人。……退到聚集地，見有軍隊從遠處出來，(用了)催淚瓦斯彈和炸子(爆炸子彈)。這天抓了十五、六個人。前後共有兩百五、六十人被抓。大約有上萬警察，來自蘭州、甘肅、寧夏。

「我們絕對沒有拿刀子捅警察，因為我們手裏沒有東西。

「拉薩發生了抗議事件，但是我們不知道。」



在難民接待中心採訪逃抵的2008年藏人抗議者。左起：本書作者北明、朱學淵、一平。
(易崴攝於2009年6月15日達蘭薩拉)

中國各媒體報導指責藏人暴動，雖然眾口一詞，卻受到國際媒體普遍質疑。這另一面之詞，是我親耳聽到的參與其間的藏人自己的說法。

・逃抵的藏人

唵嘛呢叭彌吽——
我站在遙遠的天際，找尋昨天的夢想；
遺留在心中的淚水，但願是那孤獨的嚮往。

我站在茫茫的雪原，祈禱生命的輪迴；
回蕩在遠方的呼喚，但願是那眾神的光芒。
——唵嘛呢叭彌吽。

——德幹旺姆的〈祈禱〉，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每年平均有2,500到3,000藏人逃出中國，抵達印度和尼泊爾等地。2008年，由於「3・14暴亂」事件引發的戒嚴制裁，逃亡的平均人數大幅下降：3-9月無人抵達，9月以後抵達500左右。這是從難民接待中心的官員那裏了解到的情況。

是日正有一批逃亡藏人剛剛抵達達蘭薩拉難民接待中心，分別安排在一樓和地下室男女分隔的兩個宿舍。我們當然不會放過機會去看看這些翻越雪山、投奔自由的人。



達蘭薩拉難民接待中心，剛逃出中國的藏人仍然心有餘悸。(易崴攝於2009年6月14日達蘭薩拉)

下樓，走進位於樓廳門口的男室。這是一個三百多平米面積的長方形空間，室內一覽無

遺：三排地面大通鋪或矮床，從門口一鋪到屋子盡頭，此外再無任何其他設施。大屋子裏人不多，統統合衣在通鋪上休息。見我們突然闖入，他們本能地躲避我們的目光和鏡頭。我們沒有流亡政府官員陪同，也沒有人向他們介紹我們的身份和意圖，他們完全可以、而且有權站起身來，把我們關在門外。但他們只是、僅僅是，翻過身去，蜷縮起來，或者埋下頭去，用臂膀遮住臉。就這樣，在靜默中他們等待著，等待我們離去。靜默的僵局中，感受他們的恐懼和緊張，我腦子裏疊映出大陸官方媒體和春節聯歡晚會上藏人載歌載舞的畫面。那聚光燈下和鏡頭面前的場景，與眼前藏人的情形可謂霄壤之別。

不忍久留，我們匆匆退出。

樓下地下室的是女屋，面積小些，30平米左右，地鋪之外，也是一無所有，簡陋得無以復加。女屋沒有成年藏人，只有兩個在樓梯上玩耍的兒童和一位在地鋪上看書的少女。我們簡單採訪了這位目光清純的少女。

孩子年輕，口無遮攔(恕我隱去她的名字和年齡)。她來自拉薩，在五天時間裏，乘車加步行，先抵達尼泊爾，再到達蘭薩拉。是父親送她來的。二人均無護照，只能非法出入境。父親現已經安全返回，留下這孩子在這裏準備就學。這孩子小學畢業後未升初中，她說，原因是藏人大學生畢業後仍然找不到工作：「只有20%的大學畢業生能找到工作。」她的父母都是小生意人。到達蘭薩拉學習是她自己的主意。關于學完之後何去何從，她似乎主意未定。先不假思索地說要回去，言及找工作的困難，又說想當播音員和電視主持人，理想的去處是「美國之音」。「這是我的理想」，她說。關於未來和現狀只有一點她極為肯定：即便找不到工作，在這裏能學到真正的知識也足夠了。她說她不希望所學都是中國歷史而沒有西藏的知識。

她漢語流利，反應敏捷。顯然有充分的民族意識。說到學習自己民族的文化歷史，她的表述卻是漢化的：「……畢竟我可以學到更多的知識。我不想西藏教育我們的，都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在這裏，我們可以

學到(接受)自己藏族的文化教學。在中國我幾乎沒有聽到(學到)過我們自己的國旗和國威，在這裏我可以學到我們藏族的國旗和國威……。」

大概她想說的是藏族的尊嚴，但是說成了國旗和國威。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概念是用來思考的，也將限定思考。一個只有價值判斷詞語而沒有中性詞語的大腦，難以體會所謂「客觀」為何物。流亡政府難民接待中心室地下室的女生宿舍裏，坐在我面前地鋪上的，是一位使用漢化概念——確切地說是意識形態化的漢語概念，抗拒漢化的藏族少女。正如同在中國的反抗運動中，人們難免使用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對抗意識形態化。這幾乎是任何被奴役的反抗者都難以擺脫的境況。



達蘭薩拉難民接待站：這姐弟倆兩個剛抵達的小難民，老朱正教他們如何拍照。
(北明攝於 2009 年 6 月 14 日達蘭薩拉)

我們身後是60年的極權統治，我們無意識地習慣於政府無所不在的權威。即便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時候，這也已經成為一個潛在的話語系統和思維模式。這是一個不易覺察的誤區。從對流亡政府官員的訪問中，我發現他們不僅無法對內地藏人暴力反抗行為負責，而且對境外西藏青

年大會要求獨立的呼聲也不能實施壓制。由此可知，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信奉普世自由價值的政體，民主已然成為流亡藏人的生活方式，而不僅是一種追求或一種口號。相形之下，對到此一遊的漢人而言，在缺少民主實踐前提下，要想徹底清除血液裏極權主義的思維方式，相當艱難。反抗奴役是一件事，清除奴役生活烙在身體上的印記是另一件事。此項淨化事業單靠勇氣和自由意志不足以完成。聖經記載，為了進入上帝的應許之地，成為真正的自由人，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被要求在曠野流浪四十年，直到大部分被奴役者死去，剩下年輕的一代。這段歷史記述極富啟示性：一朝為奴，畢其一生，被奴性污染的血液無法徹底純化。除非具有超常的自我反省能力，無人能夠倖免。

不過我確信，在流亡藏人的學校裏，「國威」這個詞彙，這種思維，這種表述，將從這位少女的頭腦中淡出。自由與虛驕狂妄無緣，是責任和自信的聯盟；信仰與懦弱苟且無緣，是謙遜容忍和堅韌不屈的基石。在達蘭薩拉藏人社區，在民主制度和自由社會裏，在佛學詞典和宗教信仰中，這位少女不需要依仗民族主義和國家至上的價值觀，就可以生活得獨立、自信而有尊嚴。

起身道別，我們祝福這位少女在不久的將來實現自己的夢想。當少女描述她做「美國之音」主持人的夢想時，齊越指著正在記錄的我，告訴了少女我類似的職業和供職所在。少女聞言，目光流露出驚訝和羨慕之情。那表情足以讓我知道這職業在她心中的重要程度。

我們都知道，要把理想變成現實，她將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不過只有我明確地知道，這位少女不需要如我一樣，用幾乎畢生的精力和時間為自己準備一張永久化驗單，不需要在生活的各個驛站和關口、通衢大道和羊腸小路，書屋和戶外、私人空間和公共場所，不斷為自己驗血，不需要通過發掘民國傳統和進入西方人文歷史，不斷過濾血液中被污染的雜質。面前這位少女年正輕，小學畢業就避免了中國官方教科書的污染，也正確地疏離了上大學、混文憑的惡習，又很快逃離了高度奴役化的社會。她今日抵達的這所藏人自己的難民屋，

雖然簡陋到一無所有，卻標誌著她已經把意識形態化的語言體系和冷戰思維方式拋出了自己的生活空間。即日起，她有足夠的時間清洗自己並未徹底污染的大腦，還原為一個正常的人，走上一條自由的生命之路。

・悲聖蒼涼菩提心

我是佛，我不怕上西天。

——宗喀巴

達賴喇嘛的安全警衛工作由印度保安官員負責。十平米左右的小小公眾接待站，一個辦公桌。一圈座椅，一個茶几。裏面人滿為患，一些人被招進另一個門去接受安全檢查，另有三名歐洲人，英國口音，圍住辦公桌，向登記人員發出請求。他們問有沒有機會見見達賴喇嘛？回答是：如果現在登記，一周之內可能可以安排，但是今日絕對不行。他們說，他們會在這裏逗留12天，問填好表格之後如何獲得通知，以便他們能夠前往覲見。回答是：打電話，寫電子信。他們不大滿意這樣的回答，怏怏離去。

我們一行六人不及午餐，步行至達賴喇嘛官邸，接受安全登記檢查。在接待室等候了20分鐘左右，終於開始出示證件，登記表格。然後進入旁門安全檢查區，出示隨身攜帶用品，過掃描崗，記錄在案，簽字畫押。最後我們走進圍牆和大門之內的庭院，來到車道旁邊的候見室。

達賴喇嘛辦公室主任才嘉—— 一個 45 歲，膚色微黑的英俊男人，前來陪同我們等候。談及去年先後前來覲見達賴喇嘛的中國大陸人，他說有 100 多。其中 70 多名來自佛教界， 30 多名是作家、學者、體制內人員。「有些是前來打聽消息的。我們照樣接待。」他說。他還告訴我們：沒有聽說回去之後坐牢的。

會面時間到了。我等一行被引進達賴喇嘛的會客廳。聖者在客廳門前等候，經江琳介紹，一一與我們握手。

達賴喇嘛的會客室正面臨窗。右側有門通往另一個房間。藏人供奉達賴喇嘛的圖像，達賴喇嘛則供奉佛像：左側正面寬大鏡框裏，是一尊金碧輝煌的佛像。像前有香爐，青煙裊裊，說明這位轉世救度眾生的菩薩，仍然修行，這裏是他的「心地法門」。

落座之前，我們按照事先的設計，一一向達賴喇嘛敬獻哈達，是昨天江琳和易歲代大家購買的質量最上乘的哈達。聖者將我們獻上的哈達一一回敬。易歲把大堆佛珠放在聖者面前茶桌上，然後我們開始提問。

達賴喇嘛一一回答(或討論)了我等一行的問題，這些問題大致包括：西藏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衝突、藏人喇嘛人數與藏民的比例是否過多、流亡社區的寺院是否修建過大、流亡社區環境衛生與藏民勞動習慣問題等。朱先生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對手，他的問題總是值得認真解答，是為漢藏兩族之間重要的溝通，信息量很大。

江琳是藏人的知己，因為對西藏流亡社區的深入了解和對西藏宗教的深刻認同，她幾乎無甚疑問需要解答，只是借機會知會這位聖者她在其他流亡社區的見聞。

齊越陳述自己兒時在藏區生活的經歷和對藏文化的熱愛以及自己相關事業，他像很多藏人朋友一樣，希望聖者了解自己的一切。

易歲表達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真理部」宣傳下，對藏族問題的無知、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以及對藏族宗教、文化的尊重，對達賴喇嘛的敬仰之情。

一平表達對流亡藏人命運的深厚同情和對他們堅持信仰的敬意，他發言內容和一以貫之的謙遜態度、陳述中表達的深長憂慮，再度贏得我的認同。

我對中國「真理部」有關西藏問題的宣傳和大漢族主義觀點多少有些免疫力，同時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自治主張、和平思想完全理解並支持。很難說有人比西藏流亡政府擁有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面對一個失去人性和溝通可能的權力集團，在目前困境下，堅守和平意志比實行政治操作更需要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我能表達的，只有對流亡藏人保存自己文化，

堅守自己信仰的敬佩。我比較了八九之後，中藏兩個流亡群體在海外建樹方面的巨大差異。我還按照生命輪迴的觀點，從宿命論出發，對藏族半個世紀厄運的做了另一種闡釋，一種非社會學的、神秘主義闡釋。我最後一個發言，時間不多，一口氣把想法合盤托出，有些凌亂。我繼續說：1989年6月中國自由運動被鎮壓，1989年12月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那時就表達了對八九年民主運動被槍彈鎮壓的嚴重關注和對中國政府暴行的譴責。我盼望達賴喇嘛能夠以自己的威望，持續關注中國八九六四失敗之後的現代化轉型。



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會客廳回答我們的問題。(北明攝於2009年6月15日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說，他希望以後能夠有機會在天安門廣場弘揚佛法。藏人認為達賴喇嘛是轉世的觀世音菩薩。這位菩薩心中，政治問題與宗教問題相關緊密，佛法無遠弗屆。我想象，果真出現這等景觀：十四世達賴喇嘛站在毛澤東站過的位置上，為百萬中國民眾弘揚佛法，就像教皇保羅二世在他的家鄉波蘭傳達上帝之愛那樣，將是何等景觀！ 1978年10月教皇保羅二世赴梵蒂岡當任，不到一年他就重歸故里。百萬民眾從四面八方匯聚聆聽他的演講。他強調人民「擁有上帝的權利」和「自由的權利」，尤其強調人類的天賦尊嚴，他伸出雙臂，向被奴役的波蘭同胞呼告：「你們是人，你們擁有高貴的尊嚴。不要用你們的腹部爬行。」波蘭團結工會首領瓦文薩(Lech

Walesa)後來告訴法新社記者：「在卡羅爾・沃伊蒂瓦當選教皇之前，與共產黨政權抗爭的只有十數人。但是當他當選教皇之後，通喻民眾那句著名的告誡『不要害怕』，我們有數百萬人加入了戰鬥行列」。中國民間擁有成千上萬的佛教眾信，而達賴喇嘛改寫了擁坐佛堂吃齋念經、消極避世的佛教教義和修行原則，他身體力行積極入世的地藏王菩薩精神，一如教皇保羅二世通過天主教信仰，把人的尊嚴、悲憫和無畏傳播到教堂之外的冷戰世界。如果中國「真理部」閉嘴，敢讓達賴喇嘛親自對華人發言，他可以用他的道德精神讓中國湮滅的人文生態起死回生。

達賴喇嘛告訴我們，中國政府認為沒有漢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的問題。他被認為是一個分裂中國的罪魁。聖者陳述這一現實時，語氣詼諧，面帶笑容。但我的直覺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惡意攻擊給他造成很大騷擾。他還告訴我們，藏人內部對他的中間道路和憲法下尋求自治的主張有分歧，因為秉持這一主張與中央政府談判沒有結果，導致部分藏人對他不滿。他說，這種狀況，很容易導致漢藏問題複雜化。

2010年5月23日，達賴喇嘛在美國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的「公共政策羅斯福機構」與中國異議學者教授會面，用英語發表演講。他簡要回憶了49年之後西藏被佔領到起義的歷史，談他不尋求獨立，不尋求與中國分離的思想和宗教背景，歷史與現實的由來。也談他與中國中央政府對話的決心和對話失敗的心情。

言及他出走前的經歷，他說， 1956年他出訪印度期間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將會就西藏問題給毛澤東帶去特別的信息，並保證西藏的改革將推遲6年。達賴喇嘛因此打消了出走的念想，回到了中國。然而西藏的狀況依舊嚴峻，他說：「我艱難地努力，平息事態，但是我失敗了。然後， 59年起義發生了。」

言及這段歷史，他沒有一句批評、苛責的言辭。但是他一反既往的詼諧幽默，神情沉鬱，語氣悲涼。從49年到59年，西藏從此開始被顛覆，縱然江河倒流，天地翻轉，他寥寥數語帶過，把那些欺凌與欺騙、屈辱與失

望統統嚥在腹中了。他的心情何以能夠不蒼涼！我想，這等蒼涼是達賴喇嘛不願向世人展示，卻在回眸忍看時無法不沉浸其中的。

然後，他說下去：

「那是一個矛盾，那是一個問題，無論中國政府是否承認，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既不利于西藏，也不利于全中國。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接下來，他說了這幾句話，手勢堅定，一字一句，擲地有聲：

「我們不尋求獨立，我們不尋求分離。無論歷史如何地不同，我們只是面向未來。」

他告訴在座各位他如此選擇的原因。他展望歐洲現實，以歐盟為例指出二十一世紀不同於二十世紀：「看看歐盟，看看歐盟的精神，那些不同的國家，早期為了捍衛各自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的人民，現在這種情況過去了。現在人們更加現實地考慮問題而渴望共同的利益。所以，歐洲的歐盟出現了。」

自從走出雪域，那個封閉的西藏，那輛拖在人類二十一世紀列車尾部的最後一節車廂，實際上擁有完全的全球化意識和現代化準備。在精神上，它屬於世界文明人類的精神譜系。

達賴喇嘛繼而引述印度50年代早期一位精神領袖和政治家關於「東亞大同」的理想說，這一理想對他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如同在本次覲見時，他以幽默口吻告訴我們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達賴喇嘛在多個場合告訴世人，他對共產主義解放受苦人的理想懷有親切感。他並以此批評現代中國政府領導人，認為他們雖然是共產黨人，但已經不再具有共產主義的信仰。達賴喇嘛的天下一家理念，顯然來自他的佛教信仰。在這次聚會上，他使與會者明白，他關於不尋求獨立，不尋求分離的信仰背景，來自西方和東方這兩大思想資源。而且有歐盟為先例、做榜樣。這是他的第二個理由。

最後，他從現實出發，分析西藏留在中國的利益，他說：

「現實地說，沒有必要要求西藏的最大利益，因為西藏是一個不發達的

國家(backwards country)，在物質上非常不發達，每一個西藏人都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西藏。為了這個原因，只要經濟問題發展仍然是中心的考慮，西藏人民跟中國人一樣，都會感興趣，都會獲得利益。」

談及與中央政府對話的誠意，他說，早在70年代，他就產生了與中國政府進行對話、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他說：「那時候中國還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我們就決定，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與中央政府對話，我們必須對話。」他回憶說：

「到了1979年，另一位領導人鄧小平復出，他復出之後我們收到了一些信號：北京政府或中央政府希望對話。我們立即做出了回應。無論如何，到了86、87年，一些民主運動在大陸一些大學開始，所以中央政府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強硬，到最後甚至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胡耀邦被解職。胡耀邦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傳統的共產黨領導人，有完全的勇氣承認他們自己的失敗，他們自己的錯誤。我想他是這樣一個人：非常實事求是，注重現實思考，所以他被解職了。然後趙紫陽也被解職了。此後，所有政策都變得更加向左傾。所以，我們的對話沒有價值，雖然我們繼續尋求這種對話。到了2008年，(兩個字不清)危機發生了。在那期間，一個短時間裏，我們從北京收到過不同的信號，一些非常有希望的信號，但是幾周之後，那個積極的信號消失了。(繼之以)同樣的強硬路線。我們不顧這些，繼續尋求對話，而且我們的標準和要求沒有變化。所以，到了2008年以後，(幾個字不清楚)危機。我真的感到精疲力竭。我公開表示，我們對政府的信心現在變得很小，但是我們對中國人民的信心，從未動搖。……」

德蘭修女的醒世名言中有一句是「最要緊的是溝通」。達賴喇嘛亦如是說，而且達賴喇嘛是最善於與人溝通的一位。他的秘訣非常簡單，儘管不易做到。他的秘訣不是技術性的，而是心性的。他要求善意在先，虛懷若谷、而且敞開心靈，還要善解人意。在處理漢藏關係時，達賴喇嘛正是這樣做的。關於自治的訴求，他已經在多個公開場合反覆地說，西藏不要求獨立，不要求分離，只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再也沒有人如此明確地、清晰地、反覆地、誠心誠意地傳達

這個有限的訴求了。他的誠意，不僅源自西藏的現實，也源自天下一家的東西方文明理念和他的宗教信仰。可是這位老人看上去一直像是在對著一堵牆壁說話，這面牆壁返來的「迴聲」嚴重扭曲，變成了他要求「大西藏」、「變相獨立」和「分裂」。至今中央政府不能夠聽懂這些表達，或者，如很多同情西藏的漢族知識分子所指出的：故意聽不懂。

2008 年 10 月底，談判被迫中止，這位老人身心俱疲。可是他依舊堅持著中間道路和自治主張，僅僅是把對話的對象，從中國政府轉向了中國民間。

談判破裂的季節是深秋季節，山風吹蕩，經幡飄搖，經輪聲聲，白塔默默。達蘭薩拉依然如故，霜葉紛紛，只看楓紅。在一個又一個獨自祈禱的清晨和冥思苦修白晝，丹增嘉措這位老人是如何克服疲憊和沮喪，從看不到出路的漫漫黑暗裏努力仰望黎明的？是什麼讓他面對冰天雪地，甚至是刀槍劍戟，仍然不放下張開的手臂，不穿上抵禦中傷的盔甲，而依然敞開自己的胸懷？

2010年3月，在達蘭薩拉召開的漢藏交流會上，前往覲見達賴喇嘛的人群中，一位 1959 年隨軍進藏「平叛」的前解放軍士兵，不期然被旁人公開了身份。「獨立 62 師就是 59 年西藏『平叛』的主力部隊……殺紅了眼的解放軍，把藏族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當『叛匪』打死……我們那個部隊雙手沾滿了藏人的鮮血，這麼說一點也不過分」。這位自稱平叛兩年之後，分到獨立62師的士兵，在覲見達賴喇嘛之後這樣回憶他從老兵那裏聽來的故事。他叫梁山橋，如今已滿頭華髮。當他聽聞別人對他的介紹，立即站起來向達賴喇嘛鞠躬致歉時，誰也沒料到，達賴喇嘛也站立起來，面帶笑容，與他握手，還用不熟練的漢語說，「啊，解放軍，解放軍，歡迎」。在送別會上，達賴喇嘛一視同仁，給這位前解放軍軍人也獻上了一條潔白的哈達。不僅如此，他還特別地向這位解放軍深深鞠了一躬，並慈善地擁抱他，嘴裏依然用漢語念叨著：解放軍，解放軍。

消息從海外博訊網站不脛而走，繁忙與閉塞中，我聽見了自己心底

的江流。

火焰可以融化堅冰，大水可以澆滅火焰，石土可以阻擋大水，火藥可以炸開石土……。如果殺戮也不能製造仇恨，還有什麼能夠阻止這位老人心中的愛與悲憫，消弭他的善和仁慈？

這不是物理世界的邏輯和心理哲學理論能夠解釋的現象。30 萬到 100 萬藏人因為不願放棄自己的信仰，死在漢族統治下，最初，直接殺戮他們的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梁山橋的眼淚沒有打濕這位聖者的袈裟，是因為一旁的友人提醒他，把腦袋從聖者的懷裏抽出來。我內心的江流趨於深闊，是因為我看見達賴喇嘛為藏民族忍辱負重半個世紀到如今，卻準備寬恕一切悔罪的惡人，正如教皇保羅二世在囚室裏，寬恕了那位刺殺他而被判刑的兇手。

不應當功利主義地評價人類這種神性及其行為，因為神性是造物主在人類身體中種下的基因，它與獸性相反，是徹底超越現實功利的。厄運和詆毀，奴役和殺戮可以用仇恨和怨懟污染無辜者的心靈，在精神上、道德上打垮無辜者，使他們長出魔鬼的獠牙，生出非人的冷酷，但是不能污染、打垮一位以悲憫之心鍛造的聖者。歷史進程儘管富有鐘擺似的往復慣性，這種聖者境界，卻可以據之為憑並借之為力，從而調轉方向，擺脫慣性，避免奴役接著奴役、暴政接著暴政的循環，走上民主自由之路，重建人的尊嚴與高貴。

覲見開始不久，達賴喇嘛用藏語與在座的工作人員交流，不久他們端來了奶茶，並再度與達賴喇嘛溝通。然後，達賴喇嘛告訴我們：他與我們的會面時間可以延長了，因為他臨時推遲了與一個「美帝國主義」的會面。他用藏音濃重的漢語念出「美帝國主義」這個五、六十年代中國家喻戶曉的詞語，詼諧的氣氛立即感染了我們。

我最後插空告訴聖者，一位大陸學人未能成行，可否加持我為他買的念珠？話沒說完，達賴喇嘛接過我遞上的珠子，雙手合十，舉起在胸前磨捻加持，並再為此行所有人的大堆佛珠念珠甚至手鐲項鏈加持。然

後，他為我們一一簽名、分別合影。

親臚加持，承蒙簽名，蒙福合影，對我而言是一種儀式，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儀式。

我知道，其他漢人如有同樣要求，也會得到同等禮遇和關照。這是一位在圍追堵截中逃離家園的老人對他的「敵族」所持的態度，他為抵消這個敵族的奴役和殺虐之惡果不懈奮鬥了半個世紀。這位聖者20歲就扛起全體藏人苦難，獨自走上自我獻祭之路，卻把祝福廣佈世人。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合影剪裁。左起：李江琳、達賴喇嘛、朱學淵、本書作者北明、一平。（才嘉攝於2009年6月15日達蘭薩拉）

在我們送去簽名的圖片背後，印著這位聖者對世人的勉勵：

「每天清晨醒來時想：今日我是幸運的，我能醒來，我還活著，我擁有彌足珍貴的人生。我不會浪費這生命。我要用我全部能力發展自我，開放心靈，為一切生命的利益追求啟蒙。我將以善念對待他人，我不會讓憤怒所俘虜或把人往壞處想。我會盡最大努力為他人謀求福利。」

・詩僧

那條河孕育了金山羊的村莊，那條河淹沒了大藏王的車轍，
那條河是雪水融化清涼的奶，那條河上牛皮筏子作輕舸。
——我喝了河水熬成的茶，從此後，
只要路途乾渴，我就想起拉薩河。

那條河聽過悲傷的歌，那條河只解善良人的渴，
那條河容忍了帶給她的痛苦，那條河洗去了塵世的污濁。
——我洗過七夕夏月的澡，從此後，
只要追求幸福，我就想起拉薩河。

那條河不改變原始的清澈，那條河煮熱了陽光和快樂，
那條河披掛著彩色的祈願，那浪花曾變作無數金天鵝。
——我背過阿媽背過的水，從此後，
我看到的每一條河，都是拉薩河。

——〈拉薩河〉，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2009年2月，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發表記者帕特里克・賽門斯(Patrick Symmes)的長文〈西藏後起之秀〉(Tibet's Rising Son)。文章一開頭這樣描述噶瑪巴喇嘛、藏傳佛教格舉教派的領袖：

「作為一個神，他是一個精緻的年輕男人。身材清瘦、表情自信、穿著紅黃相間的袈裟，噶瑪巴喇嘛總是像一個儒雅的王子一般接受著他人的鞠躬。他在漢語和藏語間流利自如地切換，晚上會學習朝鮮語，有時候還會禮貌地用英語糾正翻譯的一些發音上的問題。印度東部菩提伽耶外的一個新的寺廟是噶瑪巴喇嘛的臨時住所，黃昏時分，人們常會看到他在高高的台階上慢行，眺望著下方在焦乾的田地裏收割麥子的婦人。」

輿論認為，噶瑪巴將成為達賴喇嘛的繼任者，或西藏未來的攝政王，以便彌補十四世達賴喇嘛身後轉世靈童的尋找和主政之前，西藏精神領袖的空缺。——「沒有任何一場政治運動經得起20年沉寂」。西藏文化宗教在中國中央政府現行強硬政策下，面臨滅絕，達賴喇嘛為挽救這個600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種族，被迫走出佛堂，獻出一生大部份精力。西藏精神領袖必須後繼有人。

1992年3月，七歲的阿波嘎嘎被認定為十六世噶瑪巴的轉世靈童，6月，中國國務院宗教局宣佈認可阿波嘎嘎為第十七世噶瑪巴。他由此成為中藏雙方共同認可的唯一大寶法王。 1994年和1999年，這位十七

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曾兩次訪問北京，受到極高的尊敬和禮遇。他參加了 94 年國慶慶典，並在官員陪同下先後參觀北京、上海和廣州、福建、浙江等城市。他首次到訪北京時，還去過五臺山和峨眉山等佛教聖地朝拜。他對中國官員的印象不錯：「雖然他們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似乎對佛教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和恭敬。他們的一些談話內容似乎也能與佛教哲學相契合」[1]。幾乎看不出任何理由導致這位年輕的藏傳佛教大法王決心背井離鄉，流亡印度。但是再次訪問歸來不到一年，這位年僅 14 歲的噶瑪巴離鄉出走了。

中國政府立即散佈輿論說，噶瑪巴到印度，目的是取回自己的黑寶冠和其他自己的前世物品。然而噶瑪巴再也沒有返回中國的西藏。在他抵達印度之後首次發表的聲明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把自己出走的原因說得清清楚楚：他多次要求出國訪問，但是從未得到答覆；他一再請求中國政府允許大司徒仁波切到他所在的西藏楚布寺為之灌頂、口傳和教授佛法，但是這位仁波切不被准許進入中國，原因是這位仁波切與達賴喇嘛關係密切。此外，他雖然到京訪問期間可以在官員陪同下參觀走動，但是在家鄉，他除了呆在楚布寺，沒有在西藏境內行動的自由。他的另一個擔憂來自班禪喇嘛的前車之鑒：年滿十八歲之後，在被授予徒有其名的官位之後，他將被要求違心地攻擊達賴喇嘛，並可能被中國政府當作一個傳聲筒，利用來分化瓦解西藏。為了避免淪為徒有其名的噶瑪巴，為了能夠接受正規的傳承灌頂和法教修行，為了避免成為中國政府的傀儡，為了挽救西藏宗教文化，他只有出走一條路可循。抵達印度之後他說，「我在為我今生的任務作準備，教導及學習佛法，和激發眾生心中本具的慈悲和智慧」，「只有在目前此種情況下才有可能」[2]。葛瑪巴告訴世人，是他自己做出了流亡的決定。他秘密出走前給中國政府留下了一封信，陳述了他出

---

[1] 2005 年 3 月 18 日《法王噶瑪巴的自我介紹》。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Karmapa_about_self.htm

[2] 2001 年 4 月 27 日十七世噶瑪巴於印度達蘭薩拉上密院(藏傳佛教格魯派密院最高學府之一)首次召開的記者會上的談話。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2000_now/2001_04_27.htm

走的理由並事先聲明，他的出走既不是背叛國家，更不是要分裂藏漢兩個民族。——他對中國政府欺騙輿論的傳統方式完全了解。

噶瑪巴流亡印度之前，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中三個教派的領袖，均已流亡印度，包括噶瑪巴的前世，十六世葛瑪巴讓　日佩多傑，也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那一年抵達印度。作為一名得到中國官方認可的藏傳佛教精神領袖，十七世噶瑪巴在其上師們逃亡印度四十年之後，竟步其後塵，重複踏上逃亡之路！消息傳來，震驚世界，也震動了中國紅朝。中國當局一貫按照世俗觀點解讀宗教心靈，用現世功利手段處理宗教事務。但就如同他們的唯物主義殘暴曾經讓達賴喇嘛感到匪夷所思一樣——他們曾經派達賴喇嘛的哥哥暗殺達賴喇嘛，這等對佛教信徒的無知，使得持守眾生平等理念、連蚊子都不願打死一個的達賴喇嘛感到荒誕不經——他們的無神論禮遇絲毫不能觸動噶瑪巴的心。在逃抵印度之後的首次公開講話中，噶瑪巴指出了西藏宗教文化面臨的滅頂之災：

「目前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還在發生戰爭，有些地方失去了自由，我們西藏就是其中之一。西藏是個全民信仰佛教，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民族。但是二、三十年來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受嚴重踐踏並正瀕臨絕滅。」[1]

噶瑪巴出走後相當低調。但是他的逃亡本身是一個明確信號：西藏被奴役的狀況始終未有些微緩解。他成功抵達印度三個月後的2000年2月就稱：西藏歷史文化現實處于「非常時期」。流亡伊始，這位年輕的葛瑪巴就祈願「在達賴喇嘛的偉大構想和全體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雪域眾生早日獲得自由。」[2]

噶瑪巴出走前聽過達賴喇嘛的講話，看過達賴喇嘛的照片。但是他

---

[1] 十七世噶瑪巴《抵達印度後首次公開談話》，2000年2月19日，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2000now/2000_02_19.htm 。

[2] 十七世噶瑪巴《抵達印度後首次公開談話》，2000年2月19日，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2000now/2000_02_19.htm 。

出走前幾天，破天荒第一次夢見了這位聖者。夢境有如一個預言：

噶瑪巴正在草原上散步。達賴喇嘛身穿法衣，走向他。達賴喇嘛握住噶瑪巴的手，並對他說：過來吧。「尊者帶著我去一間鑲著金頂的寺院，金頂閃閃發光。」[1]

接下來，1999年12月28日，年末時間，深冬季候，噶瑪巴在對外宣佈嚴格閉關多日之後，於夜間10點30分開始行動。這是警衛人員不值班的時間段。他和侍從摸黑走出房間，悄然無聲，避開門廳，從窗戶跳到護法殿屋頂，再從屋頂跳下地面。 登上一輛等候在那裏的吉普。他們一路向西，選擇蜿蜒山區小徑，晝夜顛簸兼行，以避開道路檢查站和軍營。新年的兩天前，這位不願做奴隸的噶瑪巴成功進入尼泊爾境內。此後，噶瑪巴一路繼續祈禱此行平安，並在新舊年交替之際，完成了他此生的重要轉折：他用了六天的時間，克服惡劣的路況、氣候和健康狀況，徒步或騎馬、地面乘車或空中飛行，最後乘火車，輾轉行進。終于在新年的第五個清晨，他和隨行人員抵達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西藏文化宗教匯聚地、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居住地——達蘭薩拉。

達賴喇嘛已獲知這一重大消息，正在宮邸等候。

噶瑪巴抵達後沒有片刻喘息，徑直奔達賴喇嘛而去。他說：「我直接去覲見尊貴的達賴喇嘛，他是慈悲的化身，他以慈愛和關懷接受了我，我非常地開心。」[2]

對他的出走，達賴喇嘛與眾人一樣感到驚訝，但是他讚揚這位年輕的噶瑪巴出走動機「非常好」。達賴喇嘛2000年6月在美國洛杉磯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噶瑪巴的問題時說：「一開始，大家非常驚訝。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問他選擇這個危險的旅程的目的是什麼？他告訴

---

[1] 2005年3月18日《法王噶瑪巴的自我介紹》。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Karmapa_about_self.htm。

[2] 2001年4月27日十七世噶瑪巴於印度達蘭薩拉上蜜院首次召開的記者會上的談話。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events/2000_now/2001_04_27.htm。

我他要為佛法和西藏人民做點事。」[1]達賴喇嘛知道噶瑪巴的選擇意味著什麼，他說：「如果他留在西藏他會有個人的享受，但是不能達到他的目標。所以，他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出走。」[2]

噶瑪巴知道，現在他終於自由了。他作為一名葛舉派宗教首領和修行人的生涯，可以正式開始了。

我等一行走進噶瑪巴在上密院的會客廳時，是他流亡生涯的第十一個年頭。

前來覲見的各色人等絡繹不絕。

安檢之後順序上樓。在噶瑪巴經常眺望黃昏遠景的三層露天走廊上，我們排起了長隊。已經有兩組人在我們的前面等候。不需長時間的等候，很多人前來只是為了表達敬意，恭獻哈達，得到祝福。人們魚貫而入，又匆匆離去。

覲見之前接獲的規定是：不能談話、不能拍照、不能錄像。

「能做什麼？」

「敬獻哈達。」

這一預設，把我們當中談鋒甚健的學者朱學淵先生疏離走了：「那我們去幹什麼？」他問。

既來之，則觀之。信息不僅靠語言交流，知識和感受更不僅是語言的特權。我站在三層露天陽台的隊伍裏，眺望遠方，體會這裏黃昏時分人去鳥歸的空明曠寥中，一個流亡異鄉、肩負使命的年青人的所思所想，心裏充滿好奇。

不幾時，我們被幾位忙得滿頭大汗的工作人員指揮著，進得門去。噶瑪巴出現在面前：當年那個面龐佈滿高原血色的十四歲孩子，已經長

---

[1] 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activity/2000/6/report.htm

[2] 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activity/2000/6/report.htm

成高大英俊、皮膚光潔的二十五歲青年。報導稱噶瑪巴「出名的嚴肅」，他自己2008年到訪美國時，在公開場合也是如此自我形容的。不過，在看見他最初禮節式微笑的瞬間，他頭上的神秘光環即刻鑽進腳下的地毯去了。等到我們離開，那些神秘光環已經從地毯下面飛到窗外的田野去了。



十七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轉自十七世噶瑪巴網站)

那是一個約一千平米的大客廳。正面是噶瑪巴座席，右側，一排沙發依窗而列。我們列坐於靠牆的那一排沙發，整整齊齊，安安靜靜。有些滑稽。幸虧人多！我暗自慶幸，不然如何將這例行公事的覲見進行到底？

孰料這位被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嚴加保護」的藏傳佛教神秘領袖，不僅要與我們談話，而且一開口，就把翻譯廢了——他說漢語。我們有些面面相覷，一時張口無言。

李江琳急中生智，提問徵詢他對中藏關係的建議。這位年輕的噶舉派教宗聽完一番陳述和提問，像孩子一樣笑著，往上翻了翻眼睛，嘴角咧了一咧，似乎是做了一個頑皮的鬼臉，然後說了一番正確之極的話。大意是，漢藏兩族過去一直和睦相處，未來關係必然源遠流長。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是長遠的，兩個民族仍然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是從敘述自己的經歷開始陳述這個觀點的。他毫不避諱地談及自己的經歷和觀點：我從小在西藏長大，學習中國文化。出來以後，遠離

中國，反而對中國文化更加親切而感興趣了。我現在學習中國書法和繪畫……。

我借機問了一個問題，他回答的方式是，繼續談自己在中國文化中受到熏陶的經驗和對文化中國的熱愛。——沒有一個政界領導人會把自己攤開了，擺在會客桌上回答來訪者的問題。他看上去心無罣礙，一派天真。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面前這個人，擁有三界五行之外的特殊身份，佛教界眾生是要頂禮膜拜的！

在達蘭薩拉見到的西藏宗教界、政界首腦人物和中層官員，幾乎無人表現出對多年中共壓迫的仇恨。他們始終傳遞著這樣的信息：我們要求自治，希望和平，願意與漢人和睦相處，盼望自己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流亡政府的「新聞信息與國際關係部」兩位部長更是特別明確地表示：在中藏關係上，我們不計較歷史，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們只寄望未來，我們希望中國未來能夠與西藏和平相處。上山後我們首次聽見這番話，我有些懷疑桑傑嘉的漢語翻譯是否詞不達意。

他沒有詞不達意。我對不計較過去的藏人主張不以為然。忘記過去，並不能等於面向現在和未來。一個失去真實歷史的民族，不可能建設自己真正的未來。中國就是因為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一個時期接著一個時期、由遠及近、周而復始地切斷自己的歷史，古老的民族才變得今天這樣淺薄，才變得如此面目全非：下巴上長著馬克思的鬍子，眼睛裏透著斯大林的冷光，張口說著被中宣部污染的新華語體(後來為了顛覆這種語言，又變成了流氓腔)，而腦子裏則轉著人類最貪婪的念想。爭相成為物質暴發戶，把家園解讀為金錢堆積的動物遊樂場，把世界解讀為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文化的保存在於繼承，一個民族若在向前披荊斬棘開拓道路的同時，向後斬斷來路，這個民族何以為繼？當日與流亡政府信息部官員共進晚餐時，我趁機對忘卻歷史這一說法進行確證，但是發現他們心口如一，不打幌子。我表達了不同意見，兩位官員謙和地

微笑著，並不反駁。以後數日參觀訪問才明白，達蘭薩拉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把中國官方在藏族身後挖斷的道路填補起來，以便他們以自己確鑿的存在，走向世界。但是面對中共強勢欺凌，他們必須閉嘴。無論中宣部如何強詞奪理，他們只要一條：讓我們依照你們的國家法律自治。

噶瑪巴的背後是赤色的土地，他出生在那裏，卻越過那條鴻溝，回溯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異族人，他走到漢人前頭了。

回來後我翻閱這位十七世噶瑪巴的資料，發現他是扔進我窗戶裏的一塊石頭。這塊石頭的衝擊，是對我的西藏壁壘的最後一擊。

我們覲見的場所，也是他學習的課室，平時排放著簡易的長桌和椅子，經文法器，文房四寶。他與他的幾位老師在那裏共度每日時光。除了做佛學功課，他也在那裏研習中國書法和中國繪畫。他還寫詩、他也作曲並歌唱。

宗教與藝術在終極意義和最高境界上無法分家。就我所見，這位年輕人的水墨、工筆技術相當老辣，線條規範熟練，墨意則縱橫飛揚，風格在濃妝淡抹，富麗與簡約之間自如穿越。而他的隸書則敦厚中透著明顯的活潑靈動的氣韻。他的作品幾乎全部與佛教相關，一如歐洲中世紀那些以聖經人物故事為題材的油畫，充盈著高遠、富麗的天府貴氣。

噶瑪巴認為，漢語和英語是本世紀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兩種語言，不過相對于西方，噶瑪巴對中國更有感情。2000年噶瑪巴出走印度，達賴喇嘛除了讚揚噶瑪巴為藏人做事的宏願，對這位當年十四歲的孩子的讚揚還有兩項：一是「他的佛法知識相當不錯」，二是「他能寫很好的詩。」達賴喇嘛幽默地說：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比我這六十多歲的人寫得還好。

詩言志。噶瑪巴的詩大多與佛教祈願有關，但是當 2008 年初中國大陸遭受暴風雪災害時，遠在印度達蘭薩拉上密院寺廟中的噶瑪巴，寫了一首現代詩，題目是「希望啊，你在哪裏？」[1]這是苦難中對希

望的叩問，詩文則情感充沛，是對災難中的中國所發的願。

深愛此岸世界的噶瑪巴對自己的流亡深感無奈，對必須遠離的中國一往情深。詩一開篇就表達失去故鄉的迷茫：

冬季的某日
我獨處一隅
然而此時
卻不知該真正朝向何方
冷冽中
力竭的人
漫無方向的祈禱著！
故鄉啊！故鄉
你在何處？
或許
是你不願見我這漂泊的人
而消失無蹤！

隨後，這位年輕的藏傳佛教噶舉派傳人稱雪災中的土地為故鄉，稱受難的人們為同胞，並與之感同身受：

蒼天啊！
今日聽說
您沒良心的
給予我的故鄉和同胞們
前所未有的苦痛

---

[1] 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works/poem/2008/20080202_Hope.htm

嗚呼！
上為天，下為……唉！
我卻只能不知所措的苦笑著！

希望啊
你在哪裏？

天為人所傷，災難是大自然的忠告也是大自然的懲罰。在揣度這災難原因之後，年輕的噶瑪巴在詩中發願：

願以慈母恩賜的血肉之軀
包覆著故鄉大地
消融那無盡的風雪
和那難耐的冰寒。

雪災、乾旱、地震、流感、血鉛超標、食物中毒、不合格疫苗……，近年來中國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在憤世嫉俗的責任指控或悲悼哀痛的同情救助之外，為救眾生苦厄而發願自我獻祭，就我所知，僅此一例。雖然只是一念，這是一種陌生而崇高的情感和值得敬服的宗教境界。世上很多人面對社會榮譽和權利，會感覺自己相當高大，欲罷不能；噶瑪巴剛好相反，面對災難和責任，雖千萬人，他願獨往，自獻於承擔苦難、解救他人的祭壇。他何嘗不知面對雪域另一端那無法無天、無神祗、無信仰的巨大地域，他無能為力！他因此自嘲而嘆息，卻不放棄心中的祈願，他在詩中繼續寫道：
而這
是多麼的痴傻呀！
啊哈哈！
我這小兒難以言表的心中密語，

就讓萬物傾聽吧！
唵嘛呢叭彌吽

他的詩畫中一個鮮明的主題，是女性和母性、悲憫和愛憐。他的工筆畫「妙音天女圖」，以深邃太空中的融融月光為背景，將天女之美麗與莊嚴，絢麗與聖善，表現得淋漓盡致，整個畫風空靈而透明，華麗而典雅，耐人尋味。而他的短詩，能唱易吟：善思如母眾，難忍無量苦；憶念蒼生情，世世永不離。



十七世噶瑪巴的畫作：妙音天女圖。(轉自十七世噶瑪巴網站)

噶瑪巴的另一些詩，例如〈世界啊〉[1]，顯示他對世界和自然的熱愛與眷戀。

這位法王，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一樣，是一位外表含蓄嚴肅，內心浪漫充溢的詩人。他生於青藏高原，喜歡南方的風；身穿西藏佛教袈裟，喜歡古代漢人文化；

「世界南方大海，自由生音而現，往昔姣容天女，禮撒拉思瓦

[1] 引自《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官方中文網”http://www.kagyuoffice.org.tw/karmapa_17th/works/poem/2006/20061228_A_World.htm 。

蒂。……」(噶瑪巴為妙音天女而題)在這裏，有李白的自然瀟灑和無限廣闊的心靈空間。

每一個夕陽西下、炊煙繚繞的黃昏裏，當他放下佛事和創作，站在露天走廊上向遠方山巒，或田間勞作的婦人眺望時，他是一個穿著袈裟的詩人，在聖善、寂寥、悠遠、悵闊的世界中獨行。

十七世噶瑪巴被國際輿論認為是達賴喇嘛身後西藏精神領袖的繼承人。美國《時代周刊》2008年以「下一位世界領導級喇嘛」(The World's Next Top Lama)為題，專文論述說：「尊者達賴喇嘛也在2001年公開的場合中，表達對噶瑪巴所代表的獨一無二傳承的肯定。」指出，作為傳統藏傳佛教中第三位重要的領袖，噶瑪巴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噶瑪巴與達賴喇嘛一樣，擁有悲憫仁厚之心。對于西藏不同的教派而言，噶瑪巴與達賴喇嘛共持宗教各派兼容、避免宗派的觀點。「像所有的西藏人一樣，未來我會繼續以最大的力量來支持尊者。」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是兩個教宗之間的關係，但有時不免更像爺爺和孫子之間的關係。這也使得過去兩大教派之間的緊張得以彌合。至于佛教，他雖然被限定在藏傳佛教的絳紅色袈裟中，但他告訴人們，他將效法他的前任，佛法將對所有佛教信徒開放。

對於中國而言，他同樣是繼承達賴喇嘛精神領袖地位的最佳人選。噶瑪巴血液中有一種天然的中國情愫。他在與我等會見中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因為離開中國更加鮮明而深長。

事實上由于研習中國書法和繪畫，他在藝術上，已經比大多數當代中國人都傳統中國化。而在接受華文媒體記者訪問時他表示，他的漢語比從前在中國時大見長進。事實上，他初抵印度時，只有小學五年級的漢語水平，但是在異鄉印度，他的漢語在與人談話中無師自通。他不僅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也熱愛中國庶民，熱愛中國土地。他甚至告訴BBC記者，到了印度之後，他彷佛感到自己以前是個漢人。這種自我的神秘認同，對未來漢藏和平、平等、友好相處，應當是福音。

行色匆匆，20幾分鐘的漢語交談結束。行前，噶瑪巴贈送每人一小紙袋吉祥物，並再次打破他的辦公人員頒佈給我們的規矩，建議我們與他合影。當我走出門去，一眼望見露天走廊裏遠方田野背景下依然列陣等候覲見的人們，我彷彿感到，當舉世關注達賴喇嘛本人和西藏問題的困境時，這位年輕、謙遜、實修、律己而刻苦的噶瑪巴已蓄勢待發，他已經長入西藏與中國的未來。

從噶瑪巴會客廳出來，陽光普照。戴著噶瑪巴回贈的哈達，在上密院的階梯前拍照留念。突然鐘聲大作，就見樹蔭下乘涼的和尚們，從六、七十歲到六、七歲不等，絕大多數 20 歲上下，拖動鮮艷的紅色袈裟，蜂擁挪向旁邊一座老式樓房，再從那樓房不大的門洞魚貫而入，最後從那門裏形成一個長隊，蜿蜒到樓外。

那裏原來是一個食堂。食堂裏四面牆壁上掛著藏傳佛教各派領袖和達賴喇嘛的大幅畫像。牆下大廳裏，拼起來的十幾個大桌子，每桌可圍坐十幾人。

我們飢腸轆轆，當即決定就在那裏蹭飯。簡單交涉之後即刻獲准。我等一行數人夾在紅色袈裟中排隊領飯。碗是自己取，飯也自己盛。品種不多，白米，花卷，土豆泥的湯，炒茄子等一類顏色與袈裟一樣鮮艷的炒素菜，每人還有一個香蕉。

坐在西藏出家人中間，心知肚明自己是異類，彼此生活方式隔的豈只一座廟門。那卻是我到達蘭薩拉幾天以來吃得最愜意可口的一頓飯。

・桑傑嘉和他的心事

我住過的那一間帳房，在高闊的無比高闊的羌塘，
她是青藏高原的腹地，唐古特神聖的北方，
好大一片荒涼。

我住過的那一間帳房，在北方海拔五千米以上，
是湖泊最多的地方，是動物最多的地方，
是神話最多的地方。

我住過的那一間帳房，在一片野犛牛棲居的牧場，
六月裏翻滾八千里雪浪，雲霧托起山岡，
哦喲呵——好蒼茫。

我住過的那一間帳房，四周都是威猛的護法金剛，
鹽湖女神在空中飛翔，轉經筒支在了天上，
經幡栓著太陽。
……

——〈我住過的那一間帳房〉，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桑傑嘉(Sangjek Kep)三十多歲，性情開朗，單純率真。有一雙藏人難得的、會說話的眼睛，有時笑意盈盈，有時含情脈脈，有時悲愁切切，有時憤懣沉沉。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他燦爛地笑。他留一頭披肩長發，兩顆虎牙在笑口常開時閃現，給人一種錯覺：這長髮披肩的是美國好萊塢電影上永遠勝利的獨角英雄，不是現實中被奴役的苦難藏民。



桑傑嘉在西藏流亡政府總理府會客室為到訪的中國作家做翻譯。(易歲攝於2009年6月11日達蘭薩拉)

桑傑嘉喜歡漂亮女孩，年齡、種族、地域不限，只要覺得漂亮，一概贏得他的青睞。藏人大概跟走西口的山西漢人一樣，沒有什麼勞什子規範，自由得像天上的鳥，願意跟誰順風飛多高就飛多高。

桑傑嘉喜歡吃肉，出訪途中路過集市

貿易，他下車買上十斤羊肉，放在後備箱。傍晚歸來提著下車，從路邊陡峭的小路一路搖下去，搖到溝底，回家連續飽餐數日，幾天之後，遇到機會，再如是這般操練如儀。

桑傑嘉喜歡美國的空氣，「波士頓」，他說，「我在那裏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尷尬，很多人看見我都笑著打招呼，沒有人把我當外人。秋天的樹葉飄得滿街都是，空氣特別清爽。真的太好了。」——不知道他喜歡的是美國氣候還是美國人。

桑傑嘉是我們這次訪問的的漢語翻譯。延及數日的參觀會談活動，他必須以一抵十，將所有人的所有言論，用漢語和藏語輪番咀嚼一遍，從沒見他厭煩過。和大多數達蘭薩拉的藏人一樣，桑傑嘉從境內西藏逃亡到此，他在達蘭薩拉的職業是西藏流亡政府新聞與外交部一份中文刊物《西藏通訊》的主編。

桑傑嘉是西藏問題專家。幾天前在顛簸的山路上，桑傑嘉手摳住車窗穩住身體，操著藏語味道濃重的漢語，不厭其煩地回答我關于西藏的初級問題：

印度人和藏人有什麼不同？

藏人如何處理勞動和朝聖的關係？

藏人的信仰與時下實用功利性所謂宗教有什麼區別？

如果他們不是終日為升斗進項祈禱，然後無所事事等著天上掉餡兒餅，他們祈禱什麼？

如何定義藏民比較接近事實？

你用繪畫的要素，線條和造型，描述音樂，只能說明你對繪畫情有獨鍾；你用旋律和節奏描述雕塑，說明你對音樂青眼有加。藝術理論上把這叫做所謂通感。但是通感在西藏問題上毫無意義。究竟什麼尺度才是衡量藏民的合適尺度？

藏人在這裏一樣貧窮，為什麼乞丐都是印度人……？

為養家糊口我嫁給媒體十多年，八小時之外仍然分心照顧這個吞噬我幾乎所有能量的使命，錄音設備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如影隨形，專門

收納一些聽起來有保留價值的資源。不過此次達蘭薩拉之行，我決心擯棄拼命工作的惡習，逃離媒體而自我放逸，于是只帶了眼睛、耳朵和嘴巴，偶爾還有鼻子，感受宏偉殿宇裏的香火。桑傑嘉的經驗式、見證式的回答，讓我後悔那日沒有一個按鈕可以按下去，以便將他那些獨特的描述錄下來與人分享。

山路崎嶇，山澗環繞，我覺得我面前坐著的是一座橋樑，跨越藏區禁地的橋樑。

橋對面，是一個古老神秘而陌生的去處。

沉重的西藏命運看上去並沒有讓桑傑嘉失去他日常活潑的天性，他總是從容瀟灑而心無芥蒂，與我們相處非常融洽。不過有一件事，使我改變了對他的最初印象。

在一個一起喝茶的黃昏，在路邊茶座的昏黃燈光下，桑傑嘉告訴我，他雖然有一個在上學的女朋友，也準備結婚，但是他「不準備要小孩」。女友未必同意，但是他說，他現在仍然不會改變這個決定。我吃驚地問他為什麼。他說：做一個流亡藏人太苦了，我們失去了真正的家園。如果解決不了西藏問題，為什麼要製造一個注定要受苦的生命？更何況，這個生命一出生就是一個流亡者！

「我們這一代一定要解決西藏問題，不能再把痛苦留給下一代藏人。」他說。

桑傑嘉很難容忍任何對藏人的歧視。哪怕是友好的漢人朋友下意識暴露的輕視，他也無法容忍。而這種歧視，由於大漢族主義的根深蒂固，在同情藏人的漢人中在所難免。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境遇和經驗，讓桑傑嘉對這個世界感到格外的失望？

我驚訝地望著面前的桑傑嘉，他那一對稚氣十足的虎牙再也不能裝點他沉鬱的面容，我感覺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單巴次仁有孩子嗎？」月色迷離，街燈搖曳。沉默中，我差點將這

心裏冒出的問題問出來。單巴後來結婚了嗎？我突然想起單巴。飄忽不定的夏日街燈下，單巴的眼神也經常秋意蒼涼嗎？

是的，我又一次在藏人身上發現了單巴的影子。

在三年尋找學醫資助失敗之後，單巴跟桑傑嘉一樣，進入流亡政府部門工作。——單巴的最後一位親人，他的父親沒有撇下11歲的單巴追隨單巴的兩個妹妹和母親而去。他挺住了。在被抬到醫院一周之後，他回到形單影隻的單巴身邊。隨後不久，他再度聽說孩子要被送到別處去托養。在西藏，是因為聽到這樣的消息，他們一家五口才決定逃亡的。幾個月之後在印度，再次聽到這樣的消息，這個五口之家只剩下父親和單巴了。這次，單巴絕不願意離開父親，他已經不能再經受任何分離。但是單巴的父親決意讓單巴前往。這次是去達蘭薩拉，他們的達賴喇嘛居住的地方，托養所的任務就是照顧在築路勞役中失去雙親的孤兒。自從踏上逃亡征途，單巴生命中的一切一直在不斷地遺失：家、妹妹、然後是另一個妹妹，然後是媽媽。就像自己的軀體，一部分一部分地廢去。這一次的被迫別離，是可憐的單巴最後一次也是至關重要的別離。單巴沒有辜負父親的期待。他此後中學、高中、大學一路保持學習成績優異。

單巴的民族意識卻是在異族中間形成的。他的為西藏而生活的意志，更是在異族的歧視和輕蔑中練就的。學校裏那些好奇的疑問：你的父母在那裏？他們是做什麼的？你的兄弟姐妹都是誰等等都被單巴澆築進了他的西藏版圖的磚牆。

「我們是難民，我們沒有祖國」，那些對他們的來歷和身份一無所知的提問，是他心中的祖國的邊境線。他在邊境線設卡，用自己一流的學業成績在他的邊卡插上西藏的雪山獅子旗。

在單巴轉到噶倫堡蘭姆博士創辦的教會學校後，他被歧視的憤怒變成了力爭上游的動力，在那裏，在他的西藏邊卡上，除了雪山獅子旗，還有下列他在校五年期間的自我標識：他是幾乎所有運動隊的隊長、學校的學習監管、學生會副主席以及學生會主席。最後，單巴使被中國佔

領、殖民、摧殘、奴役、人種和文化滅絕的西藏，在這個學校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和尊敬：單巴的名字被刻在了這個學校的優秀學生紀念碑上。這個學校有史以來第一次，為一個畢業生召開表彰大會，這個畢業生就是西藏流亡學生，沒有祖國、沒有母親、沒有兄弟姐妹的單巴次仁。

單巴那時候才真正找見了自我，發現了幾乎失去一切的自己究竟是誰：「無論個人的損失還是國家的損失都十分慘重。我別無他途，只有重新將這一切建立起來。」

世界上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在一個城市裏，只有一個人是異族血統和人種的這類事情。這是單巴上大學的經歷。學業每上一個台階，學校每更換一次，單巴就必須重新壘築他的西藏版圖，用那些同樣的疑問、輕蔑和歧視。而在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所在地，單巴成了唯一的異族人。單巴是西藏第一代看見火車和地球儀，知道世上除了西藏、中國、和印度以及大海，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的西藏難民。強烈的反差和心理衝擊，迄今為止，不知道除了西藏人，還有哪個民族，能夠以個人之力承受並且挺住。孤單已如單巴在學院食堂的一日三餐，不喜歡也得吞下去。但是譏笑、嘲諷、歧視和騷擾如影隨形，他難以為繼。欺生是世上一切物種的天性，單巴如何以一己之力，抗拒物種天性？

不到一周，單巴就考慮退學。

考慮之後，單巴作出的卻是另一個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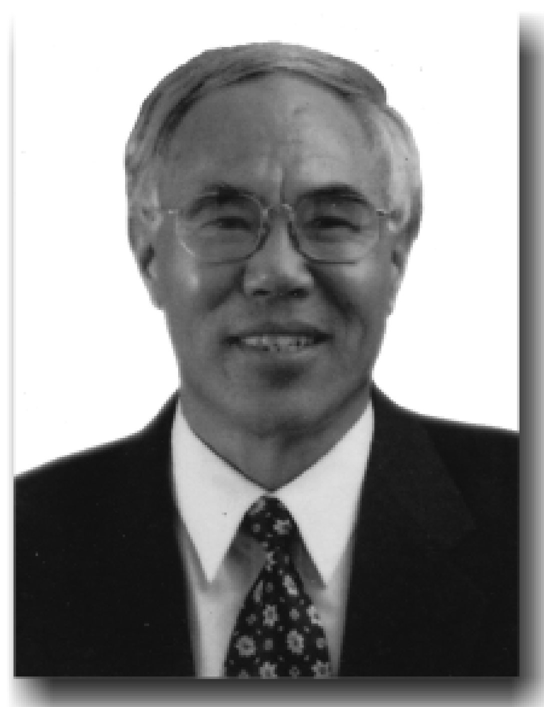
他徑直走進校長辦公室，要求對學院全體教師和學生發言。

達賴喇嘛曾根據他59年流亡前後在印度的經歷回憶說，儘管尼赫魯先生最初不同意他流亡印度，也不支持他的任何避難主張，但是從未阻止他自由地思考和向世界發表自己的言論。達賴喇嘛說，這使他體會到了印度的民主作風。確實如此。排外是一切人類的天性，但是民主體制的特點是包容。這樣的體制，可以克服或削弱很多天性中的弱點，而將人類的良知發揚光大。單巴，一個初來乍到的普通學生，這個城市，這個學院中唯一的外國人，而且是失去祖國的、寄人籬下的流亡者，獲得了向全校師生發表講話的機會。

幾天之後，他走上了空無一人的講台，面對整個座無虛席的禮堂。儘管心理準備充分，黑壓壓的觀眾仍然令他緊張。

單巴不是要向全校宣戰。作為天性溫厚、沉默而善良的藏人，儘管歷經磨難，國破人亡，他對人類的文明和良知抱有與生俱來的的信任，這一次，他不再在心中壘築西藏版圖，不再在心中的版圖設置邊防線，他要把西藏版圖灌入全校師生心中，要在他們的心中插上雪山獅子旗。

緊張中，他用自己事先準備的講稿照本宣科，開始描述西藏的歷史。但是當念到1959年拉薩起義以及難民逃亡時，他發現自己脫離了講稿，直面台下觀眾，開始講述自己10歲那一年的經歷……。就這樣，單巴用事實真相和善意的努力，勝過了人類狹隘的種群意識，把嘲笑譏諷和冷漠歧視排出了他生存的那個空間，讓印度的普通人向西藏伸出了同情和理解的手臂。


現在的單巴次仁，是西藏流亡政府駐新德里辦事處的代表。(桑傑嘉提供)

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連續三年找不到資助學醫，單巴回到藏人流亡社區，自願到難民營辦公室兼職。一個偶爾的機會被流亡政府發現，遂進入「新聞宣傳局」秘書處工作。 那正是目前桑傑嘉工作的部門，信息部的前身。單巴為此來到了達蘭

薩拉。那時侯的達蘭薩拉尚未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而流亡政府則是傳統西藏噶丹頗章宗教政權和新生民主政治的混合體。財力極為薄弱，制度尚未健全，一切都讓單巴吃驚不已：政府機關使用的電話線亂七八糟、聲音根本聽不清；打字機破舊不堪，打字不靈光；山坡上工作人員生活區異常擁擠，住房老化的牆體上，舊報紙、碎泥土和罐頭錫皮如雨點般剝落到床上；而他那帆布床，躺下去就陷到混凝土地面……。

跟桑傑嘉目前的工作性質大同小異，單巴在新聞局工作，除了收聽拉薩廣播，回答世界各地對流亡政府的提問，同時簡報、摘要政治、科技、文化發展情況，每天與文字打交道。

西藏流亡歷史蹣跚踉蹌五十年，流亡政府和社區已經相當健全，可是桑傑嘉一如剛從孤獨、苦悶中站起來的當年的單巴，內心家國一體的痛楚依舊，只不過在平時，他總是讓自己沉浸在繁忙的工作和天然的愉悅中。連流亡的藏人學校那些十幾歲少女，都有這種心理特徵。桑傑嘉就是那個發奮讀書卻因資金匱乏無法深造的單巴，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能夠忍受自己的貧窮，不能容忍對藏人的歧視和嘲諷。

桑傑嘉更令我感嘆的，是他對達賴喇嘛的深厚情感。

覲見達賴喇嘛那天，我們步行前往。抄近路，穿越一道門，走過一片私人或流亡政府宅區。桑傑嘉就在這時不見了。達賴喇嘛辦公室的才嘉是尊者的隨身翻譯，今天桑傑嘉沒有工作任務。我猜想他今日必定要給自己放一天假了。不料走到達賴喇嘛官邸檢查登記站，他又出現了，換了裝：穿上了鑲有絲綢寬領邊的咖啡色新藏袍，腰間結結實實繫上了紅色的圍帶，腳下登了一雙黑色皮鞋擦得很亮。平時不修邊幅的桑傑嘉，今日穿了最好的衣服。但事實是，他換裝之前，沒有人通知說，作為一個藏人，他可以與專程來訪的漢人一起去覲見他們日日供奉在心的活著的觀世音菩薩。他穿的藏服可能是臨時借來的，也可能是日前準備好的。經過與門衛甚至辦公室人員的一番口舌，他終于被應允與我們一起覲見。消息傳來，他顯然十分激動。我們坐在來客登記室填表登記、等候

安檢，他陷于緊張而十分沉默。後來當我們魚貫而入，一一與尊者握手，我注意到，他躬身走進尊者會客室，彎腰九十度合十祝福，再躬身退著離開，隱身於距達賴喇嘛最遠的沙發背後的角落。他的動作舉止一如面對聖威無比的活佛。整個會談接近兩個小時，他像一個謙卑的影子一言不發。我們自然而然把他忘記了。

就在談話結束，達賴喇嘛為我等一一簽字時，我突然發現一束目光，悲苦而專注，正從沙發背後越過前排座席和寬闊的空間，直射達賴喇嘛。

這是桑傑嘉！

他的眼睛像源遠流長的兩條河流，如飢似渴奔湧到尊者面前，即刻戛然而止，全神貫注，凝然不動。那是一個透明的橫截面，伏在他荒原一般蒼涼的面頰上，裏面凝固的微微顫動的淚流，稍微一碰，就會決堤而出。他整個人的坐姿一如羅丹的「思想者」雕像，身子微微躬屈向前，只是引頸舉頭，似乎在傾力托舉那過于沉重的目光。

我心裏一驚，感到心中有什麼東西被突然觸動。我確信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目光。

桑傑嘉沒有帶念珠請尊者加持，沒有買名片請尊者簽字，甚至沒有主動走上前來跟我們一起與達賴喇嘛合影。當我站在人群裏呼喚他的名字時，他看上去很猶豫，直到達賴喇嘛向他伸手招呼，他才快步走來，站在了最後一排。在道別的時刻，他始終站在一旁，保持躬腰的姿勢，默默地、全神貫注於尊者。他始終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

當我們步出會客室，在走廊裏收拾行裝，並為今日覲見的圓滿感謝江琳時，達賴喇嘛握著桑傑嘉的手，說了幾句藏語。然後他雙手合十，倒步躬身退出客廳，一直退到門外。當他轉過身來，我注意到他的臉上佈滿了飛動的神采、幸福的喜悅。

事後我好奇地問他：「尊者都跟你說什麼了？」

他回答說：尊者叫我要好好為你們做翻譯，把真相告訴你們。



桑傑嘉躬身退出達賴喇嘛會客廳，轉過身來，臉上佈滿幸福的喜悅。(北明攝於2009年6月13日達蘭薩拉)

再後來我又問，「會談結束前，我發現你特別悲傷，那是為什麼？」他呻吟了片刻，回答了四個字。

那四個字，比一切任何直接的描述都能夠讓我頓悟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愛和崇仰無與倫比。

那四個字極為簡單，桑傑嘉說：

「他太累了」。

會談期間，我確實注意到達賴喇嘛有兩次用手捂住嘴打哈欠，還有一次，乾脆把疲倦的哈欠忍回去了。年過七旬有半，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做佛教功課。下午為我們延長的會談時間，本來是他的午休時間，他已經連續工作了將近12小時。這個事實在我看來尚屬正常，對於藏人，卻

導致難以克制的憂心和焦慮。針對這種特殊的感情，桑傑嘉回答我說，達賴喇嘛在他心中，就像是自己的父親。

父親為家族免於滅絕而奔走世界50載，從少年青絲到耄耋白髮，把家族的悲慘命運昭示給世界，把家族優秀的傳統播撒到世界，把世界的一切獎賞、支援、贊助回饋給家族。父親是流亡西藏的締造者。父子之情有血緣維繫，加上達賴喇嘛對世界接納西藏的的絕無僅有的貢獻，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可是遠遠不夠。兒女是可以對父親撒歡撒嬌的，藏人對達賴喇嘛卻見之彎腰低首，退之躬身倒步，拜時五體投地，言時虔敬恭順，他們對他的感情，在父子之愛這一層之上還有更多。

桑傑嘉是長大的單巴。單巴小時候在托養所見過達賴喇嘛三次。第三次是和其他一百多名孩去第一所流亡學校就讀之前，他們步行去見達賴喇嘛。當坐在門廊上的尊者親切地囑告他們要努力學習，以便未來能為沒有獲得學習機會的人們服務之後，單巴按照事先的準備領誦《十四世達賴喇嘛長壽詞》。但是他緊張得渾身發抖，十一節詞被他整段整段地忘記了。但是關鍵詞語他沒有忘記：「雪域的保護神丹增嘉措，佛祖佑護您。祝您長生萬壽，祝您如願以償」。[1]

達賴喇嘛之於藏人也許像是上帝之於先知，帝王之於子民。擁有這種情感，需要心中擁有信仰，體驗這種情感，則需要心中擁有神聖的能力。世上舉凡虔誠的情感都應當獲得尊重，即便既無信仰，亦無神聖，也應當以起碼的理性，予以尊重和理解。

我從桑傑嘉那憂慮悲苦的眼神中，讀出一種自己不能完全了解的神秘信息，並窺見一個自己不能進入的神秘世界。唯其如此，深受觸動。我猜想他肯定渴望擁有來自這位尊者的信物。

---

[1] 本章截稿時，有了單巴次人的下落。桑傑嘉從達蘭薩拉回話：單巴次仁他現在是西藏流亡政府駐新德里辦事處的代表。他後來娶了達賴喇嘛的妹妹做妻子。

於是，在一個小型答謝宴席上，一串達賴喇嘛加持過的念珠，一幀達賴喇嘛親筆簽名的圖片，代表我們全體贈與桑傑嘉。桑傑嘉接受我們的禮物不推不讓，不卑不亢。一神之下，漢藏無別，眾生平等。不過席間他又恢復了活潑的笑意。隔天我們就要啟程下山，大家說起了感謝的話，他一一笑納。略微的羞澀中，他把一席答謝餐宴變得跟他的語言一樣平實質樸，不過只是在這即將離去的前夕，我才確認他不只是一個說漢語的西藏問題專家，更是一個說漢語的雪域藏人。他的生命，不僅因為西藏的苦難而厚重，而且因為心中的神聖而深沉。

・西藏兒童村

在後藏，我祈願吉祥，
為了仙境的羊卓雍湖，
一部浪花寫就的經書，
每一個文字都來自上古，
每一夕潮湧都是祝福。

在後藏，我祈願吉祥，
為了金盆玉壁的江孜平原，
一個不知屈服的誓言，
空氣是無形的偉岸，
宗山城堡是指天的悲願。
……

——〈在後藏〉，摘自楊志軍《敲響人頭鼓》

李江琳在西藏兒童村收養了的一個藏族兒童做兒子。辦公室人員把這孩子招到辦公室與他的養母和我們相見，我們看見一位藏族青年婦女領進來一個怯生生的小男孩，叫扎西頓珠(Tashi Shundup)。他靦腆地、甚至有點勉強地、露了露自己的牙齒算是與我們打了招呼，但是無論如何不肯開口。

李江琳情緒正好相反，她樂不可支，不由分說，摟住這孩子衝我們嚷：「看！看！我兒子！很英俊是不是？」然後撫定她的西藏兒子噓寒問暖，親了又親，盛情如火，全然不管孩子受寵若驚，手足無措。我們辦事麻利、章法嚴格的領隊一秒鐘之內就變成一個驕傲的母親了。突然她「呀」了一聲，我們所有人都被嚇了一跳。緊接著聽見她大叫：



李江琳和他的西藏養子扎西頓珠。（易歲攝於2009年6月15日達蘭薩拉西藏兒童村）

「我忘帶上禮物了！」她萬里迢迢飛躍太平洋，從美國帶給這給孩子的禮物，今日竟然忘了帶上車。不過細心而通曉西藏事務的一平帶上了給所有孩子們的糖果點心及其他禮物。而江琳將在此地逗留半年，有的是機會從住所把她專門給他兒子的禮物送來。

扎西頓珠才七歲。

單巴次仁被迫離開父親轉往幼托園的時候，比扎西大四歲。

幼托園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拯救夭折中的西藏流亡兒童。流亡難民在從難民營遷往拉達克工地的途中，受阻於大雪，孩子們連續夭折。期間，51名兒童被送往達蘭薩拉，安置在政府工作人員簡陋的窩棚裏。流亡西藏是一個大家庭，所有人必須手牽手，共度每一個黑夜，共望每一個黎明。可是大人們忙著上班，孩子們無人照看。達賴喇嘛遷居達蘭薩拉不到三周，指示他的姐姐次仁卓瑪創辦了這個幼托園。幼托園有一個美麗的名字，譯成中文是「康寧別墅」。康寧別墅寄託著藏人對自己後代的期待和祝福。

康寧別墅的孩子們來自印度各公路營，均是西藏流亡者丟在世間的孤兒或半孤兒。他們抵達後遠離了死神，卻仍舊帶著非人生活的後遺症：患有各類異族傳染而來的疾病或其他疾病，如肺結核、感冒、疥瘡直至嚴重營養不良。

單巴在那裏開始擁有較為正常的兒童生活，他一去就洗澡、理髮、清除身上的寄生蟲。發了西裝、褲子和襯衣，他變成一個乾乾淨淨的小男孩。白天，他跟其他乾乾淨淨的孩子一樣，用打製的碗排隊領飯，吃印度的大米和扁豆。夜晚，他與三十個同伴在別墅的一個房間打地鋪，地上鋪著個人的毯子。每天上午先祈禱，再做操，然後上課，同時學習母語和英文。下午則自由活動。從早到晚，所有作息時間都是集體活動。條件有限，病號也無法隔離另行管理。

單巴的痢疾很快痊癒，但是他的心無法痊癒。除了遵守作息起居和學習日程，只要可以自己支配時間，他就避免參加任何集體活動。
下午孩子們玩耍，從不見他的身影。這個十一歲的孩子沉浸在記憶猶



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後與西藏兒童合影。(貢噶扎西提供)

新的家庭災難中，無法自拔，他患了嚴重的幽閉症和憂鬱症。他的眼神，比扎西頓珠的更憂鬱，沒有一個人能夠讓他露出微笑，哪怕是扎西頓珠那樣勉強的微笑。更沒有一個人能預見，單巴將成長為一個集體生活的表率，一個優秀的求知者，一個敢於在大禮堂講台上對異族師生發表講話的新生，一個帶領學校球隊在足球場上衝鋒的隊長，一個眾眾望所歸的學生會主席。

貧病交加，活下來是底線。無人照顧單巴的心靈，那是十一歲的荒野，完全沒有春天的氣息。如果有心理學家研究一下單巴康復的原因，一定會增加一個罕見的病例：單巴不是在寬慰、愛撫和治療中康復的。具備了幼托園的大前提之後，他竟是在更加擁擠的現實空間裏，被擠開了心靈的窗戶——那原先容納三十人的寢室，開始容納六十人，九十人，最後一百二十人的時候，單巴次仁再也沒有獨處的機會了，他即便不出去玩耍，也無法獨自呆在寢室，他必須學習與其他同伴交往，必須

把思緒和心情放回到現實中。

終於有一個下午，孩子們踢足球的時候，在局外旁觀的單巴，注意到那足球滾到了自己的腳下。他不假思索，將那個足球一腳踢了回去。就在這一刻，他的幽閉症和憂鬱症同時開始撤退。那是單巴人生旅途上標誌性的一腳，是戰勝苦難的第一個里程碑。不久，他就完全認同了這個集體，在心理上真正成為幼托園的一員。

兒童村有操場，一大群西藏兒童在場上大呼小叫，來回奔跑，踢的仍是足球；有飯廳，孩子們分組席地而坐，銳利嘹亮的童聲合唱直搗耳膜，唱的是他們熟悉的高原歌曲；有寢室，空間已不似當年那麼窄小，不過所有牆邊都靠著上下床，仍然人滿為患。在操場、飯廳和寢室駐足，我努力想像單巴初來乍到的情形，想像他站在球場邊、坐在合唱隊、擠在寢室裏的感受。我想分辨，在這遠離父母的幼托園，究竟是那一腳足球，還是一種藏人患難之中相濡以沫的氣氛，最終打開了單巴的心，彌合了他的傷痛？

遠離父母的扎西頓珠比單巴幸運，在兒童村，他有一個姐姐相伴。他們雙雙被親生父母秘密送到此地時間不長，父母希望他們在這裏接受正常的教育，了解自己民族歷史、宗教、文化，保持自己民族特徵，成為真正的西藏人。在辦公室寒暄片刻，扎西與我們一起回到他自己的宿舍。在那裏，看見了他的姐姐。一個臉上帶著明朗微笑的小女孩。扎西這時的表情放鬆了許多，對我們卻依然不苟言笑。

這裏的孩子每人每月全部生活開支是45美金，每天平均1.3美金，這是聯合國規定的貧困人口生活標準。就是說，一個人每天從自己的生活費中勻出1.3美金，可以養活一個流亡的西藏兒童。兒童村有關部門有這項認捐和認領西藏兒童的業務。每天1.3美金的月生活費中，包括每月發給孩子個人的零花錢，25盧比。「你用這錢做什麼呢？」我問扎西的姐姐。她回答我就像單巴次仁那一腳足球一樣不假思索：「我給我的媽媽爸爸打電話」。她說：大部分她的夥伴都用這錢給遠在雪山另一

邊的父母打電話。

喜馬拉雅山上那條逃亡的雪線，五十年來有始無終，綿延不絕。五十年後，流亡的西藏兒童們衣食住行條件稍有改善，但基本相似的命運沒有改變。失去家園，漂泊異鄉自古是成人的主題，兒童遠離父母流亡，等於失去生命的襁褓。扎西頓珠的眼神畏縮而膽怯，我看見後面隱藏著孤獨、驚懼和恐慌。半個世紀前，在雪山、密林和公路營留下流亡腳印的單巴次仁，作為先行者，在西藏兒童村留下了另一樣東西：他的影子。

但願打開單巴心靈的那隻足球，在藏人相濡以沫的傳統挾持下不斷飛動，撞開一個又一個逃亡孩子的心扉，射入自由歡樂的陽光。

下午與我們的領隊李江琳告別，這位一平稱為「奢侈的精神貴族」的女子，辭去了穩定應手的工作，卸下了美國大城市的盔甲，給自己限定六個月時間留在這裏，要完成收集西藏歷史資料的使命。相對於中國的精神死谷和道德荒漠，江琳在這座兩千米的山上找到了自己的家園。她的理由，也是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認同達蘭薩拉的理由。我與她擁抱告別，從她充滿信心的眼光裏，我感到她蓄勢待發多年的激情和理性，已經找到的最佳突破口。

被小商小販和行人車輛裝點得十分熱烈的達蘭薩拉街區，在陽光和高溫參與下顯得更加熱烈而擁擠。為我們送行的小麵包車如同在一根細長而曲折的腸子裏穿行，為了避免拖泥帶水，後視鏡都回放了。司機甚至不得不跳下車去，與對面和後面的司機一起，協調指揮過往車輛，疏通淤塞的道路。

飛起的熱浪和塵土捲入車窗，顛簸中下行的景色逐漸退為遠去的山巒和峰巔。這裏如今安扎著一個流亡的民族，他們沒有為自己建構水泥叢林，讓自己鑽進去變成燈紅酒綠之間的擺設，他們依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己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們把這裏變成了兩千五百年西藏文明的復興之地。

・無題

不要踏入歐洲王室，它對女人來說尤其危險。

——迪特里希・施萬尼茨
(Dietrich Schwanitz)

火車站。滿地塵埃上浮動著印度人流。與達蘭薩拉一樣，不斷有窮苦人乞討，只要小施同情，甚至流露憐憫的目光，就圍住不走，而且越來越多，堅定地尾隨你到任何地方。與達蘭薩拉一樣，乞丐中沒有藏人。

不敢戀戰，只能選擇盡快進站，以便擺脫尾巴。但是無人檢票，隨意進站，乞丐與旅人徹底平等。

山下高溫攝氏42度，人人汗流浹背。齊越、老朱、一平、易崴分頭去買水果。我看守我們的行李。

我即刻發現，除非擁有極大的耐力或乾脆做怒目金剛狀，不可能擺脫那些前來乞討的人群。

在山上，我們已經領教了印度乞討的職業水準。最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母親。她們用一個布兜，把嬰兒像挎籃子一樣挎在肋下。嬰兒在船型布袋裏曲蜷著身子，仰面朝天，陽光直射下，嬰兒通常閉著眼睛，口唇乾裂，看上去奄奄一息。母親就這樣展示她們的骨肉，攔截遊人，伸手乞討，經常在與遊人對視時，指指自己的孩子。沒有多少外地人能夠經受得住這樣的場景。

江琳某次的經歷是，當她掏錢給這樣的一位母親時，這母親示意要她進入路邊的商店，給她的孩子買牛奶。江琳進得店去，按乞討者的指點買下奶粉，那母親覺得不夠，又指點著讓江琳為她買下其他很多用

品。出乎意料的是，同一天，當江琳再次路過那裏時，這位乞討的母親再度出現，依然讓奄奄一息的嬰兒暴曬在陽光下。她糾纏住江琳，無論江琳如何解釋，她都不依不饒。所以這一次當這位母親再度攔住我們的去路時，江琳告訴我們，千萬別上當。

我甚至懷疑，這些被當作乞討道具的嬰兒是不是也可以在母親之間借用？

達蘭薩拉這樣的母親在特定的地點有很多，她們以最高效率賺取路人的同情，轉眼之間，再以最高效率瓦解她們賺得的同情。

當這位印度母親再度攔阻我們乞討時，江琳給我們講了她的故事。
(易崴攝於2009年6月11日達蘭薩拉)

此刻面對一堆行李我既無處可逃，又耐力不夠，怒目呵斥是個累人的事，不到火候，裝不出來。這樣的情況下看守行李，比大熱天步行十幾分鐘去買水果更艱難。

不過印度文化傳統並不指責乞討者，

反而把財富擁有勸授予不勞而獲的人。這是出於印度生命輪迴、財富輪轉的思想：

「神還沒有讓我們餓死，就連吃飽喝足的人，死亡也以各種樣子到來。慷慨者的財富永遠不會浪費，不施予者將找不到寬慰之物。……讓富者滿足貧困的哀嘆者，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財富輪流轉，正像不停轉動的車輪。蠢者不勞而獲食物，這樣的食物——說真的——將會把他毀掉。他不瞻仰可信賴的朋友，沒有人會愛他。無人與之分享食物者罪行很大。……」(《梨俱吠陀‧頌詩》)

乞討儼然成立，施捨是一種自救方式。《梨俱吠陀》的印度文意為「精神知識之歌」，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四書五經」，其中，一千多首「頌詩」與基督教《舊約》中的〈詩篇〉具有同等宗教與文化地位。這首題為〈慷慨〉的詩，為乞者張目，教導不施捨罪莫大焉。如此說來，財富可疑，不施捨可恥。乞討在印度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模式，與人之尊卑無關。

印度教之博大精深使無數東西方學者皓首窮經。不過我的淺顯問題是：如果神只愛靈魂，何必要創造世俗世界？如果神擯棄肉體，為何要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人類？如果現代化和物質財富是罪惡，為何要鼓勵人類誠實地勞動和創造？以健全的身心要求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所得，難道比不施捨更光榮嗎？

我的思想到這裏停止了。我承認，我不知道圍住我的乞丐們所詮釋的是印度教的深刻性還是它的世俗化。

終於，三路人馬陸續歸來。所有人手裏提的都是瓶裝水。水果呢？「沒有」。沒有賣水果的，只有賣水的。

我已經發現桑傑嘉對站內外的混亂、骯髒、貧窮、吵嚷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就如同我習慣於華盛頓市區稀少的行人、低矮的建築和朋友習慣於中國城市的高樓大廈和渾濁空氣。看著桑傑嘉的從容不迫，我意識到，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從印度這個「奇怪崛起」(英愛德華‧盧斯語)的國家，走入了同一個西藏。

乞丐們已失去耐心而退去。牛飲一頓之後，告別的時刻到來。桑傑嘉突然從包裹拿出一大疊哈達，微笑著一一為我們獻上，說這代表外交與新聞部，他差點忘了。我們在印度火車站臺的熱浪與安靜中，躬身接受外交與新聞部的謝意。他們用這種方式感謝我等一行到流亡藏區實地考察，尋求漢人政府否認存在的西藏問題的答案。

傍晚 7 點多，旅客列車終於進站。不是始發是路過。硬座車廂敞開的車窗裏，伸出很多黝黑的腦袋和手臂，一望可知裏面類似蒸籠。我們順長長的車體尋找應該上的車廂。

「B2！ B2！」沒有檢票員，我們只好見人就喊，拉著行李，匆匆奔走，一節節檢查哪裏是我們應該登上的踏梯。

但是整個列車沒有車牌，沒有標識，沒有任何可以辨認的記號，也無人理睬我們的呼叫。而且，問了幾次印度旅客，無人知道哪節車廂是「B2」。

車站上有軍人。軍人讓我們問警察。警察讓我們問列車工作人員。但是車站根本沒有工作人員。

擁擠中上下車的旅客大都找見了各自的去處，只剩幾分鐘就要開車了。我們慌不擇路，就近登車。反正無人檢票，先上去再說。老朱把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用上了——若不是他當機立斷打破陳規，我等可能就露宿車站了。

以後兩天，在新德里伊斯蘭古建築的遊覽訪問中，我等一行一再領略印度的貧窮、髒亂和乞丐文化。印度在社會各種國際評估中的指標都進展緩慢，印度著名的分析家尼南在描述這個特點時，形容印度是一個「1% 的國家」，在人口貧困指數下降率、識字人口上升率、人均壽命延長率等方面，均以百分之一的單位比率緩慢變化。另一位分析家邁隆・維納，在形容印度不會向中國那樣容易翻車的時候說：印度這輛卡車有 12 個輪子，扎破一兩個，照樣往前走。還必須記住，印度這個 1% 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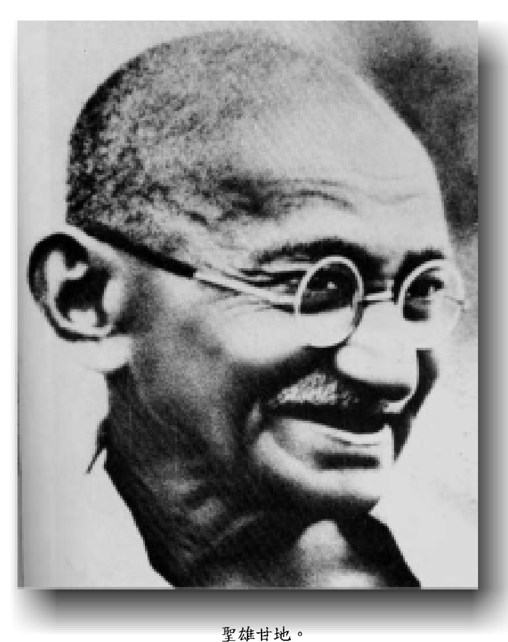
家、這輛 12 輪子的卡車，有 18 種官方語言、多種文字、林立的宗教派別，森嚴的種姓等級(參見[英]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印度那件掛在乞丐身上的破衣服，是所有第一腳踏上這片土地的人們第一眼所見。我仍然無法認同以祈禱替代勞動和坐等天上掉餡餅的功利主義「信仰」。但是我想，這輛卡車的 12 個輪子不可能都是這件衣服的碾軋者，而眾多教派中，哪個教派是它的裁縫？

不過這時我發現，我已經初具免疫力，能夠不以這個卡車上十二個輪子中的任何一個牽涉藏人，並能夠區分普通流亡藏人與本地平民之間在精神氣質、行為方式上的區別。這畢竟是印度不是西藏，總數不到10萬的藏人，在近 12 億印度人中，基本等于不存在。

・遺失的桂冠

「哦天」。

——甘地遺言


聖雄甘地。

只有兩個白天的時間在新德里逗留。縱有泰姬陵、穆爾王宮等諸多游覽地，我首選甘地陵。一平、易崴、齊越均被我說服。這不是游覽，是朝聖。

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二十世紀大行其道，引發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於人類歷史上弱肉強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義時期和世界大戰時代，他卻在那個黑暗時空裏，發明了人類最溫和的手段，解決時代賦予他的難題：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從帝國主義強權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國。他的遺產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稀世珍寶。為了實踐這種不合時宜的方式，他四次坐牢，一次抗議行動徒步行走過近400百公里，至少14次絕食，最長時間達 21 天。兩次大戰結束，他的祖國剛獲獨立不久，

1948年1月30日，他在激進主義分子的暗殺槍聲中倒下，那時他剛剛結束一次絕食行動，正前往祈禱會途中。

這個弱不禁風的印度人從人類黑暗、血腥、殘暴的淵藪中，向世界和造物證明，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自律的意志，有和平的能力，有理性精神，可以用自己的身軀阻擋自己的子彈，可以用自己的和平訴求制止自己的發動戰爭，用善意和愛戰勝自身的邪惡和殘暴。

在甘地身後，有一連串舉世矚目的追隨者，他們眾望所歸，相繼成為世界各民族堅守人類道德精神和文明理性的旗幟：北美的馬丁路・金、南非的圖圖和出獄之後的曼德拉、東南亞的昂山素姬、西藏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他們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唯獨甘地，上個世紀30年後期代和40年代後期五次獲得提名，三次進入候選名單，最終沒有獲得這項桂冠。

1948年甘地被刺，死于諾獎公佈兩天之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緊急討論過追認甘地獲獎的可能，後因違反規則而放棄。此獎那年空缺，委員會宣佈的原因是：「沒有合適的、活著的候選人」。

那年的那頂桂冠，被甘地帶走了。從他獻身民族和解的祭壇上帶走了。

斗轉星移，隨著納粹罪行、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隨著人類對自身殘暴陰暗特性的認知，甘地建立在良知和善意價值基礎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日益彰顯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世界各地人類在他身後不斷認同、接納、繼承他的遺產，就像在漆黑的森林裏不斷辨認、確證、踏上通往黎明的拯救之道。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沒有忘記他們當年遺失的這頂桂冠。甘地被刺半個世紀之後， 1999 年 12 月，這個獎項的官方網站破天荒發表委員會刊物的編輯奧義溫德・圖耐森(Øyvind Tønnesson) 撰寫的文章，〈聖雄甘地・遺失的桂冠〉(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對公眾社會解釋了當年甘地落選的種種原因，並對甘地的落選表達遺憾，意味深長。

事實上，甘地所面臨的環境比他的任何後繼者都複雜，尤其在二戰時期，他需要同時面對三重問題：在英國殖民主義現實中追求印度獨立、防止印度教與穆斯林的宗教流血衝突、在全球抗擊納粹戰爭中把握對英國——印度宗主國和二戰同盟國雙重身份的國家——的態度。

在如此複雜、相互牽連的局勢中，為追求印度的獨立自由，他本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家，但他不依靠當時國際間的交往方式追尋獨立，他拒絕了政治道路；他本可以成為印度說一不二的獨裁者，但是他拒絕使用強權，他棄絕了強權道路；他也可以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但是他背後沒有一個人道主義工作機構或慈善組織，也沒有財團、資金和任何執行機構，他甚至不是一個人權活動家。他只依仗祈願大會與他的追隨者會面，對他們發出號召。

甘地的精神遺產證明，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救世主，他是東方的聖賢，他的角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政治或宗教視野。甘地因此成為當時《時代周刊》推舉的影響人類歷史的風雲人物，緊隨愛因斯坦和羅斯福之後，排名第三。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改變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宇宙觀念；美國總統羅斯福動員美國參戰，勝利結束了全球戰端；而甘地，是有史以來人類以個人之力抗拒專制、拯救民權和爭取自由的象徵。

甘地的非暴力理想不僅獲得了印度民族主義者認同，也獲得了印度宗教信仰之外廣泛的尊敬，甚至將他送進監獄的英國法官也對他深懷敬意。

啟迪人們心中的良善之根，點燃它並使之發揚光大，是甘地領導印度最終戰勝大英帝國、實現獨立自主的原因。

人到新德里只訪泰姬陵不拜甘地陵，於我是不可思議的失誤。

甘地陵位於新德里東郊的木納河畔，是這位印度先賢 1948 年 1

月 30 日遇刺身亡後火化的地方。無論來自德里市區哪個方向，無論行囊裏裝了哪國文化背景，軀體裏裝了何等心情，即便你不了解這個人的經歷和歷史，你都會在接近甘地陵園時感受到優雅、整潔的淨身之妙，都會在陵園內接受寧靜、肅穆、聖潔的心靈洗禮。

為體驗一下舊時代的交通服務，我們分頭登上人力車。沒多久，兩輛人力車就相互走失在德里行人、牲畜、人力、機動車輛並行的大街上。我和齊越同車，無法判斷陵園確切位置所在，我們只好提前捨棄人力車服務，在烈日烤曬下舉著遮陽傘，徒步擇路，走走停停。終於滿懷燥熱與疲憊，抵達目的地。

入口在前方出現，通道與陵園格局對稱而均整，四周綠茵盎然，曠寥清寂。尚未走近，敏感的齊越已經發出一聲驚嘆。地偏而心遠，這一



坐落於新德里東郊的木納河畔的甘地陵祭壇。（易感攝於2009年6月18日新德里）

方靜土，與擾攘的德里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立即將我們沉入清涼、幽靜之中。

甘地陵的佈局全然不同於遍佈德里的中世紀伊斯蘭建築。如果說泰姬陵是人類恢宏和華麗的典範，是感性層面世俗器物的最高象徵，那麼甘地陵是人類簡潔和素雅的典範，是理性層面精神道德的象徵。

甘地陵由幾個部分組成。從中心向外依次是祭壇、草坪、長廊和外圍草坡。

祭壇是主體。黑白色調，嚴格對稱、簡潔典雅而莊重。一個方形的黑色大理石，高約一米長寬約三米，離地面半尺，平置於甘地倒下去的青色石板地面之上。正後方，一座燈柱立地而起，上端的燈罩裏燃著常年不息的火焰。正前方，一座小型青石祭台沉地而落，上面供著一個小型香爐。祭壇四圍是四座半人高的白色玉石矮牆。

玉石矮牆外圍，目力所及一概是綠色的草坪，點綴以佈局勻稱的低矮冠狀樹木(不知名)，草坪間有八條小徑，暖色石磚砌成，分別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蜿蜒而來，統統通往中央的祭壇。向八面延伸的草坪是祭壇的綠色肢體，暖色小徑是肢體上優雅的曲線。

草坪外圍是暖色石頭磚砌成的長廊。長廊環繞草坪一周，直跨陵園四座大門，入園的遊人可循廊繞行，觀看刻於牆上的文字，領教甘地精神遺產和生平事蹟，或可經草坪直奔祭壇膜拜。長廊封頂。頂部，生機盎然的綠色植物垂蓋著長廊的粉色磚牆，優雅秀美，一如陵園主體的溫馨披肩。長廊上端，是遊人另一道祭行通道。環壇繞行，居高臨下，祭壇、草坪和整個陵園盡收眼底，可以直接領略陵園簡潔、樸素、莊嚴的風格。

甘地說，「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息」。甘地不屑於服飾，只穿一道纏腰布。甘地親近自然萬物，拒絕人類醫藥、並禁肉食、遠色慾。甘地一生奉行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毫無疑問，這座陵園的風格是甘地意志的象徵。

這樣的場所，心不可能不為之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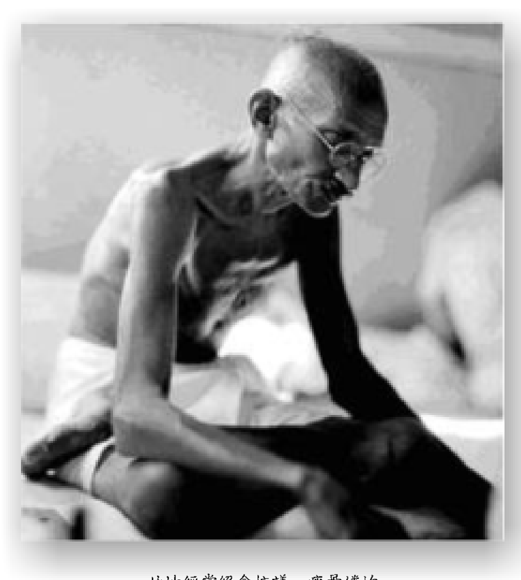
按照一般概念，甘地的祭壇簡單到可稱為「無字壇」：沒有死者姓名，沒有生卒年月，沒有死亡原因，沒有墓誌銘。

雖然一無甘地在世任何信息，墓碑正前方卻刻有銘文，以金色不銹鋼嵌在黑色大理石祭壇的正面。文是印度文，字是兩個字，沒有標點：

「Hç Ram」。

英文可譯為「Oh God」(「哦神」)，中文可譯為「哦天」。

這是甘地被刺離世臨終前，望著兇手發出的話語。這兩個字如詩如咒，終結了甘地艱難孤獨的一生，凝聚了他生活的野蠻時代人類悲情，成為甘地留給人類的深奧的信息和神秘的告白。



甘地經常絕食抗議，瘦骨嶙峋。

1947年8月14日子夜，印度宣佈獨立，狂歡的印度頓成不夜之國。為此一歷史性時刻竭誠盡力的甘地卻沒有出現在慶典上。這位年屆八旬的耄耋老者，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裏一如既往地紡紗織布。

深邃的星空籠罩著他坐下的席子，還有他的身軀，那席子是椰子樹葉編織而成，他的身軀瘦骨嶙峋。

紡車搖曳，吱吱扭扭，重複吟告著只有漫漫長夜能聽懂的悲憫和憂傷。獨對巴基斯坦的分離和暴力前景，淚水從甘地瘦窄的面頰垂落。他喃喃有聲，為失敗祈

禱。聆聽他的，仍然是那本翻舊了的《薄伽梵歌》，陪伴他的，仍然只有他那副老花眼鏡。

此後他拖著羸弱之軀走訪爭端地區，堅持對巴基斯坦實行人道關注。他絕望地表示：如果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不能建立和平，他不希望繼續活下去。如同符咒，此語一出，他被印度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刺殺了。

倒下去那一刻，他努力抬起頭，望著兇手長嘆一聲「哦天」。那不啻為他畢生祈願和平的結束語。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古今中外幾乎所有著名人物，如果有墓，必是碑座豎立。但甘地的墓是臥式的。卻又不盡然同於躺臥地面的臥碑，而是整體托出地面，呈然平現。其狀恰如一個供奉祭品的祭壇。

……是的，憑視覺和直覺，我已將甘地陵的主體部分認同為「祭壇」了。壇，作為供奉祭品的所在，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蘊含宗教意味。甘地陵的主體設計為一個芳草地中的祭壇：祭壇低矮，無需仰視，平視都不成，只能俯視。若沿圍牆頂端繞行，整個陵園更在俯瞰中盡收眼底。這祭壇是甘地謙卑與和平人格的象徵。此外，這祭壇置於甘地屍體火化的位置，等於對他一生自我祭獻的追認。所以，這祭壇不僅是甘地謙卑與和平的人格象徵，更是甘地犧牲與奉獻精神的象徵。而那一聲臨終的驚嘆「哦天」，發自心魂，簡潔、天成、深刻，寓意無限，刻在他的祭壇正立面，是他一生思想和情感的神來之筆。

在長廊出入口處的牆壁上，刻著聖雄甘地早年對人類社會罪惡的經典描述。這些罪惡至今是人類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無法治愈的癌腫：

無原則的政治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不勞而獲的財富 (Wealth without work)；
無良知的享樂 (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無品行的知識 (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無道德的商業 (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
無人性的科學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
無祭獻的敬拜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甘地對人類罪性和社會黑暗的認知如此深入，他的智慧並不比任何一個政治家或哲人淺，可是人們究竟了解甘地有多深？

相對於那些堅持不懈地提名甘地獲獎的人們，愛因斯坦早在1931年那個漆黑年代的前夜，就發現了甘地的非同尋常。甘地為抗議英國鹽稅而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步行到海的行動。這一行動取得了勝利。幾個月後的9月27日，愛因斯坦托甘地的友人給從未謀面的甘地寫了一封信，稱他為「尊敬的甘地先生」，並在這一稱呼之後，加了一個感嘆號！接下來，他在正文中表達了對甘地的欽佩：

「您的努力，表達了非暴力成功的可能、甚至與那些沒有放棄使用暴力手段的人合作之成功的可能。我們希望您的榜樣可以遠播到您的國度之外，將有助於建立一種獲得普遍尊重的國際性權威，並以此作出決斷，並取代戰爭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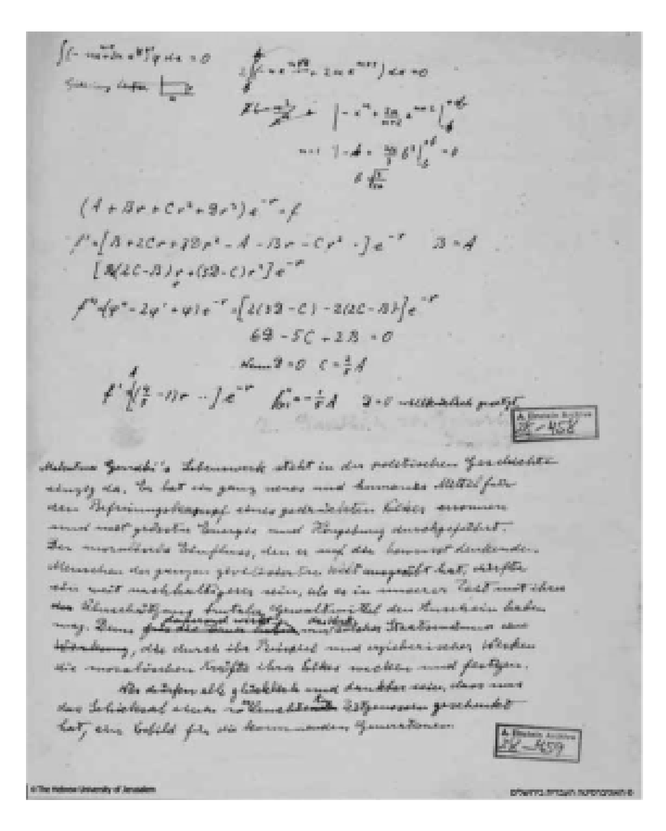
愛因斯坦並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夠與甘地見面。

20天之後，人在倫敦的甘地回覆愛因斯坦，稱愛因斯坦為「親愛的朋友」。他說：「我欣喜地接到您通過桑達拉姆送來的美妙信函。我的工作獲得您的贊同是我巨大的寬慰。我確實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在印度我的修行處會面。」

甘地去世多年之後，關於愛因斯坦對甘地的評論，人們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儲藏的愛因斯坦檔案裏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在一張愛因斯坦的數學手稿的下半頁，愛因斯坦用德文下寫了他對甘地的評價。這一次，愛因斯坦借泰戈爾對甘地的稱呼，稱甘地為「聖雄」(Mahatma)：

「聖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是罕見的。他發明了一種嶄新的、仁慈的方式來消解被壓迫國家的戰爭，並以極大的能量和熱情實踐它。

而這一對於整個文明世界人類自覺意識的道德感召力，將可能比我們這個高估野蠻暴力的時代所看到的要更加持久。……」



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愛因斯坦檔案裏發現的愛因斯坦一頁數學手稿。下半頁是愛因斯坦手書的對甘地的評價。(北明提供，轉自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網站)

愛因斯坦在一次英文演說中還表示：「我相信甘地的見解對於所有我們時代的所有政治家都深具啟迪性。我們應當以甘地的精神努力做事：為不以暴力實現我們的理想而奮鬥，此外，不參與你確認的任何邪惡的事物。」

作為人類的良知和國際性知識分子，愛因斯坦在上世紀人類所有重大國際事務上，始終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早在第三帝國建立之初、二戰爆發前十二年，愛因斯坦就劈開德國人的民族主義的狂浪，洞悉「希特勒正在通過戰爭達到目的」。文明世界對德國現代野蠻人的反應相當消極，愛因斯坦對此發出嘆息。但是在此之前，愛因斯坦就在印度的貧民窟裏，在印度人民對英帝國主義的不合作運動中，發現了甘地非凡的存在。他對甘地的高度評價在西方世界無出其右。不過，囿於國際局勢的沉重壓力和扭轉危局的需要，愛因斯坦眼睛裏，甘地的非暴力只是民權運動的一種手段和一種政治鬥爭工具。然而，對甘地深有研究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編輯奧義溫德・圖耐森則正確地認為：「當他在印度的眾多民族主義追隨者將非暴力用于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主要策略和政治手段



優雅、簡潔、肅穆的甘地陵。（易歲攝於2009年6月18日新德里）

時，甘地的非暴力是他的原則和理想。」[1]

得甘地精神真傳的除了印度本土文學巨匠泰戈爾，就是本世紀的東方藏人，十四世達賴喇嘛。

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頂長廊也是這座陵園的圍牆。圍牆之外，是更為寬闊的如茵草坡。達賴喇嘛曾經站在這裡，面對甘地祭壇，接受甘地偉大靈魂的感召，並在那裡發願：要終生奉行非暴力原則，為西藏爭取公義與和平。

那年是 1956 年。達賴喇嘛 21 歲。他首次訪問印度，抵達後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園。

1950 年，中國軍隊入侵西藏。中國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氣宣佈要「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因為這些帝國主義勢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這是中國中央政府擬定、藏人被迫簽署的《十七條協議》中的內容。而當時的西藏只有六名歐洲「帝國主義分子」，全部是戰爭期間從印度英國俘虜營裏逃出來的難民：一個英國傳教士、兩個英國籍無線發報員，還有兩個奧地利人和一個白俄。當達賴喇嘛首次從北京的廣播中聽到他們必須簽署的《十七條協議》時，他痛苦地回憶起一個事實：「自從1912年驅逐最後一批中國軍隊之後，西藏根本就沒有任何外國勢力了。」[2]由於藏人的超現實主義價值觀和對現世權力的淡漠，也因為西藏總共只有八千五百人的官兵，不過是用來阻擋旅行者非法入境並兼任警察職能的，藏人對入侵抱著痛苦的態度，除了少數地區發生抵抗，並未真正起而反抗。宗教是藏人的生命線，只要能在寺廟裏供奉他們的神祇，這個民族可以忍受各種苦難。

相對於大軍入侵，藏人真正的「奴役和痛苦的深淵」，始於其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達賴喇嘛回憶說：

---

[1] “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 1998-2000,1 December 1999 。

[2] 達賴喇嘛回憶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電子版。丁一夫譯。

「中共宣稱他們是來保護人民的，並且許諾人民宗教自由。然而同時卻開始系統性地壓制、摧殘宗教生活」，「並且要把西藏改造成共產主義社會」。

藏人先在軍隊佔領下退守精神家園，後再在七千座寺廟廢墟上，失去精神家園。他們走投無路。1950年中共軍隊入侵西藏，遲至9年之後，達賴喇嘛才離開流亡印度，大批藏人才開始出逃。而大批藏人並非直接追隨達賴喇嘛出逃的——雖然國際媒體曾疾風暴雨般報道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但一切消息都被中共封鎖了。大部分藏人如單巴一家那樣，離開家鄉是出於生活走投無路，並不知道他們的達賴喇嘛已經人在印度。如果知道，出逃的就不只十萬了。有見識的西藏問題學者、專家和分析家認定：西藏與中國真正離心離德，始於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這個不能須臾離開信仰的民族被剝奪了信仰權利。

早在軍隊入侵之前，西藏就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拋棄了。面對西藏國民大會發出的緊急求援呼籲，英國表示愛莫能助，美國更進一步，拒絕接待西藏求援代表團，印度政府則建議西藏放棄抵抗。最後最沉重的打擊來自聯合國，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作出決定，對西藏問題不予考慮。

西藏走投無路。「藏東的人民正被逼入野蠻境地。中藏的人民越來越決心訴諸暴力。」達賴喇嘛回憶說：「到目前為止，我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一無所獲。對於負責任的政府而言，籌備委員會不過是個笑話。我看不出我的努力未來會有成功的希望。」

作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他面臨一個巨大的抉擇：要麼支持藏人的暴力反抗，領導藏人爭取公義；要麼反對藏人暴力行為，失去藏人對他作為世俗領袖的信賴。達賴喇嘛對此後果看得十分清楚：

「我知道，中國人正在試圖削弱我的政治權力，而就我反對人民的暴力本能這點而言，我又是在幫助中國人摧毀人民對我的信任。」達賴喇

嘛在不長的陳述中，將這種感覺陳述了兩次：

「更糟糕的是，我感到我正在失去對自己人民的控制。 」

「 我感覺到，我將無法長久制止他們了。」

達賴喇嘛寧肯失去人民對他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任，也要堅持非暴力的抗爭：

「暴力反抗不僅不實際，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是唯一的道德途徑。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深刻信仰，同時很明顯，也符合佛陀的教義。作為西藏的宗教領袖，我被約束著，必須堅守這一點。我們或許將會遭受侮辱，在一段時期裏，大多數我們務必珍視的遺產或許將會喪失殆盡，倘若如此，忍辱必定是我們的命運。對這點我毫不懷疑。」

守死善道，忍辱負重，不計成敗，躬行不餒，寵辱不驚。這不是政治家的智慧，這卻是人類的高貴精神所在。這是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精神領袖的本質特徵之一，這也是藏人可以奴役，不可征服的理由。這是生命值得讚美的意義所在。就在達賴喇嘛準備帶領世界的棄兒，藏人踏上自我救贖之路的時候，他領受天意一般，接到了印度宗教界的邀請，站在了甘地祭壇的草坪上。那是他生平首次踏上印度土地，那也是釋迦牟尼兩千五百年的誕辰日前夕。在人類於黑暗中祈求和平、祭獻自身的聖壇前，他與另一個偉大的靈魂溝通：

「長滿綠草的斜坡傾向亞木納河。我站在草地上祈禱，心裏深深感動。我感到我正面對一個高貴的靈魂，一位生前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的靈魂。這個人致力於保存印度與人類的精神，至死方休。這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和平與人類和諧相處的真正信仰者。我站在那裏時，心裏想著，假如聖雄活著，他將會給我什麼樣的智慧忠告。我堅信他會將自己的全部精神與人格投入到為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和平運動去。

我的內心湧動著極其強烈的願望，真希望今生今世有幸與他相會。我站在這裏，感到與他十分接近。我感到他會始終告誡我堅守和平之路。對於他宣揚和實行的非暴力思想，過去和現在我都會堅定不移地信仰。此刻，我的決心更加堅定，無論將遇到什麼樣的艱難，我都要遵循他的教導。我比以往任何時侯都堅定的決定，我永遠不會與暴力相關。」[1]

達賴喇嘛的佛教不是「痲痺人民的精神鴉片」，也不是消極避世的廟堂木魚，卻與加爾文主義基督教原則相似，是積極入世，干預現實、內外雙修的宗教。他曾經數次與基督教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倫西(Robert Runcie)暢談宗教的社會功能，共同認為政教有交叉混合之處，就是宗教有責任為人道主義服務，「宗教不應忽視現實。宗教人士僅僅祈禱是不夠的。相反，他們在道義上有義務貢獻一切來解決世界上的問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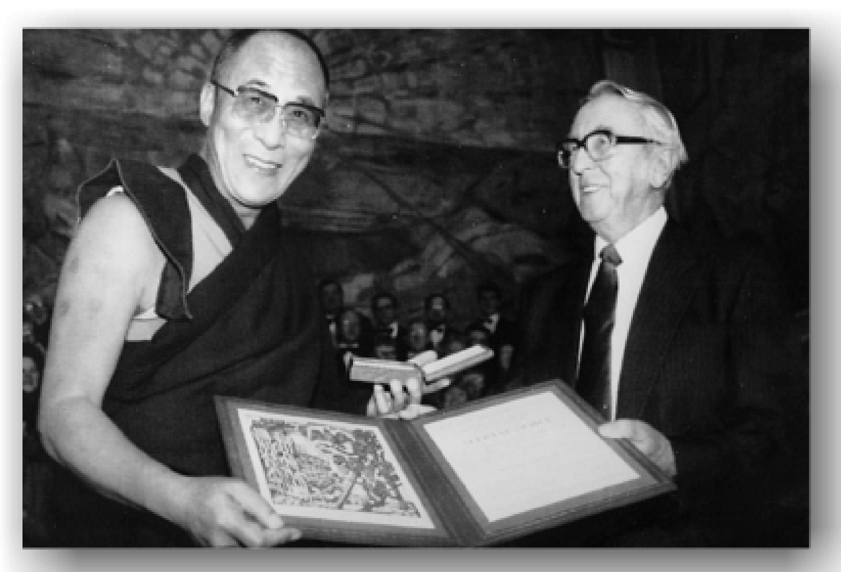
達賴喇嘛不以政治為榮心之事，一生追求清淨事佛，但是他奔走世界各地，會見各國元首，從未停止過自己出訪的腳步。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對現實的干預嚴格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他不是不知道有多少藏人被殺，據西藏反抗游擊運動所繳獲的中共軍方文件記載，僅從 1959 年 3 月到 1960 年 9 月，即達賴喇嘛出走前後，拉薩被殺的藏人就達 8 萬 7 千人。世界上不會有人比達賴喇嘛對自己同胞的苦難更感同身受，不會有人比他更理解其子民反抗的意志、更贊同他們的寧死不屈的勇氣和對西藏的愛，但是達賴喇嘛從不贊同他們暴烈的行動，他寧肯失去他們的信任，也要以「對他們產生作用的唯一方法」「作出一個個人的呼籲」。60年代，遠在印度，他在一些藏民武力抗暴的時候，曾把自己的錄音設法傳遞給西藏的游擊

[1] 達賴喇嘛回憶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電子版。丁一夫譯。
[2]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電子版，丁一夫譯。

戰士，告訴他們放下武器，停止戰鬥。此後，達賴喇嘛為了「很多人感覺他們遭到了背叛」，甚至「有幾個領袖割斷了自己的喉管而不願離開」感到非常難過。與甘地一樣，非暴力，和平主義、人道關懷，是達賴喇嘛信仰的一部分，而絕非一種爭取大多數同情、哀兵必勝的政治策略。關於這一點，慢說中國政府官員不能相信，就是擁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沒有同等信仰，同等神性，也不能理解。

1989年，中國以自身的血色迎來東歐黎明的時候，達賴喇嘛近40年拯救西藏文化、宗教的和平努力贏得世界的尊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將198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達賴喇嘛，表彰他「在爭取西藏自由的奮鬥中始終如一地反對使用暴力。為保存他的人民的歷史



1989年12月10日，達賴喇嘛在挪威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獎章和獎狀。(轉自諾貝爾獎委員會官方網站)

與文化遺產，而代之以在寬容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倡導和平解決問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並認為，達賴喇嘛對人類的貢獻在於，他「從對一切生命的一種偉大的尊重出發，並在對所有人類以及自然的普遍責任的概念基礎上，發展了他的和平主義哲學」。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埃格·阿爾維克(Egil Aarvik)在頒獎詞中表示，除了中國，世界都看到了達賴喇嘛的和平努力。他說：

「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就與他的成千上萬流亡印度的同胞一起，居住在組織化的社區裏。這並非世界上第一個流亡社區，但卻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武力行為的社區。考慮到被佔領期間西藏人民的痛苦，這種非暴力方針更加值得注意。達賴喇嘛的反應一直是建議和平解決問題。這將長久地滿足中國人的利益。要舉出任何歷史上的一個少數民族維護自己權益的例子是困難的。沒有人像達賴喇嘛那樣，對對手採用調和的、協作的態度。」

阿爾維克在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委婉地表達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未曾授予甘地此獎的遺憾，同時以微妙的言辭強調了頒獎現場的委員會成員並非50年前的委員會成員。最重要的是，在將達賴喇嘛與甘地的比較中，阿爾維克用了舉世公認的對甘地尊稱——「聖雄」，稱這位聖雄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和平事業領導者」，並表示本年度此獎，也「部分地表達對聖雄甘地的紀念」。以此，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了卻了他們耿耿於懷半個世紀的心願，並終於為他們的歷史性錯誤雪了恥。

確如阿爾維克主席頒獎詞中指出的，達賴喇嘛將自己看作是甘地精神的繼承者，在自己的書面答獎辭中，他視甘地為自己和其他人的導師：「甘地的榜樣是我們許多人的精神源泉」。

半個世紀以來，達賴喇嘛流亡在甘地的故鄉，並在這裏建立了最大的西藏流亡社區和流亡政府，毫無疑問，在眾多的甘地追隨者中，達賴喇嘛是甘地精神最直接、最忠實、最偉大的繼承人。上個世紀48年甘地被刺，49年中國易幟，50年中共軍隊入侵西藏，59年達

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們流亡印度。89年那一年，中國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和一百年黎明前的黑暗中，再度失去文明轉型的機會，流亡的西藏則徹底浮出中國巨大的陰影，更多地獲得世界的認可和支持。1948年那頂遺失在印度的桂冠，從甘地的祭壇上空飄落，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主人。

達賴喇嘛實行民族自救的環境雖然不及甘地民族獨立的環境複雜，但是達賴喇嘛的對手，卻比大英帝國更野蠻、專斷而無情。達賴喇嘛雖然獲得了那頂飄逝在甘地祭壇上的桂冠(以及世界各地各國八十多項獎)，但是他未必比甘地更幸運：有生之年，他未必能夠看見西藏獲得的自由，臨終之際，他也未必能回到自己的故鄉。因為他把西藏命運背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沒有功利層面上人生的榮華富貴和安逸泰祥。然而這一切個人榮辱對於達賴喇嘛而言並不重要。世世代代達賴喇嘛轉世往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普渡眾生，解救苦難。從佛教觀點看，他們是來到人世間的「道成肉身」，傳播宇宙之愛、人類大同、生命之平等尊嚴是他們到此世間的唯一使命。十四世達賴喇嘛身在五行中，意在三界外，他的生命植根於宇宙之永恆存在而不是人生數十載的時空，而且他的精神人格也是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位，他心中惦念著西藏的苦難和人類的缺憾，他何以可能不高貴超聖而謙卑絕俗？

華氏103度，烈日當頭，熱浪滾滾，這個炎熱的印度六月天，幾乎要把所有歷史沉思都蒸發掉。我們在甘地祭壇前祭拜鞠躬、肅立留影，在達賴喇嘛與甘地靈魂相遇的草坪上，借著樹蔭席地而坐，心中充溢著一片悲聖悠遠的清涼之意。優雅和莊嚴，淨土和聖壇，在廣廈毗連、笙歌達旦的中國已經絕跡，同樣面對奴役，中國的苦難正在孕育的究竟是另一個帝國暴君？還是另一個布衣甘地？

·歸程

我必使他們在我的殿中，在我的牆內，有紀念，有名號。

——《聖經·以賽亞書》

次日傍晚，告別兩位大陸友人，登上美聯航客機，再度飛越太平洋返美。

歸程中，漢藏共同棲息的星球再次緩緩出現機翼下方的蒼茫天宇間，河流婉如驪歌，山川隱約如詩，大海蒼茫如畫。在萬尺高度上，回眸達蘭薩拉之行，我發現自己心中的世界版圖已然生長出一片不可或缺的聖土，一闋精神寄存的空間，一種莊嚴的期盼。



印度返美途中，萬尺高空俯瞰：河流婉如驪歌，山川隱約如詩。
(北明攝於2009年6月19日印度返美途中)

初稿：2009年6月9日-19日達蘭薩拉之行途中

終稿：2010年8月31日美國維吉尼亞州

下篇

流亡西藏訪談[1]

[1] 依據《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走進西藏」系列訪談錄音整理。小標題和括號內文字為北明所加。所有訪談均經被訪者本人校對。

一、西藏問題緣起

採訪時間：2009 年 6 月

採訪地點：華盛頓

受訪人： 李江琳，獨立作家。上海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美國麻省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西藏問題獨立研究者，目前著重研究西藏流亡史。



李江琳肖像

藏人為何逃離故土？

西藏流亡人口國際分佈廣泛

北明：

600萬藏人中約有10萬人左右從西藏出走，流亡到印度了。截至去年(2008年)拉薩事件爆發，大約每年有3,000左右的藏人逃離他們的故土。他們的後半生，包括他們的希望，都已經落腳在印度了。我想問您，是什麼驅使他們下這麼大的決心，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別的國家去生活？

李江琳：

西藏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最近幾年來，我們可以看出，特別是2008年拉薩事件之後，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非常高漲。民族情緒的高漲是一把雙刃劍。漢民族的民族情緒高漲也會刺激其他民族，使少數民族的民族情緒隨之高漲。這樣的話，發生衝突很容易，化解卻很難。我們對西藏問題真相了解太少，我們看見的大部分都是宣傳。西藏問題是怎麼產生的？怎麼發展的？現在是處於哪一種狀態？多數人其實並不知道。

西藏流亡史應該從1959年開始。我們大家都知道1959年的拉薩事件，達賴喇嘛1959年3月31號入境到印度。幾個月之後大批的藏人逃出來了，追隨他而來。幾年之後，流亡藏人達到8萬，這是西藏流亡社會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這50年來不間斷的有藏人離開西藏，到達印度，逐漸形成了一個流亡社會。這個流亡社會的人口是將近14萬。

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誤解是，認為流亡社會主要在印度，其實不完全是這樣。印度的人數是最多的，其次尼泊爾流亡藏人數量也非常多，還有少量在不丹。以這個亞洲的流亡社區為基礎、為起點，有越來越多的藏人離開這些地區到了歐美國家。所以現在流亡藏人總的分佈大概是在20多個國家。我說的 20 多個國家，是形成一定的大小不同的規模的有組織的社區。沒有組織的那就不止20多個國家。也就是說，西藏流亡社會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它不是僅僅在亞洲。

西藏傳統社會結構解體導致藏人流亡

北明：

鑑於西藏流亡現象的社會化和世界性，我的問題更突出了：為什麼西藏人要流亡？你還沒回答我這個問題。是什麼驅使他們離開自己的故土？為什麼他們要到別的國家去生活？

李江琳：

第一個階段，就是50年代， 1950年到1959年之前，有少量的藏人離境。那個時候沒有形成一個西藏流亡社會。形成流亡社會是在 1959 年之後，也就是達賴喇嘛出走之後。達賴喇嘛的出走表明了什麼呢？歷史上來看，它意味著中藏之間的合作失敗。達賴喇嘛在1951年有機會出去他沒出去， 1956 年有機會出走他沒走，他一直選擇和中央政府合作。但是到了1959年，這個合作失敗，他才離境。離境前後，四川、青海等地，也就是康巴地區和安多地區的土改造成了藏區社會的激烈動盪。

當他們離境的時候，當然有很多的問題，一個是它的傳統社會結構崩潰。隨著它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崩潰，它的經濟結構也崩潰，它的信仰受到很大的壓制。一個信仰無神論的政治體制和千百年來非常虔誠地信仰佛教的社會開始碰撞的時候，這種碰撞非常慘烈。那是沒有研究過那段歷史的人想像不到的慘烈狀況。

西藏佛教信仰平臺被毀

北明：

你說非常慘烈，能不能舉個例子？

李江琳：

理塘寺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北明：

請你具體說說這個理塘寺事件。

李江琳：

這個事件簡單說來是這樣：理塘寺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寺廟，而且是當地的主要寺廟，裏面大概有7,000左右的僧人。在四川土改期間，就是「民主改革」期間，引起了藏民的反抗。反抗之後，大量的藏民和反抗的民兵躲在理塘寺裏面。解放軍出動飛機來轟炸，把這座歷史悠久的寺廟，幾乎夷為平地。像這樣的事件，就導致了大批的藏民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他們就跟隨他們的精神領袖出境。像這樣的事件餘波震盪非常厲害。很多平民，不是領主頭人，而是一般的普通信仰的西藏民眾認為，在這個新的社會體制下和理念下沒有我們的信仰存在的餘地，沒有辦法合作下去，連達賴喇嘛都沒有辦法待下去了。於是他們就追隨他出去。

北明：

那也就是說中央政府的這種無神論信仰跟藏傳佛教信仰之間，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之間衝突太劇烈了，是吧？

李江琳：

這是衝突之一。應該這麼說：西藏文化的基礎是它的佛教，是它的宗教。它的節日啦，它的文化啦、歌舞啦，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那麼後來作為「民主改革」的內容之一，就是根除這種宗教信仰。這裏面有一點：雖然「民主改革」不是直接針對信仰而去，但是由於它植根非常緊密，所以你要動它的社會就不可能不動它的宗教。舉個例子說，有很多當時的社區，我們都知道土司啦頭人啦這一類的，但是實際

上一些寺廟在西藏社會中起極大的作用，兼任了醫院、學校等等在傳統社會中的多種功能。在很多地方，一個小點的地區，可能它最大的土地擁有者不是一個家族，而是一座寺廟。寺廟的土地來源，有的時候是政府封給它們的，有的是當地頭人捐獻給它們的，有的是他們(指寺廟僧侶)買的。最大的地主是一個寺廟的話，土改工作隊在那裏進行土改的時候，就不可能不動這個寺廟。動這個寺廟的時候，那麼最大的地主是誰呢？是活佛！那麼就去鬥爭活佛。活佛對於漢人來講這就是一個地主，對藏人來講那不是一回事。

北明：

那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李江琳：

對！我採訪過的很多藏人，他們都告訴我，當時在四川引起反抗，不是因為他們的頭人被鬥，不是因為分了他們頭人的地，而是鬥活佛，或者是沒收寺廟的財產。

北明：

也就是說，西藏這個民族和漢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不能離開信仰，他們不能沒有精神領袖，他們不可能離開宗教而生活下去。要剷除他們的寺廟，等於把他們的生活之根給剷除了，他們就覺得沒辦法在這個地方繼續下去了，能這樣理解嗎？

李江琳：

一定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尤其是對老一輩人。

我常常感覺到一點，就是說我們漢民族自己實際上百年來是經受過無數的苦難，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一點，就是藏民族也經歷過很多苦難，而我們並不知道這些苦難對於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比方說文革。在1950年的時候，全部藏區包括周邊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大西藏」地區，有7,000多座寺廟。到了文革後期，文革結束的時候，完整的寺廟只剩下8座。這對藏人來講，是刻骨銘心的痛苦的事情。原來是十幾萬的僧尼，到了後來只剩下幾千。

北明：

僧尼原來是多少？

李江琳：

原來是十幾萬。

北明：

十幾萬！

李江琳：

對！只剩下幾千！

流亡藏人尋求保持宗教生活方式

北明：

請簡單描述一下逃出去的藏人的生活。生存都是問題，他們還能保持他們的宗教生活方式嗎？

李江琳：

前10年，1959年到1969年，對他們主要的挑戰是生存，先得活下去。印度政府那個時候給了他們非常大的幫助。等到他們自己安定下來了，他們種的那點地有點收成了，他們有能力蓋房子了，他們蓋的第一所房子就是寺廟！這就是(漢藏)兩個民族不同的地方。我曾經在印度南方最大的一個流亡社區，採訪過他們的第一代老人，他們就帶我去看那個寺廟。他們說：這是我們自己在社區建立後建的第一所房子，是我們自己蓋的，不是印度政府給我們蓋的。

北明：

你去採訪，你是漢人，流亡藏人如何對待你？他們是否憎恨鏟除他們信仰根基的漢人？

李江琳：

這麼說吧，流亡藏人社區，很多地方我去的時候，我是50年來他們見到的第一個漢人。他們對我沒有任何仇恨，他們很願意和我講他們

的故事。他們在跟我講故事的時候，也沒有任何指責。讓我看到宗教確實對消除仇恨是很有作用的。

西藏問題是怎樣產生的？

採訪時間：2009 年 10 月 1 日
採訪地點：華盛頓——達蘭薩拉
播出時間：2009 年 8 月 25 日
受訪人：李江琳(同上)

西藏問題存在的標誌

北明：

「西藏問題」這四個字在《中國政府有關會談的新聞聲明》中是被打了引號的。您認為西藏問題是否真實存在？存在的標誌是什麼？

李江琳：

我先說明一下「西藏問題」這個提法的來源。「西藏問題」這個提法最早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一篇，1949 年 8 月 6 號毛澤東給彭德懷一份電報，叫他們進攻蘭州時，要「十分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同年 11 月 23 號，他給彭德懷和賀龍的電報裏又提到：「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覺得，西藏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他的種種針對西藏的謀略，用兵，統戰，宣傳，改造等等，都是為了解決「西藏問題」。那些電報當時都是機密，不是公開的。

「西藏問題」這個詞公開提出來，我記得是在1959年拉薩事件之後。1959年5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一本書，叫做《關於西藏問題文選》，人民出版社同時也出版了一本內容基本相同的書，叫做《關於西藏問題》。也就是說，在1959年之前，西藏不是沒有「問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因此，「西藏問題」不僅存在，而且從5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

就現階段而言，我認為「西藏問題」的存在至少有三個標誌：

1. 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境外半個世紀。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本來應該是在西藏境內，居住在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的，為什麼他會離開西藏？為什麼他一直無法返回？為什麼他離開西藏之後，在不到10年之內，會有8萬多藏人追隨他離開，因而建立了一個流亡社會？1959年之前，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大規模逃亡，顯然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2. 從1956年起，西藏周邊地區就開始出現暴動，官方語彙稱之為「叛亂」。1956年到1958年，事實上西藏周邊地區的藏民全面暴動，涵蓋的地區非常廣泛，青海、四川、雲南、甘肅，差不多藏民居住的地區全都出現了規模不等的暴動，只有衛藏，也就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管轄的地區，還比較平靜。這些地區的暴動遭到相當殘酷的鎮壓，倖存者逃往拉薩，但是無法停留，於是他們又逃到解放軍尚未完全控制的山南。在山南重新整合，把原先自發的、各自為陣的反抗力量統一起來，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於是發展成西藏三區藏民的全面暴動。

這整個過程持續了將近八年，從1956年到1963年。在此之後，以尼泊爾的木斯塘為基地，游擊隊還斷斷續續騷擾了將近十年，直到1972年才完全結束。也就是說，從1956年到1972年，藏民在不同地點進行了長達16年的武裝反抗。而且，1959年3月以後，每隔大約20年左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而且暴動的地區越來越大，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文革期間不少地區還出現了「再叛」，也就是說，藏人的反抗已經持續了整整三代人。如果西藏三區沒有嚴重問題，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3. 五十年來，藏人不間斷地逃亡。根據1991年以來的統計，平均每年有2,500到3,000人離境。如果不存在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逃離？

所以，不承認西藏問題並不等於不存在西藏問題，只是說明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而已。

周邊藏區大批藏民逃亡始於1959年

北明：

依據您最近的調查，藏民是從什麼時候起陸續逃離故土的？逃離者主要來自哪個區域？

李江琳：

1959年之前，只有少量藏人離境，而且是陸續離去的，不是突然在短時期內大規模出走。1959年3月之後，藏民大規模出走，根據1959年5月14日《紐約時報》的消息，「第一批91名難民於5月13日到達印度政府建立的臨時難民營，而且已經有11,500名西藏難民越過印度國境。」這是1959年國外的報道。1993年國內出版的內部資料也承認：「在平叛改革中，個別地區發生鎮反打擊面偏寬，以及過早提出辦合作社試點等問題，截止1961年1月，邊民外流2萬餘人，損失牲畜10萬餘頭(隻)。」[1]這裏的「2萬餘人」指的僅僅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內，不包括周邊藏區。

逃亡者來自西藏三區，但是西藏自治區周邊地區比較多一點，而且這個趨勢越往後越明顯。最近這些年的情況是：三分之二的逃亡藏人來自康區和安多，即西藏自治區周邊的藏區。

藏民逃亡前的土改、暴動與鎮壓

[1] 《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組織史資料》69頁。

北明：

除了中國官方的宣傳，國際輿論一般認為，西藏的厄運是從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兵西藏，藏人被迫簽署「十七條協議」開始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遲至1959年之後，藏人才開始逃離他們的故土。在簽署十七條協議之後，相關的藏區發生了暴動，這些暴動是如何發生的？

李江琳：

最早發生暴動的，都是先「解放」的藏區。比方說，四川甘孜地區。1955年12月，四川首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在甘孜州實行土改的決議，兩個月後，1956年2月15日，色達縣就發生藏民暴動。接下來，2月28日，白玉縣藏民暴動，29日，新龍縣暴動，3月，理塘暴動。到1956年3月底，甘孜地區有18個縣的藏民暴動，有1萬5千人參加[1]。政府調動大量正規軍來鎮壓，不僅動用步兵、炮兵，還調動了騎兵，空軍也參戰，空中地面力量都用上了，土改演變成了戰爭。

北明：

您的研究顯示，隸屬中央政府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是藏區暴動事件發生的起始點，而土改是暴動發生的直接原因。請介紹一下這方面情況。

李江琳：

1956年7月，也就是籌委會剛剛成立，昌都地區就發生暴動。到1958年，發展成全區性的暴動。為什麼在成立籌委會之前沒有發生暴動呢？因為在1956年籌委會成立之後，西藏工委就開始大力宣傳土改，而且派工作組到四川等地去「取經」。昌都在邊界上，四川藏區土改是怎麼進行的，土改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昌都那邊的人很清楚。一聽說去那邊「取經」顯然就是要按照那裏的方式土改，當地藏民馬上就上山打游擊去了。

青海果洛地區也是這樣，果洛工作團進去的時候風平浪靜，上層人

[1] 《甘孜州誌》。

士、平民、僧侶都沒有反抗，相反還幫了很多忙，可是到1958年，發生了全面暴動。為什麼？這也跟土改有關。

1956年開始的土地改革拆毀藏民生活根基

北明：

請問土改是怎樣直接導致藏民暴動的？

李江琳：

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意識到：土改的目的不僅是要徹底改變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而且要改變人民的意識形態。因此，土改過程中還伴隨一個「破除迷信，移風易俗」運動。這個運動的標誌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拆毀、改造寺廟，沒收寺廟財產，直接或間接強迫僧尼還俗。這種土改方式基本上照搬到了藏區，結果上層下層都開始反抗。

北明：

請您請舉個例子說明上述暴動的原由和情況？

李江琳：

果洛暴動的原因，果洛藏族自治州前州長達傑的書《果洛見聞與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果洛歷史上，1958年是難以忘懷的一年。這一年，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推動下，中共果洛州委依照青海省委關於加快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在沒有思想準備，沒有實踐經驗，沒有群眾基礎的情況下，倉促下達公私合營和牧業生產合作任務指標，想用簡單的一聲號召的辦法來改造私有制。結果遭到一些部落的抵制，導致了局面的失控。最後動用軍隊進行了『平叛』。結合平叛，實行『邊打邊改』的政策，還錯誤地提出『消滅封建制度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並舉，畢其功於一役』的方針，要求『兩步並作一步走』。隨著人民公社的出現，又強迫牧民一舉實現了公社化，稱之為『一步登天』。這些不合科學的作法不僅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而且嚴重地影響了果洛藏族對共產黨的敬意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留下了許

多隱患和不利因素。」[1] 雖然他只提到「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沒有直接提到生命損失，但是至少說明了果洛暴動和「社會主義改造」之間的因果關係。

北明：

政府插手之外的地區情況如何？

李江琳：

那幾年裏，恰恰在當時噶廈政府和班禪堪布廳管轄的範圍內，沒有發生暴動，但是人心惶惶。達賴喇嘛看局面無法控制，跟張經武 [2] 反覆交涉又沒有結果，給毛澤東直接寫信反映情況得不到回音。而且當時國際社會對西藏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絕望之下，他就想借去印度訪問的機會出走。他一走，西藏局面就會徹底失控。中央為了安撫西藏上層，通過他們去影響民眾，趕快宣佈「六年不改」。當然這不過是個「緩兵之計」。暴力土改只是時間問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衝突不可避免，最終導致達賴喇嘛出走。

現在我們所知的「西藏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可見，現在的「西藏問題」，不是1951年產生的，而是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進行暴力土改以後產生的。後來勝利的一方稱之為「武裝叛亂」，失敗的一方稱之為「武裝起義」，但是不管稱之為什麼，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那就是：在那段時間裏，西藏三區發生了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而這場發生在中國境內，長達七年多的局部戰爭，中國人當時一無所知，現在了解到的，也是宣傳多於史實。

漢藏經濟、文化改造運動後果及其原因比較

北明：

---

[1] 《果洛見聞與回憶》95 頁。

[2] 張經武曾參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西藏的昌都戰役的部署和領導工作。1950年是中央政府人民武裝部部長，1951年是中共中央派駐西藏的軍人代表。

土改、破除迷信，這兩項經濟和文化運動在中國大陸漢人地區也同樣發生，為什麼漢人沒有反抗，藏人反應如此強烈？

李江琳：

漢區其實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不過很多是消極反抗，比方說強迫農民入社，他們就把土改分來的牛殺了，諸如此類，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武裝反抗。

有幾方面因素：

1. 是漢區很早就收繳了民間全部武器，再加上控制非常嚴密，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就採取行動，所以沒有大規模武裝反抗的可能性。

2. 就整體而言，漢民族的宗教意識遠沒有藏民族那樣強烈。寺院不僅在藏人的精神生活中有巨大作用，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也有很多實際的功能。摧毀寺院，對藏民族來說，是對他們整個生活方式的全面摧毀。反應當然是不一樣的。舉個文革中的例子：當時批鬥青海前副省長喜饒嘉措。因為他是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當地人民不肯批鬥，工作組就強迫僧人去鬥他。結果兩三天裏，先後有六名僧人自殺。他們寧願自殺也不肯去鬥他[1]。

3. 當時對藏民族生活方式的改變，不是來自於藏民族內部的改革要求，而是另一個民族強加給他們的。「反動分子」，「階級鬥爭」，「叛亂」之類的語彙，那是共產黨理論框架裏的概念，當時的普通藏人別說理解這些詞的意思，他們的語言裏連這些詞彙都沒有。我採訪了一些當時參加了暴動的藏人，他們說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國家」，「民族」，「革命」之類的觀念，他們認為那些不准他們拜佛，強行拆毀和關閉他們寺廟的漢人是「佛法的敵人」，所以他們反抗。

西藏土改中的武力鎮壓、軍隊平叛及擴大化實例

[1] 降邊嘉措：《毛澤東與達賴班禪》。

北明：

中國政府如何應對這些反應？引發了什麼結果？

李江琳：

中央對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其實一無所知，他們對民族地區狀況的了解主要來自基層的彙報，彙報的情況未必準確，因此根據那些彙報做出的很多指示完全不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反而激化了矛盾。當時在各個藏區的幹部絕大多數是漢人，而且不是部隊轉業軍人，就是在內地進行過土改的幹部。這些人對藏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同樣一無所知。在「階級鬥爭」思維方式之下，任何不同意見都被視為「反動」。既然是「反動」，解決的方式就是鎮壓。但是那時候藏民手裏還有槍。工作組人數少，武器不足。一旦發生武裝衝突，往往打不過藏民，他們當然不會向上報告自己工作失誤導致局面失控，只能編造情況，或者誇大事實，於是政府調動正規軍「平叛」，最後導致西藏三區的藏民全面暴動。平叛時還出現了所謂「平叛擴大化」。

北明：

請具體說說擴大化的程度，嚴重嗎？

李江琳：

達傑書裏有青海久治縣的數據：「該縣從 1958 年 8 月至 1960 年底逮捕關押 1,050 人，佔當時全縣總人口的 9.57% 。其中， 1958 年捕辦 802 人， 1959 年捕辦 116 人， 1960 年捕辦 132 人。 1962 年貫徹中共中央西北明局民族工作會議精神，清查捕辦的1,050人中，應釋放的862人，截止1963年7月15日已釋放258人，勞改農場通知死亡的346人，還有 258 人未通知。後來這項工作不了了之。」[1]也就是說，僅僅青海的一個縣，就有將近 10% 的人被抓，其中 82.1% 的人是被錯抓的。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達 57.5% 。這還只是一方面。當時被抓的人大多數是男人，他們被抓，被打死之後，他們的家庭留下的老人

[1] 《果洛見聞與回憶》，223 頁。

和孩子的情況遭遇，真是慘不忍睹。這樣的情況對整個藏區的影響面是巨大的。

這個問題其實中共中央後來也承認了。198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覆青海省委關於解決1958年平叛鬥爭擴大化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指出：「……由於『左』的指導思想影響，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使一批幹部、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彌補的損失。責任主要在領導。處理這個問題，要著重從政治上解決，要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眾之間、幹部之間和民族之間的隔閡，引導各族人民顧全大局，團結起來向前看；在經濟上，也要給予適當的撫恤、救濟和補助……」[1]。這裏還是避免提到「生命損失」。

見證：《一個藏人的童年》

北明：

請介紹一下藏民被抓後，老人和孩子們的狀況。

李江琳：

多婦女兒童。他們自己被一次次追擊，雖然只有十來個人，也不得不跟正規軍打仗，後來他父親終於被打死，他和他哥哥成了孤兒。父親死後，兩個孩子被抓進監獄，他還記得他在監獄時候的號碼是3299。關了幾個月，被放出來。後來他跟他哥哥被送到一個叫做「幸福之家」的機構。當時作者十歲，他哥哥十四歲。

他去的時候，「幸福之家」裏有大約一千名兒童，其中大多數的孩子父母被抓，還有一些孤兒，另外還有600多名老人。這些都是家人被捕之後，無人照顧的老人[1]。名義上來說，這些老人兒童是被政府養在那裏。

不到一年，作者離開「幸福之家」的時候，也就是1959年下半年，「除了幾個小孩和幾個老人被家人領回去之外，現在幸福之家三個大隊裏，只剩下50名兒童和十幾名老人。其他的人都在不到半年內死亡。更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

多婦女兒童。他們自己被一次次追擊，雖然只有十來個人，也不得不跟正規軍打仗，後來他父親終於被打死，他和他哥哥成了孤兒。父親死後，兩個孩子被抓進監獄，他還記得他在監獄時候的號碼是3299。關了幾個月，被放出來。後來他跟他哥哥被送到一個叫做「幸福之家」的機構。當時作者十歲，他哥哥十四歲。

他去的時候，「幸福之家」裏有大約一千名兒童，其中大多數的孩子父母被抓，還有一些孤兒，另外還有600多名老人。這些都是家人被捕之後，無人照顧的老人[1]。名義上來說，這些老人兒童是被政府養在那裏。

不到一年，作者離開「幸福之家」的時候，也就是1959年下半年，「除了幾個小孩和幾個老人被家人領回去之外，現在幸福之家三個大隊裏，只剩下50名兒童和十幾名老人。其他的人都在不到半年內死亡。更準確地說，是在兩三個月之內死去的。」[2]。

這些老人和孩子是餓死的。政府給他們的食物是從各家沒收的酥油，糌粑等。幾個月後，沒收來的食物吃完了，這些老人孩子就開始挨餓，然後就在不到半年內，大批餓死。書裏談到過這些屍體是怎樣處理的，這裏就不說細節了。這是1959年發生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區曲瑪萊縣的事情。如果這本書的作者是流亡藏人，他的敘述肯定會被斥為「達賴集團編造的謊言」，但是該書作者是中國體制內的幹部，曾經當過副縣長，還在法院工作過。 這本書是作者退休之後寫的。在藏民族的集體記憶裏，整個「平叛」過程中，對婦女兒童老人的屠殺和迫害的事很普遍，我在採訪中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敘述，一些英文版的藏人回憶錄裏也提到過解放軍對平民的屠殺。

西藏「民主改革」資料來源簡介

北明：

請再確證一下，您引證的這些資料來自何處？中國普通人能否看到？

---

[1] 《一個藏人的童年》，印度版，360頁。
[2] 《一個藏人的童年》，印度版，416頁。

公開出版的資料中有很多信息，內部出版的資料其實也不難找，願意客觀對待歷史，懂得「宣傳」與「史實」的區別，有基本分析和思考能力的人，如果認真想要了解「西藏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是很困難。根本不需要很多國外資料，也不需要流亡政府的資料。我的資料來源，大部分是中國官方出版社在不同時期裏出版的書。

北明：

謝謝。您對這個專訪的相關話題有什麼要補充的？

李江琳：

補充一點：1959年之後的宣傳裏，一直說是西藏叛亂的原因是因為上層為了維護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發動的武裝叛亂」，這個結論並不符合史實。其實，早在1952年，也就是達賴喇嘛從亞東返回拉薩之後不到兩年，他就成立了一個改革局，開始計劃和進行各種改革，包括改革烏拉制度，計劃將土地收歸政府所有，然後分給農民等等。也就是說，達賴喇嘛不是不接受改革，而是不接受以暴力和摧毀的方式進行的，「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改革」。暴力土改給中國社會留下了無窮後患，這點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爭議了。

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藏民族在1950年之後的歷史，是由中國政府來主導的。漢民族在那段時間裏經歷過的一切苦難，暴力土改，文化毀滅，大飢荒，文革等等，藏民族同樣經歷過。由於對這些「運動」的反應不同，藏民族還經歷了漢民族沒有經歷過的慘烈鎮壓。用軍隊「平叛」，是中央軍委直接下的命令，要通過「總決戰」來解決「西藏問題」，是毛澤東親自給西藏工委的指示。這段歷史最大的悲劇是：如果走出「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來看的話，那些年在西藏三區，事實上是兩個不同民族的農民在互相射擊。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整個漢民族來承擔，所以，哪怕是為了漢民族的緣故，這段歷史也必須盡可能理清。

公開出版的資料中有很多信息，內部出版的資料其實也不難找，願意客觀對待歷史，懂得「宣傳」與「史實」的區別，有基本分析和思考能力的人，如果認真想要了解「西藏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是很困難。根本不需要很多國外資料，也不需要流亡政府的資料。我的資料來源，大部分是中國官方出版社在不同時期裏出版的書。

北明：

謝謝。您對這個專訪的相關話題有什麼要補充的？

李江琳：

補充一點：1959年之後的宣傳裏，一直說是西藏叛亂的原因是因為上層為了維護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發動的武裝叛亂」，這個結論並不符合史實。其實，早在1952年，也就是達賴喇嘛從亞東返回拉薩之後不到兩年，他就成立了一個改革局，開始計劃和進行各種改革，包括改革烏拉制度，計劃將土地收歸政府所有，然後分給農民等等。也就是說，達賴喇嘛不是不接受改革，而是不接受以暴力和摧毀的方式進行的，「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改革」。暴力土改給中國社會留下了無窮後患，這點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爭議了。

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藏民族在1950年之後的歷史，是由中國政府來主導的。漢民族在那段時間裏經歷過的一切苦難，暴力土改，文化毀滅，大飢荒，文革等等，藏民族同樣經歷過。由於對這些「運動」的反應不同，藏民族還經歷了漢民族沒有經歷過的慘烈鎮壓。用軍隊「平叛」，是中央軍委直接下的命令，要通過「總決戰」來解決「西藏問題」，是毛澤東親自給西藏工委的指示。這段歷史最大的悲劇是：如果走出「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來看的話，那些年在西藏三區，事實上是兩個不同民族的農民在互相射擊。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整個漢民族來承擔，所以，哪怕是為了漢民族的緣故，這段歷史也必須盡可能理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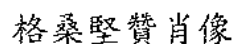
二、西藏經濟現狀[1]

採訪時間：2009年6月、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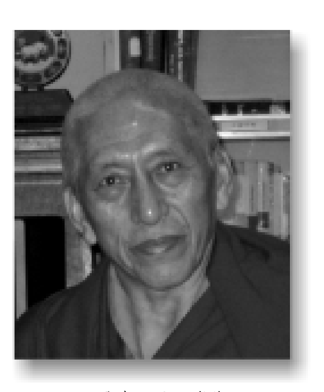
採訪地點：華盛頓——達蘭薩拉

受訪人(依次)： 1. 格桑堅贊，西藏議會議員、《西藏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2. 桑東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3. 李江琳，中國西藏問題專家。





格桑堅贊肖像



桑東仁波切肖像

[1] 本節採訪分別而做，為內容統籌和行文方便，文字順序略有調整。

中央投資和補貼「怎麼算，大家看不懂」

北明：

一直以來關於西藏經濟狀況，一個廣為中國政府宣傳的信息是：中國中央政府自1950年以來不斷對西藏提供經濟援助，加強西藏現代化建設，改善西藏的經濟環境，提高藏民生活水平。2009年6月19號，官方《新華網》西藏頻道刊登記者署名文章，題目是〈西藏在祖國大家庭呵護下成長〉。文章說：從和平解放的那一天起，西藏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50年來，西藏擁有過400多億中央投資和財政補貼，一直「在祖國大家庭呵護之下成長」，並且目前已經「進入第三次經濟發展高潮」。雖然如此，透過中國官方的輿論，人們也逐漸了解到，從1950年西藏被「和平解放」至今半個世紀以來，內地藏人對中央政府統治的反抗不絕如縷，西藏流亡政府近年來以「中間道路」的和平方式爭取真正自治的努力始終不懈。

鑑於此，很多中國人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西藏年年擁有中央的大量投資，享受其他省份沒有的經濟補貼待遇，對中央政府的回報率卻最低，從來都是負數，你們藏人如何還要鬧事，還不滿意！格桑堅贊先生，我想知道，您怎麼看這問題？

格桑堅贊：

西藏自治區成立50週年，有個成果展覽，講的是900多億，當然這都

是財政補助。這裏還有一些其他省區支持西藏自治區的一些建設項目，從建立自治區到現在，按他們的說法，一共是1,698個項目，這裏面投入的資金大概就是64億多元。

北明：

您是說64億多元？

格桑堅贊：

對，1,698個項目才64億多元。這個我也有些懷疑。怎麼講呢？因為我們知道，中央成立西藏(自治區)後，有一個關於西藏問題的工作座談會，第一次、二次、三次、四次。這些裏面都有些大的項目，這些項目，比如像第二次座談會的43個項目，投資是30多億。這64億資金，中國「新華網」2005年8月24號為什麼報成這樣？這都不清楚。還有，這些投資項目裏面包括青藏鐵路，都是幾百億。所以，這裏面怎麼算，大家也看不懂。

開發所得大於投資和援助：森林資源的砍伐

北明：

中央從西藏獲得的財政收入是負數，這個信息您怎麼看？

格桑堅贊：

西藏對中央的財政收入是負，這個說法呢，我認為應該這麼考慮：西藏，當然了，對中央的稅收肯定比較少，但是呢，西藏從50年代、60年代到97、98年左右，財政狀況主要是以「木頭財政」為主的一種財政。

北明：

什麼？

格桑堅贊：

木頭財政。怎麼講呢？就是說很多地方的收入主要是(來自)砍伐森林木材的收入。也就是以破壞性砍伐原始森林為代價，給中央的貢獻很大的。我們也應該計算這麼一個數字。97、98年以前，藏區都是木頭財政。

北明：

您能否具體講講這種「木頭財政」的情況？

格桑堅贊：

你知道，四川藏族地區整個森林生態系統約佔四川森林面積的81.3％，木材蓄積量達10.22億立方米，佔四川木材蓄積量的66％。西藏自治區，有林地面積約9.1億畝，全區森林覆蓋率為9.84％。絕大部分森林分佈在藏東南地區，活立木總蓄量20.84億立方米，居全國第一位。這就是我說的「木頭財政」的客觀因素。西藏包括四川雲南這些藏區。例如雲南有個地級州，三個縣總共有35.35萬人。這個地區是滇西的主要林區，經濟支柱是採伐森林，木材加工，以及森林工業服務。森林工業及相關產業佔全州財政收入的70％以上，有的縣甚至達到90％左右。

(中國官方媒體和流亡藏人的民間媒體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有關研究部門的研究統計一致顯示，藏區的森林資源豐富。以青海、四川、甘肅境內的安多和康巴藏區為例，那裏除了幅員遼闊的土地資源和野生動植物資源，原始森林資源面積亦達397萬多公頃。格桑堅贊先生依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以四川擁有18個縣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例，說明98年以前「木頭財政」收入和中央政府投資藏區總額的比較情況。)

北明：

關於「木頭財政」，能舉個例子，說得更具體些嗎？

格桑堅贊：

比如，四川省有一個州叫甘孜州。那裏有一個江叫大渡河、還有一個江叫雅礱江，這兩個江，從1969年到90年有個數字：一共漂流的木頭就是4,500多萬立方米。這個數字是一個「甘孜州州情」裏面報的。當時，甘孜州的木頭指標，在計劃經濟裏面是七、八十元一個立方。而一個木頭的中間商(把木頭)運到成都，應該是賣到300多元，但是在成都的實際價格是800到1,000元。如果按照國際價格，我知道當時1立方米的木頭國際價格大概是7,000到8,000(人民幣)。所以呢，這4,500多萬立方米，僅僅是雅魯

江和大渡河漂流的木頭，就達到這麼多。這還僅僅是69年到90年的數字。

由於長江上遊青藏高原的生態遭到大破壞，致使長江下游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災，97年以後中央才開始開始禁止採伐。但是，這裏面通過金沙江漂流的和陸路運輸的木頭不計其數，估計在上百億立方以上。從甘孜州建政到大概97 、 98年之間，中央總共對甘孜州的投入是50多億，但是這種木頭財政對中央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其差價在幾千億元之間。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北明：

您是說這4,500多萬立方米的木頭都出口嗎？還是在國內銷售？

格桑堅贊：

沒有出口，我是按照國際價格提供一個比例。如果按照成都的市場價格，甘孜州計經委統配價格為七、八十元，與成都的價格大概相差都是700元。這4,500多萬立方米的木頭，就是按照每立方米最低差價600元計算，都是上百億人民幣的差價。這還是從69年到90年的數字，禁止採伐是97 、 98年以後的事。

北明：

您能不能告訴我，禁止採伐之前，從69年到90年，從大渡河、雅礱江漂流出去的藏區木材，按照最低差價總共收入是多少？

格桑堅贊：

我現在看到甘孜州僅從雅礱江一條江漂走的木材就達到3,500多萬立方米。這個差價，以成都的最低價格為計算，應該是210億元人民幣。這種支援國家建設的材料，叫做「統配材」。這是計劃經濟指令性計劃中的一個做法。當然這是最低的估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97、98年。這就是甘孜州的財政情況。

北明：

210個億，雅礱江一條江。

格桑堅贊：

對。

北明：

除了雅礱江和大渡河，還有那些地方大量漂流木材？

格桑堅贊：

除了上面例舉的甘孜州——雅礱江的情況以外，最多的還有金沙江裏面的木頭漂流。其它藏區如阿壩州、迪慶州、甘南藏區、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靈芝地區、山南地區都是以砍伐森林為主的木頭財政。2005年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僅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在50年的時間裏為國家上交了上百億立方木材，為支援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從這裏可以看出，區區藏區一個縣上交給國家的木頭就是以幾千億元來計算，與國家的投資和支援根本不成比例，所以我們在說國家從藏區拿走的遠遠多於給予。

開發所得大於投資和援助：礦藏資源的掠奪

北明：

一般看法認為，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多年來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補貼，而西藏中央政府的回報率非常低。這個情況您如何看？

桑東仁波切：

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西藏的礦藏資源很豐富，中央政府在西藏自然資源的開發中獲得的收入很可觀。從現在的研究發現，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投資，跟從西藏本地運出去的礦藏資源的收入差額很大，它(中央政府)得到的收入比例是很高的。

我們最近研究發現，其實中國政府現在對西藏開發的礦產種類就有160多種，其中有好多資源都是很珍貴的。黃金、白銀，還有一些更高的稀有金屬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價值很高。

在過去的50年裏，按中國政府自己的資料進行研究，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投資，跟在西藏開發資源的收入的比例(來看)，它所得到的收入

是很高的。

北明：

我再明確一下：投資的資金和開發所得，這兩者能平衡嗎？還是說開發所得更高？

桑東仁波切：

高，遠遠高於……

北明：

有具體的數字嗎？

桑東仁波切：

有這個數字，有具體的數字！現在記不起來。……比如金礦，在西藏境內有 100 多個金礦在開發。有一個資料顯示，有一個金礦每天可以開採 20 公斤黃金。

北明：

每天？

桑東仁波切：

對，每天。在衛藏也有，在康區也有，在青海也有。

北明：

這些消息從中國官方的資料來的嗎？

桑東仁波切：

都是官方資料。

北明：

每天 20 公斤的黃金開採，這是什麼時候？

桑東仁波切：

這個資料應該在 1999 年到 2000 年這中間。當時有人拿這個資料過來，包括金礦的照片和資料都有。

格桑堅贊：

阿壩州有很多金礦，2009 年 7 月 28 號阿壩州門戶網站報道：09 年 6 月份的黃金產量在 584 公斤以上。

北明：

這說的是一個月？

格桑堅贊：

對，6月份，阿壩州金礦的黃金產量是在584公斤以上。這是阿壩州政府官方網站，也就是門戶網站報道的。這種金礦在阿壩、在甘孜州、在德勤州、在西藏自治區的很多地方都有。

(據中國官方《西藏商報》2003年報導，截至2001年底，在西藏自治區已經發現的一百種礦產、1,800多處礦藏地中，探明有儲量的礦藏有36種，其中17種儲量居全國前9位。其中鉻礦、硼礦、銅礦等13種礦藏位居中國前列。而中國緊缺礦物中的鉻鐵礦儲藏量和開採量位居全中國第一，產量是中國全部這種礦藏量的90%以上。此外西藏的東玉龍銅礦也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板岩銅礦之一。

據格桑堅贊2010年8月26日提供的《中國青海省人民政府門戶網》[http://www.qh.gov.cn]的相關資料顯示：「青海是資源型省份，現已發現各類礦產127種，產地3,900餘處。編入礦產儲量表的礦種有93個，單礦種產地667處；已開採利用的礦種65個，礦區205處；已探明儲量的礦產109種(含亞種)；礦產保有儲量在價值17.25萬億元，佔全國的13.6%。在已探明的礦藏保有資源儲量中，有54個礦種居全國前十位。其中，居全國首位的有10種：氯化鋰0.18億噸，鍶0.27億噸，電石用石灰岩13.83億噸，化肥用蛇紋岩82.00億噸，冶金用石英岩3.05億噸，氯化鉀7.09億噸，玻璃用石英岩16.46億噸，石棉0.58億噸，芒硝89.32億噸，鎂鹽17.22億噸。居全國第2位的有鹽礦、碘、溴、壓電水晶、鑄石用玄武岩5種。居全國第3位的有錮、自然硫、硼、硅灰石、滑石、水泥配料用板岩、飾面用蛇紋岩7種。居全國第4位的有伴生硫、天然鹼、泥炭、長石、建築用砂、透輝石、石膏7種。此外，石油及有色、貴重金屬礦產也很豐富。

現已發現各類礦產123種，探明儲量的有97種。在全國的總儲量中，有51種的儲量居前10位，11種居首位。已經國家審定上儲量表的礦產有70多餘種，保有儲量的潛在價值達81,200億元。

格桑堅贊先生接下來一口氣列舉了幾個藏區境內正在開採中的礦物石油產地，及其產量。)

格桑堅贊：

另外，西藏自治區現在發現很多銅礦。銅礦現在是中國最稀缺的一種礦物，需要從國外進口很多。我看到昨天有一個西藏自治區發佈的資料，礦產局的局長，他那個西藏自治區的銅礦佔整個中國整個銅礦的50% 。儲藏量達到 3,000 萬噸以上。有報導說，西藏昌都地區的一個(礦)叫玉龍銅礦，每年的利潤高達 2 億多美元。這樣一些大型的銅礦到處都在開採。看看這些資料和數字：

「甘孜州州內有富集的貴重金屬、稀有金屬和有色金屬資源，非金屬、有色金屬和貴重金屬 60 個礦種，形成礦產 1,095 處，其儲量均十分豐富，被譽為『中國的烏拉爾』。其主要產品有黃金、鉛鋅礦、銅礦石、鐵礦石以及大理石、花崗石、白雲岩、石膏礦、雲母礦、硅礦石等非金屬礦產品。

鐵礦主要在道孚縣，有礦山 1 個；

銅礦主要開採區在康定，九龍等縣，有礦山 6 個；

鉛鋅礦主要在康定、瀘定、九龍、丹巴、巴塘等縣。有8個有礦山；

錫礦主要在巴塘、康定等縣，有礦山有 3 個；

金礦主要在康定、丹巴，理塘、甘孜、色達、德格等縣。其中九龍里吾銅礦從 94 年試生產到 2008 年年底，累計處理原銅礦石量 542.3 萬噸，產出銅精礦含銅量 9.3 萬噸，實現銷售收入 20.56 億元，實現利稅總額 12.38 億元，實現利潤總額達到 9.71 億元，實現稅金 5.55 億元，創工業總產值現行價 21.62 億元。

被譽為聚寶盆的青海柴達木盆地，共有33個鹽湖，經濟價值最大的是全國獨一無二的鋰礦區——東台吉乃爾湖和全國最大的鉀鎂鹽礦區——察爾汗鹽湖。已初步探明氯化鈉儲量 3,263 億噸，氯化鉀 4.4 億噸，鎂鹽 48.2

億噸，氯化鋰1,392億噸，鍶礦1,592萬噸，芒硝68.6億噸，上述儲量均居全國第1位。其中，鎂、鉀、鋰鹽儲量均佔全國已探明儲量的90%以上。而且，鹽湖資源品位高，類型全，分佈集中，組合好，開採條件優越。

目前共發現16個油田、6個氣田。石油資源達12億多噸，已探明2.08億噸；天然氣資源2,937億立方米，已探明663.29億立方米。

礦種多，品位高，產地遍佈全省各地。有色金屬礦產有：銅(儲量180萬噸)、鉛(110萬噸)、鋅(153萬噸)、鎳、鈷、錫、鉬、銻、汞等。黑色金屬礦產有：鐵、錳、鉻、鈦、釩等。另有貴重金屬礦產金、銀、鉑；稀有稀土金屬和稀散元素礦產鍺、鎵、銦、鎘、鍶、鈹等，保有儲量佔全國的63%。

非金屬礦產資源共發現礦產36種，有5種列全國第一。主要有石棉、石墨、石膏、溶劑石英石、石灰岩、白雲岩、耐火石英岩、硅石、耐火粘土等。開發利用前景十分廣闊。」

青海省的柴達木盆地是一個最大油田，光這個油田，1982年勘探到的儲藏量達到121.41億噸。這裏面，有15個油田，5個天然氣場。每年開採1.2億頓石油。從82年開採到現在，包括天然氣，一共開採了多少，我們都沒有用金錢來計算。

另外，柴達木盆地還有9個鈾礦，你知道鈾礦吧？

北明：

我知道鈾是一種礦物。

格桑堅贊：

對，污染性很重，製造原子彈的材料。有9個鈾礦在青海這個地方。像上述這些資源，從1982年勘探，這麼多年來一直開採到現在，一共獲利多少？我們都沒法用金錢來計算。而整個格爾木市已經成為漢人佔百分之九十九的移民城市，藏人在這些開採中非但沒有得到任何經濟利益，而失去的卻是自己的家園。像這樣的砍伐與開採行為，對整個青藏高原生態環境的破壞，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用金錢來計算。

流亡政府對西藏經濟狀況尚缺乏系統研究

北明：

從1950年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央政府對藏區投資多少，拿走的、所謂支援國家建設的是多少，差額是多少，這個情況，西藏流亡政府有一個哪怕是大致的統計嗎？

格桑堅贊：

我是流亡政府議會議員，不是搞研究的，沒有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我只是抽時間看大陸新聞，也零零星星收集一些資料。很多有研究的藏人，他們無法用中文接受採訪。流亡政府的相關研究都是零星的，除了這樣一些零星數字以外，我們還沒有一個詳細的投入與收入的調查數據，很多數字沒能匯總起來。

北明：

為什麼西藏流亡政府沒有進行這方面的系統研究呢？

格桑堅贊：

流亡政府自己也知道這方面需要加強。原來總是講，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到了破壞，還有藏民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包括多少寺院被毀壞，這方面西藏流亡政府的調查研究比較多，而經濟方面的研究比較差一點。原因是，在外面培養出來的經濟人才，不熟悉裏面的經濟情況；而從裏面出來的人，雖然比較熟悉裏面的經濟情況，但是都不是經濟專業人員。

現在這個問題非常迫切，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共把對西藏的投資作為統治西藏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工具，西藏流亡政府也知道研究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由於我前面講的這些原因，不僅僅是對經濟問題淡化，而且缺乏這樣的人才，所以沒能進行系統的研究。不過我們都知道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北明：

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有相當確鑿的說法和數據，說明西藏是輸血之地，

而且很多漢人，包括知識分子，對此沒有異議。我想，民眾一定也希望有機會聽到流亡政府自己的說法和解釋，看到支持您的說法的數據和事實。

格桑堅贊：

現在我們有一個「西藏問題研究分析中心」，關於整個西藏地區礦業公司每年開採量是多少，儲藏量有多少，他們都在收集。但是，每年的利潤有多少，這方面沒有研究。我覺得一年以後，可能會有比較具體的進一步的成果。

鐵路交通主要功能：運輸藏西自然資源

北明：

我還有一個問題：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了鐵路交通。一般認為鐵路與經濟發展有接關係。您怎麼看中央修建的這些鐵路的作用？這些鐵路給藏民了來了經濟上的好處嗎？

格桑堅贊：

這是個很大的話題。第一條鐵路修到青海 [1]。從青海再修鐵路到西藏首府拉薩有幾個方案，也就是所謂的「青藏方案」、「川藏方案」及「滇藏方案」。如果選擇後兩個方案修建鐵路，那是藏人最集中的地段，那麼，這條鐵路對藏人或多或少帶來一定的方便。但是選擇青藏線，也就是從荒無人煙的那曲草原直接修到拉薩，除了將大量漢人及軍用物資運進來，大量資源運出去外，對一般藏人的經濟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北明：

您是說鐵路所修到的地方不是西藏人口稠密區，而是礦藏開發區？

格桑堅贊：

就是。其實中共高層也早就說過，青藏鐵路的戰略意義高於經濟利益，現在它要把這個鐵路再延伸到日喀則，還有林芝地區，其考慮也是戰略利益。

---

[1] 據悉，從西寧到格爾木的一段鐵路多年前開通，位於藏人聚居的安多地區。因此對藏人來　　說，那就是西藏的第一條鐵路。

北明：

你說「戰略意義」或者「戰略利益」具體指什麼？

格桑堅贊：

你知道，整個青海，包括柴達木在內的很多地方，都是中國最大的油田跟氣田所在地，開採量很大。這就是為什麼青海等一些地方變成了中國的一些大的經濟城市，這都得益於青海的經濟資源。

從兩千年開始修鐵路到西藏自治區，我認為這(鐵路)最主要是這種戰略上考慮，而並非針對西藏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西藏的經濟發展，並沒有這樣的一種聯繫。因為你知道，從青海到首府拉薩的青藏鐵路沿線，很多都是荒蕪人煙的地方，西藏的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從四川、川藏線到拉薩。如果鐵路是從川藏線修到拉薩，對整個西藏的農牧民會有些出行的方便，包括對他們土特產品的銷售應該有些好處。現在他卻把鐵路修到日喀則，還有林芝地區。你知道日喀則是後藏最大的一個地區，而靈芝地區現在是「西藏的江南」，氣候最好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的中國人的數量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藏人。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有句話：「鐵路修道家門口，我還是騎著我的毛驢去出門」。所以西藏，兩百多萬平方公里這麼大的土地，火車從青海修到拉薩，對當地沿途的農牧民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中共為此要花大的投資，在三十多萬平方公里荒蕪人煙的地方修這種鐵路，我認為對當地藏民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利益，不過是一些戰略上的安排。

(2006 年 7 月 1 號開通的青藏鐵路，從西寧至拉薩全長 1,956 公里。總投資330.9億元人民幣。海外批評人士指出：只靠提供客運服務是不能夠大幅度增加藏人的收入的。外界一直不能夠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花鉅資代價來修建這條經濟價值並不大的鐵路呢？據美國之音相關的報導，外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來自印度。《印度時報》曾經引用一些觀察人士的看法認為：北京修建這條鐵路的理由，主要是加快西藏與大陸之間的整合，加強中國在印度、緬甸和尼泊爾邊界的軍事力量，以

對應邊界的意外和藏獨勢力的擴張。另一種說法，綜合了中國地質官員、中國地質專家、獨立民間評論人士和達賴喇嘛的觀點，認為由于鐵路沿線發現大量的礦藏，鋪建這條鐵路是北京開發青藏資源、推動經濟區域發展而作出的一項戰略決定。例如根據《中國新聞社》報導：前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孟憲來曾經透露說：這條鐵路的修建是國家開發青藏地區自然資源和發展經濟的佈局中的重要一環。「美國之音」的報導引述專家的話說，青藏鐵路沿線礦藏資源勘察的突破和開發，對發揮青藏鐵路優勢、推動經濟區域發展、緩解資源約束意義重大。也就是說，青藏鐵路的修建直接目的在於開發西藏的礦藏資源。格桑堅贊先生進一步論述說，青藏鐵路除了運進大量的漢人從而取代了西藏的服務行業之外，另一個作用是把大量的西藏礦產運出西藏。)

北明：

達賴喇嘛曾經多次表示擔憂：中國修建西藏鐵路是由於在西藏發現了大量自資源，是為了開發這些資源，而不是為了造福於西藏的老百姓。您對達賴喇嘛的這個擔憂有什麼評價？

格桑堅贊：

其實，至尊達賴喇嘛的原意並非這樣。至尊曾經肯定過修建鐵路對經濟命脈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把鐵路的作用用到另外一個方面，那當然是值得擔心的一件事。所以達賴喇嘛的這個擔憂就是我們全體西藏人的擔憂。你知道，整個青海，由於很早以前就通了鐵路，包括柴達木在內的很多地方已經完全漢化。而且，雖然中國最大的石油田跟煤氣田在大量的開採，但是青海藏人的人均年收入也隻有內地(人)平均收入的一半，也就是 2,600 元左右。

現在開通火車以後，這種非常便捷的、便宜的運輸方式，運輸進來的都是人。也就是說每年運輸的人達到 200 萬到 300 萬。而這裏面百分之七十是進來打工的。而整個西藏現在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及旅游業，這為大量的漢人湧入西藏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這成為政府鼓勵移民一個

做法，大量的漢人自然可以落戶西藏。同時，政府以優惠政策鼓勵這種移民，比如落戶到西藏的企業實行三年免稅及優惠貸款，轉業軍人落戶西藏，政府為之落實本人及家人的戶口等等。而這種建設大軍，包括第三產業方面的餐飲業和服務業方面漢人的技能，又優於藏人，使西藏本地的很多餐飲業，旅館服務業受到衝擊，藏人則在這種經濟建設的浪潮中被日益邊緣化。這是其一。

第二，現在它(火車)運出去的是什麼呢？大頭當然都是礦源。在西藏開的礦都是粗加工業，沒有細加工業。西藏的礦，其含量非常高的，可達到 30% 、 40% ，有些鋅，據我所知道能夠達到 60% 幾。所以都是粗礦運送出去，在內地精加工。形成一種完全從西藏運出礦源的這樣一個運輸線。

北明：

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說，修建青藏鐵路的唯一目的是推動西藏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實際上的目的是開發西藏的資源，而且導致藏民族迅速漢化，能這麼說嗎？

格桑堅贊：

嗯對。另外還有這麼一個用處：印藏之間的邊界線很長，駐紮很多邊防軍。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報導，以前完全靠川藏和青藏公路運輸大型軍用物資好像非常困難，所以現在火車的開通解決了這個問題。

「木頭財政」被迫終止後的藏區返貧現象

北明：

有沒有具體的例證，說明農牧民收入並不依靠政府補貼而是依靠天然資源？

格桑堅贊：

目前雲南境內的迪慶藏族自治州是一個地級別州，轄有三個縣，人口 35.35 萬。此地是滇西的主要林業區。以此地財政狀況為例，以前這

裏經濟維繫在採伐森林、木材加工以及森林工業服務上。財政收入一度佔全州財政收入的70%以上，有的縣達到90%左右。而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並未達到這些自治州。

北明：

您提到過，森林開發後來由於生態環境問題被禁止了，禁止之後情況如何？這些地區的經濟靠什麼維繫呢？

格桑堅贊：

可以看這些資料，四川省政協的數字：「2001年邀請四川省林委、扶貧辦、林業廳對甘孜州的『返貧』(返回貧困縣)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結果發現全州的 18 個縣中，過去 9 個非貧困縣已經全部淪為新的貧困縣。原因在於，這些縣過去是木材採伐大縣，禁伐令下達後，與伐木相關的運輸業、加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萎縮，農牧民的收入自然也就隨之下降了。道孚縣在實施禁伐令之前，全縣 4 萬多人口，竟有私人運輸卡車七百至八百輛，平均擁有載重卡車的比率據說為全國之冠。給商業、餐飲業、旅館業帶來了畸形的繁榮。但是隨著天然林的禁伐，市場一片蕭條。載重卡車絕大部分限制在家門口。幾萬元一台的車，竟以幾千元一台的價格出售。一些縣的財政收入本來是七八百萬元，結果國家禁止採伐木頭以後，財政收入只剩下 50 萬左右。甘孜州的道孚縣「木頭財政」的收入， 1997 年、 1998 年為 1,073 萬元和 1,080 萬元左右，但是到了 2000 年、 2001 年，它的財政收入降到 197 萬和 160 萬元。道孚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從 1,080 元，下降到 2001 年的 600 元的貧困水平。……」

北明：

您的意思是想說，這麼多年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經濟投資的實惠，並沒有落在藏民的身上，他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此而提高。反而是通過中央政府對西藏礦物資源的開採業和加工業才有所提高。但是，這種開採一旦被禁止，藏民生活水平就返回到貧困水平了。

格桑堅贊：

啊，對。

北明：

請告訴我，當地政府採取了什麼措施緩解森林砍伐叫停後的貧困狀況？

格桑堅贊：

(引述)「為了保工資保穩定，不得不挪用各種項目資金。縣領導無奈地說：除了填表的錢我不敢挪用，連救災款都挪用了。……形成了惡性循環。據統計，2001 年 6 月，道孚縣已挪用各種項目款 2,000 多萬元。」

西藏農牧民生活依賴自然資源及其市場價格 (冬蟲夏草、松茸)

北明：

中國官方的統計說，50 年以來，也就是 49 年以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投資和財政補貼纍計達到 400 多億元，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格桑堅贊：

我看到一些數據，證明了中共對西藏的這種投資對西藏的農牧民並沒有帶來多少利益。比如新華網的一個報導，是關於西藏的冬蟲夏草的：西藏自治區有個農牧廳的廳長叫「堅贊」，跟我的格桑堅贊(名字中的)「堅贊」一樣，他說，西藏牧民人均冬蟲夏草的收入達到1,260元，約佔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50%。怎麼講呢？在西藏很多地方，冬蟲夏草的價格非常貴。比如 2006 年西藏蟲草產量是 52.03 噸。這種冬蟲夏草它是天然生長的一種草，因為它市場價格很好，開採這種(蟲草)，農民的收入(就)提高。

北明：

冬蟲夏草的收入 1,260 元，約佔人均收入的 50%。您的意思是說，如果西藏人的生活水平有提高，那他們是通過冬蟲夏草這一類的自然資源利用，而沒有得益於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是這樣的意思嗎？

格桑堅贊：

對！除了那個冬蟲夏草以外，像西藏的很多地方，他第一，有一種

松茸你知道吧？松茸。

北明：

哪兩個字？是一種植物嗎？

格桑堅贊：

對！就是那個松樹的「松」，鹿茸的「茸」。一個草下面一個耳朵的耳。出口到日本，新鮮的時候價格最好的時候，一公斤能賣到 1,000 人民幣。整個甘孜州、整個迪慶州，包括很多地方的農牧民，他最好的(經濟來源)就是松茸。有些地方的農牧民每年的松茸平均收入可以到 3,000到4,000元。但這些都是天然的資源，由於市場價格好，所以農牧民的收入得以提高。

據2001年12月26日《中國食品網》報道：「日前從雲南省有關部門獲悉，2001年雲南鮮松茸出口創匯突破5,000萬美元大關，成為綠色經濟的一個亮點。」

北明：

所以……

格桑堅贊：

如果這種蟲草價格不好，松茸價格不好，農牧民的收入馬上會降到最低。並不是中共的這種投資給西藏的一般民眾帶來經濟上的利益。

北明：

藏民沒有其他主要的收入來源嗎？

格桑堅贊：

除了這個收入以外，你知道西藏礦藏的開發，都是內地的大企業在做。藏民去採黃金，每天可以採上個六、七十元的收入，有時候好的話，採上一百多元、八十多元。當地的百姓最多可以去打工掙一些錢。所以農牧民的收入提高，並不是依靠中央政府的投資，而是依靠這些天然資源。如果蟲草價格不好，農牧民的收入馬上會降到最低。

北明：

藏民的經濟收入，除了前面說過的，依賴於當地的礦物資源，也依

賴植物資源。而這些資源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或任何人為的因素，就會直接影響藏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說，藏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不依賴於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

格桑堅贊：

啊，你說的太準確，我就想說這些。

國家財政投入豢養地方官員，半數藏民不獲益

北明：

格桑堅贊先生，藏人心目中的西藏，跟中國政府所說的西藏自治區的概念一樣嗎？您怎麼看西藏這個區域概念？

格桑堅贊：

對西藏這個概念呢，我們應該首先澄清，中國講的是一個西藏自治區，我們在海外的西藏，講的是整個藏人居住區，包括青海的藏區、包括甘肅的藏區、也包括四川、雲南藏區。共有一個自治區、十個自治州、兩個自治縣。當然也有很多所謂的藏族鄉，但生活在那裏的藏民從語言到文化幾乎沒有藏人的特徵了。

北明：

李江琳女士， 600 萬藏人裏頭，西藏自治區的周邊地區，就是安多、康巴地區，也就是中國所說的青海、甘肅、四川境內的藏族自治州中，藏民人口佔多大比例？

李江琳：

50% 左右。可能很多漢人不知道的一點是，所謂的「西藏」實際上是指的是「西藏自治區」。國家的很多財政投入是投入在西藏自治區，並不投入到周邊地區，也就是沒有投入到所謂的「大西藏」地區。原來的西藏山區中的康巴和安多地區，並沒得到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資金。

北明：

實際上也就是說，我們從官方得到的那些信息：西藏受益於中央政

府的投資和經濟建設。可是這些經濟建設只達到藏族人口的一半，另一半地區人口並沒有受益。能這麼說嗎？

李江琳：

對！事實上基本上是這個樣子。這些地方實際上是很貧困的。國家的財政投入對他們沒有任何的直接利益。相對而言，經濟上在這個國家投入上得利比較多的也就是西藏自治區。

北明：

您認為中央政府給西藏的錢都上哪兒去了？

格桑堅贊：

中央對西藏所謂的投資，從1965年到2004年，968.72億，這都是對地方財政的補助。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前幾天有個講話：到現在，西藏的財政收入自給率才達到10%。所以呢，中央的大量投資，其實是供養了一個利益集團，對一般的西藏農牧民百姓民眾並沒有產生很大的效益。

三、西藏歷史歸屬

採訪時間：2009年9月

採訪地點：華盛頓——紐約

受訪人： 曹長青，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作家，長期關注西藏問題，支持西藏人民的獨立權利，譴責北京對西藏的殖民統治。曾主編《中國知分子論西藏》一書，並著有《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獨立的價值》、《美國價值》等專論和專著。



曹長青肖像

西藏歷史上是獨立國家

北明：

一直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央政府都宣稱，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大部分漢人對此一說法耳熟能詳，從不懷疑。即便懷疑，也缺乏足夠的資訊進行確證。另一個引人注意的事實、和導致中藏談判破裂的重要因素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即便在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認可西藏目前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時候，仍然堅持不能改變西藏曾是獨立國家的歷史事實。你作為長期關注並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如何看待中國官方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關於西藏歷史歸屬問題上的不同？

曹長青：

達賴喇嘛在過去十幾年來一直強調「中間道路」：不追求西藏獨立，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但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北京當局則要求達賴喇嘛必須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達賴喇嘛認為，歷史事實不是這樣。我曾在一個歐洲會議上，直接聽到坐在台上的達賴喇嘛說：我是一個和尚，和尚的舌頭不能說假話。他說，事實是，西藏在歷史上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到底是誰對、誰錯？其實只要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看到，北京當局強調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說

法，至少有兩個錯誤：第一個，不符合歷史的真實；第二個，不符合邏輯常識。

第一個我們來看歷史真實：一般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五個大的朝代：唐、宋、元、明、清。在唐朝時期，西藏不僅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呢。西藏吐蕃王松贊干布兼併了各部落為統一的國家，並擴展疆土。西藏的軍隊還曾一度佔領了唐朝的首都長安。很多中國人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也就是把她送去給西藏國王松贊干布做妃子，尋求雙方和好。唐朝和西藏，雙方在長安還建了一個碑，說大家以後再也不要互相侵犯了，咱們是親戚了。長安附近的這個碑還在呢，這些史實都證明，西藏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北明：

可是後來中國政府說，這個文成公主恰恰證明了西藏和中國的密切關係，就證明了西藏屬於中國。

曹長青：

我們從常識邏輯角度，你把自己的女人送給另一個國家的國王做妃子，你是強大還是軟弱呀？你強大怎麼把女人給送去呢？而且文成公主願意嗎？不願意呀！去西藏高原，一個她沒見過、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人，就是她丈夫了，而且是另外一個族群、另外一塊土地、另外一種氣候！是你被迫嘛！因為你打不過人家嘛！

北明：

這種兩族的婚姻不能說明西藏的歸屬。

曹長青：

當然了，兩族通婚怎麼就是歸屬關係呢！今天西方哪個國家，會說我把女人送給你這個國家元首做太太，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了，這是什麼邏輯呀？荒唐嘛！今天中國任何一個歷史學家，包括研究西藏的牙含章們，大家過來討論一下，你說那個唐朝長安被佔領，是誰佔領的？西藏是不是一個國家？難道是你國家的一部分把你自己國家的首都給侵佔了？有這個邏輯嗎？所以這是一個歷史常識的問題！

北明：

您再談一談忽必烈跟……

曹長青：

好。我們看六個主要朝代「唐宋元明清」，唐朝後，就是宋朝。宋朝時，西藏和中國沒什麼關係，歷史記載也較少。宋朝完了是元朝。元朝有關係，是什麼關係呢？元朝的時候，不論宋朝的領土，還是西藏，全都被蒙古人佔領了！成吉思汗的鐵騎遍及亞洲甚至歐洲。中國人把蒙古人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一個朝代(元朝)，當成自己的一個歷史朝代，這本身在邏輯上都是有點問題的。但即使這樣，你怎麼能說，蒙族人把兩個地方都佔了，你卻說他們另外佔領的那個地方，就是你的一部分呢？這在邏輯上怎麼能說得通呢？何況蒙古人沒有直接統治西藏，因為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藏人大喇嘛八思巴為整個蒙帝國的最高上師，相當於國師，讓他主掌西藏政教權力，元朝時，藏人是自我管理的。今天，只有蒙族人出來說，你這兩個地方都是我們的一部分，那還可能有一點點邏輯。

北明：

也就是說把蒙古人統治作為元朝，然後認為這是中國的歷史，所以也就是說，蒙古人佔領了西藏也就等於中國人佔領了西藏？

曹長青：

如果北京當局的這種邏輯可以成立，那是不是可以說，俄羅斯是中國歷史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因為蒙古人當時把大半個俄羅斯也都佔領了。為什麼你不說？你說不過人家嘛，人家強大嘛。你為什麼說西藏是你的一部分，因為西藏在你手裏，你欺負人家，不講理、不講歷史的真實嘛！

元朝完了是明朝。明朝也跟西藏沒有多少聯繫，跟宋朝時差不多，歷史記載很少。互相有個冊封呵，附庸風雅，我尊崇你是什麼偉大皇帝，你尊崇我是什麼上師法王，以這種方式，互相表示友好而已。

西藏和中國的關係主要發生在清朝。有四次，清朝的軍隊進入了西藏。幹什麼呢？是應達賴喇嘛的要求來平亂和抵抗外敵的：因為尼泊爾入侵，內部和尚造反等等，那麼我就請你清朝來幫我們平亂，平亂以後清朝軍隊就回去了。為什麼清朝軍隊做這個事呢？因為雙方有特殊的關係，叫施主和被施主。這是什麼關係呢？就像今天的意大利和梵蒂岡的關係似的。梵蒂岡是天主教的聖地，最高領袖是羅馬教皇。意大利作為世俗世界，對我們梵蒂岡又送水、又送藥、又送吃的。由於對我們的尊崇，意大利境內的天主教徒們，就會信服意大利政府，使世俗社會更穩定。打個比方說吧，當時清朝和西藏的關係就像一個村子旁有個和尚廟，這個廟宇沒有宣佈過獨立，因為沒必要；而這個村子，也不強調廟宇是我們村的一部分。這是一種互為友好、互利互惠的關係。我們的村長帶領村民尊奉和尚廟的喇嘛，給你送水送吃的，做施主。尊奉喇嘛，有助於村子的穩定，因為村民多是佛教徒，廟宇的喇嘛是村民的精神領袖。這是一種施主和被施、物質和精神的互惠關係。它不是一個典型的西藏是清朝的一個省、一個州、一個下轄市的關係，它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滿清皇帝順治，那是清朝很強盛的時候，當時第五世達賴喇嘛，跟滿清皇帝見過面的。達賴喇嘛和中國皇帝見面只有三次。第一次就是第五世達賴喇嘛和順治皇帝見面，那是公元一六五二年。當時順治皇帝是出城四十里迎接的。之前有漢臣說，你是一國之皇帝，而且是天下之國——全世界他都是最高中心了——你怎麼可以去迎接一個喇嘛呢？但是順治認為，達賴喇嘛是最高上師、佛教法王，為了我們大清的穩定，促使信佛教的外蒙歸順，必須迎接，給予禮遇。

北明：

當時他還為了跟這些大臣能夠說得通，找了一個藉口，好像是他假裝出遊打獵遇上的，但是實際上他是有心要去迎接。

曹長青：

對，是這樣的。我們看看，在清朝最腐敗、無能的時候，來了個英國特使，清廷還要人家下跪呢！而在順治統治的清朝強大時期，皇帝怎麼可能親自出城迎接一個外臣呢？雖然說我是打獵，路遇的，但這明顯是變通方法，出城四十里，就是一個頂禮迎接的方式。

再有一個就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就是現在達賴喇嘛的上一世，也跟中國皇朝的掌權者見過面，跟誰？跟慈禧呀！慈禧太后當時垂簾聽政。後來還有一個關於這個場面的壁畫呢，在中國的什麼檔案館保存著。中國官方學者、西藏問題專家牙含章寫的那本《達賴喇嘛傳》，一打開就是這個壁畫照片，是慈禧太后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並排坐在金鑾殿上。中國哪個皇帝允許下面的郡主、大臣、將軍，甚至外國的使臣什麼的，和他並排坐在金鑾殿上？不可以的，都是跪在下面的。

北明：

慈禧太后是個佛教徒。

曹長青：

從這些對達賴喇嘛的特殊禮節，也可以看出，西藏並不是滿清王朝的下屬。它不是一個上下級的從屬關係，而是一個特殊的關係，是一個佛教法王和世俗領袖的被施和施主的互利關係。這些都說明，西藏不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這樣的。

北京當局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說，Yes，承認了；要求他承認「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按道理達賴喇嘛是不適合對此表態的，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歸達賴喇嘛說呢？他們整個就是逼迫人嘛，不講理。但是達賴喇嘛為了能夠和北京政府有個談判的機會，能夠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還是讓步了。在一個場合說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現在北京又有第三個要求了，要你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說，這個我不能說呀！我是達賴喇嘛，我是上師，我是轉世活佛，但我不能改變歷史呀！所以他說「和尚的舌頭不能說假話」。現在僵局就在

這裏。

西藏自1950年始失去獨立主權

北明：

那也就是說這個西藏獨立的歷史是從1950年開始改變的。

曹長青：

是的。當時中共大軍壓境啊。共產黨剛打敗了國民黨，士氣正旺；另外它的軍隊太多了！當時解放軍的兵力，超過了整個西藏的人口，這個仗怎麼打呀？你全部人口還沒人家軍隊多呢！再加上藏人多是佛教徒，佛教強調不殺生，哪有發展軍隊呀？怎麼打呀？沒法打的！

北明：

他們當時只有七千人的軍隊。

曹長青：

是的，同時共產黨又軟硬兼施，來了個虛假的方式，跟你簽《十七條協議》，什麼「和平進藏」呀、「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政教領袖地位不變」呀，「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切照舊」、「不拿藏人一針一線」等等。好，等解放軍進去了拉薩，就開始給你社會主義改造。拆毀寺廟呀，讓你尼姑還俗呀，整個做這些，逼得藏人最後起義造反、抗議，結果被嚴酷鎮壓。

所以我說整個北京的宣稱，既不符合歷史真實，也不符合邏輯常識。我們今天看，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在宣稱，這裏那裏是我們自古以來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是誰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呀？這個世界從來都是分分合合的，尤其是中國的歷史！什麼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多少朝代，都數不清了。誰是誰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自古以來不可分割」，這八個字本身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想法，一個霸權的說法。但是它就可以這麼說，為什麼？今天無論是新疆問題，

尤其是西藏問題，主要是中國沒有一個講理的地方。共產黨他不講理呀，他壟斷所有的報紙、電視、電台、雜誌。

西藏在民國時期完全自治

北明：

曹長青先生，還有一個問題我要問你，跟這個有關係。就是，如果說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是極權的統治，它壟斷了所有的言論，非要說西藏就屬於中國。那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反對共產主義，信奉三民主義，為什麼它也這麼說呢？這裏面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請你分析一下。

曹長青：

但是現在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越來越改變啊。當年在蔣介石的時候就有一個講話，當年蔣退到台灣以後，說西藏到底怎麼樣，是選擇獨立，還是自治，由西藏人民自己決定。他有過這麼一個講法。

北明：

可是他當時也入侵過西藏？

曹長青：

那是清朝末期，清軍攻進了拉薩，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領導藏人，把清軍全部趕了出去，再次重申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國民黨軍隊沒有入侵過西藏。國民政府時期，西藏基本是「事實獨立」，蔣介石政府對外說西藏屬於中國，但藏人完全自治，當時國民政府駐藏人數，都規定不可超過一百人。

當然，國民黨也有一個邏輯問題。如果你說西藏不可分割，那麼你怎麼允許外蒙分割了呢？那蒙古是多大一片土地呵。而當時蔣介石政府允許外蒙古人民進行公決、公投的。為什麼允許呢？有蘇聯在背後，蘇聯支持嘛，當時國民黨政府惹不起蘇聯嘛。那後來共產黨取代了蔣介石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你怎麼不跟蘇聯要回外蒙呢？你怎麼不

說那個公投是無效的，是你們蘇聯在背後支持造成的，怎麼不敢了呢？他是強權政治嘛！當俄羅斯比你強大，你不敢了嘛。現在全部的問題是只要強權，我惹不起，所以承認了。北京當局現在怎麼不說外蒙是中國歷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而歷史上外蒙確實是和內蒙一體的。遲到二十年代才分割出去的。

西藏獨立的標誌

北明：

西藏在歷史上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有沒有一個獨立的標準呢？

曹長青：

當然有！人家有國號叫Tibet，中國人翻譯成西藏了，西藏人自己叫吐蕃，圖博；人家有自己的國旗，雪山獅子旗；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元首達賴喇嘛的產生方式；有自己的首都拉薩；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稅收；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歷史。不久前台灣有個展覽，展出一些當年西藏人出國的護照，有其他國家蓋的簽證什麼的。符合一個國家的這些條件人家都有啊。所以今天我們看西藏的歷史，西藏是不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在這明擺著的。尤其歷史這個事情是誰也動不了的。不論你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多少有強權的人都改變不了歷史。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誰也不可能改變的！



西藏紙幣　西藏錢幣　西藏郵票

四、西藏的自治訴求

採訪時間：2009年9月

採訪地點：華盛頓——紐約

受訪人： 貢噶扎西(Kungs Zashi)曾任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和翻譯員、「安全部」分析員、「達賴喇嘛駐台代表處」秘書長。現任「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中國華人事務及西藏問題研究」負責人。



貢噶扎西肖像

自治的要義：「保護、延續西藏宗教與文化」

北明：

在解決西藏問題上，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堅持走中間道路，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下的自治。中間道路和自治主張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貢噶扎西：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尊者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為漢藏兩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維持穩定與和睦相處，而提出的的一個政策和立場。中間道路歸納起來，有比較重要的幾點：第一個是不尋求西藏獨立，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尋求所有藏人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就是中間道路的基本思想和精神。還有一點，是西藏的政治外交與國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宗教、文化、教育、衛生、生態環境等有關的事務由藏人負責。中間道路最終的目標，就是保護和延續西藏的宗教與文化及藏民族的特色。

放棄獨立，尋求自治，互利雙贏

北明：

您如何解讀您所陳述的這種自治的利益所在？

貢噶扎西：

它有一個共同的利益。西藏問題如果獲得圓滿解決的話，這是符合中國國家的長遠利益和藏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所以這就是中間道路的要點。中間道路，我們顧名思義嘛，它一定有兩邊，一邊就是達賴喇嘛不尋求西藏歷史上的地位，另外一邊是也沒有辦法接受目前在西藏所實行的政治制度——即名不副實的自治。所以，「中間」呢，就是在憲法的框架內，所有藏人獲得一個名副其實或真正的自治。

北明：

也就是說，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放棄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這個事實？

貢噶扎西：

沒有錯。

北明：

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夠認可目前西藏的現狀？

貢噶扎西：

對！現狀。因為目前，它雖然憲法裏面明文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條款裏面呢，寫得很漂亮，但是(實際)執行的與條文不一樣，「名副其實」跟「真正的自治」這個詞很重要。如果藏民族沒有真正的自治，就不能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與文化。所以達賴喇嘛尊者一再強調，只要藏人獲得真正的自治，我們願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內。

藏人自治主張是應邀提出的

北明：

藏人尋求自治的這個主張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向中央政府提出來的呢？

貢噶扎西：

自從2002年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之間恢復直接會談後，到目前為止共舉行了八次會談。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是根據中央政府於2008年7月第七次會談期間提出的建議，在去年2008年的10月份，我們向北京政府提交的。那個意見書裏面，我們所要求的自治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我們說得很清楚了。

自治的細則及其針對性

北明：

雖然您說自治的情況，在提交的文件裏說得很清楚了，我還是要請您介紹一下情況，因為這份文件在大陸是禁文，大陸人們看不到。我看這個自治的文件，裏面關於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的條文裏，有語文，也就是希望保留藏語。

貢噶扎西：

是。

北明：

還有文化。希望保存西藏的文化。

貢噶扎西：

是。

北明：

其次是宗教，真正的信仰的自由。

貢噶扎西：

沒有錯。

北明：

此外還有教育，就是希望藏人能夠參與或者是決定西藏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

貢噶扎西：

沒有錯。在環境保護方面也是如此。

藏語危機

北明：

既然提出這樣的願望和想法，那就是說這樣的願望和想法目前沒有實現。也就是說，這些自治的條款是有具體針對性的。那麼我想知道這些具體的針對性指的是什麼呢？比方藏語，現在在藏地區藏人還是能說藏語的，為什麼提出這個要求呢？

貢噶扎西：

我給你舉個例子：在西藏，比如說有三個名額要錄取藏族幹部，你考試的時候，第一個主要為主的就是漢語文，如果你用藏語，那些上級單位理都不會理。這種情況在西藏農牧地區跟鄉村地區是非常的普遍。既然是在西藏的一個單位裏面(錄取幹部)，照理講就應該以藏語為主，因為本民族的語言行為，並不是如此。

「黨管一切，漢人當政」

北明：

我明白了。另外我們談一談文化。現在強調西藏自治要保存藏族自己的傳統文化。那是不是意味著，這些傳統文化在藏族地區和藏人當中已經被破壞殆盡了呢？或者是遭到了大部分的毀壞了呢？

貢噶扎西：

因為西藏的方方面面與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談到文化的時候，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西藏的宗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22條、47條、89條，還有《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第38條中，明文規定了保護文化的條款。如果你仔細去讀這些的話，這裏面寫得很漂亮，但是實際執行的時候，並不是如此。所以我們一再要強調，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裏面規定的那些條款呢，必須要把它們執行起來，就是我們所講的真正的自治。這不光是達賴喇嘛尊者跟西藏流亡政

府在講，我相信您知道，老共產黨員、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多年的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先生，在今年(2009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撰寫的〈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一文中說：「60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必須要有一個真正的自治，原因就在這裏。

寺院中的愛國主義

北明：

我再具體問您，關於宗教。對於西藏寺院的管理、西藏一般的宗教活動、師徒的關係，還有轉世靈童的確認等等，這些西藏自己的佛教事務，在藏區是不是中國中央政府都干預呢？或者他們直接插手進行……

貢噶扎西：

直接插手。您知道，寺院是宗教文化的中心之一，也是修煉佛法的主要場所，但是目前在西藏的各個寺院，都由所謂的 「寺管會」(「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控制，進行的都是愛國主義教育。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什麼宗教信仰自由。寺廟被監控起來，等於剝奪了宗教信仰自由。

北明：

在文化大革命前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六七千寺院毀得只剩下六座還是七座，而且這六座還是七座，也是半毀滅的、殘缺不整的。後來呢，又修復了一些，那麼這些修復行動，是不是意味著中國中央政府還是承認西藏的宗教，修正了自己的錯誤呢？

貢噶扎西：

不是。我剛剛講過，寺院是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改革開放後，寺院成為主要的旅遊資源之一。因此，中國政府屈於(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在80年代對外開放的時候，進行了寺院的維修。但是要知道，(基

本上是藏族)老百姓自己出力出資修寺廟，國家投入很少，後來國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還是老百姓。我認為寺院的維修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承認西藏的宗教。

北明：

那目前這些修復的寺院，內部管理狀況如何？

貢噶扎西：

如果我們講現況的話，各宗教(寺院)裏面現在學習主要有六本課本，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關於憲法的、關於政治的、還有關於歷史的。「寺管會」不管寺院的行政改善工作，行政管到佛事上去了。把寺院看成不穩的因素，出家男女僧侶說成是「分裂分子」。寺院的管理，目前處于非常糟糕的狀態。

北明：

您是說寺院裏頭啊？

貢噶扎西：

寺院裏頭都有「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課本嘛。然後在各個寺院，不管大小，都有一個「寺管會」。寺管會其實就是一個中國政府在裏面安排的一個機構。出家不出家其實是您的自由，但是那些寺院，你18歲以下的話，你不能出家。然後，一不聽寺管會的下令，你就必須要離開寺院。比如說，寺管會在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時，要求僧侶反對達賴喇嘛等，如果拒絕就遭到開除。

北明：

意思是把你開除了？不讓你在寺院呆著了？

貢噶扎西：

對。不讓你在寺院。比如說在「愛國主義教育」裏面，他們列一些考卷。就是說「達賴是分裂主義的頭目」、「我們承認北京認定的班禪」，「我們不承認……」，請那些出家人簽名。身上穿著袈裟的出家人，去批判達賴喇嘛，那怎麼可能嘛！在心靈上、感情上都沒有辦法做

到。所以你拒絕簽名的話，你就不能呆在寺院裏面。因為這樣的情況，前幾年， 2006 年、 2005 年，在西藏各地發生中國政府所謂的不穩定因素，就是他們造成的。因為有了這些情況，有些人是自殺、有些人是哭訴、有些人是離開寺院。

北明：

您是說那些出家的喇嘛和尼姑？

貢噶扎西：

對！就是這個情況。所以在寺院裏面，根本沒有一個機會去學佛法。就因為如此，每年平均1,500到2,000的藏人，跋山涉水呀，從尼泊爾來到印度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求學。如果在西藏境內，真正有宗教自由，真正能夠學佛法的話，那些小孩子為什麼千里迢迢啊，離開父母，為什麼流亡到異鄉呢？

漢化教育

北明：

我們談談教育問題。目前在西藏自治區和藏人區域教育是什麼狀況？藏人的兒童有機會學習他們的語言嗎？

貢噶扎西：

不是沒有機會學，一般中學一天有六堂課，可能有一節或二節藏文課。那漢文(課)說不定有三節、四節。

北明：

學校教學語言是漢語還是藏語？

貢噶扎西：

據我瞭解，學校的教學除了藏文課之外，都用漢語。過去80年代，前班禪大師跟阿沛阿旺晉美，一再強調學習、使用、發展藏語文的重要性。有位西藏教育界的學者，叫扎西次仁。他在 2007 年 1 月 7 日，呈給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的信中說：1987 年決定《實行藏漢並重、藏文為主大方針、

在西藏建立使用藏語文進行教學的教育體系》，而這個決定是鄧小平先生和兩位藏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大力支持下產生的。但時隔十五年後，在2005年5月22日通過的《關於學習、使用、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和實施細則中，這一重要規定被刪除了。

2007年7月，國家民委文宣司按上級有關的批示，在北京專門為扎西次仁的《「謹呈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的信」》的專家意見中明確的表示：扎西次仁先生寫給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的信，觀點十分正確。新《規定》的這種不足和負面的影響，從長遠看不僅不利於西藏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更不利於促進民族團結、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不利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因此，扎西次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件關係到藏民族語言與文化能否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大事，應該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並根據《憲法》和《自治法》的有關精神，通過相關的法律修正案求得妥善解決。

但是到現在，西藏還是漢語文為主，並沒有落實相關的規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說，為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與文化，所有藏人要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的原因。

北明：

那麼，在漢語教學的西藏的學校當中，藏人有沒有機會了解自己的歷史呢？

貢噶扎西：

沒有。我也是在西藏拉薩讀過書的人。有歷史課，沒有錯：中國歷史。把真正的那些歷史，都不教。這些教材裏面，必須要符合黨和政府的口氣啦！如果沒有這些言語的話，你的書在學校裏根本不能成為教材。在統一教材裏寫的都是政府的版本，再加上沒有新聞自由，學生接觸不到其他不同的觀點。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一代的漢族同胞不瞭解西藏真實情況的主要原因。

北明：

也就是說，藏人在學校裏頭學的是漢人的歷史，而且這些歷史也是

經過修改的？

貢噶扎西：

經過修改的。藏人的文化呢藏人比較熟悉。我們希望藏人能夠直接參與、制定一個屬於西藏自己的教育制度，我們希望在教育方面自治。因為憲法裏面也有規定嘛，國家要保護公民享有的義務教育。

北明：

在去年 10 月份正式向中國中央政府遞交了自治方案之後，中央政府是如何回覆的？

貢噶扎西：

當時呢，中國政府用 12 個字把它反駁了，就是「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大西藏」。

五、「大西藏」的問題

採訪時間：2009 年 9 月
採訪地點：華盛頓——紐約
受訪人：貢噶扎西(Kungs Zashi)(同前)

西藏流亡政府否認「大西藏」有關指責

北明：

貢噶扎西先生，中國官方關於「大藏區」的指責，您也許耳熟能詳。我想最直接的指責來自 2008 年 10 月 3 日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接受 CNN 記者專訪時的談話。針對西藏要求實現憲法規定的自治權利問題，溫家寶總理回答記者時這麼說的：

「他(指達賴喇嘛)在世界許多地方到處宣傳『大藏區』所謂的『自治』，就是要利用宗教干預政治，從而使『大藏區』脫離我們的國土主權。很多美國人不知道『大藏區』究竟有多大。『大藏區』包括西藏、四川、雲南、青海、甘肅五個省，所以所謂『大藏區』相當於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幾十年來，我們對達賴喇嘛的宗旨沒有改變，只要他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他放棄他的領土主權活動，我們就願意跟他或者他的代表進行接觸和商談。這種商談的結果，關鍵在於誠意。」

當 CNN 記者問「您希望看到達賴喇嘛什麼樣的誠意」時，溫家寶先生回答說：「其實我們已經對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個人呢，說得很清楚了，我們不僅要看他說什麼，還要看他怎麼做。他的誠意就應該表現在他放棄西藏的主權。……」

貢噶先生，藏人不僅生活在西藏自治區，也分佈在其他的四個省份：

四川、甘肅、雲南、青海，這整個區域相當於中國版圖的四分之一。鑑於這個事實，我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談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所提及的這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下實行自治」的這個意願的時候，漢人心裏就會想，您這個「自治」，就是自我管理，這麼大一個版圖，人口密度這麼高，如果您把這個版圖拿走，中國的領土就少去了四分之一，這個情況在目前現狀下很難接受。我就想知道，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怎麼想。

貢噶扎西：

是。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現在整個華人社會，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境內，老百姓沒有一個很自由的、多方面信息去瞭解真實情況的一個機會。我們提出中間道路跟自治意見書以後，中國大陸沒有辦法用憲法的條款來反駁我們的意見書，所以他就用了「這是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另外他用「大西藏」這個概念來反駁我們。

北明：

我想弄清楚，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在正式遞交中國中央政府的有關自治意見書中，究竟有沒有提出過「大西藏」的概念？

貢噶扎西：

西藏就是西藏，根據《憲法》關於少數民族自治的精神，並不存在「大」、「小」西藏之說。藏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的一個。一個少數民族不能被分為「小」「大」或「更大」。當然，如果這些自治地區改由一個自治機構管理，管轄面積肯定比現在大。但這並不意味著西藏或藏人更大、更強了。我們關心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向世界闡述這一議題。

事實上，藏人要求由一個自治機構來管轄所有的藏人自治地區。但是把藏人的這些要求說成「大西藏」，聽起來，人們尤其是漢人覺得好像我們要求分離，或者我們要把目前中國版圖四分之一的領土劃過去。其實這不是合乎實際的一個解釋，這種表述讓藏人感覺是在故意誤導人們。

(關於「大西藏」的指控，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2009年8月日內瓦召開的「全球漢藏討論會」的中文記者招待會上，有過相應的回應。達賴喇嘛首先澄清了「大西藏」這個概念：它不僅是指西藏自治區，而且是憲法裏明文規定的所有藏人居住區；其次，達賴喇嘛明確否認了中國官方的指控，他說：「一提到西藏，特別是一提到『大西藏』，人們就感覺到這個西藏好像變得很大了，其實我們不是(人們認為的)那樣，我們尋求的是憲法裏面的這些藏族地區。我們也沒有尋求獨立跟分裂，我們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西藏的宗教與文化，尋求一個真正的自治。所以這個自治是在憲法裏面明文規定的，我們希望明確地去實施這個自治。」)

西藏自治是一個行政概念，而非領土或主權概念

北明：

貢噶先生，在正式遞交給中國中央政府的有關自治文件中我看到有這樣一條，是第五：「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西藏人要進行統一的管理」。這個「統一的管理」，跟版圖、區域的劃分有沒有關係呢？跟中國中央政府所說的「大西藏」問題有沒有關係呢？是什麼關係？

貢噶扎西：

這兩個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大西藏」是中國政府的解釋、中國政府的版本，我們的意見書裏講的就是一個行政的概念，並沒有牽涉到主權的問題。

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在憲法裏面的55個少數民族，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所謂的那個領土的問題。這裏如您剛剛談的，除了西藏自治區以外，在四個省裏面的藏區怎麼辦的問題，對不對？所以我們說，所有藏人，必須獲得名符其實的自治，意思就是說，除了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以外，同一個語言、同一個宗教、同一個風俗習慣、同一個民族的四個省份的藏族，也要真正的自治。所以，這是一個行政的概念。如果我一半要民族自治，一半不要民族自治，那我們怎麼向藏人解釋？達賴喇嘛尊者怎麼跟藏人解釋？

(要求中國境內的藏人居住區全部統一實行藏人自治的行政管理，不等於要求這些居住區的領土主權，不能冠之以「大西藏」的概念並刻意地曲解。為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桑東仁波切在2008年9月25日在達蘭薩拉他的辦公室內接受中國宗教問題專家李江琳女士的採訪時，具體闡述了自治條款中有關統一藏族區域自治這一要求的必要性，他說：「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概念，是針對每一個少數民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55個少數民族，西藏這個少數民族，是一個少數民族，不是十個或十五個少數民族，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自治區。這也就是我們放棄分離和獨立的原因。」他說，「當我們接受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必須適當地建立。也就是說，我們應當有一個包括全體藏民族的民族區域自治。這不是一個領土問題，也不是什麼其他問題，只是一個有關人民的問題。」)

北明：

貢噶先生，我再跟繼續您咬文嚼字一下。在自治的文件裏頭，第二條是「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說的是「拋開現行的行政區域，所有藏人作為同一的民族，統一居住的現實必須得到尊重」，這是什麼意思呢？

貢噶扎西：

現在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人，有自治區政府來管，阿壩藏族自治州跟甘孜藏族自治州由四川省來管，青海省的自治由青海省來管理，沒有一個統一的管理，而且有些地方沒有自治條款。所以我們認為，因為這幾個地方的文化是一個文化，民族是一個民族，語言是一種語言，文字是一種文字。所以，這些同一個民族、同一個語言、同一個風俗習慣、同一個宗教的人，必須要在一個自治機構管理。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2008年9月25日在達蘭薩拉他的辦公室內接受李江琳的訪問時，論述了統一藏區行政管理在管理和民族團結方面的優勢。他說：「如果藏人有一個統一自治區，中央政府跟自治區打交道就會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語言保留、文化認同將會一次性實施，而不是分許多層次，這樣將會有助於藏人與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感情上的團結，這就是我們這方面的理由。」)

「我們是要求統一，要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合」

北明：

也就是說，在行政上，所有有藏人的地區都要統一保留藏族的文化、語言、風俗環境、宗教等等？

貢噶扎西：

沒有錯。

北明：

但是這些地區仍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在主權上，安多和康巴區仍然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只是在行政管理上實現自治，不存在什麼「大西藏」的領土問題，是這樣嗎？

貢噶扎西：

是。不存在「大西藏」跟把這些藏區從中國脫離和劃分的問題！

(不僅不存在脫離中國或獨立的問題，而且相反，桑東仁波切在指出統一藏區行政管理在管理與民族團結方面的優勢之後指出：「我們並不要求分離，我們是要求統一，要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合。就此而言，區域的大小根本就不是個問題」。桑東仁波切重申說：「根本不存在領土問題」。)

「『大西藏』不是我們製造的一個術語」

貢噶扎西：

「大西藏」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一個術語。那個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解釋，所以我也希望廣大華人朋友能夠了解這一點。

(言及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可行性時，桑東仁波切在接受前述李江琳的訪談中說，中國有些少數民族是散居狀態，他們適合憲法中規定的民族自治；而藏族屬於聚集狀態，因此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符合藏人情況。據此，他明確地說：「要求區域自治不等於要求領土主權。」他說：「那只是如何實行自治行政的問題。自治行政總是在中央政府、中央國會和共產黨的控制之下的，所有的這些都不會缺少。我們只是要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條款，因此並不存在領土問題。」)

北明：

所以說，這「統一居住的現實必須得到尊重」的意思，仍然是一個行政管理的概念。

貢噶扎西：

對。並不是一個領土的概念。沒有說把四川省的兩個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的六個藏族自治州，還有雲南、甘肅幾塊地像搬東西一樣地搬到哪裏去呢？所以，尊者達賴喇嘛一直在強調，我們不應該爭論歷史的問題。因為歷史是各說各話，如果你再去追歷史的話，有一段時間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地位。所以達賴喇嘛不去、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他在向前看。不管歷史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是願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獲得真正自治，我們願意跟十幾億的中國人民在一起。

「中國領導人缺乏信任與自信」

北明：

貢噶先生，對「大西藏」這個話題您還有什麼需要補充？

貢噶扎西：

謝謝北明女士！藉此機會，我想強調兩點。這兩點是導致達蘭薩拉和北京認知差異的根源。

一是中國領導人缺乏信任與自信。北京總用懷疑的目光看待一切，總害怕考慮達蘭薩拉提出的任何建議或訴求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或有損顏面。所以，任何微小的話題他們都會視為潛在的分裂威脅。鑒於北京的這種心態，達蘭薩拉無法獲其信任，無論藏人方面多麼真誠地信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也無論我們的要求多麼合情合理。

二是中國領導人缺乏尋求解決西藏問題辦法的政治意願。北京的領導人總是擔心，他們在西藏問題上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會帶來更多問題，甚至會失去西藏。因此，雙方無法以積極正確的方式溝通。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為什麼藏中關係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六、達賴喇嘛「自治」的要求是 「種族隔離的政治主張」嗎？

採訪時間：2009 年 10 月

採訪地點：華盛頓——加拿大卡爾加里

受訪人： 朱瑞：黑龍江人，小說作家，曾任《西藏文學》編輯，居藏多年。曾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採訪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出版論文集《傾聽西藏》、《略述達賴喇嘛尊者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詩集《秋天的情緒》，散文集《撩開神秘的面紗》等，現居加拿大。



朱瑞肖像

北明：

朱瑞女士，謝謝您接受採訪。

朱瑞：

不客氣。

「大西藏」概念的由來及其誤導性

北明：

最近網上流傳著一篇文章，題目是：〈達賴大西藏自治在本質上是種族隔離〉，作者署名「寒竹」。根據這篇文章的陳述觀點，我查閱了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有關西藏自治的正式表述，就是去年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共中央政府第八次談判中，應邀正式遞交中國中央政府的《關於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在這個建議中，我沒有看到任何種族隔離的要求。我也試圖在這個建議書中找到「寒竹」這篇文章中引述的那些詞彙和觀點，比方說「大西藏」、「大西藏自治」，還有「以種族集團劃分地區」。按照一般的行文規則我們知道，在文章中打引號的那些字是引文，它應當其來有自。朱瑞女士，您是西藏問題專家，您瞭解西藏自治的主張，您也寫過大量介紹西藏情況的文章，請問您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和引述的方式如何看呢？

朱瑞：

達賴喇嘛所尋求的藏區名符其實的自治，就是希望真正獲得在中

國憲法中賦予少數民族的那些權利。具體地說，他希望藏人能在自己的家園裹享受祖輩留下來的傳統的生活方式、信仰自己想信仰的宗教，並且希望自己的家園不被掠奪，希望自己的語言不再丟失。這和此文章中所說的「種族隔離」或者是「以種族劃分地區」簡直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中那些引號的運用，不過是別有用心地誤導讀者，一種虛設。給人一種引自於某篇文章的感覺。事實上，在流亡政府的任何官方文件裹和達賴喇嘛的歷次講話中，從來都沒有這個含義。

北明：

那麼，文中打引號的「大西藏」這個概念，是從哪裹來的呢？

朱瑞：

簽定〈十七條協議〉的時候，毛澤東和周恩來明確地承認了藏區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在1950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時候，還設立一個以藏人桑傑益西為首的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將整個西藏納入一個統一的自治區。後來由於康區的民主改革，引發了西藏各地的抗暴，把藏區納入統一的自治區的工作，就中斷了。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以後，西藏三區就被分為青海的六個藏族自治州、甘肅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兩個藏族自治州、還有雲南的迪慶藏族自治州。這十個藏族自治州加上西藏自治區，就是中國政府法定的十一個藏族聚居地。事實上，這就是中共所說的「大藏區」。這個「大藏區」，應該說，是中共自己劃定的，而現在又說是達賴喇嘛在尋求「大藏區」。達賴喇嘛不過是尋求在這些叫做「自治區」的地方，能夠實現真正的自治。再說，藏區就是藏區，是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沒有大小之分，把藏區前面加上「大」字，其目的就是在撩撥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最後達到孤立藏民族，消滅藏民族，讓西藏問題消聲匿跡的目的。

北明：

按照化名「寒竹」的文章的邏輯是說，如果藏人要求大西藏，就是要求以種族集團劃分地區。這個結論是否正確且不說，那現在我們看到的是藏人並沒有要求大藏區，也就是說，他的邏輯前提本身就錯了。能這麼說嗎？

朱瑞：

對。我前面說過，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各種文件中，都沒有提過「大西藏」這個詞，不知道這篇文章中打了引號的「大西藏」從哪裏而來？！或者是從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的媒體當中借用來的，然後對人們進行誤導。尤其是對那些得到西藏信息很有限的境內的中國民眾，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愚弄，是一種把西藏問題複雜化的陰謀。

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建議」與「種族隔離」指責南轅北轍

北明：

這篇文章還說，「達賴喇嘛為了保證『大西藏』——又是引號——的種族的純淨，提出了兩個具體的措施」：一個是「禁止其他民族向藏人居住的地區移民」，第二個是「把已經在川、青、甘、滇生活了若干代的漢人遷出去」。就您所知，是不是確有其事呢？

朱瑞：

這是很怪誕的說法。第一，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要求過「大西藏」，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了，「大西藏」不過是中共官媒為了挑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一種別有用心的措詞；第二，達賴喇嘛也從沒有要求過所謂的「種族純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尊者只是希望能夠使西藏的文化延續下來，繼續對人類有益。另外，這位化名作者說達賴喇嘛提出兩個具體的措施，這種說法，使我想起不久前楊潔篪，我們的楊外長說過：「達賴喇嘛提出，要在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所謂的『大藏區』，要趕走居住在那裏的中國軍隊、要趕走世世代代在那裏生活的其

他民族的中國人」。我就覺得這位化名作者的說法和楊潔篪的說法完全一樣……

北明：

但是我問您，達賴喇嘛有沒有這樣的想法？有沒有這樣說法？有沒有這樣主張？

朱瑞：

達賴喇嘛在不久前，也就是在2008年12月4日歐洲議會上還重申過，尊者說：「我們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驅逐非西藏人，我們關注的是大規模進藏的漢族，當然也有些其他民族，反過來讓西藏人在自己的家園邊緣化，並威脅到西藏脆弱的自然資源。」西藏高原自然資源的枯竭，事實上是對整個亞洲的威脅，因為亞洲諸大河流的源頭都來自於西藏高原。這和讓漢人遷出去的說法，有天壤之別。就是在斯特拉斯堡講演中，也就是這位化名作者提到的五點和平建議中，達賴喇嘛也明確地提出了——我把原話念一下：「在和會召開，中立化和非軍事化達成之前，中國可在西藏維持有限的軍隊和措施」，並且達賴喇嘛在五點和平建議中，特別地強調了把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國。

所以說，這個人，也就是這位化名作者，在引述達賴喇嘛話的時候，經過了一個扭曲的過程，不僅沒有引用原話、而是把他自己的語言說成是達賴喇嘛說的。所以說，在此文裏，這位作者所有的論點和論據都是虛設的，是一個圈套，要把那些不明西藏問題實質的人，或者得到西藏信息有限的人，圈進一個誤區，進行愚弄和誘導。這也是一種洗腦方式。

750萬漢族移民對西藏文化、生態形成威脅

北明：

聽到您剛才引用的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上的講話，還有其他的

講話，我也想起來，我在四處尋找這篇文章中這些觀點的引文出處的時候，仔細地看了西藏流亡政府提交給中國政府的自治建議書。這建議書是關於西藏自治的正式的表達，是西藏流亡政府新聞部出版的，這是一個權威的表達。但在這個權威的表達裏，我也沒有看到任何他所引述的那些字句以及觀點。我看到的是相反的觀點。相反觀點是在自治條款第四章第十款〈管理外來移民方法的制度〉中，表達是這樣的：「我們並沒有將定居西藏或長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員驅走的想法」。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表述，這讓我想起剛才您所引述的達賴喇嘛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講話，這些說法都是非常一致而且非常明確的。他所表達的，是藏人的擔心。這種擔心就是：如果鼓勵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成員大量移民西藏，結果就會改變西藏現有的社會結構，西藏民族將因此成為少數民族而被邊緣化，脆弱的西藏的自然生態環境將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這是西藏自治條款所表達的一種擔憂。我想知道，您認為這種擔憂是不是合理的呢？這種表述有什麼依據呢？

朱瑞：

這種擔心當然是合理的。現在西藏人在他們的土地上就已經被邊緣化了。他們不能正常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能正常地承繼祖輩留下的精神財富。比如，很多西藏的宗教節日都被禁止慶祝。並且，現在中共已經派出了750萬漢人移民西藏，遠遠地超過了西藏的600萬人口。這種估計還不包括約有30萬或50萬的中國軍隊駐扎在西藏。藏人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連自己的語言都不能說，自己的節日都不能慶祝，甚至自己的帳篷都不能呆，被迫移民到貧瘠的土地，被迫同化……這是當今人類史上最可怕的悲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家肯・黑歐(Ken Hale)說過：「每一種語言的消失，就像往盧浮宮裏投入了一個炸彈。」那麼一個民族的消失，會給人類帶來怎麼樣的損失呢？這種擔心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正在發生。

民族問題源自何處？

北明：

我再問您一個問題，既然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反覆地強調他們不要獨立，他們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之下的自治，而且中國政府也希望人家不要獨立，可是為什麼一定要說人家是要獨立、鬧分裂？一定要說人家是種族隔離？還有一個問題，您一會兒回答我：既然中國所有的宣傳工具說達賴喇嘛要獨立，那你為什麼不把達賴喇嘛要獨立的文件和盤托出來讓別人去瞭解、讓別人去甄別呢？這樣比你自己說來說去要有力得多？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朱瑞：

中共政權，依我看，非常清楚達賴喇嘛的真實意圖，就是希望要在中國的憲法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尋求藏區名符其實的自治。但是他們不想解決這個問題，還想把這個責任推給別人。所以說，他們就賊喊捉賊。也就是把他們正在做和計劃做的事推給達賴喇嘛尊者。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政權一貫的做法，輕車熟路了。所以說像你剛才提到的這位化名叫做「寒竹」的人，就是這些匿名人，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信度。其實，這些為中共辯護的匿名人，他們沒有任何風險，不會受到任何打壓，還要拿著共產黨的工資，卻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可想而知，他們給我們信息的可信度就是零。他們的主要任務和五毛黨大同小異，就是協助中共媒體誤導人們，扭曲真相，挑起民族主義仇恨、挑起大漢族主義情緒。我們都知道達賴喇嘛尊者，他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美國國會金獎的獲得者。這些獎項不是一個玩笑，它不會給一個主張種族隔離的人，它不會給一個與人類為敵的人。

北明：

好，朱瑞女士，非常感謝您回答我這些問題。關於我們剛才談到的這個話題，您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朱瑞：

我覺得非常清楚了，達賴喇嘛尊者他所尋求名符其實自治，就像拉

達克之於印度似的，居住在拉達克這些人，他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要自治，因為他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西藏人為什麼要求名符其實的自治呢？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得到過自治。這就是這篇文章的化名作者迴避的問題，達賴喇嘛尊者所要求的民族區域自治不過是挽救正在瀕臨滅絕的西藏文化，讓一個被壓榨和苦難深重的民族享受最基本的人的權利。如果說把這種努力說成是種族隔離，那就等於把主張平等說成是歧視、把尋求和諧說成是製造混亂、把渴求和平說成是製造戰爭一個道理。這就是為中共失敗的民族政策尋找一種理由，實質是在強辭奪理，也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挑撥民族之間矛盾的陰謀。

七、藏民族是怎樣一個民族？

採訪時間：2009 年 10 月 6 號

採訪地點：華盛頓——達蘭薩拉

受訪人： 桑傑嘉(Sangjey Kep)，漢藏問題專家。 西藏安多人，西北民族學院(現西北民族大學)藏語系藏語言文學學士。 1998 年大學畢業， 1999 年流亡印度， 2000 年進入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西藏之頁》中文編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負責人。



桑傑嘉肖像

一個以身體丈量大地的民族

北明：

請簡要概括一下，藏人與其他民族，比方說漢人，有什麼不同之處？最重要的不同是什麼？

桑傑嘉：

西藏民族是一個生活在高原的宗教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這個民族獨特的生活方式：以西藏本地的本教文化為基礎，以印度傳入的佛教為主線的西藏文化養育了西藏民族。西藏民族基本上全民有信仰，除了絕大多數的佛教徒外，還有本教徒，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等。

自從佛教傳入西藏後，西藏民族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發展佛教事業上，因此，對世俗的政治以及國家的發展不是很重視。特別是在佛教傳入西藏後，佛教不僅在藏區廣為傳播，而且得到空前的發展。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研究發現，當時，在全球的梵文佛教經典有三分之二是在西藏保存下來的。當然，翻譯成藏文的更多。當今世界唯有西藏人繼承和弘揚佛祖釋迦牟尼的佛法經典。盡管中共文化大革命焚燒了無數的古書經典，有幸逃過洗劫的少部分經典，僅僅是目錄，編了四十年還沒有編完。藏人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完整繼承佛教的民族，對人類的貢獻是非同一般。

藏人對信仰的虔誠其他民族是不可思議的，他們可以用身子丈量數千

公里的大地，(磕著長頭)前往聖地拉薩朝拜。西藏人毫不猶豫地把一生積攢的錢財獻給寺院或上師等，同時也為保護佛法付出一切代價。

與漢民族比較，宗教融入西藏民族的日常生活。對於藏人來說，錢財和地位都遠遠比不上宗教信仰重要。藏人為宗教信仰而獻出生命的事例很多，從中共入侵西藏至今，藏人仍然為宗教信仰進監獄，遭打壓，甚至獻出生命。比如說，中共入侵西藏後，在西藏搞所謂的「民主改革」時，政府把藏人趕出他們的家，沒收了房子，沒收了他們愛不釋手的刀槍藏人都忍了，沒有反抗。但是，當中共開始抓僧人，破壞寺院時，就開始引發藏人全面的反抗。這說明藏人對精神生活非常重視。

由於佛教文化的熏陶，西藏民族更具有善良、同情和慈悲心。而且，天生開朗豪爽、誠實、熱愛自由並且關愛眾生。雖然他們會經商、從政、征戰，但不會痴迷於此。升官發財也不是藏人的最終追求，眾生解脫才是藏人終究的追求。藏人承認佛教的因緣觀，盡量會避免做違背良心的事。另一方面，他們也因宗教信仰而具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

北明：

藏人除了是一個依靠信仰，而不是權利、金錢生存的民族，文化上還有什麼其他特徵？文學藝術上有什麼特殊建樹？

桑傑嘉：

在男女平等問題上，西藏社會本是個非常開明的社會。在歷史上，西藏婦女從來沒有像印度婦女一樣戴面紗，也從來沒有像中國婦女纏小腳。而且，西藏男女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男人可以出家，女人也一樣可以一輩子在寺廟內學習佛法。

在文學上，西藏民族創作了世界上最長的詩史——《格薩爾王傳》，是西藏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在建築史上，西藏人靠自己勤勞的雙手和智慧修建了世界上著名的布達拉宮、桑耶寺等建築。西藏還有世界藝術殿堂裏耀眼的藝術作品——唐卡等等。

西藏民族雖然是個小民族，但是個非常勇敢的民族。如，中共靠龐大的軍事力量佔領了西藏。但是為了自由、尊嚴，西藏境內外的藏人對

極權共產政權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六十年來從未向專制政權低頭，一直到今天。

將一個民族定性為：愚昧、落後的民族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不同的民族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不能用某一個民作的文化標準去衡量另外一個民族。如果以中國文化為衡量標準，認為西藏文化是個落後的文化，西藏民族是個愚昧的民族，那麼，以西藏文化為標准去衡量，藏人也可以認為中國文化落後，並且可以認為他們不信仰佛法，很愚昧，很野蠻。

一個以頭顱叩擊神聖的民族

北明：

一個老藏人在傳統的生活方式中一天的日子怎麼過呢？

桑傑嘉：

49年以前，藏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分成：放牧，務農，手工業和經商等。以祖傳的地域範疇為生活地域，以各地的本波（「頭人」之意。是西藏各地方民間領導人，相當於漢族鄉村的鄉紳。——北明注)為領袖，大的領域有西藏政府領導，其他的各自為政，所有的問題由當地本波處理本波無法處理的問題將由噶廈政府出面解決。

西藏老人起床較早，一醒來先坐起來念誦「唵嘛呢叭彌吽」——三寶保佑，感謝三寶等。起床洗臉後，點酥油燈，供水，煨桑(一種火燒檀木等的供養方式)。有的會出去轉經，有的在家中。然後，家人將茶端上，有時會在茶中加糌粑——吃圖瑪。喝完茶老人們開始念誦祈禱文，有的老人念很久，一直到家人做完早餐，再和家人一起吃早餐。早餐後，家人去做事。家中如有小孩，老人會帶小孩一起去附近的寺院或廟中朝拜，繞寺院轉，轉嘛呢(經輪)、磕頭。

北明：

一天要磕多少次頭?

桑傑嘉：

每天一般會磕頭的次數大概 500 次到 1,000 不等，看自己所能。然後，一般會和同村的老人們聊天，談論他們年輕時的事情。老人們會對某個村民的不良行為也提出批評。有時也為一些事情爭論不休。如果，某個家庭舉行宗教活動，老人們自覺地去幫忙或一起誦經。寺院或廟宇的僧人們會提供中午飯。中午飯後老人們會繼續轉經輪或磕頭或念誦經文。太陽快下山時，老人們帶著孩子返回家，幫家人看牛羊等。天黑後，老人一般不會在外面活動，進入廚房幫家人燒火，並在火灶前烤火默默念誦祈禱文。或者手持經輪不停的轉經輪。家人將晚飯第一個盛給老人。晚飯後，老人會和家人一起聊天，晚輩會談一天的工作情況，請教一些問題，並尋求老人的意見。晚輩一般都會聽從老人的建議。商量完家事後，全家老小一起念誦經文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然後，老人們回寢室睡覺。

如果是本地有聲望的長者，將要擔負村子或部落中的領導和顧問的角色，解決糾紛、調解矛盾、連親說媒、教育晚輩等等。如果是很有佛教修行成就的長者，他在晚年會收徒帶弟，傳承他一生的修行訣竅法門，為佛法的弘揚做出貢獻。

一個以經文編織未來的民族

北明：

你的父母親會念誦經文嗎？

桑傑嘉：

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會念經文。

北明：

睡覺以前也會念嗎？

桑傑嘉：

是的，睡覺前一定要念。

北明：

加起來會念多少個小時呢？

桑傑嘉：

大概早上要念三個小時，然後，晚上兩個小時。

北明：

所以加起來五個小時？

桑傑嘉：

對，一般會念五個小時。

一個以輪迴收發生命的民族

北明：

達賴喇嘛強調說西藏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請提供一些數據說明這個定義。

桑傑嘉：

中共入侵西藏之前，西藏有六千二百五十九座寺廟，有五十九萬兩千五百五十八名僧尼。而且，當今的西藏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當然，包括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有其它教的。但更重要的是，不管西藏人信仰什麼宗教，他的文化是以西藏佛教文化為根基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民族確實是個「宗教民族」。

北明：

當時西藏的人口有多少呢？

桑傑嘉：

當時的西藏人口是六百萬。

北明：

接近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差不多十個西藏人裏面就有一個僧人？

桑傑嘉：

對，大概就是這樣。而且，多數出家者是從四五歲開始出家的，也

有一部分是成人後出家的，但數量相對而言較少。

北明：

也就是說四五歲到十幾歲這些年齡的都有出家的可能？

桑傑嘉：

對！而且，一般大家都會較選擇早出家。因為，要系統的學習西藏佛教文化，必須要很小開始學習。這樣才有可能一生修完西藏佛教主要理論經典。更主要的是：僧尼是西藏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而且，寺院兼學校、博物館、文化和經濟中心、宗教活動場所等。對於西藏民族來說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而且，西藏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宗教融於其中。宗教是西藏文化的基礎和主線，對於藏人來說宗教是一種精神信仰，也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引導著藏人的精神和世俗世界。

北明：

宗教引導著藏人的精神生活這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宗教是怎樣引導藏人世俗生活的呢？或者說藏人世俗生活中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呢？

桑傑嘉：

總的來說，藏人的價值觀與西藏佛教的價值觀息息相關，相信因果報應，相信六道輪迴。所以，藏人對升官發財等的追求不是非常極端，生活中具有很大的知足心。對發生在身邊的任何事件都可以用比較平和的方式思考。因為他們相信因緣觀。

在西藏文化中很少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升官發財」、「便宜不佔白不佔」之類的思想。相反，傳統西藏價值始終會警告你，錢財乃身外之物，如草尖的露水。倡導知足，眾生為母的思想，提倡布施。同時藏人喜歡平等自由的生活，通常不會去欺負和打壓弱小群體。另外，藏人對死亡看得非常平淡，死時多半比較安詳，沒有恐懼感，認為死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再次生命的開始。

從藏人的群體性事件也可以看出藏人關注的焦點在哪裏：近五十年，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發生的群體事件都與經濟有關。比如佔用土地、

工人抗議等與經濟有關。但是，在西藏發生的每一件群體事件都與宗教壓制、迫害有關。這說明藏人的價值觀與宗教有密切的聯繫。

丟失的西藏，1959年

北明：

這樣崇尚精神生活的民族在現代化的社會裏如何養活自己呢？藏人喜歡經商嗎？

桑傑嘉：

很多人對西藏傳統社會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以為傳統西藏社會只有所謂的「農奴」和「農奴主」。事實上西藏傳統社會結構中除了農民、牧民、貴族和僧侶之外也有手工業者和經商者。中共入侵西藏前有為數眾多的藏人經商者，也有規模較大的商家。如邦達家族等。他們通過馬幫從事國際間的貿易，從印度的大吉嶺進口物資到西藏，這些產品是來自世界各地。所以，49年之前在拉薩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國際產品。總體而言，藏人的宗教意識比其他民族強。不過藏人已經融入了現代社會中，成為了現代社會的組成部分。藏人不僅輸出了價值觀，同時也受到現代社會的影響，吸收著現代文明的精髓。

比如，流亡社區西藏的寺院也開設科學知識課程，而且，也和西方科學界舉行定期交流。寺院也用電腦，電視等現代科技產品進行教學。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國如同這些國家的人民一樣，進行各行各業的工作。其中也有工程師，教授，學者，醫生等專業人才。藏人當然可以在現代社會裏與世界人民同步發展，五十年來的流亡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事實。總之，藏人五十年的流亡生活證明了西藏人民完全可以與世界六十億人民同步發展，並且完全可以按現代生活方式生活。

北明：

60年過去，大陸的中國人和台灣的中國人，在價值觀念、生活習慣上形成了很多不同。你覺得你流亡之前和已經流亡藏人之間，有沒有不

同？

桑傑嘉：

我們小時候，我們村子的小孩都不會講漢語。但是，現在的藏人小孩和我這個年齡的藏人已經不能說一句完整的藏語了。我出來之前，用藏語數到二十後，就無法繼續用藏語數下去，就很習慣的(用漢語)數「二十一」、「二十二」……。語言的漢化問題非常嚴重。

北明：

剛到達蘭薩拉的時候，你習慣這裏的生活方式嗎？

桑傑嘉：

流亡到印度之後，我才發現我身上根本沒有西藏傳統文化的痕跡，如早上一般藏人都會祈誦的經文，我都不會，但是，達蘭薩拉的小學生都可以非常流利的背誦那些祈禱文。當時覺得非常丟人，二十多歲的人站在小學生前，一句經文不會！而且，小孩們吃飯的時候會很自然的按西藏傳統方式先念祈文，然後才會吃。我們根本沒有那樣的概念，拿上碗就開始吃。發現小孩們還在誦祈文時，感到無比的羞愧。感到我們之間的區別很大。

還有些事情，讓我覺得難堪：在西藏時，村子裏的小孩看到一條蟲子，他們就毫不猶豫地去殺死它，似乎這是很自然的事。看到一隻美麗的小鳥，他們的第一個反應，也是去拿彈弓打，想方設法去捕殺。但是，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小孩們，如果看到小蟲子，會很自然地去把它小心地撿起，或想辦法把小蟲用紙包上，送到草叢等安全的地方。當我站在這些小孩面前時，我感到無比的慚愧，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做。

西藏價值是人類價值

北明：

你現在還害羞嗎？你會念經文了嗎？

桑傑嘉：

我一直在努力，現在基本上會念那些最簡單的早晚祈誦的經文。所以我媽媽知道後也很高興，自己也感到非常高興。

北明：

你認為西藏的宗教文化對人類和未來有什麼價值？

桑傑嘉：

西藏宗教文化將對人類未來的共存與和平有巨大的價值。因為，西藏佛教提倡和平，慈悲和愛心。她對單獨的個人具有平和心靈的功能，個人的這種平和將會創造平和的社會，平和的社會將會造就一個和平的世界。而且，這種和平並非來自強制，是來自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所以是永久的，是真正的和平。這一觀點得到了西方精神學家、情緒學家和大腦研究者的證實。

漢化大趨勢教會藏人主權和人權意識

北明：

關於西藏民族特性問題，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桑傑嘉：

我想補充的是，中共入侵前，西藏人對國家、主權並不非常關注，只要自己能按自己的生活方式過日子就滿足。中共對西藏的入侵和強迫改變西藏人的生活方式，使藏人開始對國家、主權等產生新的認識。因為中共不考慮藏人需求，去破壞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使藏人重新認識國家及主權的重要性。事實上，西藏人的國家以及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說是被中共逼出來的。

而且，中共仍堅持錯誤的對藏政策，不解決西藏問題。西藏人的反抗運動將永遠會持續下去，這一事實2008年得到了證實。其實，讓藏人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尊重藏人的信仰、文化傳統。西藏人和任何其他民族都可以很和諧地生活。

八、達賴喇嘛是怎樣一個人？

採訪時間：2009年10月12號

採訪地點：華盛頓——北京

受訪人： 唯色(Woeser)，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文革時期出生在拉薩，曾在西藏東部及中國漢地生活、學習多年。前拉薩《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因出版《西藏筆記》被當局認為有「政治錯誤」，書遭查禁，人被解除公職。此後有多部關於西藏的著述如《殺劫》、《西藏記憶》、《名為西藏的詩》、《看不見的西藏》、《鼠年雪獅吼》、《聽說西藏》在台灣出版，並被譯成多種文字。



唯色肖像

深孚眾望，一言九鼎

北明：

請描述一下，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是怎樣的？重要到什麼程度？請舉例說明。

唯色：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有一次，在接受英國電視四台的採訪時，我轉達了境內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深厚感情。我是這麼說的：達賴喇嘛作為藏人的宗教領袖，讓我們從信仰上皈依他；作為藏人的民族領袖，他在全世界的聲望讓我們深感自豪！當時，我剛結束在多衛康的旅行，有足夠的事實這麼說。在全藏地，無論走到何處，無論見到的是市民、農民和牧人，還是僧侶、教師和學生，甚至體制內的許多藏人，每每說到流亡中的達賴喇嘛總是激動不已，無比虔誠。

這裏，我想說一個故事。 2006 年初，達賴喇嘛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舉行法會時，批評在西藏境內出現的買賣和穿著珍稀動物皮毛的行為，講話傳到境內西藏各地之後，在藏人當中引起強烈震動，成千上萬的藏人一把火就把昂貴的豹皮虎衣給燒了。直燒得共產黨的官員們火冒三丈，甚至在紅頭文件上宣佈：「一定要奪回被達賴奪走的人心。」其方式是，不准燒皮子，不但不准燒，還得大張旗鼓地穿。於是，在藏地的各種節慶上，穿不穿皮子成了某種像徵和分野。凡是民間節日，沒有

人再穿豹皮虎衣；可只要是官方組織的節慶，就必須得 穿豹皮虎衣，否則會挨行政處分甚至更重的懲罰。

焚燒豹皮虎衣的行為既是出於環保，其實更主要的是表達了藏地民眾對達賴喇嘛的信仰，我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聽到藏人們吐露真言：「如果連嘉瓦仁波切的話都不聽，那還聽誰的？」而當局為之惱怒的也恰在於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全藏各地的強硬統治並未收服民心，一位手無寸鐵、遠在千萬里之外的老人，只說了幾句話就能夠激起這麼大的反響，難怪有國際媒體報道，焚燒皮毛「凸顯藏人對達賴喇嘛的信服，只要達賴喇嘛一聲令下，藏人無不遵從。」

又比如， 在藏地，每年都有成千上百的藏人，包括小孩子，冒著被中國邊防軍警槍擊和逮捕的危險，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翻越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雪山，逃往遠離故土的印度，最主要的願望就是朝拜達賴喇嘛。

2007年震驚世界的「囊帕拉槍擊事件」發生之後，自由亞洲藏語部採訪過幾個槍口餘生的逃亡藏人，其中一位23歲的僧人土登次仁說，不為別的，就想見嘉瓦仁波切，從小就信仰他，如果見了他，明天後天死都可以。

至於像我這樣的藏人，從小接受的是共產黨的洗腦教育，並作為黨的接班人來培養，可謂一帆風順，只要順從，就會有很好的前途。當然，我也從來沒有親眼見到過尊者達賴喇嘛，可是，就像是身體基因裏本來就有著對達賴喇嘛的信仰，自然而然地，當我在成長之後擁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判斷力，早已深入血脈的信仰和情感便復甦了。事實上，正如去年的西藏事件所顯示的，絕大多數走上街頭抗議的人，都是在所謂的「解放」後出生的一代，這些在共產黨的五星紅旗下長大的藏人，不論男女，不分僧俗，舉著達賴喇嘛的畫像，向統治者呼喊「讓我們的達賴喇嘛回家」。

我寫過一些獻給達賴喇嘛的詩和歌詞。其中有一首歌詞〈在路上〉，這裏我想朗誦它，我希望有一天，它會變成一首歌，在藏地、在更多的地方傳唱。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熱淚盈眶
懷抱人世間最美的花朵
趕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只為獻給一位絳紅色的老人

他　是我們的益西洛布
我們的袞頓
我們的貢薩確
我們的嘉瓦仁波切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熱淚盈眶
懷抱一束最美的花朵
獻給他，獻給他
一縷微笑
將生生世世繫得很緊

中國官方妖魔化達賴喇嘛助長藏人的憤怒和離心力

北明：

外間關心西藏問題的輿論基本認為，中 國官方控制的媒體對達賴喇嘛本人的評價是不公正的。在這種情況下，上述至尊地位，在大陸藏區藏民心中是否有些變化？為什麼？

唯色：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從 1959 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之後，就沒有停止過。在中共強悍的宣傳攻勢中，達賴喇嘛被賦予「最反動

的分裂主義分子」的形像，而且被固定、被強化、被灌輸。多少年來，無論文革時用漫畫醜化，還是今天動輒斥責世界上凡是歡迎達賴喇嘛的國家和領導人，中共從未放棄過對達賴喇嘛的攻擊，而這只會助長藏人的憤怒和離心。

前幾年，中國的官方媒體發佈所謂對藏族人民做的調查，宣佈說藏族人民根本不信仰達賴喇嘛，都認為他是「分裂祖國」的「壞分子」。中共的西藏官員們也對世界說「西藏的老百姓並不歡迎達賴回來」，企圖給世界這樣一個信號：在今天的西藏，達賴喇嘛已經完全喪失信譽； 在今天的藏人心中，達賴喇嘛已經成了最不受歡迎的人。然而，這個就像煙幕彈一樣的信號卻是最大的謊言，也是最無恥的謊言。

當然這個謊言對於西藏人並不陌生，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成為最令世人尊敬的流亡者，整整半個世紀，這個彌天大謊就像一張大網籠罩在藏人的頭上，雖然令人窒息，卻也無人相信。並且，更加堅定藏人對尊者的信仰，甚至不惜以生命來捍衛這份信仰。

北明：

請舉些例子說明這種不可抑制的崇敬。

唯色：

比如2007年10月17日，美國國會向達賴喇嘛頒發金質獎章。當這個消息傳到藏地，如拉薩，儘管連日來，所有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各寺院、各學校、各居委會，已經大會小會嚴厲禁止各種慶祝活動，違者必究，可是在這天清晨，身著節日盛裝的藏人們在拉薩各條轉經路上，以傳統的慶祝方式點燃香草、拋灑糌粑，以至拉薩城的上空桑煙彌漫。許多藏人還去各寺院朝拜，供奉酥油燈盞，頌讚達賴喇嘛。布達拉宮廣場人流如潮，即使拉上了警戒線，藏人們依然向布達拉宮磕頭。拉薩最大的寺院——哲蚌寺的僧侶用傳統的慶賀方式，重新粉刷佛殿外牆，結果信眾被軍警驅逐、毆打，寺院被封鎖，僧人被軟禁。

發表的文章，其中寫到：「我和我身邊所有知道這一喜訊的同胞都感到無比自豪和喜悅……這也是繼諾貝爾和平獎後，世界對達賴喇嘛卓越貢獻的又一肯定，它不止是達賴喇嘛的榮耀，更是境內外西藏人民的榮耀，

發表的文章，其中寫到：「我和我身邊所有知道這一喜訊的同胞都感到無比自豪和喜悅……這也是繼諾貝爾和平獎後，世界對達賴喇嘛卓越貢獻的又一肯定，它不止是達賴喇嘛的榮耀，更是境內外西藏人民的榮耀，是西藏歷史的榮耀！這榮耀的火把不僅點亮了西藏的自由之路，更點亮了所有在黑暗中尋找自由的人們！」而在中國內地學習的年輕藏人，也在網上激動地談論著。有人說：「我是一個普通的藏人，我不在乎我們的嘉瓦仁波切得到了什麼獎，我只有個美好的心願，希望他能回到聖地拉薩！」

2008年，西藏高原爆發震動世界的抗議，令世界為之震撼，認識到藏民族對於中共五十年的統治並不接受、並不認可。而那麼多的農民、牧人、市民、學生、僧侶，甚至體制內的藏人，自發地、普遍地做出這樣的選擇，表達的是分佈在中國行政區劃中五省區藏人休戚與共的願望。在抗議中，最多的呼籲就是「讓我們的達賴喇嘛回家」、「與至尊達賴喇嘛對話」、「祈禱達賴喇嘛長壽」，許多藏人被捕、甚至被打殘、被槍殺，是因為在軍警的搜捕中，不願意被軍警逼迫著把達賴喇嘛的法像扔到地上用腳去踩。

就在昨晚，我的一位年輕的藏人朋友傳給我一首歌，都是從未親眼見過達賴喇嘛的年輕藏人寫的、唱的，是獻給尊者的歌，讚頌他是慈悲的英雄。其中唱到：「當漂泊的靈魂迷失方向的時候，就如閃電般的智慧穿越了黑色的輪迴，這真理漸漸洞開了心靈的窗口……當苦惱的眾生告別快樂的瞬間，就如陽光般的慈悲溫暖了朦朧的沙漠，這真理漸漸縫補了難愈的傷口……哦，多麼偉大的上師、多麼慈祥的上師，你是我們心中的太陽。」

輿論宣傳誤導，國人誤解甚深

北明：

作為一個常駐北京的藏學者，作家，您認為達賴喇嘛在大陸普通漢人的心中是怎樣一個人？

唯色：

去年3月 的西藏事件，在西藏歷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意義。它不但成

為藏人集體記憶中重要的一頁，也第一次很清楚地凸現了藏民族在中國的地位問題。由於在中共強大的話語權的控制、遮蔽和曲解下，許多中國人受到當局的那種妖魔化、標簽化、污名化的宣傳影響，對西藏對藏民族尤其是對尊者達賴喇嘛，產生了非常錯誤的認識。

我見過一個中國有名的醫學專家，她的西藏印像至今停止在被意識形態的宣傳全然固化的文革年代，因為她說：西藏現在還有蠍子洞嗎？我們當年就聽說了，布達拉宮有個蠍子洞，農奴主動不動就把農奴給扔進去，讓蠍子活活咬死。而在《西藏今昔》的展覽上，一位漢族老人指著達賴喇嘛的照片告訴幼小的孫子：「他是壞人」；在《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覽的留言簿上，一個中年女子奮筆疾書：「叛亂分子太可惡了，就應堅決平叛！」

這裏，我再講一個我經歷的故事，說來荒誕。去年的一天，在西單的一家曾經銷售印度服飾的小店，因為沒看見印度的東西，我就問那個化濃妝的服務員是什麼緣故。猜猜她的回答是什麼？她居然說：「就是因為那個達賴跑到印度去了嘛，現在那邊打仗，貨都發不過來了。」我又好氣又好笑，在經歷了2008年之後，我們的尊者達賴喇嘛，看來是多麼地深入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心啊。

實際上，許多中國人不但不了解尊者達賴喇嘛，也缺乏起碼的尊重，不但在口頭上很無禮地直呼「達賴」，輕易挫傷藏人的內心，在網絡上的表現更是全無教養和修養，令人感慨這個國家的國民素質竟然下滑到這樣的地步，五千年文化中的優秀品德幾乎喪失殆盡。

慰，對於尊者達賴喇嘛以及中間道路的認識，以平等的情懷和真誠的心願，從不了解到逐漸了解，其意義非同小可。

「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

北明：

根據您的了解，達賴喇嘛自己如何看待、如何感受中國百姓對他的看法？

慰，對於尊者達賴喇嘛以及中間道路的認識，以平等的情懷和真誠的心願，從不了解到逐漸了解，其意義非同小可。

「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

北明：

根據您的了解，達賴喇嘛自己如何看待、如何感受中國百姓對他的看法？

唯色：

尊者達賴喇嘛素來對中國人民抱有期望，並且總是向中國人民示好。比如，尊者有一段開示是令人非常難忘的，我曾經抄錄下來貼在電腦後面。尊者說：「……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做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與中國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一項根本的原則。」所以尊者經常要求藏人與漢人交朋友。

尤其是在藏中第八次會談失敗之後，達賴喇嘛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越來越淡薄，但對中國民眾並沒有失去信心。

也正因為如此，尊者達賴喇嘛每次出訪世界各地時，總是要花很多時間和心血，與在各地學習、生活的各界華人見面、交流，袒露心扉，直抒胸臆，打動和感化了許多華人。

只是遺憾的是，由於中國當局素來對言論自由的控制，對真實信息的限制，大多數中國人無法了解得到達賴喇嘛的真實思想，也就容易受官媒那種妖魔化宣傳的影響，對達賴喇嘛的錯誤認識，其實是不容樂觀的。在這一點上，生活在中國境內的我深有體會，這無疑令人傷感。

「他表達了藏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堅忍」

北明：

請具體概述一下達賴喇嘛的成就。

唯色：

在拉薩的時候，我曾經聽一位僧人對我說，他遇見一位來寺院朝拜的西方人，贈給他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並且告訴他，1959年對於你們藏人來說是不幸的，因為你們失去了很多；但是對這個世界來說卻是幸運的，因為達賴喇嘛的被迫流亡，使得世界認識了西藏，使得世界上許多人因此獲得學習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寶貴機會。

1959 年 3 月 起， 24 歲的達賴喇嘛被迫離開故土，從此在漫長的流亡歲月裏奔走呼告，勞心力瘁。而每一位藏人，無論境外的還是境內的，無不承蒙著他的綿長恩惠。我曾經寫過：雖然藏人不幸，在於生為藏人而不是別的什麼人；但藏人有幸，在於藏人因為有了達賴喇嘛，世人才知道了藏人的苦難和善良。從一個民族的角度來說，達賴喇嘛的偉大，在於他表達了這個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堅忍。這是我們共有的因緣賜予我們最大的幸運和恩情，感謝三寶，從未放棄我們！

在藏人的觀念中，達賴喇嘛是像徵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對待所有眾生都慈悲為懷。而在流亡異國的歲月裏，達賴喇嘛大力推動流亡西藏社會的民主化，人人生而平 等、保障人的權利等民主理念，與佛教的利他精神構成尊者的人生智慧。事實上，評說達賴喇嘛的貢獻與成就的文章已經非常多，無論藏文、中文或英文。在這裏，我想要概括地說，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西藏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他對西藏、對藏民族、對世界、對人類的貢獻，以及他作為佛教領袖，在佛法的修行與實踐方面的成就，非筆墨所能形容。

自我人認同是「比丘」

北明：

據您了解，達賴喇嘛如何看自己，定義自己？

唯色：

多年前，仔細想想，也有十多年了。在拉薩的我，很不容易借到了渴望很久的一本書：達賴喇嘛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記得我當時激動得手都在發抖。要知道，在拉薩，讀達賴喇嘛的著作，聽達賴喇嘛的錄音，看達賴喇嘛的視頻，只要被秘密警察發現，那都會出事的。有些藏人被捕就是因為這麼簡單的理由。

因此，我從達賴喇嘛自傳上讀到的第一段文字，可謂刻骨銘心。而這段文字，即是尊者達賴喇嘛對自己身份的介紹。是這麼寫的：

「『達賴喇嘛』的意涵，人言人殊。有些人認為我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有人視我為『法王』。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隨後我出走西藏，展開流亡生涯，即遭詬詆為反革命分子與寄生蟲。無論上述稱謂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認為『達賴喇嘛』是一個示現個人職務所繫的頭銜。在下僅是一介凡夫，一個不經意間走上僧途的藏人。」

寥寥數句，意味深長。從宗教那至高無上的位置，到政治那充滿詭譎的多變，最後回到非常簡單的自我認定，西藏當代史的風雲變幻已然披露無疑。而尊者達賴喇嘛，作為得大成就的大自在者，並不在意名義上的繁文縟節。所以我們常常可以看見他的簽名很簡單，僅僅是在名字前寫上「格隆」，意為比丘，接受了佛法戒律的普通僧人。

北明：

關於「達賴喇嘛是什麼樣的人」這個話題，您有什麼要補充的？

唯色：

西藏問題並不是達賴喇嘛一個人的問題，也並非有一天，達賴喇嘛圓寂就會帶走藏人和藏文化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達賴喇嘛會乘願再來，藏人也會在濃縮佛教精神的藏文化這一精神支柱下繼續奮鬥。也許將來會有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就像尊者達賴喇嘛在1959年流亡印度，最初也有一段很困難的時期。但只要藏人團結起來，承擔起身為藏人的責

任，就沒有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當然，那樣的明天必須靠努力才能得到，如果認為可以靠國際或中國的恩賜而獲得，認為一切會很快或者很容易就能實現，那才是不可能的。

近年來，在藏人的知識分子和年輕學子當中流傳著達賴喇嘛的教導：「堅持佛教慈悲與智慧以及真誠和善意的信仰，堅持以寬容和耐心讓敵人成為親人，堅持以溝通和平等換取信任和理解 」。達賴喇嘛的這句話是諄諄期望，更是中間道路，而我們要走的正應該是這樣的道路。在年輕的藏人中間還流傳一幅令人心酸的漫畫：達賴喇嘛艱難地拉著一輛在泥濘中緩慢前行的車，坐在車上的藏人衝著他的背影雙手合十，口誦祈禱。



藏人中流傳的漫畫。圖畫車上藏民：「皈依你」。腳下路標：「獨立」。落款是「洛頓南林，93年」(唯色提供)

年已七旬的達賴喇嘛是西藏人的精神之父，作為他的孩子，我們理應盡自己的本份為我們的父親分擔，讓他不要太辛苦，衰老得慢一點！我們更應該以各自的方式去努力，讓我們有早日團聚的一天！

北明：

謝謝。

藏土出中國

達蘭薩拉啟示・流亡西藏訪談

作者 / 北明
出版印行 / 田園書屋
地址 /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電話 /852-2385 8031
傳真 /852-2770 2484
電郵 /gfbook@netvigator.com
初版一刷 /2010 年 12 月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339-089-7

定價 / 港幣 **85** 元